世界十大文学家

主编 曾繁亭



天·地·人

李大可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世 界 十 大 文 学 家

艾汶河畔的天鹅　莎士比亚传
雾都明灯　狄更斯传
未完成的雕像　巴尔扎克传
法兰西诗神　雨果传
天·地·人　歌德传
爱的先知　托尔斯泰传
炼狱圣徒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孤独的雄狮　海明威传
乱世流萍　杜甫传
寂园飞鸟　泰戈尔传


ISBN 7-202-02412-8
9 787202 024126 >

世　界　十　大　文　学　家

主编　曾繁亭

天·地·人

歌　德　传

李大可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丛 书 题　世界十大文学家
丛书主编　曾繁亭
书　　名　天·地·人
歌　德　传
作　　者　李大可　著
选题策划　王　静
责任编辑　王　静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李　欣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50000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7-202-02412-8/I·529
定　　价　15.00 元

代序

谛视大师

一

面对一部部历经时光的冲刷却愈益熠熠生辉的文学名著，我们是在倾听大师们的灵魂在说话。情感披覆着暮影，神秘莫测，与之交替的是宏大深邃、透彻骨髓的精神之清明；天空中时而是温暖的阳光，时而是血一般发红的深奥极光，时而是划破苍穹的电光，每一个内容封闭的文本，都为我们展现了一大片无垠的心灵世界。因而，也只有在内心的最深处，我们才有望与它们有所关联。

是的，总有些东西会突破那层风尘迭就的坚硬外壳，渗入我们枯涩的心田，恰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我们为此或激奋，或忧伤，或悲怆，周身因心灵的感动和慰藉而充满了力量。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羞惭、窒闷地感到，这片幽深悠久的风景，对于我们这些平常人的肉眼是太过旷大了；那些宏大深邃的思想，对于我们这些平常人的心智也实在过于飘渺晦暗，无路可循。为此，我们又陷入沉沉的迷惘和郁思之中，深感自身精神的单薄、贫弱和渺小。《哈姆雷特》、《浮士德》、《卡拉玛佐夫兄弟》、《老人与海》、《吉檀迦利》……这些千古不朽的名著在我们心头唤起的不正是如上两种体验吗？

在平淡、纷乱、激荡、混沌的人生之流下面，潜存着人生宏大深邃、神秘古奥的本质。那些最伟大的天才艺术家，也就是被人们通常称为大师的人物，仿佛上帝的灵魂附体，以其鬼斧神工的艺术杰作，突破了人生的表层，切入到人生的最深处，触摸到了构成人生本质的那些宏大深邃、神秘古奥的东西，然后像精灵一样，吐出了一串串神奇的秘语。由此来说，大师犹如先知。他们驾着语词的云朵，不断地从俗世的沼泽地向上升腾，升腾……终于融入太空，凝为镶嵌在天幕上的启明星，以亲切清冽的光芒照耀着大地上暗夜行路的人们。是了，万籁俱寂、空气中漾动着温润心绪的夜晚，独自倚楼凝望，清明夜空中遥远的星星，难道不正是因此每每使我们感动？

大师们因其不朽的名著而名垂千古，那是因为这些作品是他们生命燃成的璀璨火花。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师原也是与我们凡夫俗子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缘何他们的生命可以燃出璀璨的光华？这套丛书将会昭示——光华的闪烁不但来自天禀的优异，而更源于“痛苦”的击打。

二

揭去历史的尘封，检视大师们在沼泽地行走的足迹，我们发现，那些“来自过去而又始终就在眼前的”先知们的路，原是一条既在升腾中坠落又在坠落中升腾的路；那些在作品中为人类创造出了一个个集真、善、美于一体的艺术世界的伟大人物，其个人生活原是充满着那么多令人惊讶的混乱与矛盾：浪荡与严峻，放纵与沉郁，天真幼稚与深邃博大，美的逸乐与生之痛苦，盛名远播与坎坷潦倒，激越的反叛与自由的虚无……大师们那跌宕多姿、丰厚沉实、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不惟为其令人荡气回

肠的不朽杰作做了最好的注解，而且其本身原亦就是一个个气韵生动、引人入胜、浪漫而又真实的故事。

造化将天才艺术家的人生雕琢成了最完美生动的艺术文本。大师们不但用笔墨描绘着五彩的人生，而且同时也用自己的骨血谱写着绚丽的艺术篇章。我们不得不承认，就生存的质地而言，大师们的确异于常人。如果说我们常人的生命过程是在时间的绵延中慢慢“氧化”，那大师们的生命存在则堪称是在充满着烈焰与浓烟的钢炉中炽炽“燃烧”。

沼泽地上大师们留下的那混乱而又矛盾的人生足迹昭示我们——他们在人性上并不比常人更完善或更完美，他们在心智上也并非比常人高超优异许多；而精神夜空中大师们刻下的那痛苦而又曲折的升腾轨迹又分明在说——他们生命的本真和心灵的诚挚不同于常人，他们对人类绝对本质和人生终极价值的执著求索与追寻亦不同于常人。因了前者，他们命定地具有自由、刚劲、恣肆的狂放个性，并突破了芸芸众生凭依为人生之本的伦理的人生范式；凭依后者，他们拥有了“宁愿不要百万家财，也要弄清思想”的强大意志，并超越了芸芸众生那种追求物欲“幸福”的功利之心。由此，大师们便成了内心满是焦虑不安但又极其沉雄肃穆的奇异人物，他们怀有极其原始、狂乱的生命欲求，从来不知餍足，不知节制，只顾在严寒和酷热中伸手拚命朝“无限”抓去，永远在生活的沼泽地和思想的汪洋中饥渴地奔突……

是的，大师们有时也需要宁静与平和以利于工作，但却又更经常地需要痛苦和混乱来激发灵感。他们天生不可能太长久地沉浸于舒适安逸的生活，而更需要用强烈的感受来打破其视之为颓废与寂灭的秩序与稳定。他们似乎都从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进程是微波荡漾，而更愿涉入激流，历过险滩，降滔天洪浪，驭汹涌波涛……命运应和了他们的生命欲求，便从不让他们心安理得，绝

不容他们懒惰自在，更不允许他们像常人一样步入稳定、舒适同时也乏味、平庸的“康庄小道”。它总是在他们刚刚抓住幸福的衣裾作片刻停留的陶醉之际，用其无形有力的手掌适时将他们推进燃烧的灌木荆丛，推下绝望的无底深渊。从一个漩涡被拨向另一个漩涡，由一次动荡被掷向另一次动荡，大师们那注满热情之血的生命之舟，在奔腾不息的人生变幻之河上忽高忽低，起伏不定……

因其生命逸出常规，于是贫穷、困厄、疾病、灾难排着长队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因其精神绷向天堂与地狱的两极在神魔之间延伸，于是孤独、彷徨、非难、迫害以及后来的浮名虚位竟相蚕食着他们的灵魂。这些行走在布满苦难、罪恶与荒诞的大地上的圣徒，坚毅勇猛地从吞噬他们的大浪中一次次挣扎着浮出水面，劲健凌厉地跨越一道道壁障向上飙升。这些伟大的“思想的受难者”，虽九死一生历尽磨难，却其犹未悔仍在期求着风暴的洗礼；虽形容枯槁面色憔悴，却其念更笃仍要渴饮苦痛的佳酿；虽筚路褴褛伤痕累累，却仍始终大笑着直面人生的惨淡，高蹈着力与美的欢歌。

三

谛视大师，我们发现，作为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大都是孤独的忍者。毫无疑问，大师们人格特征的首要方面便是他们的独创性；正是这种独创性及其所衍生的超前性，决定了他们常常是一些受当时社会群体排斥的人。平庸之辈总是与时代共生死，而伟大的天才虽名垂千古，却常常是屡遭时人诟病，直至后世才得到承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千多年前，中国大诗人陈子昂登台一呼，喊出了多少文

苑奇才的心声！在这种不无幽怨的感慨中，我们进一步看到，大师们的悲剧，不仅在于他们的见弃于群体，更在于他们不能抛弃同类。博大深厚的人类之爱是大师们的最大财富，也是他们的最大特征之一。作为人，爱使他们有合群与得到理解的强烈愿望；咀嚼孤独，与其说是他们的意愿，毋宁说是他们最大的精神苦难之一。而作为艺术家，他们命定地必须在诸般痛苦之外再承当起孤独的寂寥之苦，因为孤独和忧郁是美最光辉的伴侣，也只有在孤独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超越和灵魂自由。海明威1954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中说得好："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一个在人稠广众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可以免受孤独寂寞之苦，但他的作品却往往会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岑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如他确实非同凡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① 而茨威格在谈到托尔斯泰的时候则不无沉痛地说："这个英雄主义的斗争，正同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的一样，是在绝望的孤独中进行的，或者说是在没有大气的空间中进行的。妻子、儿女、朋友、敌人都没有理解他，都认为他是堂·吉诃德。……谁也不能安慰他，谁也不能帮助他。为了能够独自死去，他不得不在一个凛冽的严冬逃离自己富有的家庭，而像乞丐一样倒毙在路旁。……正是那些为大家进行创作的人，反而离群索居，其中每一个都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都在为自己的信仰同时也为全人类而受苦。"②

谛视大师，我们发现，这些人类的精神领袖远非完善、完美之人，但他们的生命却也因此而获得了双倍的生动。肉身在沼泽地行走，灵魂在太空中飞翔，这是大师们生活与创作的基本状

① 《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4页。
② 茨威格：《罗曼·罗兰传》，姜其煌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页。

态。沼泽地中的现实生活是具体而又琐碎的；作为行走在沼泽地中的血肉之躯，大师们的举手投足绝非每每都包含着意义，也绝不可能没有过失。更何况“完美之人”因其“完美”而终止了发展，所以大师们甚至从来都不指望完美，而只是奋力朝“无限”奔去。大师们的道德更多的时候不是指向完善、完美和准则，而仅仅是要真实、丰富和强度。对这些显然逾越了市民道德的巨人来说，生活永远意味着轰轰烈烈的存在，经历一切，善恶皆要，并且两者都要以惊心动魄的姿态出现。他们用热忱与自我陶醉培育体内所有的萌芽，不论善恶，无论是激情或恶习，统统令他们茁壮成长。海明威一生胆大妄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长时间嗜赌成癖，巴尔扎克时常露出贪财虚荣的面孔，托尔斯泰一辈子都极端傲慢、偏执、任性……而伟大的上帝般的歌德则干脆坦言声称：“我具备干一切卑贱勾当的素质。”

谛视大师，我们发现，他们都是一些非常本色的性情中人，其情感欲望的强度和深度均非一般世俗中人所能比拟和理解。大师们的情感欲望总以超前的姿态不断突破种种既定的规范和限制——不管是艺术程式意义上的规范和限制，还是世俗道德意义上的规范和限制。在生活中，艺术家特有的激情往往使他们拥有更强烈、更生动、更多变、更深刻的爱情。这种爱情，使他们的各种感官更为敏锐，各种艺术感觉更为细腻，使他们的整个生命都兴奋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心理感受，诱发出创造力的潜能。绿蒂之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朱丽叶之于雨果的诸多诗歌创作，海明威四次婚姻之后的暮年在意大利少女身上找回自己已逝的青春激情并由此形成其最后一次创作巅峰，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狂、缤纷的爱情之于其笔下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我们在大师们的生活中随时都可以嗅到爱情的芬芳，在其不朽的艺术作品背后总都可以看到爱情的倩影。这正如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大作家

蒙田所说：艺术女神缪斯到处都有爱神维纳斯陪伴；也正如大诗人歌德吟咏的诗句："新的爱情，新的生命！""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谛视大师，我们深深感到，时间原来是有浓度和色彩的。对常人而言阴暗幽长的时间隧道，对大师们来说显得是那样短促细密，光华灿烂！一俟他们的身心之力竭尽极限精神再也不能翱翔飞舞，如果不是上帝自然地将他们收归而去，便则是命运那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手让他们抓起枪刀，打开煤气，拿出绳索，吞下毒药……大师们的一生，用审美的眼光看，是一出出崇高的悲剧；用思辨的眼光看，却是一个个空前的成就：他们获得了对自己命运的胜利，在生命旅程的终点上，其灵魂褪去了稚嫩、狂乱、饥渴的目光，露出了真正成熟、宁静、幸福的表情。

谛视大师，我们深深感到，命运是公平的。凡是看似惩罚与考验的东西，对智者来说都是帮助；凡是让人下跪屈服的东西，才真正令诗人振作。倘是常人，早已被击垮；而那些痴顽狂热、神魂颠倒的天才，则接住劈向他们的每道闪电，将这会焚却自己的电光变成了富于灵性的巅峰感受与精神之火。我们常人逃避痛苦，于是我们的生命"氧化"成为一派平庸；大师们拥抱痛苦，于是他们的生命燃成了卓然不凡的不朽成就。在矿山的最深处，采矿人挖出了最珍贵奇异的宝石；在人生最险恶的深渊里，大师们获得了最激昂坚定的真理。生活与精神的每次颓然倾塌的轰鸣过后，尘埃落尽，人们在大师人生沉陷的豁口与溃面上，总是会发现一座座严整雄峻的创作高峰。这诚如歌德所言："在我遇有幸运、心情愉快的时候，我的诗才的火焰非常微弱；相反，当我被灾祸胁迫时，诗的火焰炽炽燃烧。优美的诗文像彩虹一样，只

在雨后阴暗的地方出现。"①

是的，大师们承当了与常人不同的命运。命运爱他们，所以让他们痛苦；痛苦锤炼了他们，他们才变得高贵而又纯洁。在命运最严酷的恩赐中，大师们凭借谦恭与天禀被造就成为可以吞纳任何灾难的巨人。他们的肉体沉沦毁损得愈甚，他们的信仰便愈发猎猎飘扬；他们承受的灾难愈深重，他们也就愈能领悟被尼采赞誉为最有益处的生活准则：热爱命运！

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最终必然便是热爱命运。热爱命运，便是不但要接受生命的怡然春风，而更要勇敢地抗击生活的风霜雨雪。那些被生活击垮的弱者，只会喋喋不休地埋怨命运的不公，岂不知世上唯一公正的东西便是命运！那些成就了辉煌人生的大师，其唯一的秘密也许就是：对命运的热爱早就使他们明白——能够而且应该战胜的不是命运的"不公"，而只是自己的懦弱；能够而且应该反叛的不是命运的"残酷"，而只是生活中必然会有的困厄与灾难。也就是说，只有热爱命运，方可以从容面对人生，以自己的坚强与智慧，化障碍挫折为激励振作，变困厄灾难为胜利成功！

谛视大师，我们不惟在他们那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中，获得了诸多关于生活与生命、受难与救赎的诸多启迪，而且也看到了艺术创作是比发表宣言要艰辛许多的劳作，它与整个精神质地有着一种命定般的血色。在绝大多数时候，大师们的创作都是在一种比设想更为缓慢的速度中进行的。当然，这种创作过程从根本上说几乎无法用物理时间的长短来加以界定；一部作品可能写得很快，而它的产生在心理压强上却可能是远过于物理时间所能衡量的重负。是的，时间是有浓度的，它的血色较之智性的解

① 转引自《叔本华论文集》，陈晓南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释更为沉着。大师们的悲悯与关切拥抱着苦难的大地，灵魂由此上升，化作精神性的艺术文本。由此，我们终于明了：在每一个昭然于世的巨著文本里面，原是蕴含着那么多温情的眼泪和痛苦的微笑，那么多无望的呼唤和热情的煎熬，那么多浅薄的青睐和深沉的悔恨，那么多失常的心理和分裂的意识，那么多奇妙的快乐和神秘的启示……

四

由以上谛视大师的诸多感触中，便有了这套丛书写作创意的明确设定。

一般来说，作家传记的写法有如下几种：一是大量占有资料，特别是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叙述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情况，为研究者提供尽可能详细可靠的作家生活和创作的资料；二是系统分析作家的作品，描述作家的创作道路，全面评价其成败得失；三是在对作家生平的一般性叙述的基础上，重点抓住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材料，进行深度挖掘，或者验证某种理论，或者在作家研究的某一方面有所突破；四是在作家生活的基础上选择或演绎一些妙趣横生的故事，进行道德训诫或文化传播；五是以虚构与杜撰为主的外传、别传等。

我们这套“世界十大文学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因为我们并不想机械地堆砌和拚凑大师们的生平资料或私人履历，也不是在对其作品进行学院式的简单归纳或枯燥评析；既不要虚构与杜撰，更不想验证或演绎。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挖掘每一笼罩着荣誉光环的方尖碑下的生命的沉积，感受真正的生命中炽热的血液的流淌，倾听精神升华的瞬间灵与肉断裂的声音，寻找低处的肉身与高处的精神、生活的晦暗

与理想的光辉、深渊的体验与至高的荣誉的对位，体味瞬间的升华绝非凭空的升腾而只有在沼泽地里才蕴蓄着升腾的力量。

显然，这是一套以作家的人格为中心的传记丛书。作家的人格，既表现在创作中，也表现在他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作家的理想追求、精神气度、个性气质、性情旨趣、文化选择、价值取向等，都是作家人格的外化，也正是我们在明晰地勾勒描述大师们的生命状态与生活经历全貌的同时，竭力要准确捕捉并细致描绘加以凸现的核心内容。

此外，对作家创作心态的描述，无疑也是我们在这套作家传记写作过程中着意突出的一个方面。作家心态学或文人心态史，是近年来兴起的文学研究新领域；作为一种思辨色彩较强的宏观研究，它关注的显然是群体或时代的作家、文人心态。然而，这种宏观研究必须以大量的微观研究为前提，而微观研究正是作家传记的长处和优势。毋庸置疑，既然作家的天职便是文学创作，那么阐释作家的重要作品、描述作家的创作道路、分析其成败得失、评价其文学贡献，便是任何严肃的作家传记都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这套丛书在写作主旨上，明确提出对作品的分析阐释应力戒通行的那种“评传”式的八股文文风，不要把作品当作一个封闭的客体文本由着自己的性子在庸俗社会学、政治学的路子上独断撒野，而要求将作品看作是作家心灵主体性的表现，多对作家在重要作品构思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做深入的探索和细致的描述。

五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人是一个谜”；凌驾于尘世重重痛苦之上，以狂放恣肆的个性和博大深邃的思想突入谜窟探究人性本

质及人生终极价值的大师们，堪称是谜中之谜。道路幽暗，我们举着由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求真意志点燃的精神火把，斗胆进入大师们的内心世界，尽管每走一步都凝神运思，小心翼翼，但说不定最终还是难免误入歧途。大师们与存在的一切奥秘关联实在太深，他们的世界立足于生存与死亡之间，悬置于五彩缤纷的梦幻与燃烧着的明晰现实之间；他们每一个人的脚下都有一口幽幽的深井朝下通往尘世的疯狂深渊，而头上则又飘逸着一抹神秘的精神云朵连结着清明的天堂彼岸。几乎没有道路能通往他们精神的尽头，没有径渠能抵达他们内心的最底点；景慕之情使我们向他们靠近，而切近的凝眸却又使我们对这些有着远古英雄气概的巨人顿生敬畏。无论我们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多深多远，无论我们对其巨著的沉沉思辨延宕多少时日，我们总感到巨人的神魄与面容，始终呈现为一种愈发不可思议的深奥，且其递增程度恰恰便是我们用功的程度。于是，我们在肃然起敬的同时，不由得生出良多不无痛苦的惆怅与喟叹。

然而，浮出这种痛苦、惆怅、敬畏、景慕的水面，转过身来面对现实的世界，我们马上又有另一种更为深切的忧叹——

在物欲横流的喧嚣声中，汹涌的生活之流卷裹着我们直往前“蹿”；沉陷在“生计”和“事件”的汪洋之中，每一个人都像农贸市场上的小贩，只关注着自己面前的货物，与来人口干舌燥地讨价还价……信仰凋敝，心灵荒芜，生命失却了精神的根基流落成为飘泊无依的浮萍蓬蒿。

不时，也能听得到“寻找家园”以及关于“大师”的种种聒噪，但却始终没有见到真正的大师出场……

我们的时代需要大师，我们的时代应该造就出真正的大师！

由是，请允许我说——

在一切都如此繁华丰裕、一切又都如此匮乏缺失的世纪末，

在我们自己的大师到来之前，让我们将心灵的目光转向古典的夜空，在对既往大师的凭吊中，寻觅精神与神圣的相遇。

曾繁亭

1998年9月1日

于千佛山下



第一章

天才少年

处女星座

在今日德国的黑森州，坐落着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法兰克福，它拥有近64万人口，是该州最大的城市，也是德国最大的国际航空港和交通枢纽，世界各大航空公司都在这里设有分支机构。它还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150多家德国银行和110家外国银行以及德国唯一的黄金市场，号称“银行城”。它商业发达，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也是传统的国际博览会会场，各种博览会接二连三，有皮毛展、国际书展、国际汽车展、国际纺织品展等。它的工业以化学工业为主，其次为机械、电器和电子等，从市区到美因河沿岸，分布有赫希斯

特、法本公司的各类工厂和属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系统的奥佩尔汽车公司的工厂。由于工业由市区向郊区发展，在中心城市周围形成许多卫星城，它们和中心城市一起组成美因河中游最大的都市群。除此之外，法兰克福还是德国的文化名城，它拥有德国最大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拥有众多名胜古迹：圣巴托罗缪教堂，勒默尔市政大厦，圣得罗教堂，埃甲海默门圆塔，斯塔德尔美术馆等。而最重要的，它拥有一所以出生于该地的一位世界文化伟人的名字命名的高等学府——德国最大的学府之一、拥有欧洲最现代化图书馆的综合大学之一——歌德大学。

公元 1749 年，即中国清朝乾隆十四年，8 月 28 日正午 12 时，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牡鹿沟"街旁的一所大房子里。这所房子系由两所紧挨着的房子打通而成，式样老旧，曲曲折折，好些地方幽昧沉暗，一道高耸的楼梯通上几间互不连贯的屋子，高低不一的楼面靠台阶衔接起来。由于接生婆不熟练，小歌德一生下来就处于假死状态，经多方抢救，才苏醒过来。对于自己的难产和侥幸存活，歌德在自传《诗与真》中将之归因于他出生时的星座：当时，"太阳位在处女座内，正升到天顶：木星和金星和善地凝视着太阳，水星也不忌克，土星和火星保持不关心的态度，只有那时刚团圆的月，因为正交它的星时，冲犯力格外显得厉害。月亮因此耽误我的分娩，等到这个时辰过了，我才得以诞生。"

正像荷马总赞美他的英雄生在良辰吉时一样，我们的主人公对自己神秘的降生也总是念念不忘。至少在美学上，他总是愿意给神秘主义留下一方天地，而这一点正和几乎所有的艺术家的立场一样。

如果任何一种对于未知的探求都可以称为学问的话，占星术恐怕算得上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了，它发源于巴比伦，从古代希

腊、罗马时代，经中世纪、近代、现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谓源远流长。作为一种科学和迷信杂糅的东西，它似乎总是能够迎合并进一步激起那些拒绝仅作为自然物而存在的人们穷究事理的愿望。真正的科学否定、憎恨、蔑视它，却不能够消除它，因为归根结底，它们都产生于人类探寻自身存在的渴望，产生于一个古老而执拗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也许歌德整个的人生真的就在那个哇哇啼哭的时刻被规定了，以后的歌德，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只是命运手中的玩偶，只是在搬演着命运导演的戏剧。那么，我们将如何评价他的是非功过，怎样看待他的忧与悦，怒与哀，如何才能在他的痛若与狂喜中感到一个真实生命的值得同情和敬仰的茧中挣扎？

歌德的生辰既然属于处女宫或称处女星座，那么按占星书上的说法，“生于处女宫的人在其一生中为了找到达到生活目的的推动力，必须全神贯注于谋生的手段。因为生于处女宫的人具有极深切的功利感，这种功利感将他本人与工作连为一体，使他竭尽心力于工作，以至达到忘我的程度。他的人格、素质的发展也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他把自己投入工作之中，与工作相依为命。他根据工作或使命的轻重缓急，付出相应或大或小的心力。他勇往直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专心致志，不改初衷。他还具有把工作作为自己精神主宰的能力。他所选择的目标不管是哪一个，都是远大的，他都会向它迈进。由于他选择了把自己束缚于为公众尽力的事业，所以他还具有拓展自己精神世界的能力。如果把他的工作称为‘奉献’的话，那么他的确能够达到无私无我的最高境界。人们不难感到他是如何要求自己在最大限度上约束

自我、牺牲自我，以致于献身的。"① 当我们了解了歌德作为文化巨人的一生，我们甚至真的很难说清究竟是命定还是巧合了。

歌德的难产而幸存，若是不归功于生辰以及与这生辰相关的命运所赐给他的超常的生命力，那就应归因于他的优越家庭了，正是这种家庭才有可能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已糟糕的情况采取成功的补救和保护措施，并把自家的教训作为改变整个城市助产水平的开端。

歌德的祖父弗里德里希·乔治·歌德是一个铁匠的儿子，他没有子承父业，而是以裁缝谋生，于 1686 年自图林根地区移居法兰克福，娶了一位裁缝的女儿为妻。祖母科纳里娅·瓦尔特本是威敦荷夫旅馆老板塞尔荷尔因的妻子，丈夫去世后改嫁给已丧妻的歌德的祖父，生了歌德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歌德。

由于祖父母经营顺利，歌德的父亲得以享受高等教育并在后来继承一份可观的遗产。他先在当时德国一流的科堡高级中学完成了基础教育，又于 1730 年 9 月在基森进入大学，次年转入莱比锡大学专攻法学，1738 年在基森取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接受继承权的选择》在歌德时代仍广为法学家传诵。这样，约翰·卡斯帕尔·歌德得以摆脱小业主地位，进入知识阶层，还去了意大利、法国、荷兰等地旅行。尽管如此，在法兰克福这个当时仅有 3 万人口、居民分属新教、天主教和新教改革派三种不同的信仰集团、只有少数男人得以参政的城市里，他似乎仍难摆脱出身较低的年轻人的命运。在初次尝试参政的希望破灭后，他干脆放弃了在这方面的任何努力，直接从普鲁士国王卡尔七世那里买得了宫廷顾问的名义官衔，并娶了当时法兰克福市长的长女卡塔

---

① 引自沈英甲等译《古今占星术》，山东友谊书社，198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21 页。

琳娜·伊丽莎白·特克斯托尔为妻。生歌德那年，他 39 岁，他的妻子 18 岁。

歌德的外祖父约翰·沃尔夫冈·特克斯托尔先生，是法兰克福当时的在任市长，住在菲力堡街一座堡垒似的寓所里。这位尊严的老人平时静默寡言，工作之余喜欢从事轻松的园艺劳动，工作、生活极有规律。他的思想性格似乎有些保守，环绕在他周围的一切都给人以宁静、稳定、永恒之感。孩子们对他崇敬之至，相信他有预言的本领，因为他成功地预言了自己的几次升迁。显然，在政坛上，他是一个精明而自信的人。作为给整个家族带来尊荣的长辈，他理所当然地做了歌德的教父，他的名字“约翰·沃尔夫冈”也成为外孙的名字。由于小歌德难产的教训，作为市长的外公从此便雇用了一个产科师，向人们宣讲助产知识，后来出生的孩子们便由此得到许多好处，减少了陷入危险的机会。

小歌德在这个可以说是特权家庭的关爱下健康地成长着。一岁那年，他的妹妹科纳里娅·弗里德莉克·克里斯蒂安内降生，她长得不太漂亮，却非常聪颖，意志也很坚强。以后，歌德的母亲又生育了四个孩子，但他们在歌德 11 岁之前都夭折了，只剩下歌德和科纳里娅兄妹两人。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歌德和这个唯一的妹妹感情的亲密、以及妹妹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一般兄妹所能达到的程度。

歌德的祖母也是对歌德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亲人之一。她和儿子一起生活，住在外院直接靠过道的一间大屋子里。在歌德的印象中，祖母长得漂亮、消瘦，性情温柔，待人和蔼可亲。她总是穿着齐整的白色衣裳，像个精灵。她喜欢帮孩子们做种种小玩具，用各种零食款待他们，她在世时，孩子们总喜欢在她的安乐椅旁玩耍。在一个圣诞节的前夜，祖母出人意料地叫人给孩子们上演了一台木偶戏。那个小舞台和那些小角色在孩子们面前打开

了一个新世界，使他们喜出望外，受益匪浅。孩子们开始时只是观看，后来便被允许自己试演。这种体验无疑对启发和培养孩子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实践能力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以至于成年后的歌德仍对此念念不忘。

歌德五岁时，祖母去世，父亲开始对住宅进行大修，不得不暂时把孩子们寄放在朋友家里或送进公立学校念书，木偶当然也被存放起来；房屋修好后，孩子们又被安排学习各种课程，更没有机会去玩弄它们。1756 年歌德 7 岁时，德国爆发了七年战争，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诸侯国各自联合外国盟友，争夺在帝国内的宗主地位，整个法兰克福人心惶惶。为了使被禁止出去游玩的孩子们不至于憋闷无聊，大人们又将木偶拿出来交给他们玩耍。开始他们只是演出已有剧目，后来便练习演出其他剧本，这就又给了他们一个动手改装布景和行头的机会。在佣人帮助下，歌德制作了很多小服装，还尝试运用已学的几何学知识、圆规、尺、刀等制造了一些简单的盒子和精巧的小房子，尽管往往很难成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于木偶戏的爱好很快发展为对于真正戏剧的强烈兴趣了。

歌德说，父亲给他遗传下来的是多少有点好为人师的多言善辩癖，这使他在交际场中常讨人厌，而母亲遗传给他的却是另外一种天分，它能使他将想像和领略到的一切强烈、欢畅地表达出来，能将人人皆知的故事改头换面，推陈出新，或者干脆随讲随编一个什么故事，使他能够赋予最空洞的故事、最贫乏的内容以想像的魅力，从而在交际场中大受欢迎。歌德的母亲性格娴静，年轻时不喜欢东奔西跑，而更愿意穿着齐整的衣服在家看书或做女红。结婚后，又在丈夫的督促下用功写字和弹琴唱歌，也懂一些意大利文。和外表严肃的丈夫不同，她常常是快活、高兴的，每天都弹琴唱歌，有时也为丈夫的一位快乐的老助手弹琴伴奏。

孩子们很喜欢听母亲的歌声，并往往很快就跟她学会她唱的那些歌曲。这位母亲显然对孩子极富爱心，因为只有爱心和修养能给母亲最大的耐心并使她找到好的教育方法。她用奖励的方法成功地帮孩子们战胜了夜里独自睡觉的恐怖心理，而不是像丈夫那样徒劳地披着一件反穿的睡衣挡在路中间，把企图溜出自己的卧室去找大人们做伴儿的孩子们吓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此外，她往往和孩子意趣相投，并常常帮助他们做丈夫反对的事，或帮他们隐藏起丈夫禁止他们读的书，因此深得孩子们爱戴。

望子成龙

像世上所有做父亲的一样，歌德的父亲希望儿子实现自己的未酬壮志，同时，他也充分认识到儿子的优越天资，因此更对他寄予厚望。从 3 岁起，父亲便开始为歌德聘请家庭教师。由于对公立学校教师的反感和不信任态度，父亲决定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只有个别必须的课程才请职业教师来讲授。这样做当然既有益处又有弊端。

约从六岁时起，通过父亲和家庭教师的讲授以及自学方式，歌德陆续学习了德文文法、拉丁文、意大利文、数学、书法、绘画、法语、英语和希伯来文，并努力钻研《圣经》尤其是《旧约》，当然，也学习了钢琴、击剑、骑术和跳舞。年幼的歌德不仅继承了父亲勤勉、坚韧的性格、作风，更具备父亲所缺乏的敏捷的领悟力、极强的记忆力和推测能力以及把握事物概念的能力。因此，对于父亲和教师所教授的课程，他总能很快掌握，应付起来绰绰有余。妹妹和他在同一间屋里学习，当他背完自己的拉丁文功课后，便听父亲教妹妹念意大利语，就这样，他竟很快也学会了这门语言。

有些枯燥陈腐的课程显然不能吸引小歌德的兴趣，但对德国诗歌的学习却促使他很早就开始练习诗歌写作。8岁时，歌德向外祖母献上了祝贺新年的第一首诗歌，这首长20多行的作品博得了大家的称赞，小歌德从此对自己写诗的本领信心大增。十二三岁时，他又写了一些宗教颂歌和阿那克瑞翁体的田园抒情诗，得到父亲的赞赏和鼓励。

在跟父亲和教师上课之余，小歌德开始了他的早期阅读。这些书中有配有铜版画插图的《圣经》和《编年史》，有包含种种寓言、神话和奇闻的《古代语读本》以及古罗马三大诗人之一奥维德的神话名著《变形记》，还有17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费纳龙的教育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18世纪英国小说家笛福的世界名著《鲁滨逊飘流记》以及国内外作家、航海家写的诸如《世界环游记》之类当时流行的航海冒险作品。父亲的藏书中有很多往代和当时的著名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翻译本，这些诗歌也全被小歌德用心读过并背熟许多，甚至连父亲禁止家里人购买的当时德国著名诗人克洛卜施托克的宗教史诗《救世主》，歌德和妹妹得到后也在课余躲到角落里，悄悄把那些打动和吸引自己的诗句背熟。除了阅读这些正规印刷的作品，小歌德还把零食钱用来买书贩摊上的民间故事书。这些花几个小钱就能买到的小册子尽管用纸低劣、印刷糟糕，却是自中世纪起就广为流传的民间名著，如《厄伦史皮格尔的故事》、《奥大维安皇帝》、《永远流浪的犹太人》等。这些书小歌德读得津津有味，读破一本再买一本，再也不想去买什么零食了。

歌德的一位姨母嫁给了一个教堂牧师，她家里也有很多藏书。在那儿，歌德开始通过一种有铜版画插图的散文译本荷马著《特洛伊王国征服论》了解古希腊伟大的盲诗人荷马，并且，为

了满足小歌德对特洛伊战争的进一步追问，姨夫又向他推荐了古罗马三大诗人之首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等作品。这样，不到七岁，歌德已开始了解古代最伟大的史诗作品，加之以上所述的广泛阅读，他的想像世界得到大大丰富和开拓，他的小头脑中装满各种形象和事件，而他又喜欢把它们反复琢磨、加工和再创造，乐此不疲，因此，他那得之于母亲的讲故事的才能空前发展，不久他就把特洛伊神话中那个著名的“金苹果”的故事改头换面讲给他的小朋友们听，其中充满童真童趣和具体可感的形象，以至于使小朋友们都信以为真，纷纷去找寻故事中提到的那些听似十分熟悉的地方。

除了对想像力的激发和开拓，大量阅读所带来的首先是对广泛知识的掌握，包括历史和宗教知识。无论一幅历史画是取材于神话还是取材于《圣经》或非基督教历史，年幼的歌德总能马上说出它是表现什么故事，并能对那些寓意画的主旨给以超出众人的理解。

1759 年法国军队进驻法兰克福，歌德家也住进了法国军官及其随从。在这扰攘不安的几年中，歌德的父亲不再有心思像过去那样对孩子们的功课进行严格的监督，从而使 10 来岁的歌德对戏剧的爱好得到大大满足。他从外祖父那里得到剧院的免票，常常晚上跑到剧院去看法国戏剧演出，甚至不惜回来吃大家剩下的残羹冷炙并忍受父亲的斥骂。剧院上演的既有喜剧、悲剧，也有歌剧、余兴剧。这些剧目中有 17 世纪法国喜剧家莫里哀的《司卡班的诡计》，18 世纪法国文学家卢梭的歌剧《乡村卜师》和狄德罗的市民剧《家长》等。尽管开始时有很多台词无法听懂，他仍能从表演和腔调中找到乐趣，遇到喜欢的剧目他就三番五次去看。当他从父亲的藏书中发现了 17 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人的剧作集后，便把这些剧本一段

段背熟，并模仿舞台上的样子朗诵出来。通过这种方式，少年歌德不久就熟悉了剧院演出的整套剧目，并刻苦研读了拉辛、莫里哀的全部作品和高乃依的大部分作品。不仅如此，他还结识了剧团里一个可爱的法国小男孩。这个喜欢吹牛的小家伙不仅以他的惊险故事迷住了自己的德国小伙伴，以包罗万象的谈话使小歌德的法语水平大幅度提高，还常常带歌德到后台去参观，并以内行的姿态把什么“三一律”啦、“诗的和谐”啦等与戏剧有关的东西对小歌德讲个不停。这引起了歌德对戏剧理论的兴趣，他不仅阅读了高乃依的《论三一律》，还了解了围绕高乃依的悲剧《熙德》所发生的争论，初步对艺术批评的原则及公众趣味等问题产生了困惑。

这段时间里，小歌德还在陪审官封·奥伦斯拉格先生指导孩子们排演的拉辛剧作《不列颠》中扮演了尼罗王的角色，在施勒格尔的剧作《坎努特》中扮演了国王角色。除此之外，对于当时正活跃在文坛上的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莱辛的作品，歌德显然也非常了解，当父亲反对他去看戏，指斥说戏剧毫无用处的时候，他便举出莱辛的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所包含的道德伦理意义来加以反驳。然而，真正使父亲转变态度，不再反对他去看戏并在他回家后责骂他的，却是他法语水平的提高和剧本创作的尝试，小歌德写的一个由乡间背景和公主、王子、天使等形象构成的剧本深得父亲欢心，从此，这位父亲再也不在儿子从剧院跑回来吃晚餐时轻易责骂他了。

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说小歌德是一个少年天才了，但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比歌德小 7 岁的奥地利男孩时，会发现在这个名叫沃尔夫冈·莫扎特的男童身上，早熟的天才发展得更为充分和耀眼。歌德近 14 岁时，6 岁的莫扎特巡回演出来到法兰克福，这位 5 岁时就发表了第一首曲子并以其精彩的音乐演奏博得亲邻

们惊赞的小家伙显然非常吸引歌德的注意，直到81岁时，歌德对莫扎特当年那副卷发佩剑的小大人模样还记得很清楚。虽然歌德对这件事没有详细描述，但我们仍可以从歌德1831年2月14日与秘书爱克曼一起吃晚饭时的谈话里想像出当年的歌德是怎样以惊叹、羡慕的眼光来注视小莫扎特的。歌德说："音乐才能很可以出现最早，因为音乐完全是天生的，表达内心情感的，用不着从外界吸收多少营养或从生活中吸取多少经验。不过像莫扎特那样一种现象实在永远是个无法解释的奇迹。是不是老天爷到处找机会创造奇迹，有时也凭依个别的非凡的凡人，使我们看到徒感惊奇，而不知道这是从何而来的呢?"

可以想像，当时这位名震欧洲的音乐神童曾引起少年歌德多少憧憬和遐想啊！但当我们总览两位伟大艺术家的一生，竟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两人未来人生经历的幸与舛、福与祸是如此与始不同！虽然歌德一生也常处于失望与孤独之中，但从外表上看来，他一直走着一条虽然也有曲折但终究光辉灿烂的上升之路，他的人生选择和劳动成果给他带来保护、光荣、尊严和一定范围的权力，从少年到老年，他的生活一直处于受到关怀的优裕状态，而莫扎特，虽然作为神童名震欧洲，但随着他在艺术上不断成熟，他的生活境遇却越来越差，甚至每天为面包而苦恼，生活悲惨凄苦，去世后，他的棺柩仅由几位朋友护送到墓地入葬，后来甚至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他的墓地所在!

和歌德相比，莫扎特就像一颗初升时即璀璨夺目的流星，光华灼灼却转瞬即逝，而歌德却像一株小小的树苗，不失时机地生长发育，不断找寻、争取和吸收阳光与水分，直至长成参天大树。他们同是天才，却是两种不同的天才。虽然少年歌德所受的教育和他当时展露的才能似乎并不比其他富家子弟高出太多，但他丰富的想像力，尤其是他对自然的敏感、对繁复现实强烈关注

的兴趣，却像穿越云层的朝辉，向人们预示了被称为“德国文化的太阳”的天才人物的升起。

城中漫游者

早在歌德5岁时，由于父亲忙于改建房屋，孩子们便有了更多接触外界的机会，正是在那个时候，歌德开始熟悉自己所在的城市。

作为市长的外孙，歌德总能得到特别许可和陪伴，去参观一些其他孩子或成人不能擅自进入的地方。他时常独自一人或跟小伙伴一起在坚固美观的美因河大桥上漫步，或者跑到城郊去乘坐渡船。那墙壁围住的寺院区和几个世纪以来残留下的城堡，那老城的城门和望楼、新城的城墙、桥梁、壁垒和壕沟，所有这一切，无不引起小歌德的好奇与遐想。逢到市集的日子，孩子们更喜欢在商贩云集的商业街的货摊前往来穿梭，购买一些印着金兽的彩色纸。

法兰克福每年有两次大市集，在春秋两季举行。市集吸引儿童的不仅是琳琅满目的货物，更有市集开始时的盛大仪式。无论是倾城而出的“护送日”，还是圣母诞辰前一天充满戏剧式象征的“吹笛者法庭”，都使孩子们的好奇心大大得到满足，而后者尤其令小歌德欢欣鼓舞，因为那时他会亲眼目睹贵为市长的外祖父坐在罗马厅御殿围栏正中最高的座位上，作为皇帝的代表，享受无比的尊荣，而且歌德往往还会在事后得到那个作为象征性贡品的盛胡椒的光滑大木杯、一双式样奇特的缀有丝穗的缎子手套以及一根白色的小棒和两三个小古银币。

所谓“罗马厅”，就是法兰克福市议会会堂。歌德和小伙伴们经常设法跑进它的会议厅里去，有时也溜进宏大的御殿，瞻仰

那些历代帝王的画像。那绘着壁画的御阶，那精心装饰的选举室，那充满神秘气氛的选举秘密会议室，那向外国贵宾展示的“金玺诏书”，那些接受市长接见的群众，这一切都深印在歌德的脑海里，连同那些大人们喜欢讲述的卡尔七世和弗兰兹一世的加冕故事，成为歌德心中一种深层的永久的憧憬与向往。

房屋改建好后的两年时间，歌德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在父亲的监督下勤奋学习，很少时间出去游玩，接下来的七年战争中，剧院成了小歌德最好的去处；好不容易等到战争结束，1763 年，14 岁的歌德又开始跑出家门，漫游全城。

幼年时歌德对自己城市的很多情况就已非常熟悉，现在，凭借新掌握的许多历史知识，歌德更对它们加深了理解。桥塔上那历经岁月侵蚀、自 1616 年就悬挂在那里的国事犯头颅骨，过去歌德只觉得阴森可怖，现在他却不由为这些促成了社会体制改善的反叛者感到惋惜；处于城墙和城壕间的狭窄、肮脏的犹太街，过去只令小歌德想起那些犹太人残杀基督教儿童的可怕故事，现在，他却觉得这些异教徒非常和蔼可亲，而他们的勤劳和坚韧也使人肃然起敬。在一些有势力的人的陪同下，少年歌德不仅参观了当地犹太人的学校，甚至参观了一次割礼和一次婚礼以及犹太人的“结茅节”。

除了了解法兰克福的习俗、寺院和古迹外，从幼年起，歌德就接触到一些法兰克福的优秀人物，如经常在家开音乐会并参与演唱的家族显赫的陪审官封·乌芬巴哈先生，乐善好施的封·赫克尔男爵，反对出丧铺张的约翰·塞巴斯提安律师，以怪异著称、有许多逸闻的申肯堡氏三兄弟，以德经商从政的著名国家法著作家、多才多艺的封·莫塞男爵，著有《法兰克福城的法制改革考》的奥尔特博士等。

奥尔特博士的女婿封·奥伦斯拉格陪审官是对小歌德产生重

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除了指导孩子们排演了《不列颠》、《坎努特》等剧外，还在写作阐释卡尔四世宪法的《金玺诏书新释义》一书时，不时对经常来他这里的歌德进行讲解，使小歌德受宠若惊，得意非凡。歌德从小就表现出一种突出的嗜好，那就是运用想像力把简略或死板的东西具体生动地用语言文字再现出来，这时，他也如法炮制，不断把他再加工过的该书中古代岁月里的人与事向奥伦斯拉格先生进行描绘甚至表演，因而深得奥伦斯拉格先生赞赏，而赞赏又促使歌德更加乐于进行此种自我训练与表现。

因为上了年纪和女儿的违逆而变得抑郁怪癖的旧贵族封·莱纳克先生也是对少年歌德独加青眼的人物，他宴请成年客人时也必请十几岁的歌德参加。莱纳克先生很喜欢给歌德讲解世界和国家大事，而且常和孩子们一起出去游逛，沿途向他们讲述过去的人与事。

很难说这些人物当时对年幼的歌德产生了什么清晰而确定甚或持久的影响，但某种潜移默化的或氛围式的东西肯定是存在的，他们是小歌德成长环境的一部分，夹杂在其他偶然的和必然的因素之间，共同开辟了歌德未来的命运之路。

小祭司

在小歌德熟识的人中，宫廷顾问许士根先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他是个只接办重大法律案件的优秀法学家，他的奇特而略显恐怖的外型和大胆的思想给小歌德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士根先生因天花而瞎了一只眼，另一只眼在布满疤痕的脸上灼灼逼人。也许是因为疾病在他身上造成的灾害，许士根先生才成为一个愤世主义者，他的惊世之语是：“连上帝我也发现有缺陷。”许

士根先生从来不去教堂，也没有世俗应酬，甚至难得上街，但他精通数学和机械，设计出一种不仅能指示时间还能指示日月运行的特殊时钟，使少年歌德惊羡不已。许士根先生特别向小歌德推荐了德国神秘学者阿格里巴的《科学无用论》，它加深了小歌德头脑中由里斯本大地震、冰雹和疾病而产生的对世界、人生和上帝的朦胧疑惑。

歌德六岁那年，葡萄牙的里斯本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在欧洲引起普遍的恐慌。“对于这次浩劫，虔敬者不由得不深思冥想，哲学家不禁寻求安慰之道；教士也不免以惩戒说教。”①小歌德耳闻大人们的不断谈论，心中不由对有关上帝贤明、仁慈的说教产生了迷惑。第二年夏天，法兰克福又遭遇了一场大冰雹，冰雹之后是倾盆大雨。冰雹打碎了歌德家的一面玻璃窗，损坏了一些新家具和书籍，给除父亲外的歌德全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惊恐和骚乱。当小歌德和其他孩子们在黑暗中被吓得嗷嗷惊叫的时候，上帝的公正再一次受到了怀疑。

宗教在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生活和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歌德的家庭与宗教狂热无缘，在自传中，歌德虽多次谈到宗教及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但我们看不到他对自己家庭的宗教生活的特别记载。歌德反感无神论，对正统宗教也敬而远之，他从小似乎就对基督教有自己独特的体会和认识。

和其他儿童一样，歌德定时到教堂去听宗教教义的宣讲，但他未能被那些言辞打动，反而觉得它们枯燥乏味。与此同时，年幼的歌德深受那些被冠以“国内宁静派”等名称的独立于教会之外的虔诚信徒们的影响，相信自己可以单独而直接地面对上帝，

---

① 引自歌德《诗与真》上卷，刘思慕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4页。

这个上帝是无形的、非偶像化的，是“伟大的自然之神，天地的创造者和保持者”。显然，这些影响开始时是肤浅而含混的，年幼的歌德并不真正懂得一个人怎样不用以教士和神甫为中介而单独接近上帝。起初，小歌德企图靠独特的顶礼膜拜来表达对上帝的敬仰。他将父亲的一个很漂亮的乐谱架拿到自己的房间里来做祭坛，上面一级级整齐地摆满他收集到的自然物的标本，在最上面摆放的是一个小瓷碟，里面放置着线香，当太阳照进他的房间，他便拿聚光镜将线香点燃，以此作为自己对上帝的礼拜。这样，小歌德便成为自己小小王国的祭司，定时为自己的上帝举行秘密的祭祀仪式，他为此而暗暗得意，并对举行这种富有象征意味的仪式充满强烈渴望。但没过多久小祭司就受到了意外的打击：一次他要举行祭仪时，小瓷碟恰巧没在手边，小歌德便将线香直接放在乐谱架的顶层，结果将架上的红漆和金花烧黑了一大块，在他眼里看起来好像恶魔走过祭坛时留下的可憎的脚印。这件事使小歌德膜拜的热情大受挫折，它仿佛是在暗示和警告他：希望借助某种仪式来接近上帝的做法是徒劳和危险的。从此，小歌德再也没有重复这种不无真诚的行为，因为在生活中他逐渐认识到，最好的崇拜上帝的方式就是不用任何神像，使内心的崇拜从高尚的心灵和雄伟大自然的交互感应中油然而生。

成长的代价

歌德 14 岁的时候，在他的少年人生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恋爱了。他恋慕的女孩叫格蕾卿，是外地人，投靠在法兰克福一个开小酒店的亲戚家里。

青少年闲着无聊，就会想出各种恶作剧来打发时光。格雷卿的两个堂兄弟听歌德童年时的朋友皮兰德斯说歌德能出口成章，

就请歌德以一位富家女子的口吻写了一封风格绮丽的诗体情书，事后，又背着歌德将它稍微加工了一下，用于捉弄一个自负的青年人。那青年正恋慕一位富家女子，并曾向她大献殷勤，收到信后，他真地以为那是他恋慕的女子写的，就请人帮他代写回信。这差事当然又落到了小才子歌德头上，为此，那青年还专门做东请歌德和几个有关的年轻人吃饭。于是，在小酒店里，歌德第一次见到了格蕾卿。

格蕾卿比歌德大一二岁，举止谨慎，言谈很少，但她的容貌神态却格外引人注目。对于初入青春的歌德来说，格蕾卿的背影以及她那细长的脖颈、头顶上雅致的小帽，都极富有吸引力，一张樱桃小嘴和文静真挚的眼神尤其令他感动。见黑夜里格蕾卿独自出门打酒，他就不由为她担心，格蕾卿安全地返回了，他立刻就觉得如释重负，而且，从初次见到格蕾卿那天起，无论走到哪里，格蕾卿的身影总在他眼前晃动，在他心中，格蕾卿是独一无二，超凡绝伦的。

歌德本是不喜欢去教堂做礼拜的，但为了能见到格蕾卿而又不必寻找牵强的借口，他开始对去教堂做礼拜积极起来。在教堂里，他总能毫不惹人注意地在人群中很快发现格蕾卿，于是冗长的礼拜仪式再也不显得枯燥乏味了。但歌德并不敢和格蕾卿在教堂里交谈，甚至在出教堂时，也不敢和她搭讪，更不敢和她在一起。格蕾卿看到歌德便点头向他致意，这已使歌德感到无比幸福了。

不久，那几个年轻人又要歌德以那富家女子的口吻给那上了当的青年再写回信，这当然是一个再次见到格蕾卿的好机会。歌德高兴极了，一口答应下来，马上着手写信。但这次他没有按要求以那个富家小姐的语气来写，而是以格蕾卿的口气，把它想像成格蕾卿写给自己的情书。写到后来，歌德竟真地相信格蕾卿会

像他写的那样爱他了。

按照约定，歌德忐忑不安地将信送到小酒店，见格蕾卿正在屋里的窗边纺纱，他心里非常高兴。伙伴中只有格蕾卿的一位堂兄弟在，他请歌德先把信念给他听，这正合歌德的心意。歌德一面读信，一面偷偷瞥视格蕾卿的反应，见默默纺纱的格蕾卿脸色变得绯红，他读得就越发投入、动情起来。

格蕾卿的堂兄弟要求歌德对信的语气加以修改，就出门去了，除了偶尔进出的女主人，屋里就只剩下了歌德和格蕾卿。开始时，歌德和格蕾卿都沉默不语，当歌德终于尴尬地自语着停止了徒劳无益的修改时，两位少年人便开始交谈起来。格蕾卿称赞歌德文笔优美，但她反对堂兄弟们正在进行的这种愚蠢、无聊的危险勾当。她劝歌德退出这种恶作剧，免得惹出什么意想不到的麻烦。格蕾卿关切、认真的话大大加强了歌德对她的好感，也鼓舞了歌德向她表白爱情的勇气。当歌德激动不安地问格蕾卿将会如何对待一个真诚的求爱者时，格蕾卿的回答令歌德惊喜万分——格蕾卿从他手里接过那封假想的情书，沉吟了一会儿，接着，在信的落款处签上了她的名字！狂喜的歌德忍不住想要拥抱这位可爱的少女，格蕾卿却拒绝了，她只允许歌德将她的一只手放在脸颊上亲了一下，便劝歌德带着信赶紧离开，免得堂兄弟们回来再与他纠缠。格蕾卿拉着歌德的手，情辞恳切，歌德只好和她告别，他难过得眼里涌出了泪花，不知道自己得罪了那些少年人后是否还有机会来找格蕾卿。后来歌德在自传中写到，在他的一生中，从未有过像此时这样迷惑无主。

大概是格蕾卿从中斡旋的缘故，那伙少年并没有为难歌德，而且很快就放弃了恶作剧，转而承揽了一些婚礼和丧葬用诗歌的定单请歌德来写。歌德平日就对那些从婚礼上传诵到市井里的诗歌嫉羡不已，自信自己也能写出同样好的作品，现在终于有了将

自己的诗歌印出来在大众面前展示的机会，心里自然十分高兴。这样，他与这些和他不属于同一阶层的少年人的关系开始变得日渐密切起来，和格蕾卿的来往机会当然也更多了。应酬诗换来的报酬对这些少年人来说还是很可观的，他们将这些钱用来郊游和聚餐，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喝酒谈笑。他们一面谈论社会上的种种奇闻，一面探讨各自未来的谋生之道。这种种事情对于开始追求自我确认和自我价值的少年歌德来讲，当然新奇有趣，但如果没有格蕾卿参加，很难说他的兴致能持续多久。实际上，歌德并不是对每个伙伴都欣赏，尤其格蕾卿两个堂兄弟中的老大，经常口出秽语，而且神出鬼没，常很晚才回家，歌德对他十分讨厌。每次聚会时，皮兰德斯和他的女友坐在一起，而格蕾卿或坐在歌德身后，或坐在歌德旁边。格蕾卿似乎脾气很古怪，虽然有时她也会将胳臂搭在歌德的肩上看他写诗或读书，但她却不允许歌德将胳臂搭在她的肩膀上，也不和任何人握手。歌德觉得她矜持得可爱，并不生气。也许，正像歌德在自传中所说："一个未曾腐化的纯洁青年的最初的恋爱，是完全循着一种精神的方向进行的。造物主是要一个人在异性中具体发现善和美。"

有一段时间，接连几个白天歌德在小酒店里都见不到格蕾卿的踪影，向她的亲戚问及此事，大家都对他支吾其词，这使歌德大惑不解。原来，格蕾卿为了长远的谋生打算，经堂兄弟介绍去了一家饰品商店做试用女店员，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工钱很好。但格蕾卿并未将这一变化告诉歌德，更没有一本正经地征求歌德对此选择的意见，直到有一天，歌德在替妹妹买假花时偶然在饰品店里发现了穿着迥异的格蕾卿，格蕾卿才在回家后原原本本地将事情讲了出来。歌德不能不承认格蕾卿穿着新衣服比过去更动人，但一想到饰品店是个风流人物经常光顾的场所，他心里便觉得很不是滋味。但他的不高兴一闪即逝，随之而来的神圣罗马帝

国皇帝的选举和加冕典礼更使两人之间可能产生的隔阂消逝殆尽。

从 1763 年底开始，整个法兰克福就开始为选帝侯会议忙碌起来了。仪仗队的宣传准备，各地使臣和随从的住宿安排，市政厅的改建和布置，各种各样的仪仗游行，各邦国使臣间的相互正式拜访，在广场举行的包括市政官员和全体市民、军人在内的声势浩大的“保安宣誓”，等等，这一切，都令未经此事的歌德大开眼界。年底以前，歌德的父亲就已让儿子和自己一起阅览了 1742 年和 1745 年两次皇帝选举、加冕的记录以及新的选帝法约，现在，歌德更是按照父亲的要求跑前跑后，对各种重要事件进行记录。当歌德把城里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讲解给伙伴们听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大开眼界，格蕾卿更是听得聚精会神，感叹不已。她羡慕歌德能懂得和了解那么多重要的东西，并说：“假如我是一个男孩子的话，我们就想一块上大学学一点有用的东西。”她还说她准备学法语，因为在饰品店的工作已足以使她明白法语的重要了。此时，格蕾卿已经不去饰品店工作了，因为现在法兰克福人员杂乱，她要等到这一阵忙乱过后再去。

格蕾卿的话使歌德感到极大满足，他既觉得格蕾卿本分好学，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对恋人的影响力，这种自己对恋人有所帮助的自我确认大大增强了他的自信与自尊，也使他和格蕾卿的情感进入到更加亲密无间的阶段。

因为格蕾卿是外地人，歌德就到处托朋友，想方设法为她搞到证明书、入场券等，使她得以像法兰克福市民那样到各种场所观看和参与市民活动。白天，歌德忙忙碌碌地记录、写作、誊写，晚上，他便想方设法跑去和格蕾卿见面，兴致勃勃地把自己记录、加工的事件讲给大家听。这一阵子，歌德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因为经常晚上出门，他便偷偷配了一把自己家大门的钥匙，

有母亲打掩护，他从未因晚归而受到过父亲的责罚，甚至有一天他彻夜未归，母亲也为他遮挡过去了。那天他很晚才出门，兴奋、匆忙中忘了带家里的钥匙，大家不知不觉聊过了半夜，歌德索性听从格蕾卿的建议留在了小酒店里，其他人也都没有回家。那晚，皮兰德斯和他的女友偎依在角落里，女主人睡在安乐椅上，格蕾卿则头靠在歌德的肩上坐在窗边，其他人或伏在桌上，或随便躺在什么地方。歌德醒来时，天已大亮，他觉得镜前理妆的格蕾卿比以前更可爱了，而格蕾卿对歌德的态度也比以前更亲切了。

1764年4月3日，日尔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二世在法兰克福举行了盛大的加冕典礼。白天的庆典过后，夜晚，整个法兰克福被各种灯火装点得灿若白昼。饱看了一天隆重加冕仪式的歌德约了格蕾卿和她的堂兄弟们出来看彩灯。这晚格蕾卿的心情特别好，她和歌德手挽着手在人流灯海中穿行。歌德怕被熟人认出，一路上遮遮掩掩，格蕾卿对此也不生气。路边和建筑物上的各种新奇的彩灯造型令他们惊叹不已，不知不觉流连到深夜。当歌德把格蕾卿送回家去的时候，在门口，格雷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吻了歌德的额头，因为自此以后，歌德就再也没能见到她。

以往歌德去找皮兰德斯以及格蕾卿的堂兄弟们一起游玩的时候，有时会发现一两个陌生人夹在其中，这些人歌德不认识，格蕾卿的堂兄弟却和他们很熟。通过格蕾卿的堂兄弟的介绍，歌德曾经在外祖父面前为其中一个陌生青年求过职，不想这个青年却是犯罪团伙中的一员，他求职的目的是要借机从事伪造、诈骗之类的勾当。案发后，包括格蕾卿和皮兰德斯及其恋人在内的所有曾与该青年及其同伙来往过的人，都受到官方的怀疑和讯问，歌德也不例外。

就在加冕典礼的第二天早晨，歌德还未起床，他的母亲就急急忙忙来告知他已被某个严重案件牵连，歌德的父亲为此大为震怒，要他必须留在家里等候参议员施奈德前来查证某些情况。母亲的话使毫无精神准备的歌德不知所措，他既觉得自己冤枉，又为格蕾卿他们可能遭到的待遇而惊惧不安，他拿不准他的朋友们是否会背着他干一些犯罪的勾当，但他从未见到他们有任何犯罪行为，这又使他感到自慰和心安。

参议员施奈德来了，他是歌德家的老朋友，还曾送给歌德兄妹一本克洛卜施托克的诗集《救世主》。这位官员朋友先含着眼泪惋惜歌德因交友不善而给自己惹来麻烦，要他把知道的事情“坦率地招认出来”，继而厉声训斥，以上法庭对质来威吓歌德。歌德生来从未受过如此责难，虽然他最终不得不叙述了自己的交友经历（包括偷配家门的钥匙和彻夜不归），但心里却冤愤难平。一再的追问使他深感屈辱，被迫以“交代”的口吻说出朋友们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更令他痛苦难当，最后他终于忍不住痛哭起来，而且大声要挟说，如果法庭要将他的无辜的朋友们判罪，他就要自杀。

施奈德先生走后，歌德陷入到纷乱的狂想之中。他既不能随意离开自己的房间，又无人可以倾诉，母亲和妹妹的安慰对他无济于事，父亲的宽恕和参观帝室“宝器”的建议也不能使他的精神有所转移。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一遍遍在脑子里描摹他和朋友们尤其他和格蕾卿可能会有的悲惨遭遇，这些想像既是他的烦恼的来源，又是他的悲伤的滋养，他沉浸于其中，日夜食寝难安，终于发起病来。

案情终于有了结果，歌德向外祖父推荐的年轻人是犯罪团伙的骨干之一，受到法律追究，而皮兰德斯和格蕾卿的堂兄弟们都与那人是泛泛之交，因而得到了最宽大的处理，经过一通训诫之

后就被释放了；格蕾卿已回家乡去了，家里人告诉歌德她是主动要求离开法兰克福的，而在歌德看来，格蕾卿实际上是被不名誉地驱逐出城的，这使他更加忧愤伤心，难以从抑郁的心境中自拔。歌德常常哭泣焦躁，病情时好时坏。除了对格蕾卿前途的忧虑外，还有一件事增添了歌德心中的疑惧、烦乱，那就是他觉得家里人一直在监视他的来往信件，对此，他感到愤恨至极。歌德猜想格蕾卿他们会给他写信，而实际上，他没有收到他们任何人的信件，只有纷乱的狂想在他喧嚣的头脑中纠缠不休，但这些持续不断的狂想不久就被新来的家庭教师釜底抽薪了。

这位新来的家庭教师是歌德过去就认识并爱戴的一位先生，因此，尽管歌德把他视为又一个监视者，他还是能与这位“阿尔戈斯”① 友好相处，并向他倾吐了自己的感情隐秘，而教师也将他所知道的案件细节讲给了歌德听。他告诉歌德他在保密的法庭记录里见到过格蕾卿的“供词”，关于自己和歌德的关系，格蕾卿在“供词”里这样写到：“我不能否认，我曾常常并很喜欢见他；不过我一直把他当作小孩子看待，我对他的爱慕的确是姊弟一般。在好些场合，我曾好好劝告他，我不独没有引诱他做暧昧的勾当，而且劝阻他参加一种会使他受累的恶作剧。……”

格蕾卿的话不能说不是真实的，但她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大姐姐和女教师的口吻大大刺痛了歌德敏感的自尊心。虽然格蕾卿比歌德年龄大点，但歌德向来以格蕾卿的保护者自居，尤其当他滔滔不绝地向她讲述种种知识、奇闻和为她而四处奔波的时候。他把自己看作是格蕾卿精神生活的创造者，而格蕾卿则是他的创造物，当然同时也是他所依恋的人，但他的依恋绝不是小弟弟的情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眼睛能轮流休息，天后赫拉让他看管自己的情敌伊俄。

感，他已是个快满 15 岁的男子汉！既然格蕾卿不过是把他看成一个小弟弟，为什么要在那封他假想出来的情书上签上她的名字呢？这不是太愚弄、太轻视他并对他的真诚情感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吗？歌德继而又想到格蕾卿在饰品店的改装，想到她总是只给她自己主动表示亲近的权利却不允许他主动与她搭肩牵手，等等，过去被看作是可爱的矜持和羞涩的，如今变成了故弄手段和对他的蔑视，过去被看作是可以理解的，现在都成为可疑、可耻的隐秘，而这些天来他自己在痛苦和思念中极为夸张地为自己描摹的爱情悲剧，现在似乎也成了充满滑稽色彩的不伦不类的单相思。这样一想，歌德在自己心中垒造的他和格蕾卿爱情的圣殿便轰然倒塌了，爱变成了恨，他憎恨格蕾卿像对待一个傻瓜似地对待一个只比她小一两岁的聪颖而富于热情的真诚少年。

实际上，家庭教师的一番话或许是真实的，或许只是一种策略；格蕾卿的“供词”可能是诚实的，也可能只是一种违心或半违心的聪明的自卫方式，但它仍对歌德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歌德决心把格蕾卿从自己心里驱逐出去，振作精神开始新的生活。他要努力学习必要的知识，为进大学做准备。然而对初恋的少年来说，爱情如同一种无上的信仰，当偶像倒塌以后，歌德感情上的空白是家庭教师的哲学课所填补不了的。歌德开始更多地关心妹妹科纳里娅，积极踊跃地参加科纳里娅和她的男女朋友们组织的各种娱乐活动，也常常在家庭教师的陪同下走到城郊的浓密丛林中，在画纸上描绘那些挂满青苔的嶙峋怪石、湍急奔流的溪水瀑布和摇曳多姿的带露花草。写生，既是歌德一向的爱好也是他摆脱家庭教师监管的一个有效方式，每当他开始绘画，教师就由他自己独处在寂静幽深的树林中，自己则拿本书放心地去附近另外的地方阅读，这时，格蕾卿的面影就会时常在歌德的眼前浮现出来，使他因画技不良而陷入困境的写生作品半途而废。

尽管父亲总是仔细耐心地把儿子的那些未完成的画作用直线画出边框，或裁剪后找人裱糊，以此来督促、鼓励歌德把它们最终完成，这些工作并没有使歌德真正安下心来，他越来越感到对法兰克福的厌倦和对新城市的渴望。随着家里人对歌德精神状态的日渐放心，歌德开始被允许单独自由地行动，甚至跟随旅行团做长途远游。但这些自由对歌德来讲似乎并无多大益处，因为他的敏感多疑已经把他的行动大大局限住了。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在街上随意溜达，更不愿走过格蕾卿住过的地方。有时他会和家庭教师一起去环城的娱乐场所游玩，但在那里他常常害怕会遇到格蕾卿的堂兄弟们。实际上，只有在寂静的森林里，歌德才感到一种隐蔽的安全，走在路上，他便时刻觉得自己被人打量，指点，指责，议论。多疑病使歌德的心境逐渐又一次浑浊、恶劣起来，无论是妹妹和她的朋友们发明的“一周情侣制”游戏，还是年轻人一起对于诗艺的实践、探讨，都不能使他避免时有的旧痛复发，轻则突然哭泣、悲叹，重则近似撒泼。精神的紧张使歌德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在法兰克福呆下去了，自童年起就吸引他的故乡的一切如今已物是人非，只使他感到厌恶，而对未来人生的暗自设计更使他急于早一天投入到理想的征途中去。就这样，歌德在情感波动和度日如年中送走了他的15岁，1765年9月29日，已满16岁的歌德终于等到了离开故乡去异地求学的时刻。

第二章

激流与浊水

蹉跎岁月

1765年10月3日，歌德在一对书商夫妇的陪同下来到了莱比锡，在一个叫火球公寓的地方居住了下来。

莱比锡位于德国的东北部，距离法兰克福约300公里，是地处中欧的交通要道，自古就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文化名城，那时，它则是德国最大的文化、商业中心，有极为发达的出版业，即使在今天，图书出版业仍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行业。与充满保守、古旧色彩的法兰克福相比，莱比锡深受当时法国文化的影响，显得充满生机活力。歌德初到莱比锡时，正遇到该城大市集的日子，那熙来攘往的情景，使歌德感到既熟悉

又陌生。法兰克福的大市集虽然也是热闹非凡，却没有多少异族商客，而这里却充满了波兰人、俄罗斯人、希腊人，这些人奇异的东方民族服装和他们珍贵的商品使歌德大开眼界，加上城中庄严壮丽的建筑物不断涌入眼帘，歌德因一路泥泞、艰辛而感到的不快瞬间便被扫荡一空了。

本来，歌德最神往的学府是格廷根大学，因为那里有著名的语言学教授海奈先生以及著名的神学教授及东方学者米凯里斯先生，但歌德的父亲反对儿子的意愿，坚持让儿子去自己曾经就读过的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歌德拗不过父亲，只好同意，但心里却另有打算。由于外祖父是市长，歌德从小对市政内幕有较多的了解，对于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一般的成年人都很感到愤慨，在一个心灵未受污染的少年儿童眼中，那些践踏公理的事情就更加可憎并使他大受震惊，再加上父亲郁郁不得志的前车之鉴，歌德便常常暗自在心中为自己勾画不同于父亲之命的未来，希望自己将来不从事政法事业而能成为大学教授，以诗文立身扬名。因此，虽然歌德从年幼时就在父亲的安排下读了一些法律典籍，但年龄稍长后，他实际上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语言学、古学、历史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上，在为上大学而进行准备的这一年里，他更是倾心专注于此。莱比锡大学虽然不是歌德的首选，但这里也有被他视为一盏明灯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授摩鲁斯先生以及极受人推崇的雄辩学、神学教授欧内斯提先生。因此，对自己在莱比锡大学将有的收获以及自己未来的前途，歌德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他踌躇满志，充满信心，准备在新的环境里展露才华，为自己奠定走向社会的第一块基石。

和所有初到异地求学的年轻人一样，新的城市、新的文化环境令年轻的歌德长时间兴奋不已，然而，身处异地的学子很快就发现，一切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理想和顺利。来莱比锡时，父亲

让歌德带了许多介绍信。安顿好住宿后，歌德首先去拜访了历史学家、法学家兼宫廷顾问官博麦教授。博麦先生为歌德选定了最初的学习课程——哲学、法律史、罗马法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严禁歌德从事文学艺术的学习和尝试。接着，歌德又陆续拜访了其他一些上层阶级的家庭，通过这些家庭，歌德又被引荐到更广的社交圈子里去。在这些圈子里，歌德首先遭到的挫折是人们对他着装的挑剔。

歌德的服装都是由父亲亲自选料，由自家裁缝缝制的，料子虽然上乘，但式样却显老旧，甚至剪裁也不尽合体。歌德在法兰克福本来穿惯了类似的衣服，自己也感觉良好，但在一派法国风尚的莱比锡，他的服装却显得怪模怪样，就连他觉得极豪华奢侈的镶着金花边、银花边的衣服，也不能使太太、小姐们接受或逃过学友的揶揄。有一次，歌德在观看一出法国喜剧时竟发现那引人发笑的男主角穿的竟和自己是同一类服装，这使他下决心弃置所有从家里带来的衣服，按莱比锡时髦的样式重新“武装”自己。交际游乐和购制新衣使歌德的钱花得如同流水，刚到莱比锡不到一个月的歌德在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到：“我在这儿颇出风头！——但目前还没有达到招摇的程度。我也不想这样。——我要有点办法才能对这种繁忙生活应付自如。哈！真有意思。这阵子聚会、音乐会、喜剧、请客、晚宴、乘车旅行等活动真不少。哈，真有意思。好是好，但也真费钱。我已捉襟见肘了。”

然而有些东西并不像服装那样容易改变，歌德的方言就令歌德头疼不已。当时德国的“普通话”，是以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萨克森-迈森城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上流社会严格地以此作为衡量一个人德文水平的标准，歌德来自南部德国，讲的是南德方言，它不仅在发音上而且在表情达意的方式包括修辞方式上都与前种语言有显著不同，因此，歌德的谈吐在莱比锡似

乎显得十分刺耳。虽然歌德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他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那些来自不同方面的指教，开始时，他几乎手足无措，甚至连最基本的意思都不知该如何表达了。

年轻的歌德追随时尚，在新的环境中迅速改变、调整着自己，他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并力求在新环境中显示自己独特的个性。虽然在一些同学的眼中，歌德是个穿着时髦的衣服、留着与众不同的发型的傲慢可笑的家伙，但歌德却对自己却另有估价。他在信中颇为自负地写到："我的高超的兴趣和理解力，远远超过当地的花花公子。有一次我忍无可忍，就在大庭广众面前指出他们的见解是何等愚蠢。"

可以说，初出茅庐的歌德是怀着颇为不凡的文学抱负来到莱比锡的，但在遭受了服装和语言的挫折之后，歌德很快发现自己的诗文造诣也变得前途渺茫起来。

歌德来大学时，在自己以前写的诗文中挑了一些自认为最精彩的作品带到了莱比锡，一方面，他希望这些诗能博得大家的赞赏，另一方面，他也想用这些诗和以后写的诗进行比较，以确定自己是否有进步。没想到，这些倾注了很多心血并经过长途跋涉的作品和歌德后来新写的许多诗歌一样，等到的只是付诸一炬的结局。也许，这得从博麦教授的夫人说起。博麦夫人经常请歌德到家里做客，她不仅在社交礼仪上指导歌德，教给他一些骨牌之类的社交场上的游戏，还喜欢和歌德谈论文学。由于歌德平时总是喜欢把自己赞赏的作品用心默记下来，所以他经常在向博麦夫人谈论自己喜爱的作家时把有关作品背诵给博麦夫人听，有时，他也会隐姓瞒名地将自己的诗背诵给博麦夫人。当时歌德正受流行于文坛的洛可可诗风的影响，写的都是一些绮靡轻佻的诗歌，博麦夫人极为厌恶那些琐细、柔弱、平庸的东西，因此，她直言不讳地否定了歌德的爱好和他的作品，这使歌德觉得很受打击。

教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年轻教授摩鲁斯先生也深得歌德尊敬，他的分析比博麦夫人更富有摧毁力，使歌德头脑中原有的偶像和原则全都摇摆了起来。

不管博麦夫人还是摩鲁斯教授都只起到了破坏作用，他们都没有指出什么是歌德应该学习的以及他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途径，这只能使歌德写作诗歌的热情白白受到打击，使他灰心丧气。更有甚者，当时著名的文学杂志《不来梅文集》的编辑、著名作家、在学生中颇有声望的格勒特教授竟干脆在文学写作课上流泪垂涕地劝学生们不要写作诗歌，只让他们练习散文，而讲评时也只讲评散文。

在莱比锡大学，声明最为显赫的文坛宿将大概就是德国前期启蒙运动的领袖高特舍特教授了，他讲授诗学和雄辩学，曾多次任莱比锡大学校长。这位文学和戏剧改革家在三四十年代德国启蒙运动开始时，以《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而成为德国文化界的权威人物，他和他那作为莫里哀喜剧著名演员的妻子一起，以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取代德国传统的语言混乱、情节粗糙、毫无教育意义的“历史大戏”，为清理德国文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高特舍特的崇外崇古造成了一大批追随者和效颦者，古典主义戏剧原则日益成为束缚作家创作的枷锁，而不再是约束散乱的有效工具，这种始料未及的流弊使高特舍特从50年代起便遭到文坛新生力量的攻击。

也许正因如此，歌德对这位莱比锡的大人物既满怀好奇，又不免有些戏谑调侃。在入学后的第一个月里，歌德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到：“我还没看到高特舍特。他又结婚了。新夫人的前夫是个中校。你们知道这事吧？女方19岁，而男方65岁。女方4英尺高，而男方7英尺高。女方骨瘦如柴，男方胖得像猪。”

1766年4月，即歌德入学半年后，他和途经莱比锡的同乡

施罗塞尔先生去高特舍特府上拜访了 66 岁的高特舍特。事后，歌德似乎只记住了谈话开始前的滑稽场面，没有什么重要收获。高特舍特当年就去世了，歌德以后也就无缘再去拜访他。

对于当时的歌德来说，他面临的是一种极为尴尬的处境。当时德国文学正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期，“新的”代替“旧的”，“新的”又很快变成“旧的”而被淘汰，新旧力量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无序和混乱使歌德幼稚的头脑感到难以应付。在他对旧文学还没有适应以前，新生的东西已经大量产生出来，他想追随新潮流，又舍不得或难以迅速抛弃旧的习惯趣味，他过去崇拜的奉为指导的东西被摧毁了，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被他认做指导，人们的思维混乱和各执一词也使他难以找到他能接受而又为社会权威所认同的艺术批评标准。他常常被一些半懂不懂的法则和支离破碎的学说弄得迷惑不堪，结果兜来兜去，毫无收获，他也不断进行写作尝试，但却越来越觉得心有余悸，不知现在自己觉得满意的东西是否转眼之间就会因别人的否定而在自己眼中也变得一钱不值起来。这样，歌德就像一条从江河游进大海的鱼，既大开了眼界，又感到眼花缭乱，更感到难以适应。他失去了往日对自己诗歌才华的自信和明确的方向感，变得绝望和犹疑不定，在进退无路的状态下逐渐由迷惑转向对自己的完全否定。有一天，他竟冲动之下将自己已经写好和正在写的所有诗文、写作提纲和速写一股脑扔进了厨房的炉火里，使不知缘故的女房东为之大惊失色。虽然事后歌德自己也免不了有懊悔之意，但在那时他却似乎是别无选择。

如果说有谁对莱比锡大学时期歌德的写作热情产生了直接的有益影响的话，那就是施罗塞尔和贝里施了。乔治·施罗塞尔是歌德的同乡，比歌德大 10 岁，为人正直诚实，性格严肃，并洞达人情世故。此外，他博学多才，不仅精通多种外语，还有深厚

的文学修养，喜欢德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并长于诗文写作。大学毕业后，施罗塞尔先在法兰克福做律师，后来被有名的符腾堡公爵欧根聘为私人秘书。施罗塞尔在歌德入学半年左右时途经莱比锡，给迷惘的歌德带来了一丝安慰。施罗塞尔将自己用多种文字写的诗歌拿给歌德看，鼓励他进行诗歌写作。在施罗塞尔停留莱比锡期间，歌德每天和他一起吃饭，从而结识了其他一些有学识和修养的人。通过和这些朋友的交游、谈话，歌德梳理自己的思想，探索前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保持了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和热情。

在这方面，贝里施对歌德的影响更大。他是一位伯爵公子的私人教师，当时 30 多岁，瘦高个，相貌奇特，面孔上长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大鼻子，行为也怪异求新，喜欢板着面孔开玩笑，并因为自己书法很好而对印刷持严苛的抵触态度。贝里施的法文功底很好，而且精研现代语言和各国文学，加上他和歌德性格互补——歌德容易急躁而他则是个慢性子，本来就愿意和年长的人结交的歌德便很愿意和他来往，两人相处得很投机，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艺。不过也许是故意要耸人听闻的缘故，贝里施谈论起作家作品尤其是当时德国文坛上的作家作品时总是毁多于誉，而且嬉笑怒骂，冷酷无情，把歌德喜欢的作家也说得体无完肤。如果不是贝里施能对歌德的习作另眼相待的话，他也许只能是另一个博麦夫人或摩鲁斯教授。贝里施对歌德的诗歌持很宽容的态度，不仅加以肯定，还主动要求以自己精美的书法为歌德将诗文抄录装订成册，这使歌德的创作热情大受鼓舞。贝里施为歌德抄录的作品不仅纸张优良、字体优雅，而且在每首诗歌的后面还配有切合诗意的装饰画。这些插图有的是取自别人的创作，有的则是贝里施自己创作的，它们使歌德感到自己的诗歌和自己为此付出的努力的价值大增，因而也越发用心、投入地进行写作。不仅如此，

由于贝里施常在和歌德一起翻看完工的手抄本时告戒歌德珍惜他倾注在诗歌誊写和装饰上的时间、才能和精力，并和歌德一起对那些诗歌进行检视、斟酌和推敲，歌德对自己的要求也变得日渐严格起来。

在莱比锡期间，歌德写了不少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阿那克瑞翁派”风格的诗歌，在当时文坛上，维兰德是歌德最欣赏的诗人之一，他的作品对歌德影响很大。除诗歌外，歌德还根据自己在莱比锡的恋爱经历写了一出小喜剧《恋人的脾气》。总的看来，正像歌德在自传中所说，当德国最优秀的作家已经将目光转移到关系民族历史和现实的伟大而重要题材上时，他“还像是柏莱塞河畔的牧人那样，正童心烂漫地沉浸于这种纤巧的题材之中，而且我常常只挑选那些容易醉心的事物做题目”。尽管如此，尽管歌德的早期诗歌和剧作并不和时代最先进的文学方向一致，它们却多是歌德真实感受的产物，而且就这些作品的意义而言，他们对歌德整个人生的意义大大超过了它们自身的艺术价值。换言之，在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歌德逐渐培养了自己独特的写作观，它既有益于他的创作，更有益于他的生活，对此，歌德在《诗与真》中写道：

> 于是我就开始一个方向——我一辈子不能背离的方向，这即是说，把那些使我喜欢或懊恼或以其他方式使我心动的事情转化为形象，转化为诗，从而清算自己的过去，纠正我对于外界事物的观念，同时我的内心又得到宁帖。因为我的天性常常把我从一个极端抛到另一个极端去，我需要有这样的才能比任何人更为迫切。我所写出来的一切，只是一大篇自白的片断，这本小书就是想使这篇自白变得完整的一个大胆的尝试。

贝里施的学问和独特个性对歌德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因此，尽管歌德把他称做“无事忙”并觉得他言行矫饰，歌德仍和他自始至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歌德看来，贝里施不过是以表面的乖僻来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实际上并非是肤浅的哗众取宠之辈，更不是粗鄙、恶毒或心胸狭隘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贝里施已成了当时歌德的“主心骨”和人生导师，他不仅在诗艺上鼓励歌德，同时也在道德上教育歌德，诱导他做正经、规矩和恰当的事，并帮助他培养社交才能，而歌德对贝里施则有极大的依赖性和向心性，爱憎明显受他的影响。

如果说歌德还有可能从谁那里接受到有益的文学和美学影响的话，那就是莱辛了。大概在1767或1768年，莱辛曾在莱比锡短暂逗留。然而不知是出于何种念头，当歌德听到莱辛抵达莱比锡的消息后，一向倾慕名人、热中于向显达之士请教的他却打定了一个愚蠢而固执的主意，不但不去拜访和宴请这位天才校友，反而和他的几个同学一起故意回避莱辛的所到之处，似乎执意要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无知和愚妄。不过，歌德并不拒绝观看莱辛剧本的演出，对他的美学著作《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限》更是极为称赏。

对歌德来说，文学、自然科学和美术构成了他人生事业中的三条主线。在莱比锡，歌德通过旁听化学、解剖学等课程初步了解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而在美术方面，他则遇到了一个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美术教师——莱比锡画院的院长奥塞尔先生。歌德第一次见到奥塞尔时就深为他吸引，奥塞尔先生的住所及房间装饰、家具布置也对歌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许是知道自己的业余学生并不想成为职业画家的缘故，奥塞尔在教授歌德绘画时并不重视循序渐进、严格精确的基础技能的训练，而只注重培养他的观察力和审美趣味，帮他认识一件艺术品的要素，提醒他注意

所画人物的神态和姿势，强调神似，而不要求对形体比例的精确把握。当然，这种讲授方式比起歌德这样的初学者来更适合于一个已经有扎实的基本功、掌握了绘画基本技能的人。因此，在跟奥塞尔学画期间，歌德在绘画技艺上并没有多少进步，但在精神倾向和审美趣味方面却受到奥塞尔的很大影响。奥塞尔欣赏意大利派的绘画作品，崇尚单纯朴素，讨厌巴洛克风格的涡卷型装饰、贝壳装饰以及其他一切离奇古怪的艺术趣味。同时，他重视实用艺术，喜欢为剧院绘制幕布，为图书画插图，许多艺术家以依照他的作品为图书制作铜版画为生。在处世为人方面，奥塞尔有很好的人品和人缘，他珍视友谊，在莱比锡拥有一批善良敬业、以艺术为生活目的和天职的画家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观赏讨论美术作品，那些毫无门户狭隘之见的精辟评论常使得以旁听的歌德受到很大启发。

奥塞尔给歌德最大的教益应在美术史方面。从 1767 年开始，法国人达根维尔著的四卷本《名画家传》开始在莱比锡陆续出版德文译本，歌德很喜欢这部书，而奥塞尔则对歌德的兴趣表现出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他在全城搜罗了各种藏画让歌德观赏，并引导他进行艺术史的学习和研究。当时，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的声誉正如日中天，作为温克尔曼的好友和其初期著作的插图者，奥塞尔狂热地崇拜这位古代艺术世界的发掘家，他不仅热烈地向歌德推荐温克尔曼的美术史著作，还给他讲述温克尔曼的艺术生活，并指导他对温克尔曼的作品进行阅读。奥塞尔对温克尔曼的推崇强烈感染着歌德。虽然当时歌德还不能完全读懂和理解温克尔曼的论著，他仍勤奋努力地钻研它们，极力在隐晦的领悟中吸取教益。通过在奥塞尔指导下的阅读，青年歌德不仅初步了解了温克尔曼的著作和思想，还第一次认识了古希腊的艺术世界。

实际上，当歌德观赏那些奥塞尔为他搜罗来的美术作品的时

候，他对画家们所选取的绘画题材的文学兴趣远大于对绘画艺术本身的兴趣。他常常热中于为那些画配写诗歌，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研究那些作品的初衷。这些诗歌大多正是莱辛在《拉奥孔》中所指责的描写诗，这倒从反面加深了歌德对诗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认识，使歌德对莱辛的理论有了实践上的亲身体会和感悟。

随着对造型艺术理论和实践的越来越多的了解，歌德开始渴望见识更多的艺术藏品。在居留莱比锡的最后一年的春天，歌德悄悄离开学校去了约百公里之外的德累斯顿美术馆。在那里，他不仅大开了眼界，还受到了美术馆的主任顾问官里德尔先生的谆谆教诲，直到多年后远走意大利时，歌德的脑中还常浮现出里德尔先生高贵亲切的面影。

在莱比锡期间，歌德爱上了一个叫安娜·卡塔林娜·舍恩科普夫的姑娘，她是莱比锡布路尔街上一个酒店店主的女儿，歌德亲昵地称她“小安尼特”。小安尼特家的酒店兼作客栈，是大市集时期法兰克福人常去吃饭、落脚的地方，施罗塞尔路过莱比锡时，也住在这里，歌德天天到客栈和施罗塞尔一起吃饭、谈笑，很快就和小安尼特熟识起来。

和格蕾卿一样，小安尼特也比歌德大几岁，模样、情态也说不上漂亮但非常可爱，不同的是，小安尼特并不把歌德看成小弟弟，她爱歌德，温柔、殷勤而体贴地对待他，希望他将来能成为自己的丈夫。小安尼特的爱情，既填补了格蕾卿离开后在歌德心里造成的感情空白，又使歌德在异乡的孤独寂寞中找到了亲情的寄托，因为安尼特的母亲是法兰克福人，小安尼特自然也算是歌德的半个乡亲啦。

开始一年多的时间，歌德和小安尼特相处得很好。那时，歌德经常为了搜寻诗歌灵感和素材到野外散步，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他喜欢在散步时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树林中的菩提树干上。爱

上小安尼特后，歌德便在过去刻有他名字的树干上加刻上了小安尼特的名字，并让自己恋人的芳名高居于自己的名字之上。小安尼特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报答歌德对她的爱情，每次歌德去客栈和施罗塞尔的朋友们一起吃饭，小安尼特总是殷勤地为他端酒端菜，帮忙为他们预备饭食、她甚至也像小说中所写的女子们一样将自己的秀发剪下来送给歌德，以此表达对歌德的信托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在他们相爱的快乐日子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唱歌，还排演戏剧，遇到演戏缺乏道具的时候，他们竟会奇思妙想地用打了结的手巾来代替夜莺。对于女儿和歌德的来往，小安尼特的父母似乎从不反对，而安尼特的母亲则显得更愿意这个讨人喜欢同乡大学生成为家里未来的女婿。

可以说，与小安尼特的恋爱，使歌德第一次陷入了真实的爱情之中。虽然歌德与格蕾卿的恋情也可以称为初恋，但那次爱情因歌德的年幼和格蕾卿的矜持、诡秘而显得扑朔迷离，而小安尼特对歌德的爱情却真实而明朗，歌德对安尼特的爱情也少了些少年的羞涩、拘谨，多了些青年人的热烈和奔放。无数偷尝的热吻和拥抱助长着年轻人对异性身体的渴望，当这种渴望不能被顺利满足时，他便通过诗歌去获得或重温它，或通过对自己的恋人施加精神折磨来宣泄它。

在卧室里，远离开筵席，/坐着小爱神为你担心，/怕宾客们乱施诡计，/破坏新房中的和平。/淡青的火焰在他面前/发出神秘圣洁的光辉；/室内充满缭绕的香烟，/让你们饱尝新婚的滋味。

听到催客的时钟声音，/你的心跳得多么厉害；/你多么渴望美丽的樱唇，/它就要默默听你安排。/你急于要成其好事，/陪她走进洞房之中；/火炬在守夜者手里，/变得像台

灯一样朦胧。

　　她那丰满的脸和胸口，/被你狂吻得不住起伏。/她的严峻化为颤抖，/你的大胆变成义务。/爱神帮你为她解衣，/速度还不及你的一半；/他只得识相而狡猾地/紧紧闭起他的眼睑。

也许这首题为《新婚之夜》的诗所描绘的情景只存在于歌德的想像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歌德越来越频繁地对小安尼特发脾气，常常无缘无故或小题大做地和她大吵大闹，把自己来自各方面的烦恼任性地发泄在她身上，而闹过之后，往往又很快后悔懊恼，低声下气地向小安尼特赔罪。一次，歌德在与小安尼特怄气后偶然走到了他在菩提树上刻名字的地方，发现在小安尼特名字刻痕的裂口处涌出了许多树液，那些汁液就像眼泪一样顺着树干流挂下来，覆盖了下方歌德自己的名字。多愁善感的歌德被这一景象尖锐地刺痛了，他深感自己的乖戾专横和小安尼特的可怜无辜，连忙跑到小客栈去，一遍又一遍地请求恋人的宽恕。小安尼特原谅了他，但过不了多久，他就又旧病复发，重新在精神上折磨起小安尼特来。下面这首题为《假死》的短诗，典型地体现了当时歌德的妄自尊大和以看到恋人的痛苦为乐的恶劣心理：

　　哭吧，姑娘，在此处爱神的墓旁！/他死得偶然，死得无缘无故。/可是他是否真死？我不敢讲：/他也常常无缘无故、偶然地复苏。

可以感觉到，歌德写这首诗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他的爱神反复无常，小安尼特的爱神是否会永远呼应着他的爱神死而复苏。最初，对于歌德的无端吃醋和任性胡为，小安尼特总是忍耐

承受，歌德常使她伤心流泪，而她却总是宽恕他。但小安尼特的宽恕换来的往往不是歌德有效的悔改，而是他变本加厉的胡闹，时间长了，小安尼特终于开始疏远歌德。当歌德觉察到小安妮特情感变化的时候，他就像突然受到冷淡的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听由自己发起疯来，仿佛小安尼特欠他的爱情似的。等歌德认识到自己的愚妄和小安尼特对自己的重要的时候，他开始转变态度，极力讨小安尼特的欢心，就像当初小安尼特极力讨好他一样，甚至为此求助于他人。但无论他怎样努力，他已无法使受够情感折磨的小安尼特再回到他的身边来了。

实际上，自从格蕾卿离开歌德后，歌德并没有真正从病态的忧郁、敏感状态中解脱出来，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歌德对小安尼特的爱情只是歌德对格蕾卿的中途夭折的爱情的补偿和继续。而且，和许多年轻人一样，青年歌德在这一年龄阶段的情感和想法是矛盾的和不稳定的。他曾对好友贝里施说："告诉你，贝里施，我不能也不愿抛弃这个姑娘，永远不会，然而我毕竟还是要走，我一定要离开这里，但是她不会是不幸的，不，她一定会幸福……然而我毕竟是残酷的，我不给她留下任何希望……如果她遇到和她相称的人，如果没有我她也能过幸福的生活，我该多么高兴……"，也许当青年歌德在懊悔中想像着自己的行为给恋人造成的痛苦时，他觉得他应该以分手来终止对她的伤害，但谁能说在他的任性胡闹中没有一点对自己未来生活前景的焦躁和忧虑呢？然而，当人们失去了时候就会忘掉得到后可能会成为负担的想法，当小安尼特真的移情别恋时，歌德顿时感到羞耻绝望，热情有害无益地不断上升，成为一种强大的自我摧毁力量。如果说初恋的失败有种种客观原因的话，这次恋爱却是毁于歌德自己的践踏，因此，他开始了疯狂的自虐行为，以肉体的痛苦作为对自己过失的惩罚和解脱情感痛苦的方式。这种冲动行为不但使歌德

日后体弱多病，还在一个时期内毒害了他的精神，为他蒙上了一层自暴自弃的阴影。

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歌德决定了他的德累斯顿美术馆之行。

1768年3月，当歌德从德累斯顿回到莱比锡后，他和小安尼特解除了恋爱关系，狂热地投入到了铜版画和木刻的学习、制作之中。蚀刻铜版画时的有毒气体的侵害加上内心的躁动不安和毫无规律的生活，使歌德的体质迅速下降，体内长期积聚起来的疾病隐患终于又一次全面爆发。夏季的一天夜里，歌德突然大量咳血，继而昏迷不醒，一连几个星期卧床不起，处在生死边缘。8月28日，在朋友们悉心看护下终于离开病榻的歌德迎来了自己19岁的生日，也就是在这一天，他拖着虚弱的身体乘车离开了莱比锡，向故乡法兰克福驶去。

炼丹术

由于路途遥远，在莱比锡上大学的三年间，歌德从未回过家。当年他满怀憧憬地兴冲冲离家，现在却像一个海难中历尽艰辛的幸存者一样落魄而返；当年他是在一场大病康复后带着隐隐的感情创伤走的，现在又在一场大病尚未痊愈时带着更大的精神创伤回到家。虽然他回来时乘坐的是一辆舒适的马车，但经过长途旅行，他的身体仍显得非常虚弱，脸色也十分难看。面对着出现在家门口的歌德，家人夹杂在团聚喜悦中的疑惑和震惊可想而知。歌德的糟糕状态使他们受到如此惊吓，以至于他们除了身体之外没有敢马上询问什么具体情况。

最接受不了这一现实的自然要属歌德的父亲了。这个自己不得志的父亲一直对儿子寄予厚望，不仅供给儿子足够的钱物，还

亲笔修改儿子家信中的笔误和语法错误，对儿子的文学成绩也及时加以鼓励，满心指望儿子能稳健睿智地走好他为儿子规划好的人生坦途。现在，见到儿子如此一副落魄的样子，他既生气又痛苦，虽然他还能极力克制着不对儿子发火，但却找不到什么话来安慰儿子，只要求儿子静心宁神，全力配合医生尽快把病治好。父亲的这种冷淡态度，已足以使歌德感到父亲对自己的不满了，可以说，从回到家的那一刻起，歌德就充分体验到了父子关系的紧张给他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

歌德的妹妹和母亲对歌德自然要亲热体贴得多，妹妹的女友和母亲的女友也经常过来看望和陪伴歌德。母亲的朋友封·克勒敦堡女士很喜爱歌德，不时来和歌德谈心，歌德在《诗与真》中说："我在小说《威廉·迈斯特》中插进去的'美丽灵魂的自白'，就是根据这位女士的谈话和信札而写出来的。"

那时，歌德不仅肠胃功能受到很大损害，脖子的左边还在咳血时长了一个肿瘤，胸部也经常剧烈疼痛。为了给他治病，家里既请了内科医生，也请了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是个和蔼细心而又显得有些神秘兮兮的人，虽然法兰克福的法律严禁医生自己制药，这位医生仍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秘密配制药品。这些药品有一般性的助消化药，也有针对危重病症的"万应灵药"。歌德病情加重时，肠胃功能几乎完全丧失，在歌德母亲的多次请求下，内科医生终于回家取来了一瓶有强烈碱味的结晶体，把它在水中融化后让歌德喝了下去。万幸得很，药刚喝下去，歌德马上就感到舒服多了，而且此后，他的病情也开始好转起来，尽管这个过程仍然极其缓慢。

内科医生平时常向那些与他关系较密切而又信任他的人推荐某些化学兼炼金术书籍——那时的自然科学书籍常融炼金术和化学研究于一体，力图让人们相信通过他们自己读书和实践也可以

自制类似"万应灵药"似的药品。封·克勒敦堡女士很受内科医生的影响，她从基督教的宗旨出发，希望将拯救人的灵魂的工作与拯救人的肉体的工作结合起来，醉心于研究一本叫《神秘的魔术》的书。在她的感染鼓动下，求知欲旺盛而又喜欢探索新奇神秘之物的歌德也搜罗了一些著名医师和炼金术士——这些早期的自然科学家写的书来读。"万应灵药"对歌德的病症所显示出的疗效加深了大家对内科医生制造"万应灵药"理论的信任和崇拜，克勒敦堡女士在家里装备了一个小风炉，搜罗了一些玻璃管和蒸馏器，开始用铁试炼丹药，而歌德一等身体稍稍好转，就马上搬回到顶楼自己的房间里，在那儿安装了一个带砂浴器的小风炉，并自己用玻璃管制作出了各种直的和弯的容器，将各种混合的药品放在里面蒸发，或将自然和人体的某些成分混在一起调炼，还从美因河里找来一些雪白美丽的硅石，把它们和碱放在一起溶炼硅酸液。当歌德看到一些透明的玻璃状的物质在接触到空气后融化为美丽明亮的液体时，他是多么激动、惊讶啊!

万灵丹药虽然没有炼成，但对化合物和化学反应过程的仔细观察却使歌德对自然物有了更加本质、理性的认识。此外，他读的那些化学书籍如荷兰医师博尔哈夫的《化学纲要》、《医学箴言》等，也使他了解到了一些基本的化学、医学知识，为他今后对自然科学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一些基础。

在家养病期间，歌德除了研究炼丹术外，还翻检了自己在莱比锡时写的诗文和家信。信件多半是他写给父亲和妹妹的，已被严谨并爱好整齐的父亲装订起来，保管得很好。看着那些信，歌德觉得当初的自己十分幼稚可笑，甚至自以为是得有些滑稽，至于那些曾让他自鸣得意的诗文，现在他也觉得大多肤浅贫乏，缺乏由真正的热情、深刻的体验和充实的内容所造成的生动感。结果，除了《恋人的脾气》、未完成的《共谋犯》和少数几首诗歌

被保存了下来之外，其余的诗文、论文和信件，都被歌德再次交给了火神。

在莱比锡所有的旧友中，奥塞尔是歌德最怀念的人。离开莱比锡的前一天，歌德就是在奥塞尔家度过的。当歌德逐渐中断了和其他莱比锡旧友的联络后，他和奥塞尔的通信还依然保持了下来。奥塞尔的一切给歌德的印象和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当他回到家里时，马上就发现自己与那些涡形花纹的镜框以及某些中国制壁衣强烈隔膜起来。他对它们连讽带刺，还以莱比锡的房屋建筑样式以及自己了解的有关建筑知识与父亲规划建造的自家房舍相对照，指出父亲的设计的种种不合理之处。歌德那见了世面的年轻人的口吻使他的父亲极为恼火，有时父亲能尽力克制，有时则不免爆发一场父子间的激烈争吵，使家里本已紧张压抑的气氛更加令人难耐。好在歌德对绘画的爱好还能多少迎合父亲的愿望，这使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得到一定的缓和，稍微显出一些融洽和亲切。

1770年的春天来了，歌德在失恋、疾病和父亲的不满造成的抑郁心境中在家消磨了一年半的时间。现在，他的身体基本上恢复了，抑郁的心情开始舒解，心境日益明朗，思维也开始活跃起来。于是，像当年渴望去莱比锡一样，歌德又一次渴望尽快远离家乡。三月里晴朗的一天，歌德按照父亲的安排，乘坐一辆舒适的新式驿车离开了法兰克福，向当时属于法国的南方城市——斯特拉斯堡驶去。

应试

斯特拉斯堡位于现在德国西南端的德法边界上，距离法兰克福不到200公里，歌德乘坐的马车日夜兼程，很快就到达了目的

地。在一条唤做鱼市街的地方找到寓所安顿下来后，歌德开始通过介绍信拜访新的朋友和照应者。这些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不错的包饭的地方——一个约住有10人的小公寓，它由几个老处女照管，整洁卫生，生意很好，在这里住宿吃饭的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也有退伍军人和年老而有身份的单身汉。歌德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新环境，和一起吃饭的朋友们熟悉了起来。

在这10来个一起吃饭的人中，48岁的法院书记官萨尔兹曼博士是位领袖式的人物。他财产丰厚，讲究仪表，多年来一直在这个小公寓里包午饭，既给公寓增添了声誉，又起着约束青年人放肆行为的作用，此外，还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歌德成为饭桌上的一员后，很愿博得萨尔兹曼的好感，更希望在法学学习方面得到萨尔兹曼的帮助。歌德奉父命到斯特拉斯堡来上学的首要目的，就是取得法律博士学位，他向萨尔兹曼博士打听有关情况，萨尔兹曼博士告诉他说，斯特拉斯堡大学和德国的大学不同，它的法律讲授和学习主要以实用为目的，而不着眼于培养学术意义上的法学者。他给歌德介绍了一位久享盛名的考试补习教师。补习教师也告戒歌德不要好高骛远，而要以应考、取得学位和应付踏上社会初期阶段的生活为中心来安排自己的学习。具体说来就是：既不要查究某一法律产生的地点和原因，也不要探求它怎样随着时代和习俗而变化，甚至不要管它因为错误的解释和法院的歪曲引用而搞到怎样面目全非，唯一要牢记的是现行的法律是什么，以便将来为自己的当事人服务时能够应用出来。至于更进一步的深造，要以后再说。

补习教师的话，歌德听着很不入耳，但他别无选择，还是理智地按照补习教师的指示，暂时放弃了对其他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的钻研，集中精力学习法律的基本知识——整理和背诵法律问答。这项工作对于从小就背诵法典、在莱比锡大学也学习了一些

法律知识的歌德来说，绝非难事。1770 年 9 月 20 日，歌德参加了博士生考试，27 日便得知考试及格，以后的工作就是听课和准备论文及论文答辩了，歌德的时间变得更加充裕、宽松起来，他开始把时间更多地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去。

应考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再次显示出了歌德日益定型的性格特征：他总是在对环境的妥协中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在对环境的适应中调节和显示自己的个性。这一点，在莱比锡时就已表现得较明显，在斯特拉斯堡，他的这一性格特点又进一步巩固发展，并更加明确地显示了出来。斯特拉斯堡是法国文化一统天下的法属德国人居住地，它的社会风尚不仅和法兰克福极其不同，和莱比锡也有极大差异。这里的人喜欢在城市和城郊四处漫游，穿衣、装束也一派法国时尚。初到斯特拉斯堡，歌德首先遇到的来自新的文化的挑战就体现在发型上。歌德有一头自己很珍爱的美丽的头发，但他的发型却不合斯特拉斯堡的流行样式，于是，他去找理发师，希望能有一个时尚发型。斯特拉斯堡的男子都是将头顶以下的头发向后梳理成发辫或发囊，这要求头的后面留有足够长的头发，但歌德是旧发式，后面的头发以前剪得很短，只有前面的头发还长一些。按斯特拉斯堡理发师的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为歌德理出一种见得了人的发式。最后，歌德采纳了理发师的建议，带上了一副使他看起来风度翩翩却令他行动十分不便的假发。在理发师精心修饰下，那假发竟然丝毫不露痕迹，当歌德从理发店中出来时，他已经变成一个拥有最好的头发和发型的斯特拉斯堡青年了。

萨尔兹曼博士交游很广，全城几乎到处都有他的朋友。通过他的引领，歌德很快在斯特拉斯堡的上流社会里找到了自己愉快的交际场所，并且，为了进入和适应这种交际环境，歌德又重新学习起为父亲所极力反对的各种牌戏来。萨尔兹曼博士让歌德为

打牌准备了一个单独的小钱袋，除了玩牌，在任何场合都不用里面的钱。就这样，在斯特拉斯堡期间，歌德在上流社会的客厅里消磨了他的大部分夜晚。

那时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除了打牌，大概就是跳舞了。斯特拉斯堡人特别喜欢跳舞，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听见优美悦耳的舞曲在空气中回旋飘荡。虽然歌德从小就和妹妹一起在父亲的短笛伴奏下学习跳舞，但那时学的多是一些简单、基础的舞蹈，而且自从离开格蕾卿之后，歌德就基本上和跳舞断了缘分，甚至在莱比锡时，他也绝少跳舞，纵使偶尔被强拖进跳舞者的行列，他的跳舞动作似乎也忘记得差不多了，抬手举步都显得笨拙生硬，不能与他的舞伴默契协调。好在大家认为他是因不愿跳舞而故意如此，所以并不嘲笑他。不过偶尔的尴尬却使他和舞会更加疏远，即使在回到法兰克福养病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也从未以跳舞来娱乐自己和排遣忧郁烦恼。现在，在斯特拉斯堡轻松愉快的法国情调里，歌德的青春热情再一次复苏过来。经一个朋友介绍，歌德认识了一个法国跳舞教师，定时到跳舞教师家里去学跳舞。跳舞教师有两个美丽的女儿，当教师教学生跳舞时，他的两个女儿就轮流做学舞者的舞伴。由于跳舞教师的学生不多，每次学完跳舞，歌德都被这姐妹俩留下来，一起谈天、读小说。姐妹两人都娴雅大方，而且只说法语，和她们在一起，歌德既能得到很多乐趣，又能改进自己的法语水平，心里当然非常高兴。

在姐妹两人中，歌德更喜欢已有婚约的妹妹安美梨，而姐姐璐仙德却极力想赢得他的爱情。为了避免产生进一步的感情纠葛，在一次由算命婆子引起的小风波后，安美梨劝歌德不要再到她家去了，并在与他告别时亲吻了他。他们的举动刺痛了当时躲在侧门外的璐仙德，她跑进来大骂妹妹接二连三地夺走自己的恋人，稍微安静下来后，就走到歌德面前，一边频频亲吻他，一边

说："……谁在我之后最先吻这个嘴唇，谁就永远蒙灾惹祸！……我知道，上天这回已听见我的诅咒了。我的先生，现在您可以尽快走了。"

歌德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戏剧性的学舞经历，从那以后，再没有踏进过跳舞教师的家门。

虽然从根本上说，歌德绝不相信什么算卦诅咒之类的东西，但璐仙德巫女般的喊叫却对他产生了持久而神秘的心理影响，它不仅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更迎合了他作为一个青年人喜欢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人生神秘化、戏剧化的倾向。他怀疑它，又愿意相信它，它使他感到恐惧，又对他产生吸引，每当他听到那留在记忆里的喊声重又响起的时候，他便感到自己似乎已变成一个禁忌，他的嘴唇也变成了某种圣物，谁要想获得它或为它所追逐，谁就得以自己的生命或自己一生的幸福为代价。

大教堂

璐仙德姐妹的风波对于歌德来说只是他求学生活中的一个小小插曲罢了。虽然他对安美梨有倾慕之心，但这种倾慕并没有被充分发展到有深切爱情的地步。在这个人生故事中，歌德感到的惊奇和有趣远多于难过和尴尬，他已不再是过去那个未经世事、懵懂莽撞的十七八岁的青年了，对爱情，他已多少有了一些体会和认识，对自己未来的目标，他也越来越认识得越清楚。如果说少年的他是天真的，莱比锡时的他是忧郁的，这时的他便是朝气蓬勃的。他要成就大的事业，虽然这个事业现在看起来仍有几分模糊，但他却已经开始为此而在各方面进行准备工作了。他广泛地结交朋友，在各方面进行自我训练，并开始在某些重要问题上持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和立场。

在一起吃饭的医学生中，有一个叫迈耶的青年人最和歌德投脾气。他比歌德大7岁，不仅医学学得好，还精通音乐，并有惊人的记忆力，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功课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常常是一上午的功课听下来，就能在中午吃饭时把几个老师的讲课都惟妙惟肖地模仿、复述给大家听。另一个叫容格—斯蒂灵格的学医的青年也和歌德关系很好，他比歌德大9岁，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生活要靠自己的劳动负担，常常这一季不知下一季如何过，但他刻苦、乐观，性情温和，品质纯洁正直，所以很受歌德敬重，当容格的谈话在饭桌上被反对意见所打断时，歌德常常帮助他。歌德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友爱，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容格性格的充分理解和包容。

> 我现在的健康状况已足以推动我从事我想要和应该从事的一切，不过我还有一种神经过敏的毛病，使我不能经常保持平衡、宁静的心境。一声巨响便引起我的反感，病态的事物惹起我的厌恶，但是特别使我惴惴不安的，就是从高处望下来时我每觉得晕眩。这一切缺点，我都设法克服，并且因为我不欲耽误时间，便采用一种急激的方法去矫正。例如在晚上军营奏归营乐的时候，我跑到许多大鼓的旁边，它们的强烈的冬冬声和擂击，差不多使我的心在胸中爆裂。又例如我一个人独自走上大教堂的塔顶去，坐在那塔尖的球顶或所谓塔冠之下、塔颈上头，在那儿坐约有一刻钟之久，然后大着胆子再走到露天中，站在一块还没有一“厄尔”① 见方大小、没有特设的护栏的平台上，看见那无边无际的大地呈现

---

① 这段文字引自《诗与真》上卷383页，根据刘思慕先生原注，1厄尔≈2/3公尺。

在面前，而最靠近的东西和装饰物却把大教堂以及我立于其上和跨于其上的一切东西都遮住了。这时完全像坐着轻气球上升于空中所见的那样。这一类的惊恐和磨折的滋味我既那样频频的尝试，直至我对于它们的印象已漠然无所动心；后来我从事山岳旅行和作地质学的研究，在大建筑工程中与木匠们在悬空的梁上赛跑，以及在罗马为了较真切地察视艺术作品起见不得不作同样的冒险的时候，这种预作准备的训练使我得到许多便利。同样，解剖学对于我也有两重的价值……可是，我不只对于这些感觉上的现实印象，而且对于想像力的威胁，也要锻炼我自己应付的能力。幽暗、坟场、僻静的地方，晚上阴森的寺院及如此之类的可怖的印象，我也能一样的漠然视之；在这方面，我也能做到很不错，以至无论日或夜，无论在哪个地方，我都视同一律。甚至当我后来忽然高兴起来，想再尝尝少年时在这种环境中感到的有趣的恐怖滋味时，我已经不能够从我唤起的极奇怪可怕的印象中硬逼出这种感觉。

在上面这段话里，歌德谈到了医学，也谈到了其他许多方面，其中，他特别提到了斯特拉斯堡大教学的攀登和它带给他的有益影响。这座大教堂兴建于13世纪早期，是世界建筑史和美术史上比较有名的一座哥特式建筑，当时的建筑师是封·斯坦巴哈。它巍然矗立在阿尔萨斯的广袤土地上，无论在城市还是乡间，人们几乎随处都可看到它的身影。还在来斯特拉斯堡的驿车上时，歌德同车的伙伴就已经把这个著名古代建筑物指示给歌德看，下车后，歌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登上大教堂，尽自己的视线所及，将整个城市和它周围的广大地区一览无余。以后，他又经常和他的那些年轻朋友们相约在傍晚登上大教堂的望台，举杯送

走西下的夕阳，用望远镜来欣赏四周广阔土地上的景色。但在更多的时间，歌德常独自登临这个使他魂牵梦绕的建筑，除了锻炼自己战胜恐高症外，大教堂本身的建筑样式以及它的有关德国文化的历史意义，也吸引着歌德对它做仔细观察和深入研究。在歌德心目中，大教堂既是崇高和优美完美结合的范例，又是代表古代德意志文明发展水平的民族文化成果和历史见证：

> 我在非难哥特式[①] 建筑术的人们中长大，养成了对于太过繁缛杂乱的藻饰的憎恶。这样的藻饰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使一种宗教的阴郁的特征讨厌到了极点；我因为从前只看见过这一派的没有生气的建筑物，尺寸大小的配合既不适宜，也不看见首尾一贯之处，所以我的厌恶更增强。但是，在这儿我相信获睹一种新的启示了，因为那种值得非难之处我绝感觉不到，而它的可赞美之处反逼人而来。……我既发现这个建筑物是在古德国的基址上建立，并且在真正德意志的时代有那样的成就，连那朴素的墓石上的建筑师的名字也是祖国的读音和来自祖国的语源。我为这个艺术品的价值所激励，我大胆地要将向来误呼的名称“哥特式建筑”更改，而还给它我国的“德意志建筑术”的名字。此外，我却少不了先在口头上，继而在一篇献给斯坦巴哈的论文中把我的爱国的思想披沥出来。

歌德这里所说的论文，就是他后来出版的《德国的建筑术与封·斯坦巴哈》。歌德在自传中说，该论文主要阐述了他的两个独

---

① 多指12至16世纪欧洲盛行的一种建筑风格，特点是尖顶、拱门、装有彩色玻璃等。

特思想："第一，我们应当称这种建筑为德意志式，而不是哥特式，不是外来的，而是国粹的；第二，我们不应当把它与希腊和罗马的建筑术相比较，因为它的形成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原理为依据。"

在这里，歌德非常惹人注目地提到了爱国主义思想。作为一个21岁的青年人，歌德的强烈民族感情既来自启蒙运动唤醒的整体民族意识，也和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具体生活经历不无关联。歌德来到斯特拉斯堡学习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更好地掌握法语，也许，他的父亲还希望他在得到学位后直接到法国去。但没想到，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生活不但没有使他与法国的语言习俗更为接近，反而使他与之疏远了。在斯特拉斯堡，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法语乃至文化修养都受到法国人的嘲笑，甚至连歌德极为敬重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老学者舍普夫林先生的法语也被人挑剔，而被歌德视若德国天空中的北极星的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更被法国人讥讽为不知趣味为何物。歌德的法语水平一直受到父亲和朋友们的称赞，他自己也引以为骄傲，但他从未受过正式的法语教育，他的法语来自和不同阶层的法国人的交道，既不标准，更不纯粹，他的遭遇当然可想而知。进入青年时代，歌德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文艺和法国文艺越来越感兴趣，蒙田、拉伯雷等人的作品都曾引起他的共鸣和惊叹，同处18世纪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更为他熟知，本来他还踌躇满志，希望自己直追某些榜样人物，现在他却陷入了绝望，更为舍普夫林先生和弗里德里希王愤愤不平。事情在歌德看来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你生而不是法国人，你的语言似乎就永远只能是人们的笑柄。于是歌德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在他看来，与法国人相比，德意志人更加酷爱真理与自然，而法国人的哲学晦涩而不充分，否定也缺乏扬弃的公正，诗歌则缺乏热情，生活方式则把高雅讲究到了刻板的地步。

非但如此，即使对他极为崇敬的百科全书派，歌德也日益抱以批判的眼光："老顽童"伏尔泰令他日益厌倦嫌恶——追名逐利，派性、不诚实，对于许多值得尊重的事物歪曲丑化；卢梭虽使他受益倾心，但卢梭一生无好命运，晚年孤独凄苦，默默无闻，不值得他效法；狄德罗本来最使歌德感到气味相投，现在歌德也觉得他观点太高，视野太广，使人望尘莫及。

就这样，歌德干脆完全将法语抛掉，一心一意钻研起德语来。至于寻找异国的指路星辰，青年歌德的兴趣很快就被那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巨人——莎士比亚吸引去了。两三年前，歌德曾经错过了一位可以引领他认识莎士比亚的指导者——莱辛，现在，在他到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半年后，似乎为了证明命运对他的特别恩宠，另一位导师——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和重要推动者约翰·高特弗里德·赫尔德尔又向他身边走来。

黑衣伯乐

举止落落大方，彬彬有礼，有点温柔，却不乖巧，结作圆形的撒着发粉的头发，僧侣一样的黑缎子长袍——袍子的角执起来搁在口袋里，文雅，和蔼，圆圆的脸，宽广的额头，黑眉毛下一双灼灼照人的漆黑的眼睛——不，有一只似乎有些发红，但眼光依然锐利逼人，稍扁平的鼻子，略向上撅的极富个性而又不失可爱的嘴。当歌德正要迈上精灵旅馆楼梯的第一级台阶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这个似曾相识人。歌德的心突突急跳起来。这个人的肖像他已听人多次描述过了，尤其最近几天，他和他的文学朋友们一直在频繁地谈论这个来自东普鲁士的人物，希望能有机会和这个卓越人物相处。来不及多想，那人就要上楼去了，像几年前的那个伟大启蒙领袖一样与歌德擦肩而过。歌德向他打招呼。那

人停下了脚步，深信眼前这个衣着讲究、看起来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是认识他的。他问他的姓名。歌德。这个名字对于那黑衣人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他不认识他，也没有听说过他。但他对他产生了好感，亲切地和他说话，试图以种种问话来了解他的情况，当他们一起走上楼梯的时候，他已准备和他畅谈。

两条河流就这样在斯特拉斯堡相遇了，它意味着一场已在掀动的狂飙将要最终冲天而起。

赫尔德尔，东普鲁士人，1744 年 8 月 25 日生于东普鲁士小城莫隆根的一个穷苦牧师家庭，母亲是手工业者的女儿。少年时代，赫尔德尔以抄写文稿为生，18 岁时，他到了哲学家哈曼和康德的故乡——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师从哈曼研究神学和哲学，也听康德的哲学课。哈曼是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驱思想家，有“北方智者”之称，他推崇荷马和莎士比亚，鄙视宫廷文艺，认为人必须发挥感情的力量去改变世界的现状。在哈曼的指导帮助下，赫尔德尔研究荷马、莎士比亚、卢梭和英国启蒙哲学，并在以后的学术钻研中，在神学、哲学、美学、诗学、史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从 1764 年到 1768 年，赫尔德尔在里加当牧师，并开始了文学批评生涯。1766 至 1767 年，他写出了《关于当代德国文学的断片》，对莱辛等人的《关于当代德国文学的通信》进行评论；1769 年，他又发表了《批评之林》，对莱辛的美学名著《拉奥孔》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这两部早期的重要著作，使赫尔德尔成为当时德国的知名人物，跻身于文化界一流人士之列。接着，25 岁的赫尔德尔去了法国，结识了 18 世纪欧洲思想界的泰斗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人物狄德罗，和后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深受其世界观的影响。回国后，赫尔德尔又结识了启蒙运动的主将莱辛，莱辛建设民族文学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也深

深影响了赫尔德尔。1770 年 9 月，赫尔德尔陪封·霍尔斯坦·尤丁小侯爵一起游历，来到斯特拉斯堡，在精灵旅馆，他遇到了歌德，从而使德国文学和文化具有了不同的风貌。

歌德忘记了自己到精灵旅馆本要访问的那个有名望的外国人，他贪婪地吸取着赫尔德尔对他所讲的一切。分手时，他恳求赫尔德尔允许他去拜访他的住所，赫尔德尔亲切地答应了。

就这样，从 1770 年 9 月到 1771 年 4 月，在赫尔德尔滞留斯特拉斯堡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歌德几乎天天去拜访赫尔德尔，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为赫尔德尔所吸引。他如饥似渴地把赫尔德尔的一切话都吞下去，他越热心求教，赫尔德尔就越愿意将自己所知毫不吝啬地倾倒给他。虽然赫尔德尔只比歌德大 5 岁，但对于在各方面都处于发展期的青年人来说，5 岁之差已足以拉开两个青年人之间的距离，更何况赫尔德尔是个孜孜不倦、方向明确而又有名师指点的青年呢。同赫尔德尔相比，21 岁的歌德的绝大部分思想还都处于朦胧模糊的晦暗状态，而赫尔德尔的智慧却已高度发展，足以成为歌德的老师。这个 26 岁的年轻牧师老成持重，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几乎对所有问题都有自己成熟的见解和毫不含糊的判断。

作为一个学者和理论家，赫尔德尔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研究民族语言、历史、文学、哲学以及国家体制，他对当时德国文化的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民族语言的理论，对于民歌的看法，有关文学和历史的关系的思想以及人文主义思想。按歌德的观点，赫尔德尔的全部思想在歌德与他在斯特拉斯堡接触时就已形成甚至发展成熟了，因此，歌德在同赫尔德尔的交谈中得到了巨大收获。歌德在自传中写道：

我因而得到很幸运的机会，将我一向所想的，所学的，

所吸收的，加以完成、扩大和与较高级的东西相连结。

近几年来广大文学界中发生的事，我几乎全都茫然不知。可是，现在我通过赫尔德尔而突然知道文坛最近的一切活动及其倾向了。

他的谈话无论何时听来都有意义，无论他是发问也好，解答也好，或以其他的方法表达他的意见也好，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能启发我获得新的见解。

他吸引我的魅力一天比一天强烈。我本来生性坦白，容易相信别人，在他面前，我特别没有什么秘密可守。

赫尔德尔引导歌德熟悉荷马、莎士比亚、卢梭和莪相，才气横溢地与他探讨希伯莱诗歌，他坚持用历史眼光来观察世界，认为文学以世界史为基础，是不断发展着和消亡着的历史现象，它从人民、时代和国家精神中产生，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时代和社会紧密相关，要理解文学的发展史，就必须认识人民的历史与人民的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只有当一个作家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时，他才能发挥他特有的写作诗歌的能力。赫尔德尔的这些思想实际上为时代文学指出了反封建专制、反教会的方向，他的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和激烈的反封建意识，对歌德产生了很大影响，燃起了歌德的青春创作热情，为他以后创作具有强烈反封建专制色彩的《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和《少年维特之烦恼》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也指出了明确的艺术方向。

可以说，在结识赫尔德尔之前，歌德从未有过真正的老师，他从未找到过一个他甘心低首下心而又能真正对他的文学事业有根本性指教的人。赫尔德尔的伟大品格、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洞察力征服了他，使他的敬佩和爱戴之心日益增加，而赫尔德尔的思想也因为他的缘故而更加散播开去，间接地影响了一批围绕在

他身边的青年。在莱比锡时，歌德虽然也读了《莎翁选粹》甚至维兰德的莎士比亚戏剧8卷本散文译本，对莎剧的幽默情调及众多出色的描写也不无感悟，但他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记诵名言佳句的层次，缺乏全面而本质的理解把握。赫尔德尔对莎士比亚的剧作有着深刻而透彻的理解，他美妙地将它们表达出来，使歌德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化巨人对自己和对于当时德国文学的价值。对歌德来讲，莎士比亚就像一种崇高的灵感那样吸引和鼓舞着他，他无条件地崇拜这位英国人，不敢对他稍加挑剔。在赫尔德尔滞留和离开斯特拉斯堡的日子里，歌德在他周围的青年朋友心中鼓动起了钻研莎士比亚作品的热情，包括瓦格纳、伦茨在内的一个又一个心高气傲、踌躇满志的优秀文学青年被吸引到了小公寓的包饭桌上来。这个由一起进餐的年轻人组成的小团体，经常围绕莎士比亚进行讨论、演讲，他们狂热地沉溺于莎士比亚的阅读，既读德文译文，也读英文本，既钻研全文，也研究片段，甚至连零碎翻译的段落和摘要也读得津津有味。他们还在平时的生活中模仿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举止，套用那些谐谑的言谈，或者写一些滑稽幽默的打油诗来模仿那些莎剧中的丑角。用歌德的话来说，他们一个个全都成了自命不凡的“莎翁通”。

赫尔德尔非常重视民歌的整理研究，从1770年起，他每到一处都搜集民歌。这些民歌有德国的，也有外国的，对外国民歌，赫尔德尔都将它们翻译成德语。这些民歌后来被结集出版，并在他去世后被总编为《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其中很多民歌被当时和后来的音乐家谱成歌曲，广泛在世界各地流传。赫尔德尔之所以重视民歌，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这些诗歌能够证明诗的艺术是一种世界的或民族的赠礼，而不是几个优秀的有教养的人的世袭财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对“自然”的推崇。赫尔德

尔认为最自然的东西存在于底层人民之中，因此，民歌便是最自然的诗歌。在斯特拉斯堡期间，赫尔德尔不仅改变了歌德对诗的认识，还鼓舞歌德在阿尔萨斯地区搜求流传下来的德国民歌，使歌德成为他采集民歌的助手。通过搜集民歌，歌德接触到了朴素的民间创作并受到它们的影响，改变了过去华丽纤巧、缺乏真情实感的洛可可风格，形成了自然朴素、真挚明朗的诗风。

歌德对赫尔德尔的崇拜和敬仰是空前的，赫尔德尔的一切对他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他没有将赫尔德尔写的一页纸甚至一个信封撕毁或抛弃过，只是在多年以后，那些信件等才在辗转迁移中逐渐散失了。

赫尔德尔的眼睛需要做手术，于是决定延长在斯特拉斯堡的滞留时间。和小侯爵分手后，他就另找了一所房子单独住了下来，等待医生的治疗。在赫尔德尔接受治疗期间，歌德每天早晚都去探望赫尔德尔，有时甚至整天陪在他身边，帮助伺候照料他的一切。在赫尔德尔的病榻旁，歌德不禁对赫尔德尔的坚强毅力大为惊叹。不管是由于手术创伤而造成的疼痛也好，还是由于常换绷带而造成的疼痛也好，赫尔德尔对这些都绝不露出难耐和不快的表情，不管治疗多么痛苦、讨厌，他都不丧失他那富于感召力的蓬勃生气，仿佛在他、医生和陪伴者中，只有他自己承受的痛苦最少、最轻，这使歌德感到他更加崇高可敬。然而手术很可能失败（实际上它也终于失败了），赫尔德尔在写给自己未婚妻的信中，担心自己会一辈子成为残废人，过前途渺茫不定、物质贫赛的生活。而歌德也明显感到，尽管赫尔德尔仍表现出一种对不幸未来的沉郁、坚韧、逆来顺受的态度，但他的性情却比健康时更坏了，偶尔会发脾气，以苛刻讥讽的态度和言辞冲撞人。对赫尔德尔偶尔发作的坏脾气，歌德都以极大的理解、爱心和崇敬心默然领受了，他在自传中说："我既对他的优良伟大的品性、

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洞察力日益敬服，没多久，我便惯于忍受他的叱责和非难了。这个心地好而性情暴躁的人影响很大，很重要。”

对歌德来说，赫尔德尔因疾病烦躁而偶尔发作的脾气要比赫尔德尔平常对他的尖锐辛辣的讽刺式批评容易接受得多。按赫尔德尔的水准，歌德的很多小趣味显然是幼稚、肤浅和平庸的，但这个实质上在扮演老师角色的人却并不以一个自觉的循循善诱的老师的教导方式来引导自己面前的学生，相反，赫尔德尔的表现倒真正显示出他在年龄上不过是歌德的一个兄弟，他不能扮演一个具有慈母心的长者的角色——而过去，歌德正是一直生活在这种以宽容作为一种陶冶方式的年长者构成的教育温室里。赫尔德尔的教育方式是不断地用一根布满针刺的铁鞭去抽打歌德的思想，当然，他打到的首先是歌德的自尊。歌德在自传中写道：

> 可是，不消多久，他的乖戾的脾气即露出来，使我大感不快。我对他讲及自己青年时的所作所为和种种癖好，其中有一样就是纹章之搜集。这是主要地藉着交游通讯广的世好的助力而凑集起来的。我是照着政府年鉴把纹章排列的。有了这个机缘，我便很熟悉各国各州的大小诸侯，统治者以至普通的贵族，在加冕礼举行的时候，这种纹章便常大有助于我的记忆。我颇得意地说起这事，不过他却另有见解，不独认为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什么意思，而且因此竟把我加以嘲笑，以至使我大为扫兴。

还有一次，歌德对赫尔德尔讲述他在莱比锡上学时的德累斯顿美术馆之行，谈到他对轻松幽默的宗教寓言画家多明尼科·费提的喜爱，赫尔德尔对歌德的艺术趣味和鉴赏标准大不以为然，

马上写了一首诗来讽刺歌德和他推崇的那位倒霉的画家。

赫尔德尔是个讲究工作效率而又无比勤奋的人，他几乎无时无刻不需要看书，因此对于书籍极为留心。在第一次看望歌德时，赫尔德尔看到歌德的书架上有不少他喜欢的精美藏书，如《西塞罗书简集》等，但很快他就发现，歌德实际上并不能及时地利用那些书，而只让它们在书架上起了个装饰的作用。赫尔德尔对歌德的疏懒极为不满，一有机会就拿这件事讽刺歌德，一次他向歌德借书时，干脆把借书条写成了一首讽刺诗，甚至把歌德的名字也编排进去作为嘲笑的材料，这使歌德大为不快。

这种对一个朋友既尊敬爱慕又反感不快的复杂情感歌德过去还从未经历过。赫尔德尔对歌德的弱点毫不妥协，迁就，他的尖锐而切中肯綮的批评促进了歌德的精神发展，使歌德获益匪浅，但他的批评方式却常常令歌德感到很不舒服，但尽管如此，歌德对赫尔德尔的批评大多还是接受了。歌德既赞成赫尔德尔的为人，又敬重他的成就，认为他远超过自己，因此，他按照赫尔德尔的标尺抛弃了过去的许多见解和爱好，换句话说，他接受了赫尔德尔对他思想的鞭打，只是，“只要我在当时的立场可以办得到的话，我仅力求将正当的指责同不正当的非难分开。因为这个缘故，我与赫尔德尔亲近的时候，没有一天不极有成效的得到他的启发。”

上面的引文也出自歌德的自传《诗与真》。实际上，判断“正当的指责”和“不正当的非难”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作出这种判断的是一个青年人所承认的权威人物的时候。正像歌德在自传中所说，赫尔德尔破坏和改变了他对从前所爱好的种种事物的兴趣，“因为，没有一种爱好，一种习惯能够那样的牢固，可以长久地顶住一个人所信仰的优秀人物的诽谤而不加改变。”歌德非常喜欢古罗马黄金时代的三大诗人之一奥维德的神话作品

《变形记》，赫尔德尔却对歌德的偏爱大加非难，虽然歌德极力为自己所喜爱的作品辩解，最后仍“不得不大大的压抑着自己的性子忍受下去，甚至连我所尊敬的奥维德也差不多为我所厌恶了”。

也许正像人们所说，赫尔德尔和歌德是按照对立法则才互相产生吸引力的，但这里也许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一个诗人和一个理论家看待问题的不同出发点。无疑，赫尔德尔敏锐地意识到了歌德的天才和与众不同之处，意识到了歌德那活跃在文雅外表下的强烈的叛逆精神，他对歌德寄予厚望，而且并非不看重自己对歌德的影响以及歌德对他的印象。在给自己未婚妻的信中，赫尔德尔写到：“歌德真是一个好人，只是太轻率，过于轻率，有点忘乎所以，我一再责备他不该这样，他是我在斯特拉斯堡逗留期间拜访我的唯一的一个人，也是我乐于会见的一个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也给他留下了一些好印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起作用的……”

也许，“轻率”带来的后果已使歌德心有余悸了，渐渐地，歌德在赫尔德尔面前变得收敛起来，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赫尔德尔的面前，凡是一向对自己的教养有补益的事物，尤其是我目前认真地着手做的事情，我越来越隐讳而不公开出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我最小心翼翼地隐瞒对于某些题材的兴趣，这些题材，曾深植于我的心中，逐渐培养成熟而采取诗的形式。这就是《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和《浮士德》。……我最要瞒着赫尔德尔的就是那神秘的犹太密教的化学实验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事，纵然我当时还很喜欢偷偷地从事这种实验，想用比我得自传授的更始终一贯的方法去发展它。至于我所写的作品，我相信可能将《共谋犯》拿给他看过，不过已记不起他对这剧有什么指摘或激励了。”

尽管歌德像一个孩子似地抱怨赫尔德尔从来难得赞扬他一

声，当他在自传中纵览往事的时候，他对赫尔德尔对自己所产生的有利而重大的影响仍然给予了极为充分的评价："当这些人的活动盛极一时之际，我们青年人也在我们圈子里开始活跃起来：而我也有点开始跟较年轻的朋友们——纵不是跟年长的人们——走上互相吹捧、标榜、拉拉扯扯的邪路上去。在我接近的一伙人中，我所创作的总是视为佳构。闺秀、朋友和恩人总不会贬低别人为取悦于他们而撰作的诗。由于这种情谊关系便终于产生一种互相阿谀的虚饰的词令，如果一个人不随时锻炼较高尚的本领，这个人的个性就容易丧失在这些连篇空话之中了。幸而我还可以说，因为一个意外的结交，我的沾沾自喜、顾影自怜的爱好，虚荣心、自负心和骄傲等等在我心中潜伏或作用着的一切都经受了一个严酷的试炼。这个试炼是独特的，又与时世不相宜，然唯其如此才更透彻、严峻。因为，给我带来极重大的结果、最有意义的事件就是与赫尔德尔之结识以及接着跟他的亲密交往。"

热恋与离弃

赫尔德尔是个精力非凡的人物，他对当时稍有价值的著作尤其是印刷出来的东西无不过目。他常常带给歌德一些新出版的文艺书，并特别向歌德推荐了由18世纪英国作家奥里佛·哥尔德斯密斯写的感伤主义小说《威克菲牧师传》。该书1766年在伦敦出版，1767年即有德文译本在莱比锡出版。赫尔德尔向歌德盛赞这本小说，并以他独特的真挚、质朴的方式朗读这部小说的德文译本给歌德和他的朋友们听。青年歌德被这部作品的情调和赫尔德尔富于感染力的声音深深打动了，以至于赫尔德尔说他感情过盛，并责怪他对于小说作者在艺术上的匠心缺乏洞察力。总之，这部小说当时在歌德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他觉得自己大有

所得，虽然当时他对这所得为何还不甚了然。

尽管歌德在《诗与真》中说他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不久后会置身于同小说的虚构世界相似的现实世界之中，但这种说法也许只是“诗”，不是“真”，也许当时他和许多被艺术作品打动了的年轻人一样，对进入小说的虚构天地、成为其中的某个角色不无向往和幻想，而正因如此，当同桌吃饭的韦兰屡次对他谈起塞森海姆乡村牧师布里翁及其二女一子时，青年歌德便不由得极想去拜访这个家庭。

1770年10月初，刚通过考试不久的歌德和韦兰选了一个晴和的日子动身去塞森海姆。天性活跃的歌德不能平淡地对待这次旅行，临行前，他脱下了平日所穿的时髦服装，找出自己的旧衣服，又借了别人的衣服，搭配起来穿在身上，另外，他又给自己梳了一个很特别的发式，让人看起来即使不觉难看也会感到怪异。歌德说，他从幼年时起就有改装癖，甚至连严肃的父亲对他这种爱好也予以鼓励。不管怎样说，青年歌德总有许多新花样，何况这次拜访显然令他兴奋不已。

塞森海姆是斯特拉斯堡城郊一个宁静的村庄，到那儿约需六小时的旅程，沿途莱茵河两岸美丽的自然风光令两个年轻人心旷神怡，而歌德那副怪里怪气、与他真面目极不相称的酸秀才模样，更令韦兰一路上大笑不止。歌德嘱咐韦兰在向主人介绍他时不必说好坏，韦兰预言一场好戏将要开场。

当他们来到牧师家时，已将近晚饭时间。在外表破旧的屋子里，只有牧师一人在家。牧师陪着歌德和韦兰说话，他给歌德的印象是胸无城府，深沉和气。不一会儿，牧师的太太和大女儿也回来了，只有牧师的小女儿弗里德莉克和她的弟弟不见踪影。姐姐出去空找了一趟，回来后便和母亲一起抱怨当地的不良习俗。在歌德听来，弗里德莉克也许是一个经常在外奔跑、耽于游戏的

野丫头吧。

> 恰在这刹那间，她真个走进门来，于是这个田舍的天空便升起一颗最可爱的星。两姐妹都作所谓德国式的打扮，而这种殆已过时的民族装束特别与弗里德莉克相配。她穿一条有绲边的圆筒形的白色裙子，很短，使她的美丽的脚儿一直到踝都露出来；一件短而白的紧身马甲，一条黑色的薄绸的围裙，作这样装束的她便介于村姑与城市小姐之间。她走进来的时候，身躯修长而轻盈，仿佛没有穿衣服那样，她的可爱的头上结着一大条黄金色的辫子，比起它来，脖子像是太过纤柔了。她的乐滋滋的碧蓝的眼很明晰地顾盼着，可爱的微低的鼻子，像是在世间无挂无碍那样在空气中嗅着。她的腕上挂着一顶草帽。这样，在最初见面的一瞬间，我就看出和觉察到她的一切优美和可爱之处而心花怒放了。

在歌德的自传里，弗里德莉克整个一副自由自在的轻灵模样，一望即知是个心境明朗、无忧无虑的姑娘。对歌德装扮的这个贫寒而勤奋有才的神学生，弗里德莉克的态度既关切又纯真自然，全无忸怩羞涩之态。她的朴实甚至粗率也显得别具一格：在已走音的钢琴上为客人弹奏曲子而毫无不安，接下来的小曲没能唱完，却站起身，嫣然一笑说：“如果我唱得坏，我不能归咎于钢琴和学校教师；让我们到室外去，听听我的阿尔萨斯和瑞士的流行小曲，一定会唱得好点。”

弗里德莉克的这番话说得顽皮、率直、又有点蛮不在乎的骄傲，但却让人觉得非常纯真可爱。尽管歌德心里觉得愚弄这样善良的人有点惭愧，但事已至此，他也只好继续扮演乔装的角色。晚饭后，韦兰提议大家出外散步。一路上，歌德挽着弗里德莉克

的手臂，听她东扯西拉地描述自己生活圈子里的人与事。听到弗里德莉克谈论她所特别尊重的人物，尤其是当那些人物是男性的时候，歌德不由得心中生出某种嫉妒。他想到弗里德莉克的晚归，想到牧师太太和大女儿对村中习俗的种种诅咒，不由心中嘀咕不安：弗里德莉克该是有很好的人缘和不少的仰慕者吧？但他徒然费尽心机，妄加臆测，却不能从弗里德莉克的话中发现什么把柄，只好自慰地想：她既然这样推心置腹，像对旧相知似地对我毫无顾忌地滔滔不绝，她的心一定是极其纯洁的吧。虽然歌德心里这样想，但他又总觉弗里德莉克这种一见如故、无挂无碍的心情难以想像，所以散步回来一进到主人为他们准备的房间，歌德便忍不住盘问韦兰是否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接着又接二连三地提了一大串问题：这个姑娘有过爱人没有？现在是否在恋爱着？有过婚约没有？当韦兰对这些提问都给以否定的回答时，歌德又不由掩饰说："真的吗？这样的天真烂漫的心情是我所不能想像的。如果她恋爱过，而失恋，而又平复过来，甚或已许了人，在两个场合，我都觉得无所谓呢。"嘴上这样说着，他心里却暗自高兴。就这样，歌德和韦兰一直聊到深夜，歌德一边聊一边回味刚才散步时的情景，他觉得，费里德莉克好像已经有点喜欢上他了：她不是曾委婉而聪明地表示希望他以后还想再来，就像其他来访的客人一样吗？

第二天天一亮，歌德就急切地想再见到弗里德莉克。可当他再穿上昨天的衣服时，却不禁羞惭、尴尬起来：这身精心搭配起来的服装昨天还令他得意洋洋，兴奋不已，今天穿在身上却越看越觉得难以见人，如果说在黄昏时人们对长途旅行的客人的风尘仆仆常不以为奇的话，那么在一个空气清新、阳光明媚的早晨，人们该用怎样的眼光来打量一个衣着怪诞的大学生呢？歌德左思右想，悔恨交加，恨不能抓起韦兰的漂亮衣服换在身上，可他俩

身材又不相当，歌德不禁绝望起来。偏在这时韦兰又火上浇油，说歌德的那身衣服实在穿不出去，这使歌德不由更加懊恼，竟高声喊道："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事，再见，宽恕我吧!"说着，竟不顾韦兰阻拦，直冲出房去，一口气跑出屋子、院门，一直跑到来时存放马匹的旅舍，骑上马往斯特拉斯堡方向奔去了。

跑出了一段路程，未见有人来追，歌德便放缓了马匹，他开始对自己的不辞而别有些后悔了。回想着昨夜散步时的情景，各种念头在他脑中迅速交替、变换，猛然间，他想起刚才经过德鲁森海姆时看到客栈的小老板穿了一身很整洁的衣服，对，就先借小老板的衣服来穿。拿定主意，歌德立刻掉转马头，又回到德鲁森海姆。小老板很爽快地答应了歌德恳求，兴奋的歌德换上衣服后，灵机一动，又用一块木炭把眉毛画成小老板那样，接着又把头发也梳成了小老板的发型。这下，歌德简直变成了小老板本人，连小老板自己都觉得有些真假难分了。小老板家里有个产妇，小老板曾答应把婴儿受洗的饼送给牧师太太，为了使一切显得更加逼真，歌德耐心熬过三个多小时后，拿着原准备由小老板自己去送给牧师太太的饼，兴冲冲地上路了。

歌德的这次不得已的改装又成功了。除了被牧师太太偶然识破外，歌德几乎骗过了所有的人，甚至当他在路上意外地遇到韦兰和弗里德莉克姐妹时，他们也都没有把他认出。放下饼后，歌德按照牧师太太的主意来到牧师家附近一个高地上的小树林中，从那里眺望周围的景色，等待午饭的时间——那时他就又可以见到弗里德莉克了。歌德选了一处板凳坐下，发现板凳旁的大树上挂着一块长方形的小木板，上面写着"弗里德莉克休憩之所"几个字。意外的发现使他既愉快兴奋，又惴惴不安，心里怦怦直跳，此时，他已下意识地预感到，他的到来将打破弗里德莉克的和平宁静的生活。

一些小波折往往能带给恋人们许多乐趣并增进他们的感情，当弗里德莉克在树林中发现“小老板”原是歌德时，惊愕之余，禁不住兴奋不已：她已从韦兰口里知道了眼前这个不断改装的人正是韦兰常对她们提起的那个以种种乖谬行径脍炙人口的朋友。歌德握着弗里德莉克的手，抑制不住内心的热情亲吻了它，并一改昨晚的沉默拘谨，把憋在肚子里的倾慕之语喋喋不休地向弗里德莉克倾诉起来，而弗里德莉克此时倒沉思缄默起来了。

回到学校，歌德觉得学业比以往艰苦了一倍，他日夜思念弗里德莉克，心中郁闷，度日如年。在小安尼特之后，歌德又开始陷入到一种盲目的热情之中，再次委身于不知方向的生命激流。

很快，歌德在医学课上找到了几天的假期，他来不及等韦兰，也不顾天色已近黄昏，立刻动身前往塞森海姆。尽管歌德到塞森海姆时夜已很深，弗里德莉克姐妹却还没有休息，她们的饭桌上摆着食品，仿佛她们真像她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料定歌德一定会来。歌德这次打扮得整齐漂亮，惹得弗里德莉克的姐姐不由发笑，而弗里德莉克却认为歌德这样做是为讨她的欢心，心里非常高兴。第二天是星期日，歌德陪弗里德莉克一起去教堂做礼拜，接着又陪她在田野中散步，帮她构想给来访的客人安排的各种娱乐活动。弗里德莉克的父亲在第一次见到歌德时就对他感叹过房屋的破旧和自己的无能为力，现在，当牧师再次与歌德谈起重建房屋的话题时，满怀热情的歌德立刻自告奋勇，答应回去后为老人绘制一张平面设计图，使弗里德莉克对他在爱慕之余又增加了感激之情。分手时，两个年轻人似乎已心心相印，深信彼此的倾心相爱。

以后，歌德又数次来牧师家，不仅把自己花了很多功夫绘制的图纸带给牧师，还请内行的朋友画了一份更为切实可行的图纸，这张图纸不仅包括平面图、断面图、正面图，还包括了预算

书以及庭院的安排等。在牧师家里，歌德总是和弗里德莉克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时间长了，牧师一家渐渐习以为常，视歌德如家里人，再加上他们对歌德的好感和信任，不久，他们就按当地习俗任弗里德莉克和歌德的感情自然发展。歌德和弗里德莉克常与其他年轻人一起结伴访友，或在莱茵河上泛舟钓鱼。美丽的自然风景和淳朴的田园乐趣滋养着年轻人的恋情，也孕育了歌德赞美青春和爱情的诗歌。这些以后被收入《塞森海姆之歌》的诗多具有民歌风味，明朗朴素，真挚动人，是歌德诗风转变后的佳作，其中那首著名的《五月歌》，大概就是在这时写成的吧。

在塞森海姆，逢到节日客人多，歌德和弗里德莉克多和来牧师家的客人们一起做各种游戏活动。在游戏中，人们常把亲吻作为赏罚的手段。一开始，歌德还设法避免这种场合的出现，因为他总想到璐仙德，害怕那诅咒中的事情真的发生，但随着游戏的不断进行，快乐的愿望使他忍不住把璐仙德的诅咒抛到九霄云外，一有机会，他就在弗里德莉克温柔的双唇上留下热烈的亲吻。

跳舞，拥抱，接吻，海誓山盟。歌德和弗里德莉克似乎已坠入爱河的最深处，然而，在一天的狂欢之后，当歌德被沸腾的热血冲击着在深夜里突然醒来时，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感情苦恼和思想混乱之中，他越感到弗里德莉克的优秀、可爱，他的痛苦就越真切、越深刻。歌德明白，这只能是一场没有婚姻的恋爱，所谓璐仙德的诅咒，也不过是自己的理智的警告罢了，当意志能抵挡住情欲的冲击时，这诅咒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铁栏，当追求快乐的愿望占上风时，这诅咒便成了一个鸡叫时分的苍白鬼影，一个娱人性情的文学神话。在他和弗里德莉克的这种田园牧歌似的爱情中，有多少是真情，多少是冲动，多少是给予，多少是虚荣呢？这种理智的反省使歌德痛苦、自责，却不能帮他从身

不由己的热情中解脱出来，而在这时，他总是选择放弃思考，把结局交给命运，任自己的理智随激情漂流。

这个命运很快就到来了。有一段日子，歌德学业繁忙，半个月不能去看弗里德莉克，痴情的姑娘耐不住心中的思念，便想到城里去看望歌德。正巧弗里德莉克家在城里的一位亲戚早就邀请她们一家到斯特拉斯堡去做客，于是，弗里德莉克就在母亲和姐姐的陪同下来到了斯特拉斯堡。

牧师的亲戚是斯特拉斯堡颇有财产和声望的人家，他们家的年轻人因为常去塞森海姆牧师家游玩，所以认识歌德，歌德也曾几次到他们府上拜访，受到主人的热情款待，弗里德莉克来到斯特拉斯堡后，歌德一有时间就陪她和她亲戚家的表姐妹们一起做各种在塞森海姆时常玩的乡间游戏，或者给在座的太太、姑娘们讲故事，朗诵莎士比亚戏剧。有这样一位多才多艺、像骑士一样为自己效劳的恋人在身边，弗里德莉克毫不觉得是在异地做客，她沾沾自喜，自由自在，乐不思返，似乎丝毫也没有感觉到这种陪伴对歌德来说开始是出于热情，后来就成为勉力承担的义务了。

歌德初次在牧师家见到弗里德莉克姐妹时，虽然觉得她们穿的德国民族服装已经过时，使她们看起来既不像村姑又不像城市小姐，但他的热情并未因此而降低，相反，他觉得这种装束特别与弗里德莉克相配，尤其是当弗里德莉克轻盈优美地走上铺满鲜花青草的高坡，或像小鹿一样跑过溪水潺潺的田野的时候。在那种背景下，那些戴着漂亮首饰、按时髦的法国方式打扮起来的表姐妹们总是不如本色质朴的弗里德莉克更能打动年轻诗人的心。但现在，置身于城市的帷帘、穿衣镜、座钟、瓷器和古玩之间，那些仪容华贵的太太、小姐们却显得更与环境相称，而弗里德莉克姐妹的民族服装则使她们完全成了一副仆人打扮。弗里德莉克

似乎对这种相形见绌全无感觉，依然如在乡间的客人们中间一样善于应酬，她轻松自如地给大家制造欢乐气氛，毫无造作、拘谨之感，但弗里德莉克的姐姐却几乎丝毫不能适应新环境，更无法漠视环境对自己造成的心理挤压，用歌德的话说，她就像一条被海浪打上岸去的鱼，完全失去了在乡间的自如感，言行举止尴尬笨拙，令歌德感到十分难堪。虽然歌德按弗里德莉克的意旨尽力去安抚她的姐姐，但他心里却盼望她们能早日回去。好在弗里德莉克的母亲娴雅大方，比两个女儿更显得与新环境相称，甚至言谈话语也不在其他太太之下，歌德的心境才稍微安宁了些，但他始终无法使自己做到像弗里德莉克那样泰然自若，心无他思。在他心中，已经产生了一种陌生情感，这种情感骤然拉大了他和弗里德莉克之间的距离。

毕业近在眼前，歌德暂时抛开种种杂念，全力投入论文的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他发现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对他来讲是不太容易完成的，便准备按大多数人的做法写一篇一般意义上的论文，但父亲否定了他的这种打算，鼓励他下工夫做一篇真正像样的论文。最后，歌德选定了这样一个论文主题：作为立法者的国家，不仅有权力而且有义务建立一种固定形式的、无论俗人还是教职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的宗教信仰。论文题目为《立法者》。歌德的父亲对于儿子的这一富于新教精神的标新立异之作极为赞赏，但法学院院长却把歌德的论文视为一篇危险的东西，“出于宗教的原因和慎重的考虑而把它压了下来”，拒绝将之作为合格的学位论文由院方予以公开出版。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歌德被允许以论文提纲参加答辩，并轻松顺利地通过了，1771年8月6日，歌德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歌德取得博士学位的第二天，他就听到了舍普夫林先生去世的消息。在斯特拉斯堡，舍普夫林教授也是对歌德产生显著影响

的人物之一。虽然歌德几乎没有机会接近这位卓越的学者，他却和教授的两位弟子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因而得以了解教授的著作和生活情况。舍普夫林教授这位从1720年就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担任历史学和雄辩学教授的老学者，无论在学术还是社会生活方面都极为成功，他遍游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地，所到之处不仅与当时的知名学者结交，还替政治家们出谋划策，是各国君侯的座上客，深受学界和政界的敬重与好评。舍普夫林教授对歌德的影响表现在，综观歌德的一生，他似乎一直都在以舍普夫林的方式来选择和安排自己的人生，只有爱情除外，因为舍普夫林教授是一个女性厌恶者，而歌德却崇拜女性，爱女性，不断陷入到新的爱情中去，甚至就在临近毕业的这段极为忙乱的时期，他还仍处在爱情的矛盾与痛苦中。

送走弗里德莉克姐妹和她们的母亲之后，歌德便很少到牧师家去了，他不能给可怜的弗里德莉克带去任何可以安慰她的许诺，而弗里德莉克也已无任何东西能帮她对心上人加以挽留。那以盲目的爱情方式出现的青春冲动已冲过它的最高点，现在，已开始在社会习俗的阻力下向下跌落，只是还保留着它的部分能量和惯性。这些残余的能量与惯性靠着频繁的通信得到补充和延续，让不知所措的恋人们暂时自欺欺人地陶醉于热情洋溢的优美情话中，而一当他们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即将分手之感便毫无遮拦地淹没了他们的所有欢乐。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歌德将在斯特拉斯堡的最后时间投入到了那些逝去年代遗留下来的古物的静穆以及当代煤矿和明矾制炼场的机器的喧嚣之中。他和众多信徒一起攀登乎日山脉的绝顶奥提利安堡，在古罗马堡垒的废墟边听人讲述美丽的伯爵女儿结庵修道的故事，和上流社会的人们到乡间别墅去游玩，考察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建筑构造，到曼海姆参观古物馆，在“观景楼的阿波罗像”、“拉奥孔”、“垂死的斗剑士”

等著名雕塑作品前屏息凝思……当他心事重重地最后一次去看望弗里德莉克时，这位《威克菲牧师传》中的“苏菲”仍然兴高采烈地欢迎他的到来，弗里德莉克似乎想不到也不愿想那等待着她的坏命运。他们重又登临那块熟悉的高地，在那棵挂有“弗里德莉克休憩之所”的大树上，他俩的名字曾为了纪念初次的相恋而相偎相依，如今，风雨已将树皮吹蚀得发白，他们的欢乐已全都逝去。两人的相聚再也难找到往日的幸福欢笑了，良辰美景，便觉物是人非，阴郁灰暗的天气就更让人难以忍受。分手时，歌德从马上俯身伸手给弗里德莉克，与她作别，一向心境明朗的姑娘仰面握住心上人的手，热泪已止不住簌簌流淌。从初识到热恋到分别，前后持续不到一年的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几天痛苦的相聚，歌德事后回忆起来只剩一片模糊。

1771 年 8 月中旬，歌德毕业离开斯特拉斯堡。临行前，他没有勇气再与弗里德莉克告别，直到回到法兰克福后，才给弗里德莉克写了一封诀别信。弗里德莉克的回信使歌德心痛欲碎，在信中，痴情的弗里德莉克仍一如既往地倾诉自己对恋人的思慕与爱恋。过去，歌德总为人们视恋爱中女子的退出为正常而视男子的退出为不义的做法愤愤不平，现在，他才第一次感到他给弗里德莉克造成的损失是多么严重！弗里德莉克不是像格蕾卿那样被别人赶走，也不是像小安尼特那样自愿放弃他，而是被他无情地抛弃了！那颗乡村茅舍的天空中最明亮的星被他伤到了心灵的最深处。从那以后，弗里德莉克一直默处在孤独和痛苦之中，终生未嫁，歌德只在 1779 年去瑞士时去看望过她一次。

第三章

掀起狂飙

一 浪游者

回到故乡后，歌德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并成为律师协会的会员，但他基本上不管事务所的工作，把它们全都交给了父亲处理。在斯特拉斯堡上学期间，歌德写了许多诗歌、论文、游记及其他即兴的东西，父亲把歌德写的这些文章逐一编排起来，加上标题，督促儿子完成或修改它们并使之付印。但一开始，歌德却无心顾及这些。弗里德莉克的信深深刺痛了歌德，内心的负疚使他深感苦闷懊悔。为了排遣烦恼，除了和妹妹倾心交谈外，歌德开始像儿时一样在故乡四处漫游，因而得了个“浪游者”的绰号。他时常置身于森林山冈，在大自然中求得心灵的

宁静，思索过去，设想将来，思考那些一直萦回在脑海里的作品。他在思索中沉浮，在自责与奋起中挣扎，在暴风雨中祈求生命守护神的救助：

守护神，只要你不抛弃他，/无论风雨，都不能/使他心里感到害怕。/守护神，只要你不抛弃他，/他会向着雨云，/他会冒着风雹，/迎头高唱，/就像你，/高空的云雀。

守护神，只要你不抛弃他，/你会用火焰翅膀/把他从泥泞中举起。/他会行走，/就像那位举起花足，/踏着丢卡利翁[①] 的洪水泥淖，/诛灭了大蛇，轻松，伟大，/皮提俄斯·阿波罗[②] 一样。

……

——《浪游者的暴风雨之歌》

多么清醒的对于自我天才力量的意识和肯定！羽翼渐丰的歌德已难以再将自己束缚在感情生活的狭小圈子里，他要像天神阿波罗一样缚住苍龙，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

除了漫游和写作，歌德还借助交友、骑马和滑冰来忘却暂时的烦恼。与赫尔德尔的通信一直保持着，由此歌德了解到许多关于哈曼的信息，他收集了所有哈曼的著作，从中接受他的影响。故乡的朋友中，最使歌德感到愉快和最有助于他的是已从符腾堡公爵那里回到法兰克福的施罗塞尔。施罗塞尔的哥哥是优秀的法学者和从业律师，也很爱好诗文，对歌德也十分友好。通过两兄弟的介绍，歌德结识了久已听赫尔德尔称赞过的法兰克福邻城达

---

①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之子，宙斯发洪水时，只有他和他的妻子没有被洪水淹死。

② 即日神阿波罗。

姆施塔特的军队主计官约翰·海因利希·默尔克，两人成了好朋友。

默尔克比歌德大8岁，学识广博，判断敏锐，富有才智，既精通近代文学、各国通史和人文史，又是老练的实务家和会计师。他为人有些尖刻，愤世嫉俗，具有双重性格。就本性而言，默尔克善良、高尚、值得信赖，在实际生活中也时常表现出明达、安详的一面，但有时他会故意玩世不恭，搞一些恶作剧来得罪或损害他人。默尔克对歌德的未来生涯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和达姆施塔特的其他有识之士不断鼓励歌德，督促他完成手头的作品和着手创作已经构想的作品，这样，歌德对《浮士德》的构思不断取得进展，《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的构想也渐渐完成，而默尔克，则最终成为《浮士德》中的魔鬼靡非斯特的原型，——无论是性格还是外形上，歌德都赋予了靡非斯特以默尔克的特征——玩世不恭，对事对人的尖刻态度，对世事人心的敏锐洞察，瘦长的身躯，惹人注目的突出的大尖鼻子，咄咄逼人、鹰瞵虎视的淡蓝色双眼。

1771年10月4日，歌德在莎士比亚命名日的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莎士比亚命名日》的演说：

> 我们希望，在命运好像已把我们带回乌有乡时，还能流芳世间。这种希望，据我看来，是我们一种最崇高的情绪。……
>
> ……
>
> 我没有片刻犹疑拒绝了有规则的舞台。我觉得地点的统一好像牢狱般的狭隘，行动和时间的统一是我们想像力的讨厌的枷锁。我跳向自由的空间，这时我才觉得有了手和脚。现在我知道了这些讲规律的先生们在他们的洞穴里对我加了

多少摧残，并且还有多少自由的心灵在里面卷曲着，因此，要是我不向他们宣战，不每日寻思着去攻破他们的牢狱，那我的心要激怒得爆裂了。

……

所有法国人和受到传染的德国人，甚至维兰德也在内，在这一事情上，正如在好些别的事情上，没有使自己增添光荣。从来以毁谤一切至尊为他的职业的伏尔泰，在这一方面也证明是一个真正的特尔西脱[①]。假如我是尤利西斯[②]的话：他要在我的杖下把背都扭歪了。

这些先生们的大多数对他的人物性格特别感到不满。

而我却喊到：这是自然！是自然！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是自然的了。

……

他跟普罗米修斯比赛，一点一划地学习他去塑造人类，只是这些人类有着无比巨大的身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不出自己弟兄的原因了；随后他用自己的精神呵了一口气，使他们都变成活人，从他们的口中可以听到他自己的语言，人们可以认出这些人物的血统渊源来。

而我们这一世纪，却胆敢在自然的问题上作出判断吗？我们这些人从童年起在自己身上所感到和在别人身上所看到的都是些束身的带子和矫揉造作的打扮，我们能从哪儿获得对自然的认识呢！我时常在莎士比亚面前感到羞惭，因为有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起先一看，觉得某一点我不会那样写的。但后来我认识到，我是一个可怜虫，自然借莎士比亚

---

①②均为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前者是一个小丑似的士兵，后者是足智多谋的将领。

的嘴说出真理，而我的人物却是些传奇小说里的怪诞幻想所吹成的肥皂泡而已。

……

高尚的哲学家们关于我们的世界所说的话，同样也适用于莎士比亚：我们称为罪恶的东西，只是善良的另一面，这一面对于后者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必然是整体的一部分，正如要有一片温和地带，就必须有炎热的赤道和冰冻的拉普兰一样。

打破规则，自然，自由，辩证法，这对歌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还没有作品，暂时，这一切都只是一种方向，在这个方向下，《浮士德》和《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的材料正向一起聚集，而后者，到这个年底，歌德就给赫尔德尔寄去了初稿。

早在1769年时，克洛卜施托克出版了以赫尔曼为主人公的三部曲《赫尔曼——塔西佗笔下的阿米纽斯击败罗马人的战役》，激起了德国人持续高涨的爱国热情，人们纷纷将攻击矛头指向封建君侯及其臣僚，向上层社会发起猛烈攻击，给青年歌德留下了持久而深刻的印象。在斯特拉斯堡，一个偶然的机会，歌德读到了1731年出版的葛兹·封·伯利欣根的传记，深为传记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震撼，准备把它写成莎士比亚式的反古典主义戏剧，并拟定了剧本的主题。回到法兰克福后，歌德孜孜不倦地研读有关德国十四五世纪的主要历史、政治、法律文献和葛兹·封·伯利欣根的自传，却一直未动手写剧本，只是时常将自己的构思讲给妹妹听。科纳里娅对哥哥的讲述很感兴趣，督促哥哥动笔将它们写出来，并在创作进程中不断鼓励和鞭策他。就这样，歌德全神贯注地持续工作了6周，剧本便脱稿了。关于剧本的主题和人物，歌德在自传中说，他试图“描写一个生当乱世的勇士怎样决

心要代替法律和行政权来实行他的理想，但是，当那些公认的可崇敬的君侯把他看作怀有二心的人，甚至叛逆时，他便陷于绝望了。”剧中，葛兹被描绘为一个英杰，“因妄信在无政府的纷乱年代里善良而具有武力的人是有相当作用的，结果导致覆灭”。

歌德期待着赫尔德尔的评价，而赫尔德尔照例又给他寄来了讽刺诗，讥讽他仿效莎士比亚不当，还在信中给他起了种种绰号。歌德只好将剧本暂时搁置起来，以便过些日子能更客观地对它加以审视。不久，他开始翻译爱尔兰诗人莪相的诗，以后，他将让维特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为绿蒂朗读它们，但是现在还没有绿蒂。

《德国的建筑术与封·斯坦巴哈》仍在修改，到 1773 年它才得以在法兰克福发表，并被赫尔德尔收进《德意志的风格与艺术》一书中。

在修改《德国的建筑术与封·斯坦巴哈》的同时，歌德也在研读《圣经》。虽然歌德在当时被视为“蔑视宗教的狂人”，但他对《圣经》这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经典却一直抱有强烈的感情，对 16 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敬仰更激励他不断对《圣经》做深入研究。早在斯特拉斯堡时，歌德就不断和朋友们一起研讨《圣经》，这些自视颇高的年轻人在自居为“莎翁通”的同时，也洋洋自得地以“圣经通”自居。现在歌德又把《圣经》从头到尾或从尾到头地反复快速通读，无论自然粗犷的《旧约》，还是优美单纯的《新约》，对他都具有深刻持久的吸引力。歌德赞赏对《圣经》的科学研究和考证，但不能容忍对《圣经》的任何形式的讥讽和嘲骂，伏尔泰的剧本《扫罗》对《圣经》中有关大卫王的记述的嘲笑竟会使他陷入孩子般的激动、狂怒，甚至于凶狠狠地想：“如果他落在我手内，便要绞杀他。”

时间就在这种表面的一无所成中流逝过去。莱辛的市民悲剧

《爱米丽亚·迦洛蒂》发表了，这部被认为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的剧本又一次轰动了德国知识界。极吝于对歌德的称赞的赫尔德尔热烈地赞美莱辛，称莱辛为“大丈夫”，还建议莱辛在剧本的扉页上写上这样教训统治者的字句：“好好学习一下，在警告你们呢！”歌德怎么看呢？他当然很明确地知道这个剧本的意义，但这对他来说远远不够，他需要创造，需要写出他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将是修改后的《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但现在看起来，时机仍然还没有成熟，而不久，他的生活内容也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夏绿蒂·布甫

1772年5月23日，遵照父亲的意愿，23岁的歌德也像年轻时的父亲一样，去了帝国的直辖市韦茨拉尔，在那里的帝国最高法院见习。歌德之所以遵从父亲之命来到韦茨拉尔，与其说是为了“镀金”，或在法律业务上得到提高，不如说是为了换换环境。但韦茨拉尔位置虽好，城市规模却很小，建筑也很糟糕，更没有什么动人的景物，而且，帝国法院里案件堆积如山，陪审官们舞弊成风，即将到来的帝国执法巡视使法院内人人自危，上下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歌德本不指望能有什么乐趣和收获，更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一个将对他人生道路产生重要影响的年轻女子。

韦茨拉尔的帝国法院大厦里聚集着德国各公国和自由市派到帝国法院里来的公使，在公使馆中服务的一些快活的年轻人每天中午都到一家饭馆吃午饭，他们以一种仿圆桌骑士① 的游戏来

① 出自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中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传奇。

自娱自乐，歌德也怀着愉快的心情加入了他们的团体，绰号为“诚实的葛兹”。但歌德很快就对这种仿佛第三次大学生活似的笑闹把戏感到厌倦了，他与一位叫戈特尔的萨克森－戈塔使馆秘书成了好友，后者热爱英国文学，常与歌德倾谈、交流，还和歌德一起翻译了哥尔德斯密斯的短诗《荒村》。戈特尔督促歌德写了许多小文章，并凭借自己和格廷根[①] 诗人们的联系，将歌德的诗寄给那里的《格廷根文艺年鉴》杂志刊登。由此，歌德开始接触年轻多才的格廷根林苑派诗人团体，施托尔贝格兄弟、毕尔格、福斯等，都在这个团体里面。这些狂飙突进诗人聚集在“林苑诗人会”的旗帜下，提倡道德和对自由、祖国的热爱，在诗歌艺术上则以克洛卜施托克为精神领袖。

服务于韦茨拉尔公使馆的青年人中，有个被称做“新郎”的不来梅大公视察团团员，他的名字叫雷斯特纳，比歌德大几岁，头脑聪明，处世稳重，生活态度认真严肃，知识也很渊博。雷斯特纳从不去小饭馆参加其他年轻人的嬉戏胡闹，一心一意地埋头工作，希望能出人头地，为将来的家庭幸福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已经有了一个满意的未婚妻，她就是夏绿蒂·布甫，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绿蒂的原型。

夏绿蒂比歌德小 4 岁，父亲是“德意志骑士团”的管事。由于母亲去世，夏绿蒂很早便担负起了照顾弟妹和父亲生活的家庭事务。她体貌轻盈秀丽，性格健全纯良，淡装素服，很会操持家务，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所到之处，总能使周围洋溢起蓬勃的生气。就天性倾向而言，夏绿蒂没有过于热烈的感情和超越传统的思想，她的心灵固守在传统和习惯中，经常处于一种宁静的均衡状态，这使她的人生价值准则倾向于追求与众人共同幸福

---

① 地名。

而非个人的特殊爱好，换句话说，她顾全整体利益，并注重整体对自己的评价和自己在整体中的位置。在韦茨拉尔，认识夏绿蒂的人没有不喜欢她的，而雷斯特纳由于忙于公务，没有太多的空闲陪伴未婚妻，也很愿意有人在夏绿蒂闲暇时陪她散步、游玩，凡是他敬重的人他都介绍给自己的未婚妻交往，没有丝毫嫌忌。雷斯特纳很喜欢歌德，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歌德有惊人的才气，是个真正的天才，也具有一个真正的人的品格，是一个卓越的人。这样，歌德便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夏绿蒂的生活。

1772年6月9日，歌德去参加一个舞会，雷斯特纳因为有事耽搁，晚去了一会儿，夏绿蒂和别人一起乘车先去了，歌德正在那辆马车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夏绿蒂。那天，夏绿蒂只穿了一身简朴的衣裙，因为她喜欢跳舞，所以情绪特别愉快，容貌非常动人。歌德并不知道夏绿蒂已经订了婚，他看出夏绿蒂喜欢自然美，欣赏她的毫不矫揉造作的幽默，对她一见倾心。按照习惯，在公共场所，雷斯特纳和夏绿蒂不能有任何超过通常友谊的表示，而活泼的夏绿蒂又毫不拘谨，完全忘形于跳舞的欢乐中，因此，在舞会上，歌德显得很快活，夏绿蒂使他着了迷，第二天，他就去她家探访了她。

由于夏绿蒂的身份和性格，歌德最初和她交往起来无拘无束，他可以向她大献殷勤而不必担心会有被误解为是求婚表示的危险，而夏绿蒂也因自己已有所属而能与歌德既倾心相处，毫无矜持之感。他们常到农场、耕地、牧场、菜园和花园去，有时是他们两人，有时是和雷斯特纳三人。歌德几乎整个夏季都是和夏绿蒂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对他来说，天天都像在过节，他渐渐被夏绿蒂的魅力吸引、迷醉，如坠五里雾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热情越来越过当了。

雷斯特纳有些吃不消了，而夏绿蒂则向歌德宣布，他只能指

望她的友谊。歌德和雷斯特纳开始相互躲避，夏绿蒂也越来越注意和歌德巧妙地保持距离，歌德欲罢不能，进退为难。

恰在这时，默尔克和施罗塞尔在法兰克福写信给歌德，约他去基森城拜访法学教授赫普夫纳，歌德正欲逃脱，便欣然前往，而且免不了又一回乔装打扮，给大家带来了不少乐趣。默尔克和施罗塞尔准备创办《法兰克福学术通讯》，约请了许多知名人士参加，歌德日后也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这次老友相聚，施罗塞尔告诉歌德他想娶歌德的妹妹科纳里娅为妻，希望歌德能尽快返回法兰克福给他们从中牵线搭桥，这使歌德心中不由有些妒意。

施罗塞尔急着回法兰克福，而默尔克则同歌德去了韦茨拉尔。结识了夏绿蒂后，默尔克对歌德的痴迷十分不以为然，甚至难辨真假地责怪歌德为什么不去追求夏绿蒂的一位女友。默尔克的贬抑给歌德的热情恰逢其时地浇了一盆凉水，他索然寡欢，心中本来就无出路的感情不禁有些动摇起来。那时，默尔克正准备带着家眷游览莱茵河，见歌德陷在感情困境里迟迟难以自拔，便以种种劝说引诱歌德和他一起同去。最后，歌德终于下了决心，准备早日离开韦茨拉尔。

1772 年 9 月，歌德离开了韦茨拉尔。在临行的前一天晚上，他彻夜难眠，给夏绿蒂和雷斯特纳写了一封告别信，第二天清晨，又写了一封，两封信都充满了忧郁、感伤和自怜，完全是一种维特的风格。

“真光荣呵，这只铁手！”

按照和默尔克的约定，歌德前往莱茵河畔科不林士城的特尔镇，去女作家封·拉洛塞夫人家与默尔克会合。歌德先沿拉因河

徒步旅行了几天，然后在拉因河下游乘船而下。一路上，他有时与人结伴，有时默默独行，沿途秀丽的风光和引人遐思的古堡不时给旅人黯淡忧郁的心境增加几分亮色，他甚至想做一个终身与画笔和刻刀打交道的艺术家了。

歌德比默尔克先到了拉洛塞夫人家，受到了主人热情的款待。拉洛塞夫人的两个女儿很喜欢幽默风趣、活跃机智的歌德，很快与他成了好朋友。16岁的大女儿玛克西米丽安娜·拉洛塞最与歌德情趣相投，在自传中，歌德这样来描绘她和自己对她的感情："身材不高，体貌秀丽，仪态大方，漆黑的双瞳，柔嫩的脸色，其妍丽之处非想像所能及。""在旧的爱情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新的爱情就萌芽，使人感到非常愉快。这正像刚在落日苍茫的时候，新月从对面出现，看见日月双悬的两重光辉而欢悦不胜那样。"

这段短暂的居留，给歌德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新的爱情的萌芽使他刚蒙创痛的心得到抚慰，也使他将过去暂时抛到了脑后，而对玛克西米丽安娜来说，对歌德这种模糊爱意的感应和接受，也将对她以后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的重要程度甚至波及到了她未来的女儿贝蒂娜一生的命运和幸福。

回到法兰克福后，为了寻求精神寄托，歌德又将精力转移到了绘画上，但他不能沉下心来，很快就甩手不干了。这次回来，任市议会参议员的舅舅找了一些法律上的事务委托歌德和施罗塞尔兄弟办理，为了能使父亲满意，歌德以极大的热心投入了此项工作，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接办的法律业务，自我感觉也很好。当时的法学界正崇尚一种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新的辩护方式，正合歌德所长，因此，他便经常以法国法庭流行的辩护词为榜样，为自己的当事人写出令其感动不已的文辞滔滔的辩护书。虽然精通法律事务的施罗塞尔对之大不以为然，说打动当事人的

不一定能打动法官，而后者才是胜诉的关键，歌德自己却对那些辩护词洋洋自得，自命不凡。的确，与其说歌德像个律师，倒不如说他更像个作家和雄辩家，但他曾几何时说过他要当律师而不想当作家和雄辩家呢！

实际上，歌德所关心的确实仍一直是他的剧本。他常去剧场，虽然当时法兰克福没有良好的剧场，晚上，他仍跑到剧院去看演出。《葛兹·封·伯利欣根》的初稿已经写出很久了，现在，他已有足够的距离将它重新审视，他发现仿莎士比亚的抛弃时间、地点统一的做法损害了剧本整体的统一性，而且，由于自己的偏爱，在剧本的后部分，次要人物阿黛尔海德代替了葛兹的主角地位，对弗兰兹和他女主人的恋爱情节也写得太多。这样一来，剧本需要大改，但歌德不想一部分一部分地修改原稿，他决心将剧本从头改写。

3个星期后，一部面目一新的《葛兹·封·伯利欣根》完成了。歌德把写好的剧本拿给默尔克看，默尔克看过后劝歌德将它拿去出版，认定它可以在出版界引起轰动，但歌德心中却犹疑不决。自从出版《共谋犯》努力的失败后，他已不愿再看到自己心爱的剧本被出版商拒之门外，因此写东西时从不做付印的打算，这次这个新剧本他也不想付印，只想拿它做以后重新写作的基础。歌德的想法遭到了默尔克的嘲笑，默尔克因主编《法兰克福新闻》认识了不少学术界的人物，和出版商也有一些交情，因此，他力劝歌德自费出版这个题材新颖的剧本，相信它一定会为出版者带来丰厚利润。

歌德终于被默尔克说动了，他们两人一个张罗纸张，一个张罗印刷费，投入了紧张的奔波劳作之中。1773年6月，第二稿《葛兹·封·伯利欣根》终于印出来了，但它仍然十分谨慎、保守，上面既没有注明作者，也没有标明出版者和出版地点。

歌德和默尔克将书分作许多小包寄发出去，果然很快便在各地引起了广泛反响和注意，甚至没等他们将手中的书寄完，盗版书就已经出现了。仅一年之内，就出现了两种翻印本，甚至还有一个书商跑来拜访歌德，以一种蛮不在乎的豪爽态度约歌德为他写十几本像《葛兹·封·伯利欣根》这样的剧本，并答应付给歌德优厚的稿酬。歌德虽然觉得这个提议并非完全滑稽可笑，有很大的可行性，但他最终仍只把它作为一个笑话讲给默尔克听，至于剧本，他的兴趣实在变化得太快了。

对于普通读者和观众而言，他们大多是被《葛兹·封·伯利欣根》的题材吸引住了。一些保守的所谓老成持重者指责歌德希望再回到乱世中去，而那些正在狂飙突进精神影响下的青年们则争相传阅剧本，并在相互间的通信中热切地谈论它；对他们来说，葛兹犹如一面大旗，使他们深受激励和鼓舞。

批评家们的反应也不一致。哈曼和克洛卜施托克对《葛兹》赞不绝口，但莱辛却不喜欢这个剧本。对于《葛兹》在柏林的上演成功，莱辛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葛兹》在柏林的演出得到了巨大的称赞，我怕这既不会给作者也不会给柏林带来声誉。……毫无疑问，麦依尔在这上面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一个追求空洞言辞的城市也会追求漂亮的服装的……"

对于莱辛对《葛兹·封·伯利欣根》所持的否定态度，我们可以从高中甫先生在《歌德接受史》中说的一段话去理解："《葛兹》引起的争论——它表现为如何对待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表明，以莎士比亚为榜样的《葛兹》首次提出了一种新的艺术原则，突破了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原则，也对启蒙运动的美学观点提出了挑战。从这种意义上看，《葛兹》是当时美学解放的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是一种新的生气勃勃的艺术的开路者，是对一切诗学的权威的否定，是一种新的审美情趣的诞生。

它遭到某些顽强坚持自己阵地的启蒙运动作家的拒绝也就可以理解了。”

歌德也寄了一本《葛兹·封·伯利欣根》给夏绿蒂和雷斯特纳，希望绿蒂对他的剧本不要持冷漠态度。但歌德最看重的还是赫尔德尔的评价，他在给赫尔德尔的信中说，只有赫尔德尔才能使他正视自己的产物。显然，赫尔德尔很喜欢这个吸收了他的意见的新剧本。在给自己未婚妻的信中，赫尔德尔由衷地称赞《葛兹·封·伯利欣根》“有着德国式的力量、深邃和真理”，带给人的是“天国般的欢乐的时辰”。不过，赫尔德尔似乎仍不愿放弃以讽刺诗回答歌德的老习惯，他对自己的未婚妻说：“我像爱自己的灵魂那样爱着歌德，但我该不该，能不能向他证明这一点?”但赫尔德尔的确证明了：在他当年定稿的《莎士比亚》一文里，他把结尾的一段文字献给了歌德，把歌德视为莎士比亚的知音和继承者。

同样是十分聪明、诚挚的做法，歌德采取了比赫尔德尔更为直接的方式，他恳求赫尔德尔对他一如既往，说自己将像忠实的月亮围着地球转那样做环绕着赫尔德尔的一颗星辰。

虽然已经历了新的恋情，歌德对弗里德莉克仍难以忘怀。剧本的成功，使他负疚的心情得到了一些抒解，他希望弗里德莉克能读到他亲赠的剧本，并从中知道他的内心。1773 年 10 月，歌德托斯特拉斯堡包饭公寓的萨尔兹曼博士给弗里德莉克捎去了一本《葛兹·封·伯利欣根》的样书，并附言道：“可怜的弗里德莉克从这书中得到一些安慰，而把负心人忘掉。”也许这就是歌德在剧中偏爱玛丽和她的负心郎情节的原因之一吧。

维特的旋风

对于歌德来说，1773年是他在纷乱不安中走向成功的一年，也是他在痛苦中孕育更大成就的一年。这一年里，最令他不能忍受的消息莫过于绿蒂的婚礼，而最使他感到惊震的，则是耶路撒冷的自杀。

耶路撒冷曾是歌德在莱比锡大学时的同学，歌德在帝国高等法院见习时，耶路撒冷也在韦茨拉尔的布朗斯威克公使馆做秘书。耶路撒冷喜欢独处，绝少参与其他年轻秘书们热衷的骑士团游戏，虽然他也致力于英国文学的研究，但他和歌德之间却从未相互访问过，两人只是常在朋友家彼此见面。在歌德的印象中，耶路撒冷似乎并不怪僻，他对各种艺术作品都抱有浓厚兴趣，尤其喜欢那些描绘村野幽静孤寂景色的作品，常拿出自己珍藏的铜版画给朋友们传观，鼓动大家研究它们。在歌德的记忆里，耶路撒冷是个中等身材、身体健美的金发美少年，他的容貌柔和、静穆，一双碧眼含情欲语，摄人心魄，身上常穿北部德国人的那种仿英国式服装——蓝色常礼服，浅黄色的背心和裤子，褐色头的长靴，一望而给人英俊可亲的印象。虽然人们纷纷传论耶路撒冷热恋着他的一位朋友的妻子，但歌德从未见到耶路撒冷和那女子公开在一起过。那年9月，歌德为逃避对夏绿蒂的恋慕而强迫自己离开了韦茨拉尔，没想到一个月后，即1772年10月29日，耶路撒冷却以雷斯特纳的手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耶路撒冷向自己追求的女子表白了心中的爱情但遭到拒绝，第二天，他便被拒之门外，第四天清晨，人们便发现了他的尸体。同一种遭际，不同的选择，这在歌德心中该引起怎样的震动啊！

在为无望的爱情而痛苦、烦恼的日子里，年轻的歌德也曾屡

起自杀的念头。他搜集了不少刀剑，并常把其中一把名贵的短剑放在床边，每晚熄灯前，他总以那剑的锋利剑刃直抵自己的胸膛，看自己是否有勇气将它刺入体内。结果，他没有一次真的那样去做。法国的早期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英雄和大人物可以自由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歌德则进一步找到了神圣罗马皇帝奥索四世的例证，认为凡不能像奥索四世那样以死显示出其精神的伟大和死有所得、死有所值的人，都无权任意处置自己的生命。这种信念把他一次次从自杀的诱惑中解救出来，最终，一切都以自嘲结束；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天才人物，歌德要选择以另一种方式来解脱痛苦和摆脱忧郁状态，那就是投入有效的创造性活动，他要把自杀的勇气、决心和义无反顾的行动都赋予他的作品的主人公，他要随着作品里的一声枪响，让他人生历史上的一章永远翻过去，无论谁也不能再使他重新回到那些日子，哪怕这个人是他所狂热追求过的夏绿蒂。

歌德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他翻看各种信件杂志上对《葛兹·封·伯利欣根》的评论，不断地给寄信给他的人写回信，——现在，他已明确地成为一批青年作家的领袖，毕尔格尔等人不吝以最极端的言辞狂热地赞美他，几乎所有人的赞词都将他与伟大的莎士比亚联系在一起；他的论文《德国的建筑术与封·斯坦巴哈》也已经和赫尔德尔的《莎士比亚》、《论莪相和古代民族的诗歌》一起被编入了赫尔德尔的《德意志的风格与艺术》；他读斯宾诺莎和《古兰经》；他写了《布雷伊长老的谢肉祭剧》和《沙漠中的以色列人》（后者他又一次自费印刷，放在爱森堡书店销售）；最后，他还写信给默尔克，要回了他在韦茨拉尔时写给后者的许多书信。他在想什么呢？

早在构思撰写和印刷发行《葛兹·封·伯利欣根》的时候，歌德的心中便不断涌现出其他一些构想。初步的成功加深了他对戏

剧这一艺术形式的兴趣，他渴望将近来活动在他头脑中的诸多形象和纠缠着他的诸多烦恼再次用戏剧形式表现出来。他不断对已有的材料加以思考，最终，他的再次创作戏剧的兴趣被尝试一种新文体的想法所取代，这种文体就是 18 世纪流行的书信体，法国卢梭的《新爱洛漪丝》、英国里查生的家庭婚姻小说，都是这一文体的成功范例。很久以来，歌德时常在沉思默想中与远方的朋友们交流，向他们倾吐心中郁积的种种痛苦，这种并不落诸笔端的假想通信，实际上早已成为歌德日常排遣独处时光时常用的做法。处在种种的烦恼伤感之中，歌德觉得这种文体最宜于表现一个人心中的悲哀以及他对人生的厌倦心情，因此，歌德决心在他的这种假想通信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新作品。这样做，他只须将倾吐的对象在形式上改成一个，但并不需要放弃与多人通信时所具有的那种丰富多采，因而能确保和加强作品的魅力。然而歌德的这些想法并不是一下子就成熟和完整起来的，耶路撒冷的死固然是一种刺激，但另一个近在眼前的刺激才促使他更加真切地回到了韦茨拉尔的尴尬日子。

1774 年初，女作家拉洛塞夫人的长女、已 18 岁的玛克西米丽安娜·拉洛塞嫁到了法兰克福。玛克西米丽安娜的新婚丈夫是法兰克福的一个鳏居的商人，姓布伦塔诺，原籍意大利，比玛克西米丽安娜大 20 岁，已有 5 个儿女。新娘子玛克西米丽安娜一进门，就成了五个孩子的继母，扮演起母亲的角色，新环境，大家庭，这个诗情画意的贵族女子一时感到很难适应。拉洛塞夫人常来法兰克福探望女儿，歌德也常到玛克西米丽安娜的丈夫家去，渐渐地，歌德和布伦塔诺家的所有人包括他们的朋友都亲热、熟悉起来，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游乐乃至宗教仪式。玛克西米丽安娜一年多以前既与歌德有过朦胧的恋情，心中自然对他仍是十分依恋，加上现在又对自己的新婚生活很不满意，便更觉

得只有歌德才能理解她，给她带来快乐和安慰，因此两人过从渐密。拉洛塞夫人自然是倾向歌德的，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她也和女儿一样总请求歌德从中斡旋，而布伦塔诺起初似乎也不反对歌德的参与。显然，纵使歌德和玛克西米丽安娜两人的感情中没有爱情的成分而只如兄妹一样，这种三人行的局面也不会维持多么长久。实际上，在2月份，歌德与玛克西米丽安娜的情意相投便使那个能干却总不能讨得妻子如此欢心的丈夫大发雷霆了，他粗鲁地对那个已颇有知名度的青年作家下了逐客令。

歌德顿时感到热血翻腾了。仿佛一下子从一种晦暗不明的恶梦中惊醒过来，他不由将自己过去和眼前的遭遇同耶路撒冷的经历加以对比，思绪翻腾，心中涌起强烈的创作欲望，自离开韦茨拉尔以来拥挤在他脑中的种种意念和构思，也在这一波折的催化下很快明晰地成为一体。

就这样，1774年2月，歌德将自己与外界隔绝，集中思绪，把一切与此有关的记忆、材料和观察搜集起来，奋笔疾书，仅用四周时间，就将一部轰动整个世界的书信体长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气呵成了。

写作时，歌德如同梦游者一样，几乎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写完后，歌德奇怪地发现自己竟难对原稿再做什么润色、修改，于是便像往常一样，准备以后再做修改。他先把小说拿给比他年轻的朋友们看，那些年轻人的心境完全被小说同化了，他们对它的反应极其强烈。不久，默尔克来法兰克福探访歌德，歌德不知道他正处境困难、无心他顾，热切地将小说梗概讲给老朋友听。见默尔克反应冷淡，歌德又动情地读起书稿来，可当他中间停顿下来时，默尔克只平淡地说了一句："唔，很好"，然后没再说什么就告辞了，既无赞赏，也无激烈的反对。这下可把歌德打懵了，若是当时他身旁有壁炉，他真会立刻就把书稿扔到火里去。

歌德为此苦恼了好几天，再遇到默尔克时，他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听了歌德的想法后，默尔克劝歌德对原作不要再加修改，而直接将原稿誊好拿去出版。歌德接受了默尔克的建议，几天后，恰在歌德的妹妹科纳里娅与乔治·施罗塞尔结婚、歌德家里大摆宴席庆贺的那天，莱比锡的韦干德书店来信向歌德约稿，这种吉利的巧合使歌德信心大增，立刻把《维特》的书稿寄了出去。很快，这部险些葬于火炉的小说便轰动一时，在全德乃至整个欧洲风靡开来，众多名家齐声为之喝彩，25 岁的歌德一跃而跻身于德国一流作家的行列，成为“狂飙突进”运动中无可争议的主将。此外，《维特》带来的稿酬使歌德不仅偿还了自费出版《葛兹》时所欠下的费用，还剩下了一部分多余的钱款，这使歌德得意非常、十分愉快。

歌德给夏绿蒂寄去了一本《维特》，他在信中写到：“这本书对我说来是如此宝贵，就好像它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着的东西。接受它吧，绿蒂，我在它上面印上了无数的吻，又把它包得那么严实，好让任何人都触摸不到它。哦，绿蒂！”

然而，伴随着成功的荣誉和喜悦，种种始料未及的事情也和攻击、非难一起接踵而至了。

首先是对小说中所写人与事的猜测。由于耶路撒冷的自杀曾在青年人中引起强烈震动，因此无论走到哪里，总有人询问歌德小说中所写的有多少是事实，那些与耶路撒冷经历不符的人与事是取自何处。歌德当然不愿告诉他们其中还有自己的遭遇，因为那样就会给许多人带来麻烦。这些追问已使歌德难以应付，那些自以为是绿蒂或其他某某女性的大家闺秀们就更让歌德不胜其烦。对于这些颇为多情的女子，歌德真不知该怎样应付才好，说“是”与“不是”都会让双方尴尬、为难。

然而被这种种烦恼所困扰的不仅是歌德本人，夏绿蒂·布甫

和她的丈夫雷斯特纳，也被小说拖进了舆论的旋涡。那些对歌德在韦茨拉尔的经历有所知晓的人们忍不住议论纷纷，他们热切地或不自觉间流露出的关注目光给渴望安宁生活的雷斯特纳夫妇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歌德在小说中描写的绿蒂简直和夏绿蒂太相像了，名字，爱情，家庭，母亲，父亲，众多的弟弟妹妹，诸多的细节，还有追求者与被追求者之间的种种可疑的隐私……

雷斯特纳写了一封情辞激烈的信给歌德，指责歌德不该将他们夫妇写成像绿蒂和阿尔伯特那样糟糕的人，更不该以给他们招致痛苦来报答他们一直给予他的诚挚友情。雷斯特纳的信使歌德深感不安，他给雷斯特纳写了几封词恳意切的回信，表达自己的歉意、关怀和心迹，终于和雷斯特纳夫妇达成了谅解。但来自其他方面的有关追问，却伴随了歌德一生，不堪其苦的歌德不由觉得，虽然不少青年人因维特的影响而打算或真的已经自杀，但若以无穷的烦扰作为对小说作者的惩罚的话，也早已是罚大于罪了。

在当时的德国青年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厌世情绪，具体到个人而言，这种情绪或出于无聊孤寂，或出于事业的失意，或出于对人生的迷茫，而恋爱的挫折和打击则更易使情感激烈的青年人陷入绝望哀愁之中。这种绝望哀愁情绪因英法伤感文学的影响而空前弥漫于青年歌德的时代，扬格的《夜思》，格雷的《乡村教会墓地的哀歌》，哥尔德斯密斯的《荒村》，卢梭的《新爱洛漪丝》，甚至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都助长了这种哀愁情绪的蔓延。除了耶路撒冷这种极端的事例，哀愁情绪本身以及以自杀摆脱此种境况的愿望实际上已成为很多年轻人生活的滋养液和生存的麻醉剂。《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不同在于，它的主人公将这种忧伤失望以一种更为深刻纯粹、更为激烈优美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在维特身上，失意与叛逆、伤感与愤怒集于一体，矛头直指

压制、毁灭天才人物的腐朽等级制度和卑庸委琐的市民社会。这个具有充分美感的德国背景中的文学人物，就像一颗美丽的炸弹惊醒和震痛了浸泡在异国情调的伤感中茫然度日的人们，疲软松弛的忧郁瞬间被转化为具有巨大能量的爆发力和摧毁力。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种能量既然不能有效地指向社会或用于创造，它便等而下之地指向自身。所以，一时间，德国掀起了维特狂潮。青年人不仅仿效维特的衣着打扮，更有像耶路撒冷那样的激烈青年仿效维特的方式结束人生。

这种始料未及的效果使歌德难表喜忧，既给他带来荣誉，又给他招致非难和攻击。那些脆弱的道德家和宗教伪善者因维特之死而对歌德大加讨伐，而宣扬对人生持理性态度的启蒙学者，也不赞成歌德对维特结局的安排，莱辛和尼克莱，就是后一类《维特》反对者的典型代表。根据高中甫先生《歌德接受史》提供的材料，1774 年 10 月 26 日，莱辛在给埃森伯格的一封信这样写道："如果这样一部热烈的作品引起的害处不超过好处，您不认为得加上一个简短的结束语吗？有几点要暗示出：维特怎样才有了这样一种冒险性格；另一个与维特有类似天性的青年人是怎样保护了自己。因为这样一个人很容易把诗意的美看作是道德的美，并且相信，那个使我们强烈关心的维特一定是好的。可他确实不是；……难道您相信任何一个罗马或希腊的青年会因此而轻生？肯定不会。他们知道在爱情的狂热面前保护自己；在苏格拉底时代，一个敢于违反本性而听任爱神主宰的人，那就连一个小姑娘几乎也不会原谅他的。只有基督教的教育才能创造出这样既渺小又伟大，既可鄙又可爱的怪物。这种教育善于把一种肉体的需要转化为一种精神上的完美。所以说，亲爱的歌德，结尾再加上短短的一章；并且写得越玩世不恭，就越好！"

莱辛的话显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他尖锐地指明了一个问题，

即维特在成为青年人的审美对象的同时，还会被他们视为实践上的导师，“美”和“善”会被完全混淆在一起。作为一个宣扬以理性改造社会和国民精神的启蒙主义者，作为一个强调美善统一、情感服务和服从于理性的启蒙作家，莱辛对维特之死可谓痛心疾首，他想写一部题为《一个更好的维特》的剧本来挽回《维特》的负面影响，但他并没有写，而他的老朋友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尼克莱，却于1775年出版了题为《少年维特之喜悦》的小说。在小说中，尼克莱将原小说的情节加以改造，让一位明察维特错乱心理的名医偷偷将火药枪换成了装着鸡血的手枪，结果，精神错乱的维特不仅没有自杀成功，反倒终娶绿蒂为妻，小说以皆大欢喜告终。这部小说的情节设计，倒真算得上是极玩世不恭、诙谑滑稽了。

对于尼克莱的“杰作”，歌德既笑又气，他写了一首题为《维特墓前的尼克莱》的短诗来嘲笑尼克莱，又以更为诙谑的方式写了一段维特和绿蒂的散文对话。在对话中，维特虽保住了性命并做了绿蒂的丈夫，但却失去了往日的幸福，痛感生不如死，因为他已被尼克莱的鸡血弄瞎了双眼，再也无法看到绿蒂的秀姿丽影，而绿蒂也不觉得嫁给瞎子做妻子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因此两人都责怪尼克莱擅自干预别人的事，狗尾续貂，弄巧成拙。

这段对话歌德并未发表，而只作为玩笑留在草稿纸上，以后就散失了，倘若尼克莱看到这段对话，不知又会有何感想，出何对策。的确，这里有一个文学观的问题。尼克莱的初衷固然是一片好心，却把《维特》的美学效果完全破坏了。海涅后来在《论浪漫派》一书中嘲笑尼克莱把歌德这样的巨人看成了风车，不管是否如此，尼克莱的鸡血倒的确把歌德的巨人维特变成了他小说中的风车维特，完全忽视了《维特》冲击僵滞社会的强大悲剧性力量。

虽然歌德视那些来自道德方面的批评如同隔靴搔痒，虽然狂飙突进的作家们纷纷把维特说成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普罗米修斯”、“一个殉道者的形象，他以自身的毁灭，表明对自己信念的忠实，完成自身价值的实现”，歌德还是不能不正视维特身上的病态因素和青年人仿效维特而自杀的现实。当1775年《维特》准备印行第二版时，歌德在前面加上了这样几行诗：

> 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少女谁个不善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神至圣，/啊，谁知道此中会有惨痛飞迸？/可爱的读者啊，你哭他，你爱他，/请从耻辱之中挽救他的声名；/请看，他出穴的精灵在向你目语：/做个堂堂男子，不要步我后尘！

实际上，伤感和病态只是歌德性格中的一种诗化倾向，乐观、坚忍才是他性格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且越到后来这种决定性因素就越占主导地位，到最后，他便对所有伤感、病态的东西都无法容忍，以至于把“浪漫的”称作“病态的”，对德国浪漫主义者们也深恶痛绝。就《维特》中的人物而言，歌德从某种意义上说兼具维特和阿尔伯特两人的性格特征，这两重性格始终存在于歌德身上，既相互矛盾、冲突，又彼此支持、促进。一方面，安身立命的考虑、对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感，使歌德不断表现出被斥为庸人的言谈举止并造成他创作上的表面中断，另一方面，谋求好的生存环境、认同和归属社会的努力，又有效地保护和维持了歌德天才的一面的持续存在和不断发展，使他成为一棵粗壮的参天大树而非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在歌德身上，庸人损害着天才又滋养着天才，这种看似不可能成立的陈述却极为真实地在歌德身上达到了完满的统一。至于损害和滋养究竟哪个更为

主要，我们只能说，在我们面前，无可否认地矗立着一座巍巍高峰，而它的形成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它能矗立在那儿，这就说明了一切。

就天才的特质而言，歌德的超尘拔俗绝不逊于思想激烈的维特，而就精于世事而言，插有天才翅膀的歌德则又远非阿尔伯特所能比。创作既使歌德从激情中解脱出来，使他郁结的内心得到原地宣泄，又通过成功将他提升到了高于旧苦痛所自旧环境的新境界；通过有效的创造，歌德将往事像蛇皮一样留在了身后，以全新的生命投入了由创造的成功为他打开的新天地。当“维特”的烦恼终于随着小说的扬名而烟消云散的时候，我们的“阿尔伯特”便开始登场了。

魏玛的诱惑

《维特》的成功给歌德造成了许多麻烦，也加深了歌德与那些事先就赞赏《维特》并预言《维特》将要成功的老朋友们之间的友谊，还给他带来许多新的朋友。在老朋友中，诗人伦茨是最活跃、突出的一个，在围绕《维特》展开的论战中，伦茨写了包括 10 封信的《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道德的信札》，言辞激烈地为《维特》辩护，反驳启蒙作家和宗教界人物对歌德的攻击。狂飙突进的另一作家瓦格纳也于 1774 年移居法兰克福，从事著述和律师工作。虽然歌德认为瓦格纳所写悲剧《杀婴女人》是窃用了自己《浮士德》的腹稿，但仍和他保持着很要好的关系，与之无话不谈。此外，歌德还在 1773 年结识了小说家、剧作家克林格尔，与他成为挚友。克林格尔比歌德小 3 岁，同歌德一样，具有刚毅、坚忍的性格，敏捷的理解力，非凡的记忆力和能言善辩的口才，“狂飙突进运动”即得名于他写的剧本《狂飙与突

进》。

除了克洛卜施托克，擅长相面的神秘家、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驱人物拉瓦特尔和提倡博爱主义教育法的教育家巴西多，是歌德新结识的朋友中的优秀长者。克洛卜施托克于 1774 年 10 月访问了歌德，此前他们已有过一些通信。这次来访，克洛卜施托克很少谈论歌德急于倾听的对诗与文学的见解，却大谈滑冰、骑术和马的训练，使歌德觉得他颇为滑头。后两位著名人物先后于 1774 年 6 月、7 月途经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引起不小的轰动。在歌德眼中，拉瓦特尔是个风貌特异、卓越，从前没见过、将来也不会再找到的人物，他们自 1773 年 8 月就已开始互通书信，对一些神学问题进行讨论。尽管两人的意见颇不一致，但分歧并未妨碍他们的友谊，几次对面晤谈更使歌德大受裨益。巴西多深受卢梭教育思想的影响，主张尊重祖国语言、学校与教会分离以及灵活多样的教授方式，他设立的博爱主义教育学院在德国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歌德对巴西多的教育学说并不完全赞同，对他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出的与拉瓦特尔各持一端的攻击一切、变革一切的态度则更难以接受，但巴西多博学善辩，歌德与他争论倒感到思维倍受锻炼。

在陪拉瓦特尔和巴西多沿莱茵河旅行时，歌德又在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风光迷人的科隆受到了雅各比兄弟的款待。雅各比兄弟曾是以赫尔德尔为中心的年轻人们谐谑嘲讽的对象，歌德也曾写了喜剧《雅各比的不幸》对他们进行讽刺，上、下莱茵的作家因而产生了嫌隙，后来，在雅各比兄弟的妹妹等热心女子的调停下，双方才都互相宽容了。雅各比兄弟中的弟弟弗里德里希·雅各比对斯宾诺莎哲学颇有研究，使歌德受益匪浅，歌德常在两人已分手就寝后再次回头去找他，面对月光下的莱茵河与他进行彻夜畅谈。

回到法兰克福，歌德将很多精力用于对一路上观察所得的整理消化，各种印象重重叠叠，但始终萦绕于心的还是对拉瓦特尔和巴西多的思考。在他看来，这两位不同寻常的人物显然具有超乎凡俗的高尚奋斗目标，但为了使这些高尚的目标在平庸的尘世中最终得以实现，他们却不得不先达到某种世俗目的——得到众人的同情从而得到赞助，而为了达到这种世俗目的，他们就不得不采用与之相应而与目标的高尚性却不甚相称的手段，也就是说，在高尚的目标、世俗目的和手段这三者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手段⇌世俗目的（中途目标）→高尚目标（最终目标）。拿巴西多来说，巴西多认为最迫切的、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青年教育的改善，这次旅行，他志在以他的人格感化普通大众，使他们赞同他的教育计划，但他的着眼点，不在于启发民众，宣扬真理，而在于如何打开人们的钱包。为此，他必须使自己的计划在每个人耳朵里听起来都悦耳诱人。拉瓦特尔也是如此。这样，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悖论情况：一方面，目标的高尚可以使中途目标即世俗目的以及与此相应的手段神圣化，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世俗目的及其手段也极有可能甚至肯定会毒化最终目标，使其高尚性淹没在世俗目标的污泥之中，因为实践者在这个为了上升而被迫下降的过程中，他的高贵品性不得不一再对世俗世界进行让步，以至在不知不觉中终于与之同化，从而使最初的高尚目标成为某种虚幻或虚假、变质的东西，而世俗目标反倒似乎成了他所追求的唯一。

这些思考与历史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就产生了对戏剧《穆罕默德》的构想。在此剧中，歌德试图表达这样一种认识：伟大的人物为了高尚的目的而选择的途径不一定会给人类造福，有时反而会导致自我的沉沦。剧中，穆罕默德为了维护和推广自己的信仰，不惜阴谋杀伐，以至于使教义看起来似乎已不再成为杀伐

的目的而是只作为施暴的借口而存在。这个剧本虽未最终完成，但它的构思、主旨却显示出了歌德认识事物尤其社会政治事物的立场、思维方式和深度，因此不应该被忽视。

将自己与拉瓦特尔和巴西多等人对比，歌德开始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他觉得，创作才能是他自立的最稳固的基础，同时，他也看出，社会活动家的成功是在大众的喧哗声中实现，而他的真正意义重大的创作却都只能在孤独中完成，就像普罗米修斯，孤独地处于神的世界之外，在寂寞的作坊里独自创造出他的人类。

1774年秋，歌德开始创作诗剧《普罗米修斯》，他首先写出了其中普罗米修斯的独白片断——颂诗《普罗米修斯》。这首诗发表后，引发了莱辛与雅各比的诗学论战，并成为当时著名人士之间关系破裂的导火索，而对歌德来讲，他只是“照着自己的身材来裁剪这个古代巨人的天衣”，向自己的未来发出呼喊。这个因《维特》而遐迩闻名的叛逆天才，感到自身充满着无比旺盛的青春力量，对未来充满了豪迈的自信心，即使天王宙斯也不能使他感到丝毫的敬畏：

> 我不知道太阳底下，诸神啊，/有谁比你们更可怜！/你们全靠着贡献的牺牲/和祈祷的叹息，/养活你们的尊严。/要没有儿童、乞丐/和满怀希望的傻瓜，/你们就会饿死。

在诗中，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反抗不是撒旦式的扰乱天庭，而是力图以和平、忍耐的努力去与最高者比肩——

> 我坐在这儿塑造人，/按照我的摸样，/塑造一个像我的族类：/去受苦！去哭泣，/去享受，去欢乐，/可是不尊敬

你——和我一样!

春风得意、朝气蓬勃的青年歌德要充分施展内心的力量，在不朽的艺术创造中将尘世的狭隘存在扩大到永恒、无限。

歌德此时虽以青年作家闻名，但作为已故市长的外孙、法学博士和从业律师，他仍一直对社会政治、法律类著作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密切关注。自赫尔德尔介绍歌德读了尤斯图斯·莫泽的政治小论文后，歌德一直将莫泽这位历史、经济学家视为真正第一流的前辈作家，熟知他论及政治制度沿革等问题的各种论著。现在，歌德得知莫泽的女儿正搜集她父亲的论文准备刊行，便急不可待地直接给莫泽的女儿写信，表示先睹为快之意。莫泽的著作使歌德感动敬佩，也为他欲有所作为、着手做大事的壮志雄心添加了羽翼，不久，命运便使他直接在此方面大受其益。

12 月的一天，歌德正在房间里工作，一个自我介绍叫做封·克内贝尔的陌生人突然前来拜访歌德。得知这位军人风度的来客现任魏玛宫廷侍从长并随侍二太子君士坦丁小公爵，歌德心里非常高兴。在德意志诸国中，魏玛虽是个小公国，却享有文化盛名，它拥有德国最完美的剧场之一——魏玛剧院和德国第一个重要的文学杂志《德意志信使》。对于魏玛君王的礼贤下士、奖掖艺术，歌德早有耳闻。公爵夫人阿玛利亚不仅自身具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还致力于国家的文艺兴盛，她不惜重金网罗四方文化名士，不仅高薪聘请耶拿大学知名教授做小公爵的太傅，还使某些优秀人物如维兰德享受特别优渥的待遇。所有这些，对于正踌躇满志的青年歌德来说显然具有极大吸引力，因此，当克内贝尔进一步告知歌德魏玛储君卡尔·奥古斯特和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小公爵现正途经魏玛并想尽快与他结识时，歌德在感到意外之余连忙表示不胜荣幸之至。

17岁的魏玛太子卡尔·奥古斯特和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小公爵以亲切爽朗的态度殷勤接待了25岁的文坛新星歌德。寒暄过后，他们开始谈论各种话题。仿佛有意摆好的道具一样，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恰巧放着一本刚装订好、连书边都尚未切齐的莫泽著《爱国者的空想》的上卷，头脑机敏的歌德不失时机，很快便将话题自然引向此书。在《爱国者的空想》中，莫泽一反人们惯常对德国小邦林立状况的攻击态度，从各邦国不同的地理位置、人文特色出发，指出了邦国并立的种种益处，并为邦国治理提供了不少策略。两位太子对此书所知甚少，而歌德对它却有充分的掌握，于是歌德便为兴趣浓厚的未来君王们对该书详加解说，并由此引发出对一个国家治理者必然关心的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的谈论。这些谈话不仅显示出以作家闻名的青年歌德在历史、政治、法律、宗教等方面的广博学识，也充分显示了他对周围生存环境中的自然状况、人文地理和社会实践状况的许多实际了解与把握。谈话中，歌德还特别指出，像莫泽这种作家的才能是源于实际生活，而又复归于这种生活之中，能直接产生出对社会有益的效果，而对一般文学家来说，他们的属于诗的范畴的作品往往漂浮于道德和感性的世界之上，要绕一个大弯、碰上偶然的机会才能发生有益的作用。

歌德的谈话使两位殿下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不仅留他用餐，还约请他同去他们的下一个落脚点——美因兹多谈几天。歌德欣然应诺，连忙回家告知双亲。

歌德的父亲一向清高自守，疏远显贵，即使有法律事务上的相互交往，他也决不借以发展私人接触，却很乐意经常拿宫廷作为取笑和攻击对象，因此，虽然他开始时对克内贝尔的使命感到惊诧、愉快，但对这个令儿子兴奋的进一步交往的消息却丝毫不感到高兴。往常他总拿“离开主神也就是离开电击”、“与大人物

共食樱桃也是败胃口”等格言来教训歌德，而歌德也总以与之相反的警句来反驳他，现在，他又以伏尔泰失宠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例子以及其他类似的例子警戒儿子，并提醒他别忘了《神、英雄和维兰德》一事。父亲的这后一句话倒提醒了歌德，使他不由也踌躇开了。

《神、英雄和维兰德》写于1773年，是歌德讽刺维兰德的一出小戏剧，于同年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维兰德长歌德16岁，曾是18世纪上叶德国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他1769年任爱尔福特大学哲学教授，后因其小说《金镜》表达了对国家、政治问题的见解而于小说出版的次年即1773年被招请到魏玛，做了储君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文学教师，同时主持出版《德意志信使》，在魏玛地位显赫。维兰德极勤奋地致力于莎士比亚和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翻译，在德国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个翻译了那么多莎士比亚剧本的人：他共翻译了22个莎士比亚剧本，这些译本，是当时德国人包括赫尔德尔、歌德他们了解、研究莎士比亚的主要依据。应该说，歌德一直对维兰德是非常崇拜的，从莱比锡时起，维兰德就是歌德的一颗指路明星，但维兰德在他的莎士比亚译本注释以及《德意志信使》的一些评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莎士比亚和古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部分贬抑态度，却使对莎士比亚及古希腊罗马艺术持狂热崇拜态度的歌德这帮年轻人大为反感、愤慨，以至于不念其孜孜翻译之功，只究其亵渎冒犯之罪了。加上这些年轻人一向谐谑成性，歌德便在一个星期日午后的年轻人聚会上，乘着酒兴，一气将《神、英雄和维兰德》挥就，当场得到众人喝彩，并很快在伦茨的怂恿下印刷发行。虽然歌德后来将此事视为伦茨有意使他获罪于公众，但实际上也不能不说是他自己的年轻气盛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他的心理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打虎更显英雄本色。不过，维兰德似乎并未计较歌德的冒犯，他

对歌德的恶作剧作出了很宽大的表示，并在《德意志信使》中以一贯的智巧态度结束了那场纷争。当时，《葛兹·封·伯利欣根》正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争议，基森大学的施米特教授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它一方面赞扬《葛兹·封·伯利欣根》在“题材的选择上值得所有德意志爱国者的最热忱的感激”，一方面又指责该剧本破坏了三一律，把它说成是一个“美丽的怪物”，令歌德十分不服气。维兰德在他主持的《德意志信使》杂志上刊登了这篇文章，但继而以自己明快、热切的评论反驳了施米特教授的论调，旗帜鲜明地替歌德做了辩护：“我们愿意有更多这样的怪物！这样发展真正的杰作就会非常容易了。”对于维兰德的宽容大度，歌德由衷感到敬佩、感激。

现在，歌德的父亲将《神、英雄和维兰德》一事提出，认为维兰德既为魏玛宠臣，眼前发生的一切只能解释为魏玛宫廷的圈套，目的是要为维兰德抱那一箭之仇。虽然歌德对父亲的话不太信服，但他仍不能不对此事认真加以考虑，但顷刻间他又找不到适当的借口取消与卡尔·奥古斯特的约定，一时深感进退两难。最后，还是母亲出面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儿子的请求下，她探访了那位炼丹的女友克勒敦堡女士，在后者的支持下，这位一向无阴郁的杞人之忧、心境明朗爽快的母亲极力恳求丈夫允许儿子前往赴约。歌德的父亲尽管心中仍存狐疑，还是不高兴地答应了。

在美因兹居留的几天里，歌德再次受到卡尔·奥古斯特兄弟的热情款待，他们继续上次中断的各种话题，而这次谈话歌德当然更希望谈论文学，以便将话题及时引向维兰德。对歌德来讲，既已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最好的对策当然就是在有把握的前提下尽早把问题解决掉，而从储君的角度考虑，歌德料定他们也很想知道关于那个讽刺剧的详情，且不论他们从何目的出发。这样，当谈到当时德国文坛的状况时，维兰德以及歌德的《神、英雄和

维兰德》自然成为谈话主题。歌德便将事情的原委包括青年诗人们相互戏谑、习以为常以及伦茨的怂恿一事向两位殿下详加叙述，委婉地说明自己的爱与憎都易走极端，是对莎士比亚与古希腊罗马艺术的狂热导致他对维兰德评论的不满，但对维兰德个人，尤其是对作为翻译家与诗人的维兰德，他心里十分推崇，决无恶意。

两位殿下对歌德这番圆满的答复十分满意，他们本对此事并未看得很重，这时更是疑虑全消，喜笑开颜，甚至也跟着打起趣来。歌德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欣然接受两位殿下的劝告，答应写一封辞恳意切的信给维兰德，表示自己的友好和敬慕之意。至此，走向魏玛，歌德已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丽莉花园里的一头熊”

自《维特》出版以来，歌德一直为不停的来访者和各种社交活动缠身，但他的创作仍然进行着，除开始小歌剧《欧文和埃尔米勒》的写作外，完成的作品有叙事诗《永生流浪的犹太人》、杂诗《致驭者克洛诺斯》以及悲剧《克拉维果》，后者是青年人游乐聚会的产物。

歌德去莱比锡上学之前，科纳里娅和她的朋友们每周都举行一次游乐聚会，还发明了一种“一周情侣制”游戏：由抓阄搭配在一起的一对年轻人要在一周的时间里彼此履行恋人的责任，到再一周聚会时再重新进行抓阄组合。科纳里娅出嫁后，这种游戏依然在那帮年轻人中保持着，歌德也成了游戏的兴致勃勃的参加者。奇怪的是，几次抓阄，歌德总和一个叫安娜·西比拉·明奇的女子遇在一起。安娜是法兰克福一个商人的女儿，性格娴静，体态匀称美丽，品性贤良，很有理家才干，言谈虽少却能显出很好

的教养和理解力，是一个理想的妻子人选，歌德和她很合得来，《克拉维果》就是歌德在她的“命令”下由当时法国喜剧家博马舍发表的回忆录改写而来的。这篇花了一周时间写出的作品虽被默尔克毫不客气地一口否定为谁都能写的不成东西的作品，却博得了游乐会成员的称赞并加深巩固了歌德与那女子的友谊。剧中，曾在《葛兹》中出现的负心情人的形象再度出现，克拉维果对爱情的背叛最初是由于野心，第二次则主要被描述成爱情的消失。整个作品中，雄心与良心的对立与争辩构成了全剧的实际主体，歌德赋予了两者以同样充分的合理性：虽然最后克拉维果终于倒在了被他两度欺骗了的女子的尸体旁边，但他的死与其说是咎由自取的可耻下场，不如说是自由向枷锁的可悲妥协或者雄心向良心的壮烈回归；克拉维果的悲剧与其说是为了展示与良心冲突的雄心给个人和他人造成的危害，到不如说是为了显示人在追求自我实现和对自我行动的自主权时所必须付出的惨重代价。如果歌德真的是如他所说要在该剧中表达对遗弃弗里德莉克的行为的忏悔心的话，那他也同样表达了对自己行为的毫不隐晦和含糊的辩护，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剧本应该带给弗里德莉克更多的伤害而几乎不能给她半点安慰，也许正因如此，人们才把歌德的一番表白视为“恬不知耻”，不能原谅他春风得意时的狂妄嚣张和他实际上显示出来的对弗里德莉克的极端蔑视。

歌德虽然和安娜很合得来，但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歌德现在不愿轻易与任何女子建立较深的关系，但他和安娜的事却很快传到了他父母耳里，两位老人真的做起给儿子成亲的打算来了。歌德的母亲本来就对安娜有好感，觉得她会是一个贤妻良母和孝顺媳妇，现在，更是对安娜关心备至，想方设法和她谈话聊天，以便对她多方考察了解。同时，这位母亲也不时在儿子面前谈及婚嫁之事，并把儿子的沉默视为某种默认。他们哪里想到，儿子

中意的并不是眼前这位小家碧玉，而是另一个将要走进他的视野的大家闺秀呢？

歌德初次见到法兰克福银行家舍恩纳曼的女儿安娜·伊丽莎白是在1775年1月的一天。那天晚上，歌德被一个朋友拉去参加一个家庭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就是在被昵称为丽莉的安娜·伊丽莎白家举行的。当歌德走进宽敞的客厅时，尚未过17岁生日的丽莉正在钢琴前演奏钢琴。少女，钢琴，灯火辉煌的大厅，这幕如诗如画的情景一下子就把歌德吸引住了，使他情不自禁地向钢琴边走去。那天，歌德和丽莉都非常注意地暗中打量了对方，目光接触之间，两人都感到了一种沉默有力的相互吸引。音乐会结束时，丽莉和她的母亲表示欢迎歌德这个她们已熟知其作品的青年天才作家再次来访，歌德心里非常愉快。

对歌德来说，26岁的他虽已不是第一次陷入恋爱，但他对丽莉的看重却是超过以往任何女性的。富豪之门的地位及其所附属的高雅教养等一切华贵的上层资产阶级的东西，使丽莉除了美丽、聪明、温柔等优点之外，更具有歌德以往的恋人所缺乏的高贵仪态。直到他们分手多年之后，歌德仍承认自己爱着丽莉。第二天，歌德并没有去拜访丽莉，事隔一段时间后，他才再次登门拜访。以后，两人便开始了频繁交往，并很快由相识发展到热恋。到四五月份，歌德和丽莉已感到彼此难以分开了。

从春到夏，歌德时常陪丽莉到离法兰克福不远处的奥芬巴哈去，那里是有钱人赏春和消夏的地方。在奥芬巴哈，歌德租住在诗人兼作曲家安德烈的家里，因为事务繁忙，他常晚上去那里，然后在深夜回返，夏季更是如此。有时，歌德在归途中便倒在葡萄园中睡去，一觉醒来，已是黎明。这时，他常常起身先坐一会儿，脑中想像着也许还在熟睡的恋人，然后便在清晨的薄雾中，带着这样的想像向法兰克福走去。

歌德似乎真想成家了。和丽莉的爱情一方面使他有很多约会游乐，一方面又促使他为了现在和将来自己的生活而努力把现有的法律事务做好，有可能的话，尽力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在歌德和父亲的努力下，他们的事务所承揽的事务日渐增多，不仅承办法律业务，还接受其他各种委托，如代理定货运送等。一天的时间歌德一般这样来安排：每天早晨，他埋头从事诗歌研究、创作，然后处理法律上的事务。歌德的父亲虽然赞赏儿子草拟法律文书时下笔如有神的速度，但仍认为他的诗才胜过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加之歌德的成功使他对儿子在文学方面抱有极大的希望并引儿子的成绩为自豪，因此他尽力设法使歌德能有更多时间从事创作与文学研究，并经常和儿子谈论儿子的新著和创作打算。但这样一来，歌德就很少有时间去奥芬巴哈了，而在夏季，那里却聚满达官贵人。一想到丽莉会处在众多追求者的阿谀赞美之中，歌德心中便苦恼难安，他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尽快与丽莉正式订婚，以使两人之间的关系明确、稳定下来。

歌德的家庭虽然属于上层市民家庭，但毕竟不是属于上流社会的贵族，也不是家财万贯的上层资产阶级。歌德的父母本希望安娜那样的小家碧玉能成为自己家的儿媳妇，丽莉这个被他们暗称为“贵夫人”的大银行家的女儿自然不会称他们的心意。但他们似乎也不愿过多干涉儿子的行为，除了偶尔嘟囔几句外，他们听其自然，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策略。这样，经海德堡的德尔佛小姐从中撮合，两个青年人的双方家长便听由了他们的爱情。于是，在明媚的五月，歌德终于在未订立正式婚约的情况下成为丽莉的未婚夫了，在他的眼里，丽莉不仅显得更加美丽、娴雅、动人，而且更显得庄重、杰出起来。

然而，一旦只以两人的相互吸引为唯一条件的浪漫的恋爱告一段落，生活的实际问题也就显现出来了：歌德开始感到他为结

婚准备的资财不足，而两家在多方面存在的生活差距，也开始进入他的考虑、苦恼之中。歌德越来越意识到，那个商人的女儿安娜和他家的家庭环境倒很相称，而丽莉到他家来却显得有些委屈了。恋爱多半只是两人的事，而婚姻却带来更为紧密、确实、难以摆脱的社会关系。歌德和丽莉两家的家风、物质条件差别很大，教派也不同，丽莉家如同新贵，整日人来客往，歌德家却较保守、传统，父母亲不愿意过扰攘的社交生活，房屋设计也不适合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因此，歌德家永远也不会有丽莉家那样的交际场合，习惯和财力都不允许。然而丽莉是在社交生活和世俗娱乐的环境中长大的，她的光彩夺目和她所处的背景分不开，正像弗里德莉克不能离开使她显得美丽的乡村一样。丽莉若嫁到歌德家，她的生活习惯差不多就都得放弃，她在社交场上的种种优点也将无用武之地，甚至全都会以缺点的形式显现出来。正如歌德所说，安娜之于歌德的家庭，"正像一块枢石之于已经砌叠好的拱门那样。但是，在我与丽莉结婚的场合，如加以冷静的考察，我们不能不承认，为要使这个新嫁娘也有同样的作用，我们就逼得要再建一个新的拱门。"

丽莉家里来往的客人都穿着时髦，虽然歌德被视为文学天才，但这种天才在商人和银行家的眼中，除了仿佛一朵花之外，似乎并不意味着更多的什么。为了不至于相形见绌，歌德必须频繁地更换服饰，这种竞争，远超过了注重仪表的范围，虽不是斗富，却仍需要很多钱财，而且感到的不是轻松愉快，而是心理上的压力。从歌德的家庭和他当时的情况来看，长此以往，他将不堪重负。过去，歌德之所以从未对这些详加考虑，多半因为他觉得自己会在外地谋得远大的前程，可以任显贵官职，然而远水不解近渴，他的前途毕竟还在渺茫之中，而他的爱情却现在就需要他有一个显赫的家庭和地位，歌德于是又陷入了苦恼之中。

你为何硬把我拖进，唉，/那富豪之地？/……/难道你还要将我拴在/灯光辉煌的赌台？/难道你还要我迎合/面目可憎的市侩？

——《致白琳德》

心，我的心，你怎么啦？/是什么使你如此困窘？/……/那可爱而轻佻的少女/就用这根扯不断的魔线，/将我紧紧系在她的身旁，/尽管我十分的不情愿；/于是我只得按她的方式，/生活在她的魔圈中间，/一切都已面目全非啊！/爱情！爱情！快放我回返！

——《新的爱情，新的生活》

那时，格廷根林苑派诗人施托尔贝格兄弟等人正途经法兰克福到瑞士去，他们极力邀歌德与他们一同去旅行，歌德没有去过瑞士，又正想把自己纷乱的思绪整理一下，便打算答应朋友的邀请。歌德的父亲对儿子的想法极为赞成，并且劝他最好一直旅行到瑞士之南的意大利，瞻仰了伟大的古罗马遗迹之后再回来。

行前，歌德没有正式向丽莉辞行，只是在谈话中流露出将要远行的意思，然后就上路了。途经达姆施塔特，歌德拜访了默尔克，默尔克对歌德的同行者大加批评，说歌德的目标在于通过想像赋予现实事物以诗的形象，而他的同行者却相反，是要把想像的东西转化为现实，歌德跟这种乳臭未干的人混在一起实在是傻瓜，云云。歌德虽觉得默尔克的话不无道理，但仍未认真理会。一路上，几位旅行者放浪形骸，在达姆施塔特，他们光天化日下在露天的池塘里赤条条地洗澡，在曼海姆的高级旅馆中，他们摔酒杯，大声吆喝，狂放不羁，直到巴登大公爵的首府所在地卡尔

斯鲁厄，他们的风流才子行为才稍稍收敛。在卡尔斯鲁厄，歌德遇见了正在那儿做客的克洛卜施托克，后者亲切地接待了他，与他进行了几次谈话。歌德向克洛卜施托克讲了他最近构思的《浮士德》中的几场戏，不轻易褒奖人的克洛卜施托克对之极为赞赏，他鼓励歌德尽快将它完成。当时，魏玛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和其未婚妻正在卡尔斯鲁厄缔结正式婚约，歌德谒见了他们，两位君主一再表示希望歌德不久能去魏玛，这使歌德感到自己未来的前途又多了几分眉目。

歌德在卡尔斯鲁厄与旅伴暂时分手，只身前往妹夫施罗塞尔任知事的埃门丁根去探望结婚已一年多的妹妹科纳里娅。科纳里娅痛感不谐和的婚姻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坚决反对哥哥和丽莉的婚姻，说让习惯于高朋满座、笙歌宴舞的丽莉嫁到自己的父母亲家去，于双方都不是幸事。歌德虽然理智上被妹妹说服了，但并没有明确答应妹妹的请求，对丽莉的热情反而在心头越发滋长起来了。

到苏黎世后，歌德与两位旅伴会合了，但歌德有意与他们分开，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歌德去拜访了正在写作《人相学》的拉瓦特尔，拉瓦特尔推荐歌德访问了年已77岁的瑞士文艺批评家、诗人博德麦，受到了这位享有盛名的老人的热情接待。博德麦有“瑞士的弥尔顿”之称，曾和另一瑞士人布赖丁格一起率先发起了对高特舍特的论战，并且与克洛卜施托克是好朋友，对于青年时代的维兰德也有过重要影响。

在苏黎世，歌德还邂逅了少年时代的朋友帕沙万特，帕沙万特深以有这样的名人朋友为荣，积极为歌德做旅游向导。他们溯苏黎世湖而上，访圣玛利亚修道院，登施维茨的哈根山，游览传说中的威廉·退尔的遗迹和礼拜堂，在秀丽的湖光山色之中，歌德写出了《湖上》等著名诗歌，其中不绝如缕的仍是对丽莉的思

念。在瑞士和意大利的交界处，帕沙万特还想继续前行，而歌德却想回转了。人地两生，加上对丽莉的思念，也许还有对魏玛公爵的期待，歌德已不想再漫无目的地漂游下去了；他不是对自己的世俗生活无所用心的卢梭，去意大利，他要留到多年以后再去做，而现在，他更关心摆在他面前的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夫妇从卡尔斯鲁厄回魏玛，中途还要经过法兰克福，也许，很快他就要做是否去魏玛的最后决定，这种选择将影响他的婚姻，更影响他此后的一生。

返回途中，歌德又去拜访了拉瓦特尔和默尔克。回家后，歌德的父亲对儿子没有去意大利不大满意，冷潮热讽地说："山中所见的种种景致没有什么出奇的，谁没有游过那不勒斯才是虚生一世呢。"

虽然远行使思念暂时压过了烦恼，重回法兰克福，却使歌德再次陷入了烦恼之中。回来后，歌德听到了种种好心的传言，有的说有人在他外出时劝丽莉解除与他的不合适的婚约，也有人告诉歌德，面对人们所说的两人婚姻间的种种障碍，丽莉决心抛弃现有的生活和社会关系，和歌德一起到美洲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拓新的生活。虽然歌德觉得和丽莉家仅相隔百步的自己父母的家比远隔重洋的美洲更美好，更现实、有利，他还是被说得动摇起来，但这时，妹妹的信却像雪片一样一封封从埃门丁根飞来，在信中，科纳里娅激烈地反对哥哥的婚姻，措辞真挚、有力而沉痛，使歌德的心境更加烦乱。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歌德和丽莉两人都明显地意识到了彼此关系的变化，开始避免单独见面，但他们又无法在交际场所避而不见，因此，歌德的意志遇到了严峻的考验。但在这个时候，对丽莉的与爱慕相反的情感开始为歌德的意志帮忙了。在秋季大市集的日子里，丽莉家更比以往热闹了许多，各地的豪

商巨贾陆续来访，歌德很快便看出，这些人似乎都是丽莉走到哪儿也摆脱不掉的朋友。那些年轻人虽不对丽莉有什么强求，但看起来他们都与丽莉来往密切，彼此很熟；中年人也极力讨丽莉欢心，其中不乏相貌英俊、家资丰厚者。最令歌德憎恶的是那些倚老卖老的绅士，他们要求与丽莉亲吻，还像对待小孩子一样抚摩她。如果眼前这些刺目的景象尚可使歌德忍受的话，丽莉与那些人之间的谈话所引起的想像，却在歌德心中如同毒药一样起了可怕的反应。"什么郊游泛舟的盛会呵，怎样碰着危险而终安然渡过呵，跳舞会和晚上的散步呵，对可笑的求婚者的嘲弄呵"……歌德既已有过多次恋爱的经历，便不由对这些话产生出强烈的妒忌和怀疑，从而陷入了更复杂难堪的苦恼、绝望之中。

以前，丽莉曾告诉过歌德自己从小怎样被许多人所疼爱，怎样特别引起访问她家的客人们的钟爱，而她自己又怎样以此为乐，等等。那时，丽莉的这些话只增加歌德对她的倾慕和爱怜，而现在，对这些话的回想却使歌德陡生疑虑。歌德认为，真正恋爱着的人把他一向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只当作是为目前的幸福而设的准备，过去的种种恋爱经历像是幽暗的午夜里出现的幽灵，到了真正的恋爱出现时，便会像天破晓时那样消逝，也许正因如此，这次他做瑞士之行时，虽然在斯特拉斯堡做了逗留，却并未去看望过去的恋人弗里德莉克。但丽莉却似乎难以摆脱她自己过去的"午夜幽灵"，这使歌德不由在《诗与真》中发起对女性的感慨来了："为潘多拉[①] 的苗裔的女性，天赋以媚人动人的本领，与其说她们出自真实的爱情，甚或放荡的行动招引许多男子在她们的身边，不如说是为朦胧的意图和不能自已的本性所推

① 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她被好奇心驱使，打开了宙斯送给她丈夫的匣子，给人类带来了种种灾难。

动，以致她们自身常陷于困境，正如童话中所述的魔术师的弟子，学弄玄虚，招出掀天的大水来那样，她们看见求爱者汹涌而至，亦为之手足无措。结果，在这场合，便不能不加以选择，男子中有一个人被挑中了，便成为那女性的丈夫。可是，提供这选择以指南和决定选择者的倾向的，却多是偶然的事。……

显然，歌德认为，丽莉对她的选择完全是一种偶然的机遇，而非主观上的唯一认定，即使日后自己或专一的爱情能够驾驭、束缚住丽莉的言行，但又怎能从自己心中抹去那些从可憎的耳朵里听来的可憎的谈话呢？思前想后，歌德终于决定终止和丽莉的恋爱关系。

9月，歌德的已脱稿印行的小歌剧《欧文和埃尔米勒》在法兰克福上演，它本是受《威克菲牧师传》中的恋歌的启发写成的，歌德与丽莉热恋时，他们常以朗诵那支恋歌为乐。现在，歌德已和丽莉解除婚约，它引起的回忆只能使歌德徒增伤悲。然而，爱情和忧苦同样能激发诗人的诗兴，歌德更借着他的一贯做法自觉地以创作来将自己与现实间隔开，投入到远离现实的想像创造之中。

《葛兹·封·伯利欣根》成功后，歌德一直想在政治历史中再寻找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把它处理成戏剧作品，他找到了16世纪的尼德兰的叛乱，一直在构思这部作品。现在，他在父亲的不断激励督促下，开始了五幕散文剧《哀格蒙特》的写作。这次，歌德没有按场次顺序写，而是一写好楔子马上着手写主要场面，以使精力能更充分地投入，但即使这样，歌德也只写出了几场戏剧段落，他的注意力很快就又变得难以集中了。在这彷徨无计、濒于绝望的日子里，歌德在冥思中暗暗期待着魏玛的纶音。他经常和受教育于巴黎的法兰克福画家乔治·麦尔希奥尔·克劳斯谈论后者所画的魏玛的人物和风景，那是克劳斯不久前到德

国北部旅行时画的。歌德反复观赏那些画，心中更多了几分对魏玛的向往。新君卡尔·奥古斯特已着手重建被火灾烧毁的魏玛剧场，并投资开发久已停产的伊尔美瑙矿山，耶拿大学因人才流失和制度革新也急需贤能之士，这一切，都在歌德眼前展现出新的希望、诱惑和更迫切的期待。

命运终于来敲门了。1775 年 10 月，新婚的卡尔·奥古斯特夫妇从卡尔斯鲁厄来到法兰克福，他们再次邀请歌德与他们同去魏玛，渴望逃离爱情困境的歌德立刻就应允了。

第四章

冰 上 人 生

"天之骄子"

1775年11月7日，身穿维特式服装的歌德抵达魏玛，受到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夫妇和阿玛丽亚女公爵的热烈欢迎。

魏玛是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的首府，在歌德故乡法兰克福的东北方向，图上距离大约225公里，约为到莱比锡距离的四分之三，当时魏玛城只有6000居民，抵不上现在的一所大学。

初来魏玛，歌德并不显出一副要在这里长住久安的样子，除了尚不知道卡尔公爵将如何安置他之外，另外一种考虑当是他做出这种姿态的重要原因：歌德早就注意到，和定居某地的人相比，人们往往宽容、善待那

些漂泊不定的旅行者，哪怕这些过客本来更容易招致嫉妒和挑剔，人们也不把他们视为竞争对手和攻击目标。这次魏玛之行，事先颇多不顺，倒使歌德因此而冷静细思，对自己详加检点。

那日在法兰克福，和魏玛公爵夫妇下榻同一旅馆的迈宁根公爵夫妇请歌德赴宴，歌德没有详细询问传话的使者就想当然地认为是魏玛公爵招请他。到旅馆后，歌德在迈宁根公爵的房间里找到了魏玛公爵夫妇，当后者向迈宁根公爵告辞时，歌德便也随他们一起离开了迈宁根公爵的房间。来到街上后，卡尔·奥古斯特夫妇径直上了马车，把衣冠楚楚的歌德一人晾在了道旁，搞得他非常狼狈，当他羞愤愤地返回家时，才从路上遇到的迈宁根公爵随从的嘴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不由愧悔交加。

紧接着这次尴尬的误会，赴魏玛行期的意外延误，又使歌德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事先，公爵与歌德约好由一位尚在卡尔斯鲁厄等待为公爵新造的马车的武官来法兰克福接歌德一起去魏玛，但到了约定日子，武官却未见踪影，又过了两周左右，还是人信皆无，歌德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窘迫难堪境地。事先，歌德已向亲朋好友辞行并告诉了自己的行期。歌德既与丽莉的婚约不了了之，痛中颇多苦味，在众人面前断难像过去那样意气风发，故而这番辞行不免大有扬眉吐气之意。现在，他不能按期离家，又没有明确的音信，只好躲在家里，甚至足不出卧室，即便后来实在憋闷得慌，也只在晚上披一件宽大的外套遮蔽着出门，在市内街道上悄悄地走走，以免再度辞行或被人询问时不能从容回答。虽然歌德信任魏玛公爵，但他的父亲却像发生请吃饭那场误会时一样，坚持认为眼前发生的事情是魏玛宫廷故意羞辱歌德的恶毒计谋，拖到后来，歌德也不得不信父亲的话了。

开始，歌德还能以《哀格蒙特》的写作来强迫自己安心处变，他甚至差不多完成了这部剧作，但后来却怎么也集中不起精

力来了。几次夜行，歌德经过朋友的家门而不能进去和他们一起娱乐；在丽莉的窗下经过时，他听见丽莉还在唱着他写给她的情诗。所有这一切都对歌德构成了沉重的压迫，如果魏玛方面果真是有意戏弄他或出言不诚而他又不另谋出路的话，要保住自己的尊严，歌德一辈子只好在法兰克福做昼伏夜行的蒙面人了。犹豫再三，歌德终于下决心接受父亲的对策，起程前往意大利。但歌德仍想给自己去魏玛的希望留以最后的机会，因此决定先到魏玛武官要经过的海德堡去，看武官是否已经从那里经过。

到了海德堡，歌德在驿站打听到武官尚未经过此地，便给武官写了一封信留在驿站里，然后就到撮合他与丽莉的婚姻的德尔佛女士家去了。德尔佛女士很同情歌德心中的痛苦，安慰他，并答应等歌德从意大利游学归来后帮他另谋出路。德尔佛女士引领歌德拜访了城里的好几个家庭，其中有一个被歌德称为封·W氏的家庭中有一个女儿很像弗里德莉克，而且对歌德不无爱慕之意，使歌德竟感到在斯特拉斯堡时感受过的情调又在心中复活了。然而，歌德之所以在此地停留，与其说是为与德尔佛女士叙谈，不如说是他等武官之念未绝，武官既尚未经过此地，途中耽误了行程也未可知，他要像离开法兰克福时一样，等到心中认可的最后一天。显然，眼前的机会对他弥足珍贵，踏上魏玛，他的生活就有落脚的极大可能，而去意大利则意味着进入仕途的时间又被推迟，前途又付与渺茫中了，在当时的德国，哪里有仅以“作家”为职业而谋生的呢？而留在意大利，那是歌德连想也没想过的。

事实证明，歌德对卡尔·奥古斯特对他的宠遇的信任是对的，他终于在一天深夜等到了武官的快信，原来武官不仅因为等马车而耽误了行程，又因其他事而未从海德堡经过，而是取道曼海姆直接去法兰克福了。武官希望歌德马上回法兰克福，从那里北上

魏玛。歌德的心里豁然如释重负，不再有担心被人传为笑柄的烦恼，新的懊恼于是也就接踵而至：歌德一路向南行至海德堡，现在，又要调头向北，心中虽有绝处逢生之喜，但也不无由这通折腾而引起的沮丧、不满、不快，这种不快既不能指向办事不严谨老练的武官，便只好埋怨自己缺乏充满自信的豪气和对公爵的信任，不过，也许借机惩罚一下那武官，让他有辱使命也无不可，这样一想，意大利之行便对歌德又充满诱惑起来。但有关人生事业的大事岂能斗一时之气，心情激动的歌德头脑中迅速交替着这些念头，手里却一直在打点着行装，并吩咐佣人去叫马车。德尔佛女士极力劝说歌德留下，但歌德在争论中急匆匆向她告别，登上叫来的马车，大声向她和自己喊出哀格蒙特的道白，便随着马车疾驰而去：

> ——孩子！孩子！不要说下去了！光阴的白驹像是被不可见的幽灵鞭策那样拽着我们名誉的轻车走了，我们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勇敢地镇定地紧握着马缰，催动车轮，时而左，时而右来闪避这儿的石头，躲开那儿的悬崖吧。到哪儿去，谁知道呢？从哪儿来，差不多也记不清了！

歌德真的不知道自己要驶向哪里吗？不，他不知道的只是哪里有悬崖，哪里有石头。现在，他所要做的正是在表面的无所事事之中把这些都搞清楚，找出自己的联盟和敌对者。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歌德都是在与奥古斯特公爵滑雪、狩猎、喝酒、摔盘子、与农家姑娘调情等诸如此类的嬉戏胡闹中度过的，在此期间，他了解了周围的人，也掌握了魏玛的所有情况。

维兰德是接受歌德的，这个在歌德到来之前唯一能对奥古斯

特和魏玛的文化趣味施加影响的权威人物，对歌德这位新宠臣采取了明智的欢迎和礼让态度，他甚至写了一首《献给歌德的颂歌》发表在自己主持的杂志上，尽管其中不无隐约可辨的怀疑主义味道。

首相弗里奇是坚决反对歌德的头号人物，他在公爵的母亲摄政时就辅佐公爵，因此身份特殊，当公爵准备任命歌德为枢密顾问官并让歌德出席枢密会议时，弗里奇是唯一表示反对的人，他甚至以辞职来表示自己态度的坚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都赞成公爵对歌德的任命，相反，拥护歌德的只是极少数年轻的贵族，而反对、嫉妒歌德的人却占多数，只是他们都明哲保身，不敢公然反对公爵的意见罢了。

虽然年轻的奥古斯特公爵对他新继承下来的统治系统持谨慎态度，但他仍然毫不动摇地维护了自己的任命，公爵的母亲阿玛利亚也支持儿子重用歌德。结果，弗里奇没有辞职，而歌德则接受了任命。1776年6月11日，歌德正式成为魏玛宫廷的枢密顾问官，占据了枢密会议的最末一个席位，年薪1200塔勒，在枢密会议的七个成员中，他的年龄最小。在给默尔克的信和自己的日记中，歌德写道：

“如今我完全陷入了所有宫廷和政治纠纷之中，几乎不能自拔。我的处境是够有利的了，魏玛和埃森纳赫公国一直是一个舞台，人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人是怎样一跃而成为世界大人物的。但是，我并不急于求成，自由与满足将成为新制度的主要条件，尽管我比以往更能就地洞察当今君主统治的污秽不堪的一面。”

“我已经参与了宫廷生活，现在想参与政权，不过得一步一步地走。”

歌德需要自己的同盟者，他在魏玛寻找，也在他的故交中寻

找，但并非昔日所有的朋友都被他选中而保留了下来，在新的起点上，他似乎选择了一种更为严格的择友标准。1776 年 2 月，赫尔德尔在歌德的举荐下来到魏玛，担任了魏玛教会总监和宫廷首席牧师的职务。伦茨和克林格尔也来到了魏玛，但他们最终不得不另奔他途。克洛卜施托克听到了关于歌德怂恿、放纵卡尔·奥古斯特公爵胡闹的种种传闻以及人们送给歌德的不无讽刺的“天之骄子”的雅号，忍不住给这个曾热心求教于自己的年轻人写了一封教诲信，结果，他收到了歌德这样的回答：

“亲爱的克洛卜施托克，请救救我们吧，别让我们将来再收到这种信。它们毫无益处，只能毒化我们的情绪。请您相信，我没有这样的时间来答复像您这样的信和像您这样的警告!”

克洛卜施托克见到信后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把歌德的信拿给自己的学生看，说：“从现在起我蔑视歌德。”接着他写信给歌德，宣布与歌德绝交。

究竟是什么促使歌德这样对待过去的朋友和师长呢？有一点可以肯定，歌德十分谨慎地对待自己在魏玛这片新土地上的每一步举措，即使无所顾忌的胡闹也并非是无意为之，他要用种种策略与自己周围的人周旋，要在已经存在的旧格局里为自己撕开一个裂口，并迅速有效地巩固和发展自己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能揣度出他的内心，紧密地与他保持一致呢?

……可是神送来的风变幻无常，/我的船离开了预定的航程；/表面上它似乎在任风摆布，/暗暗地却想以智谋取胜，/在斜路上坚持向目标前进。/然而从阴沉的灰色的远方，/已隐隐传来风暴的吼声，/鸟儿们被吓得贴水低飞，/舒展的心胸也随之缩紧。/风暴果然来了。在它的/盛怒面前，水手机智地降下帆，/船像一只充满恐怖的皮球，/任风

和浪抛玩。

在彼岸的朋友和亲人，/他们站在陆地上仍惊恐莫名：/“唉，他为何不留在这儿！/唉，这风暴！唉，他真不幸！/难道这好人就这样沉沦下去？/唉，他本该，唉，他要能！天神！”

然而他立在舵旁，满怀豪情；/他的船听凭风浪摆布、戏弄，/风和浪动摇不了他的心。/他威严地注视着可怕的深渊，/不管是倾覆，还是靠岸，/都对他的守护神怀着信任。

——《海上的航行》

不得要领的文学朋友们在岸上为歌德惊呼，而决心在另一个天地里冒险的歌德却满怀豪情。一旦安顿下来，歌德所有的谋生打算便立刻转变成了事业心，他要全力干出一番改天换地的事业，在大地上写下他的宏伟诗篇。

实干家

歌德是个实干家。他是为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前途来魏玛的，更是为了实践自己的社会人生理想来魏玛的。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能将自己的世俗需要紧密地与人类理想结合在一起，使世俗行为在崇高理想的烛照下也同时具有一种毫不虚假的非平庸意义。

“我应该永远保持实干精神，哪怕是在一个被人抛弃的小村子里或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要不我干脆就活不下去。”[1]

---

① 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9 月第 1 版甘木等所译德国艾米尔·路德维希之《歌德传》第 190 页。

从一个志趣平庸的谋利者的嘴里，我们永远也不会在真诚的意义上听到这种发自生命内在要求的肺腑之言。

一被任命为矿务总监，歌德就将全部身心都扑在了伊尔梅瑙的矿山的生产恢复工作上。他组织了一个由自愿者参加的矿务委员会（或被称为矿务部），雇用了一些最熟练的矿工来进行实地操作，身先士卒地接连几个星期都泡在矿井工地上。在他的带领下，无偿劳动的委员会成员们都积极主动、热情高涨，而一个矿山顾问则对歌德说，他宁愿当一个矿业人员也不愿当大臣。这话也许另有他意，但歌德和矿工两相比较，他付出的心血精力绝不在后者之下。

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歌德十分重视的实际问题之一。为了了解民生的实际状况，歌德经常到各地去做公务旅行。所到之处，歌德看到了农民的贫困和土地经纪人、贩卖田产者对农民土地的掠夺，对广大农民产生了真诚而深刻的理解与同情。1772 年 12 月 4 日，歌德在给施泰因夫人的信中写道："在这黑暗的行程中间，我对被称为下等阶级、但在上帝面前无疑却是最高尚的阶级的人再次怀有深切的爱。这毕竟汇集了一切道德：节制、知足、正直、忠实，对过得去的一点财富感到的喜悦，善良和容忍在不……中不屈不挠我不愿使自己淹没在一片叫喊声中……"

后来，他又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看到了农民在向土地索取必需的物品，如果他们仅是为了自己而流汗的话，那这些东西是可以使他们富裕地生活。但是你知道，如果蚜虫在玫瑰上吃得肥胖、碧绿，然后蚂蚁来了，吮干它们身上的汁液，我们就这样继续下去，上面在一天里所消费的远超出下面在一天里所收获的。"

在歌德看来，要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一是要把田产划成许多小块分给农民，二要减免赋税。他给公爵递上一份又一份呼吁

使农民拥有土地的报告，并告诫公爵说，农夫的血是国家的资本。

歌德手中的权力有限，对公爵的影响力也有限，但他总是尽心尽力地做好那些他力所能及的有益事业。当发生火灾或水灾时，人们总能在救灾的第一线看到歌德的身影，其他像成立防火组织、制定防火条例、为制呢手工工场和瓷器作坊寻找图案板和花纹、为林木贸易引进新办法、堪探矿物和水源、为试验室购置新设备、视察道路和隧道、指示建设新医院等具体的事情，歌德都毫不厌烦、一丝不苟地去做，那些呼吁改革、完善现存制度的文件报告，他也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去写。在一份比一份更充实的报告中，歌德不断将自己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办法系统、完善起来，只可惜它们在很多情况下，还不能向他所期望的那样被公爵所采纳。

歌德的所有努力，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使魏玛这个既没有发达兴旺的工商业、也没有健康的农业、甚至连自己的宫廷官员都不得不靠副业谋生的贫穷落后的小国逐渐走上富裕兴旺的道路，从物质到精神，都体现出以人道主义原则治国的魅力。这种原则贯彻在歌德的政务实践活动上，贯穿在他的作品中，也指引他对那些不幸的求助者给予真诚有效的帮助。

一个意志消沉的青年写信向歌德求助，歌德就在许多年里一直给这个青年寄钱和衣物，还给他写了一封激励鼓舞的信，劝他去耶拿上大学，并答应出钱资助他。瑞士的一个音乐家需要歌德帮助，歌德不仅亲自给这位音乐家的乐曲填词，写信将他推荐给当时德国的音乐大师格鲁克，还给他寄钱和旅行路线图，甚至连他去维也纳时需要带什么样的大氅都询问到了。

歌德的这些行为绝不能从普通的慈善意义上去理解，他是要通过救助生的欲望去点燃蕴藏在每个生命中的理想和创造的火

种，这是他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也是他对所有生命价值肯定和认同的基础。那么站在人生历史高度上的歌德是怎样评价和看待自己的所有这些非文学的社会事务性活动呢？

“一些新的秘密被我发现，等待着我的还有更多繁重多样的东西，我在锻炼自己，好让自己对一切都有所准备。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为自己、为他人不得不久久地忍耐着。那目前我沉浸于其中的深邃的宁静最为我珍惜，我已经遗世而独立。在这里，我发展成长；在这里，我取得所有他们用火与剑所夺不走的东西。”①

“很难说清楚，和那些从事着固定、平凡、经常而又重要的工作的人们的交流给了我的想像力以一些什么样的裨益。这就好像洗冷水浴一样，它解除那懒洋洋的日常生活给我们带来的慵怠，我们又获得一种新的力量回到生活中去了。”②

“不管我目前这种处境会延续多久，我总是怀着完全满意的心情体验着这斑驳陆离、纷纭杂沓的生活……”③

很明显，最初，歌德并不认为自己已经离开了事业的正途，他坚信自己依然处在攀登发展而不是停滞倒退的上升路途上，当他终于穿越这段充满挑战和冒险的政治生涯，他将发现自己已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

冰川与回忆

进入魏玛的前五年，尽管免不了有事业上的重重阻碍，歌德的生活依旧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伴随着政治上的冒险，在大自

---

①②③ 引文分别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9 月第 1 版甘木等所译德国艾米尔·路德维希之《歌德传》第 176、164、165 页。

然中出现时，歌德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探险者。1777 年 11 月末，歌德独自骑马前往哈尔茨山，准备在严冬季节登上哈尔茨山的最高峰——布罗肯峰，这在当时完全是一种冒险。路上，歌德遇到了一位守林人，请求他给自己引路，守林人对歌德的想法大为吃惊，作为一个常年居住在山里的人，他认为在这样的季节攀登布罗肯峰根本就不可能。但歌德的热情最终还是感染了犹豫不决的守林人，他答应陪歌德一起登峰。在给默尔克的信中，歌德对那次攀登的情形叙述道：

> 去冬，哈尔茨山之行可谓一大享受。你知道，如果有人想把合理的事说成是冒险，那我是最反感的；如果最冒险的事发展得顺乎情理，那我倒觉得很好。大约在去年 11 月，我独自一人骑马带着旅行袋启程，途径施洛森、弗罗斯特和科特，在直奔诺德豪森哈尔茨山农夫的栖身之所，再翻过韦尼戈罗德、戈斯拉尔到了巍巍的哈尔茨山，一切详情，将来我再向你口述：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我想是在 12 月 8 日午后一时吧，我伫立在布罗肯山峰，上面是炽热的太阳，光彩夺目，下面是深达一米的积雪。从这里眺望脚下德国的土地，一切都被云雾遮盖住了。连我好不容易才劝说领我前来的守林人也十分惊讶地亲眼看到他过去一直认为是不可想像的情景，因为他多年住在山脚下的缘故。这是我独来独往的 14 天，谁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哪里。

为了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中换一下空气，歌德经常这样突然一个人跑到山里去，在壮丽的大自然中保持和崇尚事物的接触。这次游哈茨山，他写下了长诗《冬游哈尔茨山》，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远离尘嚣的大自然中，歌德的心依然被尘世的扰

攘所占据着，矿山、打猎、遁世的青年，还有求之不得的爱情……

1779年9月12日，公爵和歌德微服出行，去瑞士旅游，目的是观看途中经过的冰川。从魏玛去瑞士，中间经过歌德的故乡法兰克福，也要经过斯特拉斯堡，因此，去往冰川的路也是走向历史与回忆之路。法兰克福在歌德的眼中依然是亲切的，只是他觉得父亲变得更不爱说话了，记忆力也更加衰退，不过母亲还像从前一样精力旺盛，还是显得那么可爱。老朋友和熟人们看到歌德也非常高兴，但是丽莉已不在法兰克福了，她已嫁给了斯特拉斯堡的一位银行家。

到斯特拉斯堡后，歌德去探望了丽莉，丽莉和她的家庭给歌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过去的情感已全然无踪了，当他回忆往事时，就如同在高山之巅俯瞰山下的城市。歌德也去塞森海姆探望了弗里德莉克。分手八年了，弗里德莉克还是那样迷人，她对歌德表示出真诚的友谊，对过去温顺地绝口不谈。见弗里德莉克已安于自己命运，歌德也就安了心，他随弗里德莉克把昔日到过的各个角落都转到了，并向弗里德莉克询问了他离开后的一切。今后，歌德终于可以怀着欢欣回忆塞森海姆的往事了，所有的痛苦都因弗里德莉克的温柔和宽容化做了幸福。

归途中，歌德随卡尔公爵访问了南德意志的一些宫廷。那些平庸乏味的王公贵族们令歌德避之惟恐不及，在歌德的眼中，所有的那些王公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他们的一位仆人聪明。显然，这些访问也使歌德在比较之中对魏玛有了更加确定的认识，无论如何，魏玛还是自有它的文化品位的，而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显然也比那些不学无术的王孙公子们略胜一筹。

在斯图加特，歌德在卡尔公爵的表兄弟符腾堡公爵的军事学校里见到了军校学生席勒。当然，在这个时候，“席勒”这个名

字以及席勒的面孔对歌德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八年之后，歌德会在魏玛宫廷里发现，自己又多了一个挑战者和合作者。

这次南行，歌德还见到了一位美丽的侯爵夫人勃郎科妮。歌德此前曾见到过勃郎科妮夫人的画像，并在那画像上题了字："箭矢胜了一切。"见到勃郎科妮夫人本人后，歌德更加惊叹道："难道她竟真的是这样地美?! 这样地聪明、坦率、充满活力?! 真的，看到她，人会失去理智的。"

但他没有失去理智，他思念着另外一个女人，在这次旅行途中，他一直在不停地给她写信，给她讲述冰川，给她讲述自己看到的一切。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长久地在他心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也没有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对歌德的人生和创作发生如此持久而重要的影响。长达数十年的宫廷生活经验使她在歌德的魏玛政治生涯中成为他的可靠而精明的顾问，而她的丰富的内心精神生活和自身所拥有的一切特质，则成为歌德创作想像力的取之不竭的源泉：他把她作为女主人公写进自己的两部作品——《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和《塔索》中，在多部作品（如《威廉·迈斯特》、《意大利游记》、《亲合力》）中留下她的影子，并且，从 1776 年到 1788 年两人断绝书信来往，歌德在 12 年间一共给她写了 1700 封书信和短简，还为她写了大约 40 首抒情诗。这个使歌德如此倾倒、依恋的女性，就是夏绿蒂·封·施泰因夫人。

欣悦的灵魂

在魏玛宫廷中，也许没有哪一个女人能像夏绿蒂·封·施泰因夫人那样引人注目和令人神往了。歌德还没来魏玛的时候，就向朋友打听过施泰因夫人的情况。据说，在看到朋友的信中对施泰

因夫人的极力赞美后，歌德竟连续失眠了三夜！1775 年 6 月，当歌德第一次见到施泰因夫人的一张侧面剪影头像时，他就说出了这样的话："施泰因夫人是一个欣悦的灵魂。"

1775 年 2 月，也就是在歌德抵达魏玛的第二个月，在卡尔·奥古斯特的陪同下，歌德第一次走进了施泰因夫人的沙龙。

施泰因夫人属于那种长相虽说不上特别漂亮但却特别富有魅力的女性，这种魅力，来自先天的气质，也来自她在宫廷中的地位、后天的涵养和她的生活经历。1742 年 12 月 25 日，施泰因夫人生于魏玛宫廷的一个阴森古板的家庭，她的父亲封·夏尔特是魏玛宫廷的礼部官长，待人严厉而虚伪，城府很深且行为乖僻，被人视为宫廷怪物和上流社会的伪君子。在这样严酷、冰冷的家庭环境中，施泰因夫人从小养成了怯懦、自我克制的性格，说话轻声细气，行为严守规矩，身体则柔弱多病。施泰因夫人 16 岁时，卡尔·奥古斯特的父亲去世，卡尔·奥古斯特的母亲——女公爵安娜·阿玛利亚摄政，施泰因夫人在阿玛利亚的宫廷里做了一名宫廷女官，22 岁时，她按照门当户对的封建惯例，嫁给了现在的丈夫——魏玛宫廷的御马司总管约西亚斯·封·施泰因男爵，成了我们所称呼的"施泰因夫人"。

婚后，施泰因夫人的身体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她接连生了 7 个孩子，只有 3 个男孩幸存下来，歌德初次见到施泰因夫人时，她的最小的男孩才 3 岁。由于缺乏心心相印的爱情和频繁的生育，施泰因夫人的身体依然瘦弱多病，一双引人注目的大眼睛里总含着几丝忧郁和悲哀，似有若无地带着一种沉思的神情，而那张轮廓分明、有着柔软双唇的嘴，既给人以坚强自持的印象，又使人感觉出某种沉睡的、被压抑的渴望。

歌德爱上了施泰因夫人。这个不同寻常的女子的洒脱自然的风度，温柔悲哀的声音，娇小玲珑的体态，以及那双和歌德一样

的意大利式的眼睛，所有这一切，带着一种深沉幽远的伤感清香，一下子就把这个慕名已久的年轻人吸引住了。他全身心地倾向她，像倾向一个姊姊，又像倾向一个年轻的母亲。

> 你是所有女人中唯一能把爱情带进我的心中、赐给我以幸福的人……你是唯一我可以爱得如此热烈的人，这种爱不会带给我以痛苦，尽管我生活在永恒的恐惧之中……在你身上，我得到了一个姐妹。想着我，把你的手贴在自己的唇上……夜安……假面舞会上，我又只看到你的那双眼睛。

很明显，这封两人相识两个月后歌德写给施泰因夫人的信里，流露出的更多是精神上的依恋和心灵上的抚慰，言辞间充满了无尽的体贴、景慕和温柔，是一个弟弟写给他所敬爱的姐姐、一个诗人写给主宰他命运的缪斯、一个朝圣者写给一个无比崇高的圣徒的语气和情感。但我们也能感觉出，那圣者身上散发出来的世俗气息已经在吸引年轻的朝圣者了，只是暂时，那火苗还很微小，他能很轻易地控制住它，虽然他已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

施泰因夫人是怎样看待歌德的呢？正像歌德对她所做的那样，在歌德还没有来魏玛的时候，她就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歌德，要求朋友在信中详细给她介绍歌德的情况，并表示渴望见到这个驰名欧洲的青年作家。当时，她被告知和歌德交往是有危险的，这更增加了她对歌德的好奇和结识歌德的渴望。歌德初次见到她时，她便为歌德所吸引，当歌德和公爵的狂欢招来纷纷指责的时候，她就为他辩护：

“歌德在这里引起了一场真正的暴乱；要是他知道把它重新弄得井井有条，那倒是更适合于他的天性的。他有着良好的愿望，这点是肯定无疑的，但他太年轻和太缺少经验……”

语中不无责备，但却是对一个招人喜欢的、值得看重和有才能的青年的责备，充满母性的爱护和明辨真实与假象的智慧。是呀，她已经 33 岁了，有 10 多年的宫廷生活经验，而他呢，才 26 岁，只不过刚踏入宫廷；不错，他有智慧，但仍需要她的指导和支持，而实际上，在歌德进入魏玛的头 10 年，她几乎成了歌德全部事业和生活的顾问，用歌德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薄弱之处，由于你而得到保护，我的漏洞，由于你而得到填充。"

毫无疑问，施泰因夫人是爱歌德的，但她的爱和歌德对她的渴求相比，具有更多的精神性质。施泰因夫人的丈夫心地不坏，脾气也很好，但却粗俗、迟钝，并不能满足施泰因夫人的丰富情感和精神需要，而且经常外出，一走就是很长时间，连孩子们都和他极为生疏。在魏玛宫廷里，隐藏的或半公开的风流韵事也和正常的婚姻一样司空见惯，人们对此只会窃窃私语，绝不会群起而攻之，相反，在更多的时候，人们反而以此为荣。然而，施泰因夫人却既不想轻易背叛自己的丈夫、将命运与一个血气方刚的莽撞青年联系在一起，也不想随波逐流，不负责任地乱搞一通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歌德唤醒了她被压抑的爱情需要，但她却希望牢固地将所有骚动摒弃于自己宁静的国度之外。她天生就有一种安详、宁静的气质，情欲上的要求并非没有，但却不多，体弱多病更加强了这种倾向，甚至当她跳舞的时候，人们也会在她的舞姿中感受到中天夜月的幽辉般的宁静。

也许正是这种内心宁静的气质使施泰因夫人能长时间地将恋慕她的歌德一直吸引在自己身边而又能与之保持住纯洁的友谊。歌德从未在任何女性面前表现出过如此顽强的自我克制精神和如此可贵的自我搏斗的毅力。他一面给施泰因夫人写那些充满爱的幸福和痛苦的书信，一面用忘我的工作、频繁的旅行考察、绘画、科学研究、培植花木等来平衡协调自己。他将自己对施泰因

夫人的爱寄托在一封封书信里，寄托在教施泰因夫人朗读、画画、学英语和学习自然史上，也寄托在施泰因夫人的孩子们尤其是她最宠爱的小儿子弗里茨身上。他像父亲一样关心那些孩子们，给他们请医生看病，让他们在自己的花园里玩耍，给他们煮鸡蛋吃，教他们写拉丁文字母，和他们一起采集植物标本、欣赏自己收藏的英国铜版画，还给他们讲解魔术和宇宙的发展……歌德把自己从大学时代起即已萌芽的所有的父性之爱全都无私地倾注在自己所爱的女人的孩子们身了。

然而，歌德的骚动不安却在持续增长着，他被对更进一步的亲密关系的渴求所折磨，忍不住要在信中将自己的热情和痛苦以孩子般的不无怨言的方式倾吐出来："我今天不想见到你们，昨天你们的在场给我留下这样一种奇异的印象，以至于我自己都弄不清楚，这究竟是幸福还是痛苦……你是圣洁的，但我又不能把你尊奉为圣者。留给我的只是：用我不想折磨自己的想法来无休无尽地折磨自己，但对于你们来说，我的爱情不过是绵长而忧郁的沉思默想。就让它往后这么保持下去吧。"

歌德可以顺从施泰因夫人的意志不越过亲密的朋友关系，但他却无法使自己不受其他女子的吸引。于是，施泰因夫人开始抱怨他忽冷忽热，而他也开始从施泰因夫人那里领受到另一种情感——嫉妒，对于施泰因夫人来说，这是她给予歌德的第二重折磨。

嫉妒的火焰

"你是唯一的女性……你自己希望我幸福，如果我对别的女人的爱胜过你的话，我该是多么幸福，又该是多么不幸！……弗里茨在我们这儿……我无数次地吻他。晚安，我的天使，我看到

了你那优美的睡姿……施勒特尔是个天使 。要是上帝赐给我这样一个妻子，我就会让你们安宁的，但她不够像你……我们不会相互间为着对方让自己成为某个人，我们过多地让一个人为着另一个……我不想看到你，只是因为——你全明白——我有着一颗心。我所能说的全部都是些蠢话。我是在无限遥远的地方看着你，就好像你看着某颗星星一样！想着我……"

多么真诚！多么温情！然而是斗争，毫不妥协。吹捧自己的恋人，又不失时机地给她以打击，歌德的爱诱人而又残酷。不，难道施泰因夫人不残酷吗？正如人们所说，她的门并没有完全对歌德关闭，她的门是半开着的！每个人都在固守自己的立场，而歌德更像是要准备决斗。

"我说什么也不能和施勒特尔断绝往来，这是个无比高贵而无比独特的造物。啊，要是她能和您在一起呆上半年该有多好！"

又是一刀，比上一刀更加凶狠，不过也许，前面的话只是对这段话的徒劳无益的缓冲，一个无效的说明，一个吃力的辩白。

歌德终于将科罗娜·施勒特尔带到魏玛来了，还是在结识施泰因夫人后不久，卡尔·奥古斯特就在莱比锡把施勒特尔介绍给歌德，现在，歌德要让她到魏玛来从事文艺活动，和他一起排演他的剧本。

一头浓密卷曲的栗色长发，白得耀眼的皮肤，精巧无比的双手，修长的身材；会吹笛子，会弹竖琴、钢琴，会画画，也会作曲，能流利地运用三国语言，身体健康，从不生病。当科罗娜出现在魏玛的化装舞会上时，她总穿一件希腊式的白色长衫，人们把她称做"希腊女人"。

这就是人们为莱比锡的女歌唱家科罗娜·施勒特尔——一个多才多艺的绝色女子所画的肖像。科罗娜·施勒特尔生于 1751

年，比歌德小两岁，具有和施泰因夫人完全不同的气质。施泰因夫人的周身都笼罩在从她丰富的精神世界透射出的宁谧光辉里，而科罗娜则是外在美质向内渗透，使人忍不住猜想她也有同样超凡拔俗的灵魂。

几乎刚到魏玛，科罗娜就立刻和歌德一起投入了《共谋犯》的排练。《共谋犯》是歌德在莱比锡大学时以他和贝里施等人对克罗狄阿斯教授的讥讽事件为背景而创作的剧本，目的在于攻击伪善。在莱比锡时，歌德只写完了其中的大部分，没有最终将它完成，后来，在回家养病时，歌德以莱辛的《明娜·封·巴尔赫姆》为样板，对剧本的楔子部分进行了全部修改，并对整个剧本进行了润色，使它最终得以完成。歌德对这个剧本非常有感情，把它看作是自己最喜欢的剧本，现在，他试图将它成功地搬上舞台，并亲自在剧中扮演角色，但演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继《共谋犯》之后，歌德又和科罗娜一起排演了《兄妹》和《丽娜》。人们说在《兄妹》中可以听到从施泰因夫人的心里发出的生命觉醒的轻柔声音，但在舞台上和歌德站在一起的却是科罗娜。

上面这几个剧目演出时，施泰因夫人都没有出席观看，很明显，她不愿看到歌德和科罗娜一起出现在舞台上。

"您是在责备我，说我爱您爱得忽冷忽热。不是这么回事。所好的是，我不是每天都觉得，我爱您爱得那么热烈。当我跟您不在一起的时候，您爱的只是我在您心目中的一个概念。当您在我身边，较之您不在的时候，我爱您要爱得热烈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的爱比起您的来，要更加真实。"

矛盾似乎是不可调和的，施泰因夫人无法在只接受歌德这个概念的情况下阻止歌德在别的女性那里成为有血有肉的人，但暂时，她似乎仍不肯放弃自己的立场。

歌德的日记里充满了科罗娜的名字，他激动，兴奋，又有些不安；科罗娜给他带来欢欣，也使他感到对施泰因夫人的负疚，这使他难以在与科罗娜相处时得到纯粹完整的快乐。但是，他不能停止。如今，代替施泰因夫人，科罗娜经常出现在歌德的家里。她在那里弹琴，唱歌，为歌德翻译的诗歌谱曲。施泰因夫人似乎从歌德的生活里消失了，就连歌德写给她的信，也显得那么冷淡。

1779年2月3日，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夫人生了一个女孩，公爵委托歌德为庆祝活动创作剧本，14日，歌德开始写作《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实际上，歌德从1776年就开始构思这个剧本了，现在，他用散文来写对白，而几年后，他又最终把它改成了诗剧。在《伊菲格涅亚》中，崇高肃穆的古典世界取代了歌德此前创作的《情欲的凯旋》之类的粉红色闹剧中的肉欲世界，爱琴海的清风激浪荡涤着人们浊热、混乱的内心，呼唤他重新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伊菲格涅亚的故事出自特洛伊战争系统的古希腊神话，歌德依据的是欧里庇得斯的剧本，对其中的部分情节进行了改动：

远征特洛伊的希腊联军的统帅阿伽门农因在猎鹿时夸口，得罪了月神（也是狩猎之神）阿耳忒弥斯，后者一怒之下使大海微风不起，将待征的希腊船队困在了奥利斯港。为了求得女神的宽恕，按照祭司卡尔卡斯传达的神旨，阿伽门农准备以自己的长女伊菲格涅亚向阿耳忒弥斯献祭，但在手起刀落时，阿耳忒弥斯却将伊菲格涅亚摄走，用一头美丽的赤牝鹿代替伊菲格涅亚作了祭品。阿耳忒弥斯将伊菲格涅亚带到了陶里斯岛，让她在自己的神庙里做了一名女祭司。陶里斯岛有一个古老的法规：凡是漂流到岛上来的外邦男子，一律要被作为牺牲杀死献给阿耳忒弥斯。伊菲格涅亚来陶里斯后，不断婉言劝说陶里斯国王托阿斯，使托阿

斯终于放弃了残忍、野蛮的旧俗，但伊菲格涅亚长期不答应鳏居的托阿斯的求婚，使托阿斯的热情受阻。托阿斯的独生子战死后，托阿斯担心自己的政权不稳，心情日益阴郁，加上伊菲格涅亚再次拒绝他的求婚，他一气之下准备在新捉到的两个外邦人身上恢复往日血腥的献祭风俗，而这两个外邦人之一，就是伊菲格涅亚的弟弟。

原来，阿伽门农从特洛伊得胜返乡后，被其妻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她的情夫——阿伽门农的堂兄弟埃癸斯托斯杀死，他的儿子俄瑞斯特斯和二女儿厄勒克特拉为父报仇，合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她的情夫，因而受到专门追究血亲相杀罪的复仇女神的追逐和诅咒，俄瑞斯特斯精神失常。日神阿波罗喻示俄瑞斯特斯，只要他能到陶里斯去带回“神殿中的姐妹”，他遭受的诅咒就可以解除。俄瑞斯特斯认为这是阿波罗让他去取回陶里斯岛上的阿耳忒弥斯神像，① 就和他的好友皮拉得斯一起带着人来到了陶里斯岛，他俩先上岸，结果在海边的山洞里被人俘获。

国王准备拿两个俘虏献祭，将他们押解到了阿耳忒弥斯的神庙。在这里，伊菲格涅亚和俄瑞斯特斯通过询问家世而彼此相认，三人共同商定了出逃计谋：俄瑞斯特斯和皮拉得斯先去找隐藏在海湾里的同伴准备接应，而伊菲格涅亚则向国王的臣下阿耳卡斯谎称要到海边去浸洗被疯病人俄瑞斯特斯的到来污渎了的神像，准备乘机带着神像和弟弟一起逃走。

伊菲格涅亚的话引起了阿耳卡斯的怀疑，但阿耳卡斯的一番诚恳的话语却在伊菲格涅亚的心里掀起了波澜，她不忍以欺骗的方式弃陶里斯的人民而走，并重新激起了劝说国王的热情和希

---

① 日神阿波罗和月神阿耳忒弥斯是双胞胎兄妹，其父母为天父宙斯和女神勒托。

望，因此，当国王接到阿耳卡斯的报告后赶到神庙外来盘问她时，她便在国王面前承认了自己的计谋。

因为过去国王曾答应伊菲格涅亚在她找到亲人后可以返回希腊，现在，得知两个俘虏中的一人是伊菲格涅亚的弟弟，国王便有意放伊菲格涅亚和赶来救援的俄瑞斯特斯、皮拉得斯一起离开陶里斯，但他不能原谅他们企图掠走神像的不义行为，这时，俄瑞斯特斯的话使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原来，通过与姐姐的接触，俄瑞斯特斯的疯病已被治愈，这使他领悟到阿波罗神喻中的“姐妹”并非指阿波罗的同胞姐妹阿耳忒弥斯，而是指俄瑞斯特斯自己的姐姐伊菲格涅亚，这样，神像就无须带走了。

听了伊菲格涅亚姐弟的话，国王托阿斯尽管心中难舍伊菲格涅亚，仍慷慨地为他们的返程做了祝福，全剧就在托阿斯的“祝你们安好”声中结束。

歌德对欧里庇得斯剧本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伊菲格涅亚形象的塑造和戏剧冲突的解决方式上。他为这个古老的传说灌注了一种新的精神，使它重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在欧里庇得斯的剧本中，伊菲格涅亚三人携带神像逃到了船上，但他们未能驶远，又被风浪推回了岸边，并被追兵抓获，危急之中，智慧女神雅典娜出现，三人才得以逃脱性命。而在歌德的剧本中，人道主义是人心所向，道义人格的感化代替了依仗命运的冒险，光明磊落和同情心代替了无情无义的诡诈和对神意的被迫服从，甚至连神的意志也不再宠憎无常地滥施于人类，任何借口下的掠夺都被新的道义标准所否决。无疑，伊菲格涅亚是完美人格与理想的化身，亲情和信义、节操与友情、温柔与坚毅、对崇高事物的信仰和依赖与对无辜人民的善良朴实的感情，所有这些，都被集于伊菲格涅亚一身。这个被神所选中的女子似乎是在向人们昭示这样一种真理：神的意志是人道，神所宠幸的是那些捍卫道义的人，神既不

看重偶像，也不赞成滥杀，神惩罚，但更是慈悲的。

在国王托阿斯身上，歌德寄托了一个公正君王的理想。托阿斯虽会意气用事，但却决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被感化者。良知存在于他的心里，关键是要拿出始终按良知行事的勇气和意志，摒除私心杂念和惰性，这也许正是歌德对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赞誉和期望。

作为一个古典题材的剧本，《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的旨意的最深奥之处也许莫过于人对神意的误解了。人不了解神的意志在于让他求诸自身，却只想通过为神效力来解脱自己，神看重人体，而人看重神像，愚昧昏钝，终至将自己陷于危险之中。

在歌德到魏玛的前10年中，没有哪一个作品比《伊菲格涅亚》更重要了。歌德从2月14日开始动笔，中间经过各种各样的军事会议、枢密会议、征兵、视察道路、走访袜厂、视察瓷器作坊，诸如此类，直到3月28日才最后完稿。

从4月1日起，剧本开始排练，歌德亲自扮演俄瑞斯特斯，科罗娜主演伊菲格涅亚，克内贝尔饰演托阿斯，康斯坦丁小公爵承担了皮拉得斯的角色。4月6日，《伊菲格涅亚》首次在宫廷剧场演出并取得成功。4月12日，原班人马举行了第二次演出。7月12日，举行第三次演出，卡尔·奥古斯特代替康斯坦丁小公爵饰演了俄瑞斯特斯的朋友皮拉得斯。

施泰因夫人受到了沉重打击，尽管伊菲格涅亚的精神世界闪耀着从她的心灵里发出的光辉，但伊菲格涅亚的外貌特征却显然是科罗娜的翻版。施泰因夫人再次拒绝观看演出，以这种消极的态度让歌德感到愧悔、伤心。她知道，对歌德还处于成长中的精神来说，她是唯一的，对歌德在魏玛初期事业的发展来说，她也决非无足轻重，她的愤怒是有力量的。

然而无须施泰因夫人怎样愤怒，歌德第二次去瑞士回来后不

久，便和科罗娜疏远了。卡尔·奥古斯特一直在追求科罗娜，也许，还有其他别的原因。

施泰因夫人似乎安宁了，但这种安宁并未持续多长时间，歌德就向她发起了猛烈攻击："如果什么时候我能回到故乡去，我将祈祷上帝，求他允许我只爱一次。设若您不是这个世界的敌人，我就祈求您能够委身于我，我可爱的朋友。"数年来这种呼唤和祈求一直在歌德和施泰因夫人之间的地带回响着，而现在，歌德似乎再也不想继续忍受下去了，来魏玛的5年时间里，施泰因夫人及其有关的一切一直是他日常生活的中心和主要内容，她应该属于他，他不是弟弟，更不是儿子，而是一个男人。

> 我非常痛苦，是由于您今天对我说的那些话。如果当时没有公爵和我们一起爬山，我会失声痛哭的。是的，只有对自己的肉欲要求的憎恨才能使我这个不幸者找到一条减轻自己因为侮辱意中人所造成的罪过的途径。就权当它是一种发作、一种恶作剧好了。要知道，我带着无数的想法变成了一个不知自身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了解自身的小孩，而我又像明亮的、吞噬一切的火一样经常钻进别人的灵魂中去。不，我安静不下来，只要您在关于我们过去的话上面不给我一个完全的答复，不在将来改变您自己的那种姐妹式的关系和对别人说来凛然不可侵犯的情感，我就只有在您最需要我的时候躲开您。实在太可怕了，我把生命中那些最美好的时刻都消耗在您身上了。只要能给您带来幸福，我会同意把我头上的头发一根一根地扯光。多么盲目！多么冷酷无情！可怜我吧！

这些信使施泰因夫人张皇失措了，她的意志要她继续与歌德

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关系，但她却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歌德平静下来，使他继续安于自我克制、灵魂的契合无间和纯洁的友谊。

歌德继续发动进攻，他到一个年轻美丽的伯爵夫人的城堡中去了，在那里，他不停地把对伯爵夫人的赞美写进给施泰因夫人的信里，以此来促动施泰因夫人做出抉择：

“……伯爵夫人拥有一种经常表现在艺术方面的天才，而它却在生活的艺术方面掌握了她。我在这里总共只能呆三天了，这三天我都用来注视她，想再记住她的一些特点。”

“我把自己的心比做一座被您占领了的强盗城堡。您把那帮恶徒从那里赶走，就应该想到，它矗立在那里，是为了让你能保住它。而为了保全被征服物，就只有竭诚地卫护它。您得到它不是通过暴力和狡黠。而对一个自愿向您投降的人，您应该用最高尚的方式来对待他，为了这种信任而奖励他。”

施泰因夫人终于被爱情和嫉妒征服了，经过漫长的拉锯战之后，“姐弟”和“母子”终于变成了一对情人，而这种爱情对于歌德来说，注定不可能长久。

君与臣

在进入魏玛的最初时期，歌德几乎天天和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形影不离，公爵让歌德住进自己的宫廷里，和他一起谈论自然与艺术，规划国家建设和未来远景，那些宏伟的蓝图常常让两个年轻人长时间兴奋不已。他们同吃同眠，彼此你我相称，用维兰德的话来说，没有歌德，公爵简直都不会去游山涉水了。

不能说歌德就完全把卡尔公爵看成了一个幼稚肤浅的青年，一个挡箭牌、保护伞和实现自己人生社会理想的工具。歌德确实曾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年卡尔充满了美好的希望，这种希望建立在

他对公爵的素质和家庭环境的认识上，更建立在对他自己对公爵的影响力的过分估计上。是呀，公爵还不到 20 岁，仍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多年里，歌德一直以公爵的朋友和教师自居，他臣属于公爵，也不断勒紧手中的缰绳牵制公爵，极力要把这个小邦国的继承人造就成一个伟大的开明君主，使魏玛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国家政治和国家经济上也成为德国各邦国的典范。尽管魏玛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似乎永远也无法与普鲁士和奥地利抗衡，但它可以和其他公国结成联盟，在群体中发挥主脑作用，从而大大增强自己实力。然而公爵并不是如歌德所期望的那样一个好学生，作为个人来说，公爵崇拜歌德，他在物质方面尽量满足歌德，在一些人事安排和经济建设上也能力排众议，以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名义重用歌德并按歌德的意志和愿望行事。但这也许是公爵唯一能站在歌德的立场上对旧制度、旧习惯的捍卫者们采取的坚决有力的攻击行动。当歌德的改革目标指向某些本质性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如土地制度时，公爵的雄心的阶级性、狭隘性和有限性便暴露无遗了。改善国家财政？这些长篇大论的报告还是放放再说吧。减免农民的捐税，打击土地贩卖者？把土地划分成小块，分给小佃农？还是听听其他贵族大臣的意见吧，而那些地方自治代表会的地主们则是肯定不会同意这种方案的。

就这样，歌德所有的锐意改革的努力都终止在公爵桌上的报告里了。在很多情况下，歌德都是在失去公爵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和守旧势力抗争。对于不善权术的歌德来说，每前进一步，他都要为此付出极大努力。

“对于我说来最复杂的是，我对庸俗行为的全然无知。对那些横亘在我和可以被一个最卑微的人轻易理解、很快适应的那些现象之间的东西，我无法理解，在我面前有一道无底深渊，但应该劳动，而且要尽可能地勤奋，目的只是为了造福社会。有时候

我被难以忍受的沉重的十字架坠得两腿发软，这个十字架我不得不一个人背着……”①

“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和多少个敌人作战，为的是在生活中实现一种最微小的改革。啊，无所不见的众神，祈求你们，在看到我的智力、我的斗争和我的痛苦时不要加以嘲笑！万不得已时可以露出微笑，却要帮助我。”②

然而，如果歌德不能使公爵真正成为自己思想上的同盟，那么神也会不帮助他，甚至连微笑也不会，他领受到的只有可怕的沉默。

“我觉得自己下流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坐在国务会议的会议厅的软沙发上，听着那帮公爵们在无尽无休地进行讨论，接着又多次地回到那个可以一下子就轻易解决的问题上，我真觉得，大厅里黑色的墙壁、房梁和天花板马上就要倒下来把我压死。”③

多么难以抑制的愤懑！一个狂飚突进运动的天才人物，却要和这些毫无生气和工作效率的僵朽老爷们反复纠缠，在无休无止的扯皮推诿和不知所云的胡说八道中忍受巨大的精神折磨！然而歌德竟终于忍耐住了，而他的锐气，甚至他的愤懑也在这种忍耐中渐渐磨蚀掉了。作为一个财政大臣，他无时无刻不在为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殚精竭虑，而公爵长期的纵情享乐却使国库里本已可怜的银钱更加迅速地被消耗掉，税收负担当然也随之加重。但歌德对此能做什么呢？

“假如，哪怕是在一个省我们能变得富裕的话，我也会认为它是值得夸耀的。可我们现在的全部娱乐都只能是以马儿的精疲力尽、折断肋骨以及钱袋的空空如也而告结束。不，我希望我和

---

①②③ 引文分别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甘木等所译德国艾米尔·路德维希之《歌德传》第175、138、188页。

这一切毫无关系，要说有，那只不过是我善于从这种奢侈中拣到点东西，并且把它们塞进我那政治道德戏剧创作的布袋中去。”①

“应该浇灌自己的花园，既然我们不能让甘霖洒满遍全国。”②

这也许就是歌德得出的最终结论。他变得越来越严肃、冷静、不抱幻想，也变得越来越冷漠、孤独和沉默寡言，甚至连身体也日益消瘦下来。对公爵的看法，现在已完全稳定下来，或者确切些，他已对塑造公爵失去了信心。

“公爵，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眼界非常狭窄的人。他的所有那些创举，不过是一种狂热，在他身上缺乏的是对自己思想的坚忍不拔的信念和把计划付诸行动的韧性，这种计划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大胆的，而实现它需要的则是时间。”③

“青蛙生来是水里的动物，尽管它有那么一段时间也会栖息在草地上。”④

歌德越来越希望呆在家里。走出家门，他就立刻感到陷进了牢笼。他整日整日地将时间花在培植花木和拟订花园的改建或重建计划上，他可以花一天的时间在花园里掘土，他从法兰克福订购柳枝和葡萄枝，他养蜂，他在花园中栽种果树……这些园艺活动在开始时是他的乐趣，后来便成为他的精神疗养方式，他是如此沉湎于这些活动，以至于他的书信上都带着一种树脂的香味。在给施泰因夫人的信中他写道：“如果我能远离开政治事务争论，我该是多么愉快啊，我为科学和艺术而生。”

这段话让我们清楚地闻到了厌倦和失败的味道。往日的乐观和冒险精神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不堪重负之感。人们说，卡尔

---

①②③引文分别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甘木等所译德国艾米尔·路德维希之《歌德传》第190、188、191页。

④ 转引自高中甫《歌德接受史》第54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

·奥古斯特是歌德最不成功的作品，其实，他也许还不能算是歌德的作品，故事的脉络和走向已基本形成了，剩下的只是细节和修饰，歌德想要改编它，但是无法控制整个局势，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歌德本人也只不过成了这个故事中的一个修饰。

卡尔·奥古斯特随着年龄和野心的增长越来越不再需要依赖歌德了。经过歌德数次中途而归之后，公爵便不再邀请他一起外出游乐，到瑞士去也不再让他陪同。君臣甚或师生之间的友谊依然存在，但分歧却暴露得日益明显了。

在18世纪的德国，敌对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是两个最强的诸侯国，它们各自依靠外国势力的支持，在国内也有小邦依附形成不同的势力范围。魏玛依附普鲁士，卡尔·奥古斯特无时不在渴望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这种对战争的狂热对公爵来说也许出自他的君王野心和个人本性，但歌德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目光敏锐的大臣，却极力反对公爵不明智地将国家拖到无益的政治漩涡中去。这样，君臣之间分歧就明显了。公爵不听歌德的劝告，一次又一次地去视察自己的军营，战争爆发不起来，他便屡次发动围猎野猪的战斗，而这又是歌德所反感的，因为野猪固然破坏庄稼，而围猎活动也会使庄稼所剩无几。歌德在给公爵的呈文中委婉地劝阻到："我看到，很多方面您还是善于节制自己的，我希望，您能牺牲这种爱好，并且把这种牺牲作为送给自己亲人们的新年礼物，同时也作为对一看到那群可恶的野兽就感到惴惴不安的我的一种奖励。"

然而比起以学生对老师的顺从作为对歌德的奖励来，卡尔·奥古斯特更愿意以君主的身份对这个实绩卓著的臣下进行赏赐。1779年9月，歌德被提升为枢密顾问，年俸增至1400塔勒；1781年，公爵又让歌德由城外的小花园别墅搬进了城里的弗饶恩普朗（今歌德广场）附近的大住宅。这幢拥有30个房间的大

厦可以让歌德尽情安排他的各种各样的矿物、植物标本和艺术收藏品，也可以让他的动物骨头、书籍、科学实验仪器各归其位。虽然歌德在其此后的一生中常常住在耶拿或莱比锡而将这座大厦弃置不顾，但他从此再也没有搬迁过住宅。他和他的妻子都在这里去世。人们现在把这幢大厦称作歌德府邸，是歌德博物馆所在地。

公爵对歌德的赏赐并不止于此。1782 年，卡尔·奥古斯特为歌德向皇帝约瑟夫二世申请贵族封号，同年 6 月 3 日，不到 33 岁的歌德得到了贵族证书，成为一名功勋贵族。从此，歌德的名字成了封·歌德，他获得了一个市民阶层出身的人在封建贵族社会里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歌德怎样看待公爵对他的这一奖励呢？也许，这会让他想起一件 20 多年前的童年往事。

作为市长的外孙，小歌德常常会在有意无意中流露出某种优越感，他为他的外祖父自豪，他向同伴们讲述那些他们无法目睹的市政厅内的情景。诸如此类的事情往往引起同伴们的嫉妒和敌意。有一次，当小歌德再次沾沾自喜地谈论外祖父的时候，一个男孩便讥讽歌德，说他不应该只谈论自己的外祖父，也应谈论一下自己身份低微的祖父，甚至说歌德的父亲并非祖父的亲生孩子，而是某位贵族的私生子，并罗列了一系列的论据。这些无稽之谈想必和大人们不负责任的信口议论有关，那些顽童无意中听了去，这时候便用来打击歌德。但歌德面对这种会使其他孩子暴跳如雷的咒骂却显得极为克制和冷静，他没有和那些男孩子冲突，只是回答说，生命是上帝所赐，在上帝面前，众生是平等的。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那些孩子的话却激发了小歌德的想像和虚荣心，在他敏感、幼小的心灵里引起了波动。他陷入到了

成为贵族后裔的遐想和憧憬中。小歌德不敢向大人们打听虚实，便暗中抱着极大的好奇仔细观察那些挂在墙上的贵族画像，希望通过相貌的相像找到自己的贵族“祖父”。他一会儿觉得这个贵族的眼睛与自己相像，一会儿又觉得那个贵族的鼻子与自己相仿，结果找来找去，终难确定哪一个是自己的祖先。在眼花缭乱之中，一场天真好笑的寻根探险便不了了之了。在《诗与真》中回忆起这段童年趣事时歌德写到：“凡是足以加强世人的内心的骄傲和迎合他的虚荣心的事，就是他最欢迎的，因此，他就不再问，这在别的方面会不会给他带来光荣或耻辱。”

在当时那个天真孩童的心目中，即使是贵族的私生子，那也是多么值得骄傲和夸耀呀！而现在，虽然歌德对贵族这种名号仍有充分的敬意，他却不再认为它是多么炫人眼目，令人渴求了。他已以自身的努力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而宫廷社会也几乎久已使他闻而生厌了。在此后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歌德都没有在那些正式信函和公文上签写“封·歌德”，而仍使用原来的签名方式，如果不是那些气破肚皮的世袭贵族们老是对他狂吠不休的话，这件事本身简直不会在他心中引起什么波澜。

几十年后，歌德和秘书爱克曼谈起此事，歌德说：“当授予我贵族证书的时候，许多人以为我会因此趾高气扬。其实，我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

歌德为自己的贵族徽章选择的标志是金星。[1]

逝去的亲人

在歌德来到魏玛的第三年，即 1777 年夏天，他唯一的妹妹

① 即太白金星。

科纳里娅去世了。她还不到 30 岁。歌德在日记中写到：“极度悲痛的日子。我的心充满着悲痛和幻想。”

与风流倜傥的歌德相比，歌德的妹妹科纳里娅是很不走运的。她有种种优秀、可敬之处，富有知识、教养和同情心，性格坚强，但却缺乏对获得幸福不无关系的美貌，甚至可以说她长得一点也不漂亮、动人，以至于她内心的美好东西也难以令人憧憬、追求。科纳里娅的前额在流行的后拢发式衬托下显得过于突出，更不幸的是，她从小就患有皮肤病，经常发作，同时，也缺乏世俗生活所需要的肉感，对夫妻生活不感兴趣。歌德总把妹妹设想为一个女修道院的住持或其他高贵教会团体的主管人，而认为她不适合过世俗生活。他们兄妹俩从小亲密相处，由于歌德的父亲在大多数情况下非常严肃、刻板，妹妹在长期的生活中便形成了对哥哥的情感依赖，而且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科纳里娅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容貌给自己带来的情感障碍，因此也变得对哥哥越发依赖起来。歌德出去上学以后，歌德的父亲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对女儿的教育上，希望科纳里娅能成为名门才女。但科纳里娅对父亲严格管理方式非常反感，虽然她不得不按照父亲的要求行事，但她心里却很不情愿，对父亲吩咐她做的事情，从来都是消极执行，一分也不多做，父女之间的感情一直非常冷淡。母亲怎么样呢？这位孩子一样的母亲似乎并未给女儿带来什么感情和思想上的满足，对于情感对立的父女，她也似乎毫无办法，当歌德从莱比锡辍学回家后，他听母亲抱怨的第一件事就是妹妹如何与父亲不和。

按照当时的风俗，女子是不能像男子那样出去受教育、闯荡世界的，这就使科纳里娅被牢牢束缚在了家里，当哥哥不在的时候，她只能靠与哥哥通信来开拓和丰富自己的生活。当然，她也有自己的男女朋友，但却一直没有恋人，而她的女友们却都已有

了男朋友了，这使她的内心更加感到抑郁和孤独，对哥哥的爱心的渴望也更加强烈。当歌德由于种种原因与恋人们断绝了关系的时候，科纳里娅总忍不住在替哥哥真心难过的同时也感到几分由衷的高兴，有时甚至也不无幸灾乐祸。歌德从斯特拉斯堡毕业回法兰克福后，科纳里娅从哥哥那里得到了很多安慰，她对歌德的创作也起了不小的督促作用，兄妹两人的情谊比以前更加亲密了。但歌德去韦茨拉尔后，他和妹妹的通信联系却逐渐荒疏了，他陷入了对夏绿蒂的热情，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妹妹。也许正是由于缺乏关怀的孤寂，科纳里娅才将对哥哥的爱慕与信赖转移到了施罗塞尔身上，同意了施罗塞尔向她的求婚。

婚后，科纳里娅的生活并不幸福，施罗塞尔写信给歌德说："我的爱情引起了她的厌恶。"科纳里娅本希望丈夫能到卡尔斯鲁厄任职，结果他们却去了一个荒野似的小镇埃门丁根。在那里，科纳里娅既没有欢娱的社交生活，又不能适应丈夫对夫妻生活的要求，只在几个往日女友的陪伴下享受有限的生活乐趣，忍时挨日，精神极度抑郁紧张。她不能忍受繁琐的家务，分娩后也不能忍受自己的孩子，甚至终于把孩子送给了别人。实际上，她的精神已经失常了，从那时到去世，她一直是处在或轻或重的精神病状态，治疗也没有显示出多大效果。

歌德1775年去瑞士旅行时曾去探望过科纳里娅，当时一见到妹妹，歌德就感觉到她的婚姻生活是不幸福的。歌德来魏玛后，科纳里娅又写信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了哥哥，但歌德并没有去看她，只是让她去找他的一位新女友，给她的信也极少。也许，当歌德感到无力解决痛苦的时候他就只想逃避它，谁能知道在他日记的短短几行字里隐藏了多少沉重的悲哀！妹妹去世后，歌德没有给施罗塞尔写去一句表示吊念的话，但这也许不能解释为对妹妹去世的冷漠，对那个做妹夫的，他难道连一丝怨恨也没有

吗？对于科纳里娅的去世来说，只有歌德的痛苦是最大的，让他去安慰别人就好像他身上破了却要给一个完好无损的人去绑上绷带一样，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这一点上去指责他。

1782 年 5 月，就在歌德接受贵族称号的前几天，他的父亲也去世了，这也是他从贵族证书中感觉不到什么快乐的原因之一吧。

歌德的父亲孤高耿介，有点固执，做事持之以恒，性格坚忍，极有个性，在家庭中扮演着一个严父良师的角色。历来人们总喜欢强调歌德的母亲对歌德的潜移默化，而实际上，就其趣味爱好对歌德产生的有益影响和对歌德的早期教育而言，这位父亲无疑功不可没。尽管歌德谈起母亲似乎比谈起父亲时更带有情感色彩，但他在自传《诗与真》中，无疑通过大量写实性记录让我们看到了父亲对他的未来事业的许多更为内在、本质、具体、意义也更为重大深远的影响。

由于歌德的父亲空有宫廷顾问官衔而并无实职，所以经常幽居在家，埋头读书，耽于自己的爱好，很少过问世事。他收藏有很多造型艺术作品，其中既有他自己珍爱的罗马铜版风景画，也有当时法兰克福艺术家的绘画作品。家里的房屋修整前，他用一排罗马铜版风景画来装饰前厅，其他画作散挂于房间各处，尽管他平时不苟言笑，似乎显得古板生硬，但有时他也会很高兴地向孩子们描述那些画中的景物，使孩子们对那些作品产生更加深刻的印象。房屋改建后，那些画被装上了镶着金边的精美画框，集中挂在书斋旁一个舒适房间的墙壁上，供孩子们随时观看。他也有很多藏书，其中有外国语词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书，也有优秀的法学著作和法学论文、最好和最新的游记作品，此外还有著名的意大利诗人尤其塔索的作品。他对意大利语言以及与意大利有关的一切情有独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以意大利语来撰写游记，

有时还会把自己从意大利带回来的一小块大理石和一些动植物标本拿给孩子们看。歌德长大些后，他更是多次向儿子描述自己为儿子设计的理想蓝图，而这种讲述总是以意大利结尾，以那不勒斯告终，使歌德从小就对意大利产生了热烈向往，把那里看作是人间乐园。在谈论这些内容的时候，父亲平时的严肃古板全都一扫而空，他所描述的内容也因此变得更加生动，对孩子们也更富于吸引力。

我们从成年歌德对意大利所代表的古典艺术的膜拜与追随中，从他对矿物、植物、动物等自然科学的多方面兴趣和研究中，甚至从他爱好整齐的性格中，都能明显感觉到做父亲的身影不时在儿子身上晃动。事实上，从莱比锡到韦茨拉尔，青年歌德正是走着一条被父亲规定好了的、和父亲的年轻时代几乎同一的路线。不论青年歌德是否喜欢法学，不论这种学习有利还是有害于他的创作生涯，谁能说这一切的任何改变肯定不会使我们历史性地永远地失去这个伟大的文化巨人呢？而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父亲对儿子在创作和绘画上的督促就更不必说了。

现在，歌德只剩下唯一一个亲人——母亲了，阿玛利亚公爵夫人建议他把母亲接来同住，但他拒绝了。也许他不愿让人了解他的过去，也许他觉得即使母亲在自己身边自己也无法给老人更多的照顾，也许他实际上仍未有长居魏玛的安定感，也许……

还在两年以前，歌德就第一次产生了死的预感，不是写维特时的那种激情，而是一种深沉、幽远、真实的生命体验和对人生的深切感悟。1780 年 9 月，歌德去了伊尔梅瑙，一个黄昏，他站在吉息尔汉山顶上，环顾暮色苍茫、渺无人迹的群山旷野，不由在山顶木屋的墙壁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群峰/一片沉寂，/树梢/微风敛迹。/林中/栖鸟缄默。/

稍待/你也安息。

那时，歌德只不过刚过完31岁生日，而当他再次登临此地时，他已是64岁的老人了，岁月也早以使他当年的字迹模糊不清。人生如白驹过隙，人在茫茫宇宙中不过一粒微尘，然而即使如此短暂的人生，对于具体承载它的人来讲，也已是太过漫长、沉重了呀！

围城

施泰因夫人真正成为歌德的情人后，他们一起拥有了三年宁静、幸福的时光，热恋代替了骚乱，和平代替了争斗，两人之间的感情达到了心心相印的顶峰。每次歌德外出的时候，他都把自己办公室的钥匙留给施泰因夫人，给她买围巾，给她寄衬衫，为她订购鞋子，送钱给她的母亲，关心她的孩子们，给她写的信也越来越多。

“你的爱对我来说是晨昏夕暝时照耀着我的一颗星辰……我还不能对你说清楚，我自己也还不明白，你的爱是怎样在我的灵魂中掀起轩然大波的。这样的体验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过……再见，我的新星……一千次地吻弗里茨，就像吻你的灵魂一样。啊，要是我能向你说清楚，我是怎么感谢你！祝你健康，要知道，是你使我变得无限幸福……”

“你的形象，你的爱情将时时、处处照耀着我，我的全部思想像灌注在亲爱的祖国身上一样，永远只灌注在你一个人身上。对于我来说，新生活开始了。现在我在用新的方式对待人们。你的爱情——是照耀着我的生命的最辉煌的光。你的鼓舞——是给予我的最大的光荣；如果说，在周围人之间我珍惜自己的名声，

那只是为了你，为了不让你为我感到羞耻。”

歌德的城内官邸后墙几乎紧挨着施泰因夫人家的花园，施泰因夫人有时穿过花园小径去与歌德秘密幽会，有时则公开在歌德的底邸或花园别墅里招待公爵吃早餐或接待其他来访的客人。她和歌德一起阅读荷马史诗，一起研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哲学，有时，她也督促歌德进行创作，记录他的口授，并把他的文稿誊清、抄写下来。

歌德被施泰因夫人营造的家庭气氛环绕着，也被自己与施泰因夫人的孩子们结成的快乐友谊环绕着，他的生命航船仿佛驶进了一个宁静的避风港湾，再也不会掀起感情上的狂涛巨澜。

然而嫉妒就像一个敌视人类幸福的魔鬼，到处在人的心灵上撒下蔓生的荆棘和野草；在爱情实现之前，它曾是爱情的证明和实现爱情的手段，可当爱情实现以后，它则越来越成为一个戴在情人头上的紧箍，使他无时不想摆脱它给自由与尊严的灵魂所带来的烦恼和痛苦。

“午饭前施勒特尔来了。我现在还是被女人们爱着的人，所以你也不得不爱我。”这受宠的孩子似的俏皮话不会给歌德带来丝毫好处，它在施泰因夫人那里绝不会产生歌德所希望的那种幽默感。施泰因夫人是经过长期抗拒才最终放弃自己固守的立场的，因此，她不会把自己和歌德的结合看得那么轻松。从某种意义上说，歌德是洋洋得意的胜利者，而施泰因夫人则是被迫采取某种行动。既然歌德让她以自己的真实爱情来保卫他心灵的城堡，她付出了，她就认为有理由要求对这个城堡的绝对拥有权。这种思想在施泰因夫人心里是个再简单明了不过的逻辑，作为一个被迫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的人，她付出的代价是如此之大，因此，她决不允许其他任何女人往这个城堡里踏进半步。

于是一轮新的战斗开始了。无论何时歌德到科罗娜或到其他

女性那里去，回来后就不得不请求施泰因夫人的原谅；她盘问指责他，而他则为自己辩解，并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保证。当爱情走到这种局面的时候，它离自己解体的日子就不远了。

> 我越来越成为失去个性、失于独立性的人。我把自己的全部弱点都袒露给你，而你对我内心中那些无力自卫的东西掩护得并不严实，你一个劲儿的增加我的缺点。不，我对你的爱情，这已经不是一种情欲，而是一种我把它看得比最有益的健康更加宝贵而我也不想加以疗治的病症。

这段话写于歌德35岁的时候，而在他32岁时，他就已经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 如果不是那不可抗拒的宿命，/把我们俩的命运系到一起，/以致只有在你身上我才认识自己，/那我肯定早就会远走高飞，/走向辽阔的大地。/我的诗歌、理想、希望和要求，/只向你、在你面前倾吐，/我们的生活相依在一处。

吸引力夹杂着拒斥力，而且后者越来越大，甚至当他写下上面那段常被引为爱情证明的文字时，我们看到的也更多不是一个向心上人面对面倾诉的屋顶下的男人，而是一个站在高山之巅眺望，感受到远方强烈诱惑的未起程的远行者，外面的世界，已作为心灵悸动的重要符号，闯进了恋人们狭小封闭的话语世界。

实际上，歌德同施泰因夫人的情感发展与歌德本人的精神演进密切相关，可以说，是歌德精神发展的需要选择了施泰因夫人，情欲需要只是两人关系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当精神发展完成了一个阶段而达到成熟的时候，情欲禁忌就成为两人关系

发展的最后屏障，而当这个屏障终于被打破时，爱情便很快就和它所依傍的精神一样陷入了危机。

实际上，歌德已越来越多地将心灵寄托在对自然物的观察和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上。这些在初时是他的职责和兴趣，而越到后来，它就越成为对政务和爱情烦恼的一种逃避。

歌德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对观察研究自然物抱有浓厚兴趣，在莱比锡上学时，这种兴趣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培养和发展。有一次，他在医学教授兼植物学家、宫廷顾问官路德维希先生家吃饭，听到教授和医学生们极有兴致地谈论一些医学、博物学的话题，被他们不断提到的有关人物及其成就所打动，很快便把兴趣转移到了自然科学方面。他读了许多自然科学著作，还常常去听解剖学、生物学、物理学讲座，了解了很多有关人名和术语。辍学回家养病时，歌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又因对炼丹术的迷恋而进一步发展到做实验的阶段，万灵丹药虽然没有炼成，但对化合物和化学反应过程的仔细观察却使他对自然物有了更加本质、理性的认识，他读的《化学纲要》、《医学箴言》等书籍，也使他了解到了一些基本的化学、医学知识，为他今后对自然科学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到斯特拉斯堡求学后，和歌德一起吃饭的青年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医科生，歌德处在医学生的圈子里，和医学生们交朋友，不仅天天在吃饭的时候听这些人谈论医学，在一起散步游玩时也听他们谈论医学。这样，有意无意间，歌德自己也渐渐变成半个医学生了。歌德在《诗与真》中写道：

> 如所共知，大学生中，在上课时间以外还津津有味地谈到自己的学科和职业的，只有医学生。这是源于学科的性质的。他们研究的对象是最感性的，同时又是最高尚的，是最简单的而又是最复杂的。医学使全体人类从事于它，因为它

是以全体人类为研究对象的。青年学生所学的一切，直接涉及一种重要的、虽危险而在许多方面是有收获的实践。所以，他热烈地来专攻他要认识和要实践的东西，一部分是因为它的本身引起兴趣，一部分是因为它向他展现出一个独立和致富的幸福的前景。……医学院总凌驾于别的学院之上，在教授的名望和听课学生的数目上头都是如此；我因此也给这潮流卷进去了，加上我的医学知识的程度恰可以使我的知识欲增强和刺激起来，我更容易为所吸引。到第二学期开始，我便听冯·施皮尔曼的化学和洛布斯太因的解剖学，并决心真正用功，因为我藉着我的出色的初步知识——或不如说多余知识——在我们那一伙人中已博得相当的名望和信仰了。

当时歌德热心于听医学和化学课，除了对自然物的兴趣和受医学生的影响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而自觉的动因就是要为应付将来的生活而对自己进行多方面的自我素质训练。在《诗与真》中他这样写到：“同样，解剖学对于我也有两重的价值，因为它既能锻炼我耐得住讨厌的景象，同时又满足我的求知的欲望。所以我又听老医生爱尔曼的临床讲义，以及他的儿子的助产术的功课。我的目的也是两重的，一方面是想获得关于生理的一切知识，他方面想解除我对于讨厌难看的事物的害怕。我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从此，如此之类的事物再没能使我失去常态。”

来魏玛后，作为一个实干家而非尸居其位的官僚，对工作的极端负责精神促使歌德努力钻研与本职业务相关的科学知识，这是歌德在魏玛时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歌德向来与一切形而上的理论体系都谨慎地保持适当的距离，而对自然科学和生机勃勃的自然界，则始终怀有孩子般的天真好奇，并始终

对它们保持着敏锐的观察。伊尔梅瑙矿山的重新开采使他对矿物学和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次公务旅行时，为了采集到一块岩石标本，他竟不顾生命危险，踩在同行的一位年轻人的肩膀上，在悬崖上爬来爬去。每次外出旅行视察，他都随身带上一柄地质锤，遇到有代表性的岩石，就把它们采集回来，分门别类地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他还写了一篇研究花岗石的文章，把花岗石称做地球上最古老的纪念碑。

"我的脑子里重又沸腾着那个植物王国。一切重又冲进我的体内，折磨着我……一秒钟我也无法和它们分开。一切都在迎着我飞驰而来。如果我有时间，我将用我的余年来研究大自然所有的领域，研究它所有的方面。"① 掌管森林事务使歌德对生物学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进行研究，他研究树木和花卉，还用显微镜来观察鞭毛虫。他曾说，除了莎士比亚和斯宾诺沙，对他思想和创作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瑞典科学家林纳了。林纳把自然界分成植物，动物和矿物三大类，每类又递分为纲目属种，歌德按照林纳的分类，在自己拥有 30 个房间的住宅里，建立起了一个藏品丰富的自然博物馆。这里不仅有矿物和植物，还有各种各样的骨头标本。歌德在一个大箱子里精心收藏了一个大象头骨，女仆还以为那里面装的是瓷器!

歌德经常到耶拿大学去听解剖学课，还利用自己掌握的解剖学知识为魏玛绘画学校的师生们办解剖学讲习班。1784 年 3 月 27 日，歌德怀着按捺不住的狂喜从耶拿给赫尔德尔写信说："我找到了——既不是金子也不是银子，而是一种给我带来无法形容

① 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9 月第 1 版甘木等所译德国艾米尔·路德维希之《歌德传》第 220 页。

的喜悦的东西——人的颚间骨[①]！我和洛德尔正一起比较人的头骨和动物的头骨，突然发现了一个痕迹，一看，正是它！不过，我请求你对谁也别说，让它暂时成为一个秘密。不过，你该为这件事感到高兴，我发现了使整个人类骨骼构造趋于完整的那块关键性的小骨头。瞧瞧吧，这就是它，就放在原处！就是那个样子！”接着，他忍不住又给施泰因夫人写了一封信，向这个嫉妒而又忠诚的女友报告自己的重大发现：“这使我感到了无上的快乐，我有了一个解剖史上的发现，这发现重要极了，好极了。这也有你一份功劳。但不要对任何人说一个字。我通知赫尔德尔，让他保持缄默。我是这样喜悦，连五脏六腑都翻动起来了。”

虽然法国解剖学家魏克·达苏早在 1780 年就已发现了人的颚间骨并在 1784 年公布了自己的发现，但歌德是在对这一切全无所知的情况下从独立观察研究中得出同样结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歌德对颚间骨的发现仍具有重大的意义。那时，教会和学者们普遍认为颚间骨只存在于动物身上，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标志，而人的颚间骨的发现却为进化论学说铺下了一块重要路石。

歌德把他的发现写成了论文，在译成拉丁文后寄给了一些著名学者，但他的观点遭到了他们的否定。歌德对此倒毫不惊讶，他把自己的论文放在一边，没有发表，说：“我准备相信那些专家学者们凭着他们的五官所不曾加以相信的东西。现象的生动的内容很少使他们感兴趣。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关于它已经说了些什么。”

一个是带着毫无偏见的锐利眼光仔细搜寻现象与现象之间的渐进性联系的发现者，一个是闭着眼睛先入为主地将活生生的现

---

① 人的颚间骨是与上颚骨长在一起的一块小骨头，不易发现，但在动物身上却很明显。

实硬塞进条条框框中的墨守成规者，这就是歌德与那些对人有颚间骨持否定态度的人之间的区别。

在自然科学研究上，歌德是个坚忍不拔自学者，他集从政者、自然科学研究者和诗人于一身，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中发现美，又在审美客体中看到一般诗人领悟不到的更为深邃的本质和真理。美、自然科学和哲学被歌德奇妙地融为了一体：

> 群山和矿坑给我预言着许多有趣的东西。诚然，它们看上去已经不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但是，一旦登上山顶，展现在眼前的便是另一种类型的诗和画。①

> 我担心，人们会告诉我，只有那种矛盾着的精神才能推动我从观察和描写人类的心灵——这是造物中最流荡不定、最变化无常的那一部分——转向观察那最坚定、最无法摧毁的自然之子……啊，让我这个由于人类情绪的变化无常，过去和现在受过许多痛苦的人，能够享受到那悄悄接受着我们的、伟大的、呼之欲出的大自然所赋予的那种崇高的宁静吧。坐在那高峻而裸露的峰顶上，我可以对自己说："你现在是处在地核最深的那一层中。你来到这里，不是沿着坚实的坟墓，而是沿着美丽而肥沃的山谷……这样的孤独是这样一个只把自己的心扉向那最古老、最深邃、意义最重大的感情——真理敞开的人才能体验得到的。"②

莎士比亚、斯宾诺莎和自然科学使歌德对自然与人生的见解

---

① ② 分别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9 月第 1 版甘木等所译德国艾米尔·路德维希之《歌德传》第 197、198 页。

深刻而独到，他的整个精神都融入了自然之中，而自然深邃与博大的精魂也仿佛全部被他吸入了自己的血骨，当他饱含着诗情在《自然颂》中谈论大自然的时候，我们感到他仿佛在谈论他如此了解的自己。然而即使如此一个像自然一样复杂强大的诗人、科学工作者和从政者，也无法使自己适应魏玛宫廷越来越使他感到混乱、压抑的凝滞气氛，或者我们换个说法更合适：正是由于歌德具有与博大的自然同样的渴望无限扩张的巨大生命力，他才越来越感到魏玛这个曾经让他感到是如此一个世界大舞台的小封建公国对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的窒息。

> 难道我还能希冀比我现在所处的、其中隐藏着无限可能性的地位更加理想的处境吗？真的，只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原因……才能迫使我放弃我的岗位。如果我抛弃一切只是因为并不是一切都称我的心，而我的劳动果实又被人剥夺的缘故，那么，光就我个人的关系来说，这一点也是不可原谅的。请相信吧，我在工作和职务上焕发出来的精力产生于我自愿做出的一种牺牲的自觉，只要我一下令备上旅行用的马，我就会从你们那儿重新获得生活的全部快乐和宁静。如果我的眼前没有这样一个远景，那么在那些痛苦的时刻，我就会把自己看做只是为了活命才干活的农奴和雇工，许多事就会引起我强烈得多的痛苦。①

难道还有什么其它语言能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一个顽强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和它由此所承担的巨大痛苦与压力吗？歌德

---

① 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9 月第 1 版甘木等所译德国艾米尔·路德维希之《歌德传》第 186 页。

这样认识自己的处境，而对国家状况，他则有更加深刻的见解：

"诅咒威胁着我们，我们在把自己国家的膏血吸干……因此我们注定享受不到幸福的宁静……在我们的精神和政治世界下方有着一些布满地雷的人行横道、地下室和下水道，谁也没曾想过，它们相互间是怎样联结在一起的，它们的臣民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一个只消多少熟悉情况的人就丝毫不会感到惊奇，如果他脚下的地面突然塌陷下去，而一些奇怪的声音突然从深渊里传出来的话。"①

歌德预感到了危机，但他已无力继续在这方面与神角力，他失去了信心，因而也放弃了斗争，他所感到的只有疲惫不堪和难以摆脱的痛苦。当然，他可以"浇灌自己的花园"，但这并不能使他忘记他是抱着"将甘霖洒遍全国"的抱负来魏玛的；他将眼睛只对着显微镜和死尸，但这也不能将他与外面的扰攘完全隔开，何况他本身就不是一个要过与世隔绝的生活的人，而当他将头脑用于文学创作的时候，他感到的则是自己更大的亏空和危机。

歌德是以一个狂飙突进运动的天才作家的身份来魏玛的。到魏玛后，成了一位宫廷诗人和枢密大臣。当他一心要以重整乾坤的方式来写他的大诗篇的时候，他的生活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和断裂，但当他越来越感到对现实无能为力而渴望回到诗人和作家的位置时，他的生活的二重性就真正产生了：

"狩猎构成了公爵的全部生活内容，公爵夫人只是生活在宫廷趣味之中，两个人我都很少看到，只是到现在我才重新为自己生活，并且又重新发现了自己。那种疯狂的理想已经永远抛弃了

---

① 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甘木等所译德国艾米尔·路德维希之《歌德传》第188页。

我，它像美丽的种子成熟在我和我的朋友心中，可以钻进当地的土壤里，就像从天上降下来的宝物可以装饰人间帝王的皇冠一样。于是，我重又获得了青春时代的幸福。就像生活在祖宅之中，我无法想像，怎么可以把诗歌和律师活动联系在一起，就像现在怎么可以把另外一个我和三等文官区分开来一样，只有靠另外这个我，那位三等文官才会生活得很好。只有在我的那些计划、构思和事业的最深处我才是忠实于自己的，并且把我那上流社会的和诗人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生活用一个肉眼看不到的结联系起来。"①

我们不能以在当时是否获得声誉来评价歌德魏玛时期作品的真实价值，创作需要沉淀和累积，一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公众，还取决于它在作家创作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甚至那些看起来毫无价值的闹剧，它们也是作家向前发展的道路上铺下的碎石，在那里，芜杂的情感得到宣泄，清明纯粹的精华被保留给了那些未来将会出现的伟大作品。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歌德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段话中找到类似的观点：

"根本无法找到人与动物之间的任何区别。只是在自身的统一中，每个生物才是它现在的这个样子，人之所以成为人，甚至取决于他的小脚指头最后一个关节的形式和特征——这只是一个大和声中声音的细微差别，需要从共同性和整体性上加以研究，因为在个别的情况下，它只是一种死字母。"②

然而，不管怎样，歌德的读者范围大大缩小了，魏玛之外，他几乎与任何人都失去了文学上的联系；在魏玛，也只有施泰因夫人和克内贝尔是歌德的忠实读者，范围再扩大一点，还有赫尔

---

①②分别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甘木等所译德国艾米尔·路德维希之《歌德传》第204、200页。

德尔夫妇、维兰德和公爵。在德国文坛上，狂飙突进的天才作家歌德的名字似乎消失了，代替他的名字频频和读者、观众见面的，是一些年轻的后起之秀。1781 年，22 岁的席勒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剧作《强盗》，1782 年 1 月，《强盗》在曼海姆首演成功，席勒的名字就像当年写出《葛兹》与《维特》的歌德的名字一样传遍德国，成为文坛上又一颗耀眼夺目的新星。1784 年，25 岁的席勒又完成了他的另一部戏剧力作《阴谋与爱情》，其激烈的反封建精神与歌德的《伊菲格涅亚》的道德感化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爵对歌德的作品越来越不感兴趣了，1784 年 12 月，卡尔·奥古斯特在达姆施塔特会见了席勒，并赠给了他魏玛顾问官的头衔，而这时的歌德正在钻研斯宾诺莎哲学，正在怀着发现颚间骨的狂喜撰写科学论文。

在居留魏玛的头 10 年，歌德写出了一些著名的诗歌：《流浪者的夜歌》、《无休止的爱》、《航海》、《对月》、《人的局限》、《魔王》、《迷娘曲》等，较大型的作品只有《伊菲格涅亚》完成了，其他像《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托夸多·塔索》、《埃格蒙特》、《浮士德》等都只是写出了部分片段和初稿，这对一个自认为“从本质上说，我生来就是个作家”的歌德来说，根本不是他期望自己的创造力所能产生的效果。歌德越来越不清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将来最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785 年，歌德终于决定了意大利之行。

1786 年 7 月，歌德和施泰因夫人及赫尔德尔随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到卡尔斯巴德（位于魏玛东南方向，现名卡罗维发利，在捷克境内）度假，8 月底，施泰因夫人和公爵等人都回了魏玛，而歌德向公爵请了个假，仍留在卡尔斯巴德修改作品。莱比锡的葛兴书店要出版他的选集，他要完成选集第一卷的编定。

9月2日，歌德给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写了一封信，以含糊不清的言辞向他的君主告别：

> 原谅我吧，在我向您告别的时候，我只能模糊地谈到我的旅行计划。我自己也还不知道我的前途在哪里。您是幸福的，您的事务已经处理妥当。如果我去照料我自己的事务，我想您是会允许的；何况，您曾多次催促我去做。事情都已安排好了，即使我不在，也会顺利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我请求您给我一次不定期的长假……我将消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

施泰因夫人也不知道歌德要到哪里去，歌德只在给她的信中隐约暗示了自己的计划："那时候我就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和你生活在一起（就是说没有你在我身旁），我将在一种既没姓氏也没地位的幸福的孤独中越来越接近大地……我已经在内心中体验过许多东西，但从来还没有如此热烈地憧憬着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个不让暴力统治的基础上。不这样我就无法生活在你的身边。我宁可远远地离开上流社会，到另一个我现在正朝它走去的孤独的世界中去。"

"夜间11点。终于，我准备好了，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准备。因为真正说来，还有一个星期的事情要我去干，但我得走了，并且最后一次对你说：再见啦！祝你健康，我的灵魂！我是你的！歌德"

9月3日凌晨3点，一辆驿车载着一个神秘的旅人向意大利方向驰去，他只带了一只旅行包和一只背包，仿佛四海飘荡的旅行画家，但如果一个魏玛的廷臣恰巧也在这辆驿车上的话，他立刻就会认出那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他们的枢密大臣——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

第五章

帝都的朝圣者

约翰·梅勒

1786年10月29日，经过近两个月的旅行，歌德终于到达了“世界京都”罗马。一路上他行色匆匆，在威尼斯只停留了两个星期，而在佛罗伦萨，竟只停留了三个小时！旅程中的最后一个夜晚，他和衣而眠，甚至连衣服都没有脱。在《意大利游记》中，歌德对我们倾吐了他终于到达罗马时的激动心情：“呵，我终于到达了这座世界之都！我在这里安静下来了，像是我整个一生都得到了慰藉。因为人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新的生活……我看到了我青年时代的种种梦想，它们都栩栩如生。”

歌德完全自由了，没有政务的烦恼，没

有婆娘的数落，也没有宫廷里拘泥的礼节和呆板服装的束缚；他已不再是那个神情严肃、心情抑郁的枢密大臣封·歌德，而只是一个默默无闻走在街道上很快就会消失在异国人流里的画家约翰·梅勒。

就歌德在艺术上的偏好而言，除去对诗歌的倾心，另外对他最具有诱惑力的艺术门类就是绘画了。在文学上，歌德可谓已功成名就，而在绘画上，他则始终没有达到自己渴望的高度，也许正因如此，他才特别渴望当一回画家吧。走在罗马的街头，歌德的脑海中频频闪现出德累斯顿美术馆主任顾问官里德尔先生和莱比锡画院院长奥塞尔先生的亲切面影，20 多年学画的前尘往事又一幕一幕浮现在他的眼前。

在进大学之前，歌德已经培养了自己对绘画的浓厚兴趣，到莱比锡后，他仍保持着这种爱好，除文学外，绘画是他最感兴趣、最愿意投入精力学习的科目。歌德之所以不断产生对绘画的热情是因为他觉得这种艺术形式——荷兰派绘画使他更加坚信这一点——最符合他对自然和现实物质世界强烈关注与热爱的天性，用绘画表现自然，从绘画中认识自然，对他来说始终是一个强有力的诱惑。那时，歌德和几个学生拜奥塞尔为师，在业余时间学习绘画，虽说歌德在绘画技艺上终没能取得多少进步，但在审美趣味方面却受到奥塞尔很大影响。奥塞尔欣赏意大利派的绘画作品，崇尚单纯朴素，讨厌巴洛克风格的涡卷型装饰、贝壳装饰以及其他一切离奇古怪的艺术趣味，此外，他狂热地崇拜艺术史家温克尔曼，不仅热烈地向学生推荐温克尔曼的美术史著作，还给他们讲述温克尔曼的艺术生活，并指导他们对温克尔曼的著作进行阅读。奥塞尔对温克尔曼的推崇强烈感染着歌德，虽然当时歌德还不能完全读懂和理解温克尔曼的论著，但他勤奋努力地钻研它们，极力在隐晦的领悟中吸取教益。通过在奥塞尔指导下

的阅读，青年歌德不仅初步了解了温克尔曼的著作和思想，还第一次认识了古希腊的艺术世界。

虽然歌德小时候就观赏过父亲及其朋友们收藏的一些绘画作品，奥塞尔又在莱比锡全城搜罗了许多藏画给他讲解，但随着对造型艺术理论和实践越来越多的了解，歌德还是渴望见识更多的艺术藏品。1768 年 3 月，也就是歌德居留莱比锡的最后一年的春天，19 岁的歌德悄悄去了德累斯顿，在那儿，他寄住在一个鞋匠家里，只要美术馆开门，他天天都到美术馆去。德累斯顿美术馆不仅装饰得庄严华丽、气派非凡，美术藏品也极为丰富。在这里收藏有作品的某些画家是歌德所熟悉的，而有的他则只略闻过一二。当时歌德对绘画的鉴赏以酷似自然为上，荷兰派的风景画、静物画和室内画都是特别能打动他的作品，因为这些画能使他联想到现实并和现实进行多方面的对照比较。在这些画幅面前，歌德往往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常以自己的惊呼使解说员忍不住笑乐起来。由于歌德每天都到美术馆参观，美术馆的主任顾问官里德尔先生便敏锐地注意到了他。里德尔先生非常赞赏歌德对艺术的热情，亲自为他讲解，引导他注意那些可能会有助于他的地方，虽然歌德在德累斯顿只住了不长一段时间，里德尔先生的和蔼、认真和对工作的勤勉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在德累斯顿停留的最后几天，歌德还经人介绍拜访了萨克森美术院的院长封·哈格多恩先生。哈格多恩先生也非常喜欢歌德这个远道而来的热情的艺术爱好者，他让歌德参观了自己珍藏的一些名画，使歌德在美术馆之外再一次大饱眼耳之福。

回到莱比锡后，歌德结识了著名书商、高特舍特著作的出版者布赖特科普夫一家，了解了不少印刷方面的知识，后来又在布赖特科普夫家结识了铜版画雕刻家斯托克先生。斯托克先生的工作是按照奥塞尔先生的绘画作品制作各种尺寸的铜版画，用于文

学作品的插图，这个实用美术家做事严谨、工作勤恳，他的精湛技艺和铜版画制作过程本身所具有的魅力都对歌德产生了强烈吸引力。跃跃欲试的歌德在斯托克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学习铜版画的蚀刻技艺，开始时他只模仿他人的作品蚀刻种种风景画，不久就扮演起斯托克先生的助手的角色来，同时还在学习铜版雕刻的间隙学习木刻，并在这方面也小有所得。但是有一点当时歌德没有充分注意到，那就是在进行铜版画蚀刻时，铜和酸化学反应所产生出的有毒气体使他的身体受损很大，这成了他以后发病的重要原因。

歌德从莱比锡辍学返家后，父亲对他的情绪低迷和糟糕的健康状态一直颇为不满，他再次发病后，父亲的心情变得更加烦乱，时常流露出不耐烦的焦躁情绪，好像他故意不让自己的病情好转似的，与母亲和妹妹对他关怀体贴的态度形成强烈反差。歌德觉得父亲冷酷自私，不近人情，心里对父亲不无怨恨，但想到父亲对自己的培养和厚望，想到自己使父亲的期望和虚荣心受到的挫折，他心中又不免有几分自责，思过之下，他尽量投其所好地使父亲高兴，在养病期间，画了很多幅静物画和人物画。虽然他的画技仍比过去没有多大提高，父亲却像对待大师的初作似地将它们装裱好，用线框围起来，督促他将它们完成。有时，父亲还让自己的家庭画师帮助歌德修饰润色画面，以便使歌德能将自己的笔触和画师的笔触相互对照。在完成纸上画稿的同时，歌德还醉心于铜版画的蚀刻，他按照从斯托克那里学来的知识和技巧，尝试独立完成从绘画到蚀刻、再到印刷的铜版画制作全过程，并且取得了部分成功。不久，歌德的喉咙又开始发炎，疼得很厉害，医生的药剂也无能为力，歌德渐渐领悟到疼痛可能与蚀刻铜版画有关，便马上放弃了这个极吸引他的工作。

在斯特拉斯堡期间，歌德在赫尔德尔的引领下沉迷于文学，

很少画画。回到法兰克福和在韦茨拉尔期间，他偶尔也像维特一样拿起画笔，或者和朋友们一起观赏铜版画作品。在离开绿蒂回故乡的路上，心情抑郁的歌德再一次动了当画家的念头，他用小刀子做占卜，将它从岸上扔向河水，看它是否能顺利地落进水里——如果刀子被水边的杨柳挡住没能落进水，他就放弃做艺术家的念头，反之，则意味着他可以在造型艺术上取得成功。占卜的结果却暧昧不明：扔出去的小刀子瞬间消失在浓密的枝叶中，歌德根本无法看清楚它的下落，而与此相应，水面却激起喷泉般的水花来，似乎证明刀子确实又掉进了水里。歌德的心里十分扫兴，觉得这是不吉之兆，当艺术家的念头也就暂时作罢了。不过尽管有这次不吉利的占卜，回到法兰克福后，为了排遣对夏绿蒂·布甫的思念，歌德仍在造型艺术上花去了一些时间。他一面研究法兰克福艺术爱好者们收藏的一些绘画和铜版画作品，一面从事写生练习，还收集了不少古代雕塑的仿制品。

在以后的日子里，歌德也时常拿起画笔，到魏玛后，他还创办了一所绘画学校，并亲自给学生们讲解解剖学知识。

现在，身处旅居国外的德国画家的圈子中，歌德似乎想集中精力使自己的绘画水平得到提高，最终尝试一下自己可能达到的高度。

在罗马，歌德住在德国画家约翰·海因利希·威廉·梯施拜因的住处，当然，他的假面具很快就被揭穿了，德国老乡们都知道了约翰·梅勒就是大作家歌德。梯施拜因在给拉瓦特尔的信里这样愉快地来描述歌德：“我确实非常喜欢他，他生活很简朴，要求我给他最普通的食品和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只要能够睡觉和毫无干扰地进行工作就行。他现在就在那里面坐着哩。每天上午9点前，他写自己的那部《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希望把它很快结束，接着出去参观那些艺术杰作，他和那些大人物们不来

往，除了艺术家外谁也不接待，哪家也不去。”

的确，在意大利期间歌德专门用于创作的时间极少，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即了解和观察上，就像他的威廉·迈斯特一样，他要完成自我教育。在四处游览中，临摹、写生、与画家朋友切磋画技，欣赏古建筑物遗迹和博物馆的藏画占去了歌德的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期间，歌德画了上千幅画，山川、古迹、人物、狂欢节，无所不包。有一幅描绘罗马狂欢节的画，歌德画了整整一个星期，尽管它画得似乎缺乏热情，歌德自己仍然很喜欢它。

歌德也学习雕塑，他成功地雕塑了一尊罗马神话人物的头像，并学会了鉴定各种各样的古希腊雕塑所属的年代。他也研究古代建筑术，研读拉丁文作者的有关奥古斯都时代[①] 建筑术的著作。现在，哥特式和巴洛克式的建筑都只能引起歌德的反感，只有古典风格的建筑物残垣才能使他感到怦然心动。

对于这段在意大利的“画家”经历，歌德在 1829 年 4 月 10 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做了这样的总结：

> 在过去的一切年代里，人们说了又说，人应该努力认识自己。这是一个奇怪的要求，从来没有人做得到，将来也不会有人做得到。人的全部意识和努力都是针对外在世界即周围世界的，他应该做的就是认识这个世界中可以为他服务的那部分，来达到他的目的。只有在他感到欢喜或痛苦的时候，人才认识到自己；人只有通过欢喜和痛苦，才学会什么应追求和什么应避免。除此以外，人是一个蒙昧物，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对世界知道得很少，对自己知道

---

① 罗马皇帝屋大维（前 27 - 14 年）统治时期，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

> 得更少。我就不认识我自己，但愿上帝不让我认识自己！我想说的只有这一点，当我40岁在意大利时我才有足够的聪明，认识到自己没有造型艺术方面的才能，原先我在这方面的志向是错误的。如果我画点什么，我就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掌握物体形象。我有点害怕，怕对象对我施加过分强烈的压力，比较柔和有节制的东西才合我的胃口。如果我画一幅风景画，我总是从较暗淡的远景画起，画到中部，对前景总不敢把它画得有足够的魅力，所以我的画产生不了应有的效果。此外，我不经过练习就没有进步，如果没有画完就搁下来，再画时总是要重新从头画起。可是我在这方面也不是毫无才能，特别是就风景画来说。哈克尔特[①]经常对我说，“假如你愿意跟我在一起住上一年半，你会作出使你自己和旁人都喜欢的画哩。”

“比较柔和有节制的东西”，这种口味是一个不太年轻的学者的口味，在从狂飙突进歌德向古典时期歌德转变的过程中，学者歌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这次意大利之行，所到之处除了写生外，歌德时时处处都显示出了一个自然科学研究者和一个博物学家的热情。还没出德国边境时，他就搜集到了一块嵌着碧玉的石英，他把它带到了罗马，又从罗马把它带回了魏玛。歌德也研究海藻和海蜗牛，当他第一次见到大海时，他不由从心底发出惊叹：“多么崇高的活生生的存在！这样和谐，这样真实，又这样地可以接触。”在意大利期间，歌德曾三次登上维苏威火山，去研究那里的熔岩。

---

① 德国风景画家。

西西里是意大利之行中给歌德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他说："没有西西里的意大利不会在人的脑海里留下印象，这里是打开一切的钥匙。"这里的"钥匙"，在更多的意义上是针对自然奥秘而言。在西西里的港口巴莱摩，歌德发现了棕榈树，根据棕榈树的形状，他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原石"的"原植物"思想：

> 真的，它比我们想像的来得简单；原植物看起来是这样一种神奇的创造，以致大自然本身引起了我的嫉妒。掌握了这个模式和这把能够揭穿奥秘的钥匙，我们就可以从无限遥远的年代开始研究植物的发展。很明显，这个规律我们可以应用于整个的活生生的世界。①

有时，歌德研究自然的兴趣甚至超过了对历史古迹的兴趣，据说，在西西里时，为了看一看田野中成熟了的黑麦，他甚至没有去游览那里的著名古都锡腊库扎。看来，代替枢密顾问歌德，自然科学工作者歌德又要和作家歌德争夺时间和精力了。

二　《哀格蒙特》

在意大利期间，与科学研究相比，歌德在创作上的直接成果似乎不大，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完成那些已经开始的作品或修改已经完成了的作品。歌德将很多精力用于修改《伊菲格涅亚》，在这个剧本上，歌德再次显示出了他喜欢反复修改作品的癖好。1779 年这个剧本初次完成时，使用的是散文形式，1780 年春天，

---

① 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9 月第 1 版甘木等所译德国艾米尔·路德维希之《歌德传》第 236 页。

歌德曾将它改成韵文，但在1781年，他又将它恢复到了原来的散文形式。1786年夏，在卡尔斯巴德，歌德对剧本进行了第四次修改，到罗马后，他继续他的修改工作直到年底将它最终完成。1787年1月13日，歌德将修改定稿的剧本寄回了德国，6月，剧本被收入莱比锡葛兴书店的《歌德著作集》第三卷。至此，歌德了结了一桩大心事。

《伊菲格涅亚》定稿后，歌德开始加工那个被耽误得更久的剧本—《哀格蒙特》。这个剧本早在1775年歌德去魏玛以前就开始写了。《葛兹·封·伯利欣根》成功后，歌德一直想在政治历史中再找一个历史转折期的重大事件，把它处理成戏剧作品，他找到了极富戏剧性的尼德兰叛乱，一直在构思这部作品，当他陷入与丽莉恋爱的苦恼中时，在父亲的不断激励和督促下，他开始写作《哀格蒙特》。由于心绪烦乱，当时他写了几场就写不下去了，到魏玛后，他又断断续续写了一些篇章，到1785年，这部戏剧已差不多写完了，但仍没有最终完成。

所谓尼德兰叛乱是指16世纪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武装斗争。尼德兰包括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的一部分领土，当时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二世统治。查理五世的母亲是西班牙王室的胡安娜，父亲是哈布斯堡王室的腓力，查理五世不仅从父母亲那里继承了西班牙联合王国、西班牙在美洲和意大利的殖民地以及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欧的世袭领地，还继承了祖母勃艮第玛丽的勃艮第领地，其中就包括富裕的尼德兰，1555年查理五世退位时，他把西班牙和尼德兰分给了儿子腓力二世。早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便联合穆斯林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里兰一世反对哈布斯堡王室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在宗教方面，传统的天主教也受到马丁·路德领导的新教的威胁和攻击。腓力二世不仅从父亲那里继承了

对法国王室的斗争，也继承了对新教徒的宗教斗争。

尽管查理五世在1555年就已接受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允许德国各诸侯和城镇在天主教和路德教之间作出选择，他的继承者腓力二世在尼德兰的宗教压迫却非常残酷。1559年，腓力二世将自己的异母姊姊玛加丽特·封·帕尔玛派往尼德兰当女摄政，任命自己宠信的红衣主教格兰维拉为尼德兰总督，设立宗教法庭，颁布最严厉的惩罚律令，大幅度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和各独立州的特权，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城市暴动，加尔文教徒[①]和再洗礼教徒[②]反对天主教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在所有对西班牙王室的继承者持敌视态度的人中，尼德兰贵族占了一定的比例，其中包括哀格蒙特伯爵、奥兰宁亲王和霍恩海军上将。1566年8月，尼德兰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武装起义，起义者破坏天主教堂和修道院，捣毁圣像，声势浩大，迅速蔓延到各地。人民起义的迅速发展吓坏了女摄政，也吓坏了本来对起义持支持态度的尼德兰贵族。前者不得不发表宣言停止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并减轻惩罚敕令所规定的刑罚，而后者则倒向西班牙统治者，背叛了自己的人民同盟。1567年9月，腓力二世派残暴的阿尔巴公爵率西班牙军队前往尼德兰镇压人民起义，机警的奥兰宁亲王等尼德兰贵族闻风而逃，而哀格蒙特等人幻想西班牙政府对他们能宽大对待，结果束手被缚。1568年6月5日，在被捕半年后，哀格蒙特伯爵和霍恩海军上将在布鲁塞尔的市场上被阿尔巴公爵下令斩首，走完了他们动摇不定的悲剧一生。

歌德在写作剧本初期就认真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但写作时

---

① 16世纪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创立的教派，主张政教合一，以长老制代替主教制，符合当时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要求。

②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在德国、瑞士、荷兰等地出现的一个基督教教派，不承认教会为儿童所做的洗礼，认为应该在成年后再次受洗，代表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利益。

他并没有严格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对哀格蒙特的年龄、身份、境遇等都做了改动。定稿后的剧情是这样的：女摄政玛加丽特统治下的尼德兰爆发了破坏圣像的暴动，市民们人心惶惶，普遍对西班牙统治者的压榨掠夺极为不满，而女摄制则心惊胆战，急急忙忙叫人写信将详情报告西班牙国王，以免隐情不报的罪名。奥兰宁亲王和哀格蒙特伯爵都是尼德兰上层贵族，原来彼此有嫌隙，后因在外来统治者面前的共同利益而走到一起。他们站在尼德兰平民与西班牙统治者的中间地带，一方面为西班牙国王服务，一方面又捍卫和要求自己的权利，因此，两个人都被女摄政和西班牙政府视为危险分子。接到报告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不满女摄政的宽容政策，派嗜杀成性的阿尔巴公爵赴尼德兰镇压起义。闻知风声的奥兰宁亲王极力劝哀格蒙特离开布鲁塞尔返回自己统领的州府，但哀格蒙特不相信西班牙国王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制裁自己，没有听从奥兰宁亲王的劝告，结果，奥兰宁亲王得以逃脱，而哀格蒙特则被阿尔巴公爵诱捕。哀格蒙特的情人、平民姑娘克莱尔辛呼吁市民们奋起反抗去营救哀格蒙特，但高压之下人们都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响应她的勇敢号召。克莱尔辛在绝望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哀格蒙特则被斩首。临刑的前一天夜里，哀格蒙特梦见克莱尔辛模样的自由女神把未来荷兰的国徽指示给他，并为他戴上了胜利的桂冠。

该剧中，哀格蒙特的政治悲剧是在与奥兰宁亲王的对比中突现出来的。比起哀格蒙特来，奥兰宁对自己的行动有更充分的自觉意识，他目光敏锐，头脑清醒，能深刻把握事物的本质。他看出尼德兰的利益和西班牙统治者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他只不过是被迫扮演一个效忠西班牙王室的人，而哀格蒙特却天真地认为自己真是那样的人，似乎丝毫也没想到自己的行为会给西班牙统治者留下异己者的印象。身为一个不可能完全成为统治者

合作伙伴的代表异族利益的人，哀格蒙特一直不切实际地希望站在一个中间者的立场上说话，扮演一个忠实的进谏者的角色。他把自己为西班牙王室所敌视的维护尼德兰民族权益的行为同时视为对西班牙国王的忠诚行为，幻想统治者把尼德兰人的利益视为西班牙王室的利益；他似乎完全没有认识到，在统治者眼中，任何一点对尼德兰人利益的要求都是要挖他们的墙脚，而他那种应由尼德兰人来统治尼德兰人的思想更是大逆不道。在女摄政眼里，哀格蒙特和奥兰宁都是抱着极大热望要取得摄政位置的人，而在哀格蒙特被捕的第四幕，从哀格蒙特与阿尔巴公爵的对话里，我们也确实更多地嗅出了哀格蒙特作为一个本质上的西班牙王室利益反对者的味道。实际上，直到最后两幕，哀格蒙特才开始接近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争取民族自由的英雄形象。在全剧的结尾，哀格蒙特激动地发出了这样的呼喊："不，这种血不是白流的。迈步前进吧！勇敢的人民！胜利女神引导着你们前进！就像大海冲破海堤一样，你们也这样去冲破专制的壁垒，让你们的洪流淹没他们，从他们强占去的基地上把他们冲走！……保卫我们的家乡！为了救你们至爱的亲人，照着我留给你们的榜样，欣然捐躯吧。"

席勒对哀格蒙特这一戏剧人物的评价中的某些话对我们的理解不无帮助，他说："在历史上哀格蒙特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在这部悲剧里他也不是。在剧中他是一个心地善良、愉快而坦率的人，同整个世界是朋友，轻信自己，轻信别人，自由，勇敢，好像整个世界属于他似的，诚实，遇事泰然，不管在哪儿，同时慷慨好义，和蔼可亲，雍容华贵，是一个有些夸口的人，有欲念和爱，一个快乐的普通人。……哀格蒙特有功名心，他追求一个巨大的目的，但这不影响他摘取他在路上遇到的花朵，不妨碍他夜间潜到他所爱的姑娘的身边……"

的确，歌德在剧本里给哀格蒙特赋予了很多人情味，也许正是这种对人情味的追求，导致了哀格蒙特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矛盾和混乱。在剧中，哀格蒙特的行动介于政治家和一个放荡不羁、无所用心的年轻快乐的骑士之间，当他思考判断问题的时候，他的思路明显带有非政治的个人色彩，这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女摄政的判断上：他过多地把她看作一个女性而非统治者，而当他只想着她对他甚至产生了爱情的时候，她却把他视为一个危险而使人厌恶、令人担忧的人物，把他视为一个摄政位置的觊觎者。不过，也许正因为哀格蒙特不是一个自觉主动的政治反叛者而是一个多少显得有些"无辜"的暴政的牺牲品，他的死才加倍激起人民对专制暴政的仇恨与反抗。这大概就是该剧在以后的德国反拿破仑民族战争中大受欢迎的原因吧。

作为一部戏剧作品，《哀格蒙特》的剧情设置与发展显然缺乏戏剧所需要的那种内部与外部的紧张与冲突。哀格蒙特与克莱尔辛慷慨陈词的高潮出现因缺乏铺垫而显得突然而生硬，哀格蒙特的思想发展更显得痕迹不清。剧情设置的严重缺陷导致整个作品缺乏起伏，进而导致早期演出的失败，直到贝多芬的音乐将那些因缺乏冲突而造成的漏洞完全掩盖、弥补为止。

尽管《哀格蒙特》比《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最终完成的时间要晚，但由于它体现出的强烈反暴政色彩，人们仍倾向于把它作为歌德狂飙突进时期的作品，而把《伊菲格涅亚》作为歌德向古典时期转变的标志。对此，我们可以从《哀格蒙特》最初初具规模的时间来考虑。歌德在 1787 年 11 月 3 日写给赫尔德尔的信中说，对于《哀格蒙特》，他只是完成了 12 年前所写的，并没有加以改写。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到枢密大臣歌德和狂飙突进歌德的差异给哀格蒙特这一形象蒙上的许多扑朔迷离的色彩：

……不，克莱尔辛，我不是那一个哀格蒙特。

……那个哀格蒙特乃是一个脾气不好的、倔强的、冷酷的哀格蒙特，他克制自己，时而要扮出这副面孔，时而要扮出那副面孔，世人当他快乐高兴，其实他是受罪、被人误解、被人牵累；他受人民敬爱，可是人民却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心意；他受群众尊崇和拥戴，可是对那些群众却毫无办法；他周围也有些朋友，可是他却不敢信任他们：他很少受人注目，可是那些人却想尽方法要来攻击他；他孜孜不倦，常常没有目标，大多没有酬报——呵，他是什么情况，他的心里觉得怎样，别让我对你说下去了。可这一个哀格蒙特，克莱尔辛，这一个却是平静的、坦率的、幸福的人，有一颗最高尚的心灵爱他、了解他；他也完全了解那一颗心而且以万分的爱情和信任把那颗心压紧在自己心上。这一个就是你的哀格蒙特！

当我们读到这段道白的时候，那个“快乐无忧、轻松的处理事务、逍遥放荡的度日”、把女摄政看成是一个无计可施的妇女的骑士哀格蒙特已经荡然无存了，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阴郁的、谨慎警惕的、一肚子苦恼和烦闷的枢密大臣歌德的憔悴面影。

无论如何，歌德终于在1787年6月至9月间把这部一再拖延的作品写完了。9月5日清晨，歌德给一位朋友激动地写信说：“我必须在清晨给你写信，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节日的清晨，因为今天《哀格蒙特》算是真正写完了。”

思归

除《伊菲格涅亚》和《哀格蒙特》外，歌德在意大利没有写出其他完整的作品，《浮士德》增加了《魔女的厨房》和《森林和洞穴》两节，《威廉·迈斯特》增添了一些材料，《纳乌西卡》只写出了两场，而《塔索》的完成也要等到1789年。不过，在意大利，歌德寻访了塔索监禁处的遗址，参观了塔索的墓地，仔细研究了塔索的半身像，在即将返回魏玛时，又读到了塔索的传记，从而实际上完成了全剧的构思。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歌德开始想返回魏玛的。不过，在歌德与魏玛朋友们的通信中，他总在不断地提到自己的返回，他的信中时常出现这样的话——“请爱着我并等着我，我会高高兴兴地回到你的身边。”当然，当歌德写这些话的时候并不妨碍他一再向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申请延长假期，而对他的请求，公爵也都慷慨予以准许，并照常不误地给他发放薪金。也许，卡尔·奥古斯特乐得没有人总是在他面前反对他对战争的狂热，也许他是真心理解歌德的处境并支持歌德的选择。歌德在1788年1月25日写给卡尔·奥古斯特的信中曾这样回顾性地强调了自己到意大利旅行的必要性：“我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医治我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在德国它折磨我，并且终会把我变成个废物。”而在给施泰因夫人的信中，歌德也毫不避讳地写道：“像近几年的生活，我宁愿去死。”

然而无论如何，歌德的这次意大利之行都像是一场赌博，一次冒险的突围，无论从政务上看还是从创作上看都是如此。对歌德来说，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我只有一次生命。我把它押在一张牌上，全部地、毫无保

留地。尽管这样，我还是要继续往上押。只要我的肉体和灵魂能够不变得有害，只要我的天性、我的精神、我的幸福能够合起来克服这场危机，我将把一切能够拿出来赔偿的东西都赔偿给你。如果我毁了，那又怎么着，就让它毁了吧。反正我已经没有任何用处。”①

这场赌博看来歌德多半已经赢了，他的精神获得了解放，而他的君主并没有抛弃他，依然在充当他的保护人。然而不安却在日益增长，尤其当那种获得解放的感觉已让人习以为常并成为又一种稳定不变的东西的时候。

歌德来意大利已经一年多了，这段时间他大多住在罗马，也去了拿坡里和西西里。尽管从 1787 年 6 月由西西里返回罗马到 1788 年 4 月离开罗马回国这段时间里歌德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创作高峰期，他似乎仍觉得魏玛的环境更有利于他的创作，尤其是当他打定主意回魏玛后将主要精力用于从事科学研究和创作而放弃其他烦琐政务的时候。在上面提到的歌德写给公爵的那封信里，歌德极其谦卑、诚恳地向他的君主表示感谢，并进一步巧妙地提出了自己的职务上的要求：

> 我多么感谢您给了我这宝贵的悠闲。从年轻的时候起，我的心一直有着这些爱好，除非我达到这个目的，我的心永远不会得到安宁。我跟职务的关系根源于我同您个人的关系，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让一种新的关系从旧有的关系中产生出来吧。我可以确切地说，在这一年半的孤独生活中，我重新发现了我自己。我是什么呢？是个艺术家！除

---

① 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9 月第 1 版甘木等所译德国艾米尔·路德维希之《歌德传》第 233 页。

此我还能是什么呀！您将能够做出判断，给予使用。让我在您的身边尽力吧。我已看到这次旅行给了我什么好处，它是怎么使我身心清澈、照亮我的前途。您到目前为止一直对我十分宽容，所以在将来也请多多关照。您给我的恩惠超过我能够做的，也超过我能够要求的。我已经见识了这个世界的一大部分美丽的地方，最后，我仍只希望和您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你们中间。是的，如果您让我做只有我做得了的事，而把其它的事让别人去做，我将对您更有用，胜过我以前所做的一切。

歌德在意大利期间，他的工资都由他的仆人兼秘书菲利普·赛德尔代他领取，在他最初远走意大利时，也只有菲利普一人知道他的去向和通讯地址。菲利普不断给歌德写信，详细地向歌德讲述魏玛发生的一切，通过菲利普，魏玛的一切扰攘都传到歌德的耳朵里了。对歌德的长期居留国外，魏玛宫廷里议论纷纷，不少人对公爵给歌德的厚遇极为嫉妒、不满，抱怨歌德长期休假，不干活却照常拿俸禄。当时已在魏玛的席勒在给朋友克尔纳的信中这样描述魏玛当时的情况：

“可怜的魏玛！歌德什么时候回来没有肯定，此地很多人认为，他肯定永远对他的所有职务不闻不问了。当他在意大利绘图作画时，那些福伊特们和施米特们[①] 必须像牲口一样操劳。他一事不干，在意大利浪费他那1800塔勒的俸禄，他们只拿一半的钱，却干着两倍的活。”

席勒的话歌德未必会知道，但魏玛的议论他肯定不会毫无所闻，所有这些都增加着歌德的不安，他不知回国后会面对一些什

① 如同汉语中所说张三李四们。

么样的面孔。在意大利期间，歌德写给施泰因夫人的信极少，甚至有半年的时间他没给施泰因夫人写过一封信。初踏旅途的时候，歌德每天都为施泰因夫人记日记，但施泰因夫人却只字不给他回。快到罗马的时候，歌德在给施泰因夫人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些绝望的话：

“和你一道生活了九年，成为你的心爱的人——可突然间，觉得自己置身于孤独和陌生的世界中。我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我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决定，是出于一种最大限度的必要性，就让我们的生命一道结束这唯一的想法来维系住我们吧。”

施泰因夫人想向歌德要回过去她写给他的那些情书，这使歌德非常伤心：“莫非，这就是你对一个爱着你的、而又长久期待着从你那里得到哪怕是一个温存的字眼的朋友所说的话？我不想告诉你，你的信撕碎了我的心。……你打算沉默吗？你想从我的手里夺走你爱情的证据吗？不，你做不到这一点，不要这样残酷地折磨自己吧。我是造成这场痛苦的罪魁祸首。但，也许，你的信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它已经朝我飞来，为的是拯救我，安慰我；也许，你已经接到我的日记？请求你，跪着请求你，容许我回到你的身边，别让我永远当一个漂泊异邦的逐客。宽宏大量地宽恕我在你面前犯下的罪过吧！把我扶起来……不要认为，我已经离开你。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你，代替你在我心中的地位。要知道，我曾经为生存、也为死亡而战斗过，没有任何言语能够描述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只有毁灭才能促使我实现自我复归。”

我们很难说这段充满恋慕与炽热情感的文字完全是出于矫情。不错，这种对于施泰因夫人的热情的喷发在歌德来说已越来越少了，但它并没有消失，而只是凝结成了岩石。这岩石不是一块碎小的石块，而是一个巨大的岩层，从歌德的情感一直延伸到

他的思想，成为他的灵魂土地的一部分。当席勒在魏玛见到施泰因夫人时，他给朋友克尔纳写信说："她确实是一位富有特性的有趣人物，我很了解歌德为什么那样依恋着她。她说不上漂亮，不过她的脸上有一种温柔端庄的表情，流露出相当独特的坦率。她的性格中具有健康的理智、真实的感情。她从歌德那里收到一千多封信，在意大利，他每星期都给她写信。大家说他们的关系是完全纯洁的、无可指责的。"外人的评说总是隔雾看花，但这段话再次提醒我们注意施泰因夫人对歌德的吸引力中的精神本质。的确，歌德想从那种给他带来无穷烦恼的过于紧密的肉体关系中解脱出来，但也仅此而已，他仍需要保持和施泰因夫人的精神关系，需要施泰因夫人的那从一个高级的心灵里穿射出来的温柔目光的注视；他之所以远走意大利，是希望重新调整和施泰因夫人的关系，而并不是想斩断这种关系，正如他从魏玛宫廷逃脱出来，只是希望以另一种身份再回到那里，而不是想要弃它一样。

歌德天生就不是像卢梭那样的流浪者，魏玛像地心引力一样吸着他，他在那里已经拥有的一切在召唤他回到旧有的环境中去。但当他走向这些召唤的时候，他又要躲开哪些悬崖，避开哪些石头呢？施泰因夫人又会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些问题，使歌德一想起要离开罗马来就感到心中困惑。

1788 年 3 月 17 日，歌德接到了赫尔德尔催他回国的来信。赫尔德尔至今仍是歌德在魏玛最知心的朋友和精神上的对话者，也是他在政治上的同盟，在意大利，歌德只在给赫尔德尔一人的信里才倾吐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而对施泰因夫人，他则隐瞒自己一切有关未来的计划，对公爵，他也只是请求、饶舌和善意地嘲讽。

歌德终于决定离开罗马了，这种念头使他黯然神伤，39 岁

的他竟像个孩子一样接连许多天都不停地哭泣。歌德的眼泪是复杂的，里面凝结着过去，也隐含着未来。意大利之行是歌德人生旅途上的重要里程碑，无论他为此付出多少感情，都不能算是过分。临行的前夕，歌德在德国女画家安格莉卡·考夫曼的花园里种了一棵意大利松，当他已回到德国边界的时候，他还写信给已去罗马的赫尔德尔，让他打听这棵小松树，并且在信中把在意大利度过的日子称为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歌德 4 月 22 日离开罗马，归途经过佛罗伦萨时，他写完了《塔索》第五章的最后一场。

第六章

成熟的人

朝圣者归来

“我不知道我随身带回来的东西会不会让您感到愉快。”这句给克内贝尔信中的话代表了歌德返回魏玛途中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尽管如此，歌德的心里对早日返回魏玛仍然充满热切的向往。就像一个久在海上漂泊的旅人渴望陆地一样，他渴望回到旧有的环境中去，或者确切些说，他渴望尽快将新的计划在自己已经适应了的旧环境中开始实施。过去，他的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被政务搞得七零八落，今后，他要专心致力于此，不错，他已经 39 岁了，然而，“对于所有人来说，我已经老了，惟独对真理例外……没有比真理更伟大的东西了；就连最微小的真

理，其中也包含着伟大。我是多么高兴，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真理。”① 他在2月22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孜孜不倦，欢悦非常，也这样地期待着未来。我一天比一天清楚，我本来就是为诗歌艺术而生，在下一个10年，我还能尽力去训练这种才能，可以写出一些好的东西，因为青春之火使我无须花很大的力气就能成功。”歌德已恳求公爵给他另行安排工作，现在，他要在新的真正属于他的领域里大展宏图的愿望绝不亚于当年他投入到魏玛政治激流中去的时候。

1788年6月18日，歌德抵达了阔别近两年的魏玛，回到了他的恩主、朋友和敌对者们中间。正像他当初所担心和预感的那样，他没有享受到什么返“乡”的快乐。包括施泰因夫人在内的魏玛宫廷对他的归来持暧昧的冷淡态度，给他那兴致勃勃地向人们讲述意大利见闻的热情泼了冷水。他很快就感到大家似乎都已不再需要他了，他似乎已成为多余的人。他不由像孩子一样地抱怨道：“……朋友们不安慰我，不重新把我拉在身旁，而是把我置于绝望之中。我对远方的几乎是不熟悉的事物的狂喜，我对失去的这一切所感到的苦恼和怨尤，都像是使他们受到了侮辱，我失去了任何人的关心，没有人懂得我的语言。”

很长一段时间，歌德没有任职，事实上，没有人向他提起这件事，即使当他主动询问起伊尔美瑙矿山情况的时候，人们也常常答非所问。他去得太久了，事情总得有人去干，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没有他了，一切都按部就班，魏玛似乎没有什么非他不可的事情，甚至连文学似乎都不需要他来增加光荣，因为时代的光荣正归于新到魏玛的席勒。现在，歌德倒仿佛成了《塔索》中的

① 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甘木等所译德国艾米尔·路德维希之《歌德传》第260页。

首相安东尼阿，“满头大汗，辛辛苦苦地回来，在暮色深沉时，想在渴念的树荫下好好休息，以应付新的劳苦，却发现那个树荫已被一个懒汉占领，难道在他的胸中不该激起一种人之常情?”

在歌德离开德国的两年里，德国文坛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的时代精神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事实上，自从歌德进入魏玛时起，他就已经开始脱离仍在持续发展的狂飙突进运动，退化为时代文学的一个旁观者了，意大利之行，似乎更加重了这一事实，使他在人们眼中越发显得有些学院气、老古董。他已和自己的时代、国家分离，掉进了希腊、罗马古典艺术的致命诱惑之中。这诱惑对他来讲是多么甘美，多么深沉！从对他以后 40 多年的影响来看又是多么持久！多么富有成效！但德国大众的热烈呼吸达不到这样高的琼楼玉宇，这样远的庙台亭阁，他们需要《强盗》，需要《堂·卡洛斯》，却不需要《伊菲格涅亚》，不需要《塔索》。歌德旧有的尊荣、地位，还有公爵的恩宠，这一切，表面上似乎都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他不再感觉到人们对他的渴求与企盼，每个人面孔底下的面孔仿佛都在向他发出疑问：你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重新回到这个你曾丢弃了的地方？

歌德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和苦恼之中。他为什么要回来？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对他来讲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换句话说，他从来都没有一刻放弃过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和了解以及对不同生活环境的有意或无意的比较，这种比较使他不必集中思考便能得到自己的答案。舍普夫林的榜样仍在眼前，难道要他像莱辛那样穷困潦倒，在普鲁士将军秘书、公爵私人图书管理员这样的卑微职位上终此一生吗？或者像卢梭，默默死在老病孤独和自己无力防卫的敌对者的攻击、诽谤之中吗？哪里还能找到像魏玛这样适合他的环境呢？在魏玛，他可以不辞而别，事后才以一纸书信向君王交代原委；在魏玛，他可以将枢密顾问、军备大

臣、筑路大臣和会计长官的工作弃置到不顾，以到一个遥远的地方长期休假来重新调整自己，任由他人叫苦连天、嫉恨不已，也难使君王对他加以半点责难。在卡尔·奥古斯特的庇护下，他享有别人难以企盼的自由和殊遇，加上他的威仪和震慑力，几乎任何攻击都难伤到他一根毫毛。“是你自己让我有权轻视你!”说此话的安东尼阿和他所训斥的塔索加在一起才是那个使首相弗里奇都甘拜下风的诗人歌德。不错，这个他享有特权的邦国只不过是德意志诸国中的一个小邦，而且也只不过在德国稍显文化兴隆，但这难道还不够吗？他不是一个需要以世界为家园的浪迹天涯的人，他需要的只是来自远方的精神食粮和间或到远方去换换空气；他不是卢梭，也不是拜伦，他需要职位、薪俸、住宅，需要舒适安定的生活，况且在魏玛，他仍有自己的崇拜者，尽管数量不是那么太多。这样，他为什么不回来呢？即使人们不像迎接一个刚从卡皮托尔山戴上桂冠的诗人一样来欢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公爵对他有可靠的恩宠，而且现在看来仍没有什么变化，难道因为其他人不高兴他就得被迫离开这里，将自己 39 岁的前程托付给虚无缥缈的未来吗？不，要走，也是他们，轮不到他。多少年来，他在这里顽强生长，已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一样扎下了难以轻易撼动的牢固根基，从他在海德堡被武官的急信追回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他选择的是哪条道路。

歌德迅速安定了下来，一个多月后，他已全力投入了新生活的建设中。卡尔·奥古斯特给了他充分的自由，免除了他除矿务总监外的大部分职务，让他担任艺术与科学事务总监，主管高校、剧院、美术学校、图书馆和科学研究机构。歌德提出了一个口号，要把魏玛变成第二个佛罗伦萨，为此，他聘请了在罗马时结识的瑞士画家约翰·海因利希·迈耶尔来魏玛做他的艺术顾问，还撤换了耶拿大学的一部分教授，起用了一批拥护和推行他的关

于艺术必须有崇高风格的美学理想的新人，席勒、年轻的哲学家谢林、费希特等都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为了把学者、艺术家们团结到自己身边，也为了及时交流学术思想和艺术经验，歌德还于1791年9月9日成立了“星期五协会”，让学者、艺术家和普通的科学艺术爱好者们每周聚集一次，宣读报告，互相切磋。在协会成立大会上，歌德发表了旨在推动学者和艺术家们交流合作的演说，呼吁打破自我和派别的狭隘观念，在开诚布公的交往中使自己同时也使事业受益。

所有这些，都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一个新的歌德，他和那个在斯特拉斯堡饭桌团体里的歌德更为相似，而和魏玛前十数年中贵族圈子里的枢密大臣迥然不同。作家与科学工作者的相互交往，个人创造与全民族文化的联系，这些对歌德来说决不是突然产生的陌生的思想，只是在魏玛前十数年中，他从未这么渴望与外界交流，从未这么热情洋溢地把它说出来罢了。那时他另有目标，在政务繁忙之中，他将自己束缚在了一个特定领域里，爱情的烦恼更使他很少有轻松愉快的心情投入与更广泛的世界的联系，不知不觉之中，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已成为一个束缚在茧中的蛹，完全陷入了心理与外在的孤独之中。

意大利之行使歌德焕发了生命活力，对新事业前景的展望更使他迫切地想达到初期的目标。他不断向公爵申请科学和艺术研究经费，不断在茶会、舞会、音乐会上寻找朋友、听众和合作者。当年，在公爵和贵妇中兜圈子的他曾一想到要在自己家里举办的茶会就头疼不已，而现在，他精力勃勃，兴味盎然，甚至邀请同事在夜里十一点或早晨六点去他那里交谈。现在，在他的朋友圈子中，更多的是著名学者，尤其是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洪堡和威廉·洪堡两兄弟已日益成为他的亲密朋友。这些学者和科学家们都集中在耶拿，因此，他经常到耶拿去，在那里与他的

被领导者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也在那里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对色彩学、光学、骨学、矿物学、植物学甚至电学的研究如今已成为他日常活动的重要内容，他会在清晨踏着积雪与费希特、洪堡兄弟及迈耶尔一起去解剖所，会为研究光学在家里特别建一间暗室；他孜孜不倦地研究颜色学，向牛顿的色彩理论挑战，他把自己对植物学的多年研究成果写成了《植物变形记》……

从意大利初返魏玛的歌德，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花去了比创作更多的精力，从1788年6月返回魏玛到1794年与席勒合作，在这期间五年多的时间里，歌德的新作品只有诗歌《罗马哀歌》、《威尼斯警句》、《列那狐》及剧本《塔索》、《平民将军》、《大科夫塔》及《受鼓动的人》（又译《激动者》或《叛乱者》），此外还发表了《浮士德片断》。其中，重要的作品除《浮士德片断》和《塔索》外，只有组诗《罗马哀歌》和《威尼斯警句》，在这两组诗里，歌德怀着热烈的激情赞美了他的新“缪斯”——平民姑娘克里斯蒂安娜·符尔皮乌斯，为我们展示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次重要的爱情经历，这次爱情最终导致了婚姻，也导致了歌德生活中的又一次围城。

“年轻的狄俄尼索斯”

1788年7月12日清晨，刚从意大利回魏玛不到一个月的歌德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花园别墅附近的公园里散步，一个长着栗色卷发的年轻姑娘迎面向他走来。

她看上去20岁左右，穿着普通人家姑娘的漂亮衣裙，映衬出光滑的皮肤和红润的面孔，使人一望而知她的平常出身、出门前的用心修饰和身体的健康。这个姑娘表情活泼，尽管这会儿有点紧张、局促，一双炯炯闪烁的大眼睛躲在深深的眼眶和双眼皮

里，就像牧神在丛林中悄悄向外探望，那挺直的希腊式鼻子，微翘的圆满的下巴，使居于二者之间的两片柔软丰润的嘴唇显得格外动人，仿佛一只盛满琼浆玉液的酒杯，从以后歌德为她画的素描头像看，除了女性的柔和秀丽，她那端正脑袋上的面孔还有一种男童的英俊之美，活像希腊雕塑的临摹品。然而在她身上还有一种使这一切显得真正活跃和更具吸引力的东西，那就是她的骨子里似乎隐藏着一种很容易使人深受感染的世俗享乐的单纯气息。面对着这个如清晨的空气一样新鲜的姑娘，歌德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罗马，真实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爱的需要。他不仅答应了姑娘为她哥哥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符尔皮乌斯——一个毕业于耶拿大学的未来强盗小说作家的求助，任用他做自己植物学研究的助手，而且很快与这姑娘成为情人，为她也找了个她很乐意的新的安身之处——开始他把她带到他的花园别墅中，后来她便和她的亲人一起搬进了弗饶恩普朗附近的歌德府邸。

亲爱的，你这样迅速地委身于我，别后悔！/相信我，我不会当你厚脸皮、卑贱。/阿摩的箭有多种作用，有的擦伤人，/用慢性的毒使人心长年受苦。/也有的饰着劲羽，刚磨得非常锋利，/会射穿骨髓，使血液立即沸腾。/在英雄时代，男神和女神互相爱慕，/一见就钟情，一钟情就寻欢作乐。/你认为，爱神在伊达林中爱上她的/安喀赛斯时，她曾三思而行？/如果路娜不赶紧去吻美貌的睡客，/奥洛拉就会嫉妒地急忙唤醒他。/赫洛在大会上看到勒安德洛斯，/后者就敏捷地跳进黑海的海波。/公主瑞阿·西尔维亚到台伯河边/去打水，神就一把将她抓住。/马尔斯就这样生下儿子！——双生子受母狼/哺育，罗马自称为世界女王。

——《罗马哀歌》

这个被哲学家叔本华的母亲形容为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姑娘，就是23岁的纸花厂制花女工、一个已故档案管理员的女儿克里斯蒂安娜·符尔皮乌斯，18年后，当她41岁时，终于正式成为歌德的合法妻子。

很难说当歌德把克里斯蒂安娜领回家并与她发生亲密关系的时候有什么长远的打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当时从心底里喜欢这个姑娘，并且越来越感觉到这种喜爱的加深以及这种喜爱对自己的意义。克里斯蒂安娜是一个天性原本快乐现在更加快乐、头脑原本单纯现在更加无忧无虑的姑娘，她对歌德给她的爱心满意足，一天到晚像只蜜蜂似的在歌德的大房子里飞里飞外，将四处都摆弄得井井有条，要么就与歌德喝酒、唱歌、跳舞，笑起来总是那么爽朗、那么开心、那么透着一股傻呼呼的聪明劲。的确，克里斯蒂安娜虽然没有太多的文化，但确实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女子，她感受到自己的青春对歌德的吸引，为此而高兴并洋洋自得，但同时她又对这个日常总是衣冠楚楚的魏玛宫廷大臣从心底里感恩，并懂得将这种感恩及时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出来。毫无疑问，克里斯蒂安娜爱歌德，并且尊敬他，她不仅以自己青春的爱来吸引他，还以自己的感恩来愉悦他、满足他、安定他。在夏绿蒂、丽莉、施泰因夫人和其他宫廷女性面前，歌德始终是一个时刻准备为女主人效力的精神抖擞的骑士，而在克里斯蒂安娜面前他却开始成为一个国王。对歌德来说，克里斯蒂安娜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情人、一个女管家、一个会给他生儿育女的媒介，更是如今孤独而成熟的他的独立王国里的一个臣民，一个属下，一个壁垒中紧密的同盟者。他不知道她是否忠诚，但他觉得他能使她忠诚，因为他能满足她所需要的一切，她的目光中流露出来的心意他总是一望即穿。歌德迷醉于克里斯蒂安娜的身体，迷醉于她的简单的心灵，迷醉于她活跃的青春带给他的房间

和花园里的一切。

作为低层社会出身的女子，克里斯蒂安娜和弗里德莉克相比是幸运的，她的幸与弗里德莉克的不幸出自不同时期歌德的不同心态：默默无闻的歌德渴望环绕着上层女子的荣耀，而作为欧洲著名作家、魏玛要臣，歌德本身就是荣耀，他可以使自己心爱的人与他分享——如果不能分享荣耀本身，至少可以分享荣耀带给他的许多好处 。

然而克里斯蒂安娜不仅分享到了与荣耀相伴的好处，也充分品尝到了这种荣耀带给她的打击与伤害。

1789 年 2 月，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的歌德情人的秘密被施泰因夫人的小儿子弗里茨偶然发现了。一时间，枢密顾问歌德和一个穷困潦倒的已故档案管理员的女儿的故事成了魏玛上流社会的头号新闻。魏玛宫廷的妇女们，尤其施泰因夫人，感到自己的尊严被严重伤害了：一个不算什么美人而且喜欢喝酒作乐的女工竟然在歌德的家里扮演起了主妇的角色！一个和上流社会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什么艺术修养的女子竟被一个自视为魏玛精神领袖的特封贵族珍爱地金屋藏娇、瞒过众人这么多时日！看他半年多来兴致蛮好的样子，却原来他的快乐的源泉并不在上流社会的客厅里，而是来自他的别墅花园！

这些百思不得其解的愤愤不平的贵夫人们，她们无法懂得歌德的需要，无法看穿这随意而又必然的选择里所隐藏着的深刻秘密。

歌德从意大利回魏玛后，施泰因夫人把歌德旅行时寄给她的日记全部退还给了歌德，而且一直对歌德保持冷淡、矜持的态度。在她与歌德 10 多年的交往中，她始终没有放下她的架子，也放不下她的尊严，当她的感情受到伤害后，她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尊严，甚至来不及深深地沉入痛苦中去。也许她太聪明了，一

眼就认定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歌德再挽留住了，也许她太高傲了，得不到全部的东西就干脆放弃。她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歌德：他们之间的距离加大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已不可能再恢复。

当歌德看到那一页页退回的日记时，他真恨不得把它们丢进火里，直到20多年后，他才把它们从抽屉里拿出来加以整理。歌德所想的只不过像施泰因夫人当初对他所想的一样，保持纯洁的友谊，在《塔索》里，他让塔索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早就认识这种友谊的专制，它在一切专制之中，似乎使我最难忍耐。"从本质上说，是施泰因夫人的专制赶跑了歌德而不是她的年龄赶跑了他。从歌德来讲，他从亲密朋友和知音的角度仍对施泰因夫人抱有深刻的感情，不愿意轻易地失去这位"欣悦的灵魂"的友谊和情感，但从一个男子的变化了的意志来说，他则终将摆脱她的兼具母亲和情人双重身份的罗网，他已再难在她的树荫下扮演一个不听话的孩子的角色，他已不再是儿子和儿子似的情人，而将是父亲，丈夫，过独立的、别人无权干涉的生活，如果他必须依然吮吸乳液，那也将是一个真正的情人的乳液，——她是女性，而且除了女性，什么都不是。

正因为歌德与施泰因夫人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两人在魏玛宫廷里引人注目的地位，歌德的新情人和魏玛宫廷的任何一点瓜葛都会把歌德拖到更为复杂的人事关系里去，给他带来无穷的烦恼。对于现在的歌德来讲，一个魏玛宫廷的女子——不管她做他的妻子还是她能够委屈自己、甘做他的管家和情妇，就像埋在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就像一扇永远关不上的窗户带不上的门，会给他的独立和宁静带来威胁。现在，他要独立，他要和这个差不多已抛弃他、对他的归来持冷淡态度的魏玛宫廷划清界限，他的行为就是他表明自己毫不妥协的意志的无声的宣言和挑战。

施泰因夫人最明显地意识到了这种挑战。当她以冷冰冰的态

度拒归来的歌德于千里之外的时候，她仍在拭目以待，没想到，她等到的，却是这样一个连对歌德知之颇深的她也极感意外的消息。一趟意大利之行竟将一个多年来一向谨小慎微、极为尊重等级差异和魏玛的宫廷趣味的枢密大臣变成了一个破坏习俗和法律、甘以低贱女子为生活伴侣的流浪汉，这确实是她未曾想到的。她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住，她病倒了。被践踏的自尊心、被刺痛的爱心、顽固的阶级意识，这一切都鼓动起她心头的怒火，她失去了往日清明的理性和睿智，以毫无风雅的态度四处攻击她的情敌并极其愚蠢地在公开场合使歌德陷入难堪、尴尬的境地。

挣脱施泰因夫人的束缚，这是歌德愿望，但得罪施泰因夫人，却不是歌德的初衷，他忍受着，出于礼节，出于对施泰因夫人心境的体谅，也出于种种关系的考虑。他恳求施泰因夫人重新给予他信任，“用一种自然的观点看待已经发生的一切”，但施泰因夫人却写了一个充满复仇情感的剧本《基多娜》来作为对他的恳求的回答。忍受似乎要无限制地延长下去，而且它的强度似乎也在不断加大：“……你直到现在对我的做法，令我不能忍受。我说话，可你对我紧锁双眉，我需要关怀，可你对我不理不睬；我为朋友出力，可你对我冷酷漠然、漫不经心。我的任何表情你都要加以控制，我的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加以斥责，总是使我沮丧、尴尬。……”

终于，歌德决定以取舍来结束这折磨人的一切，他选择了已有身孕的克里斯蒂安娜：

> 我常常误入歧途，而又归正，但并不/更开心；如今这姑娘是我的欢乐！/这即使是错误，较聪明的神，请保护我/等到达冷波的河边才让她离去。
>
> ——《威尼斯警句》

在这里，歌德为他对克里斯蒂安娜的选择的正确性留下了商讨的余地，但他并不想放弃自己的选择，而且相反，似乎为了更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宣称要永远让克里斯蒂安娜陪伴他。

6月8日，歌德给施泰因夫人写了一封绝交信，彻底结束了他们10余年的交往，从那时起，足有5年的时间两人互不来往，直到1794年，歌德才与施泰因夫人恢复通信联系。

《托夸多·塔索》

歌德在1827年5月6日与爱克曼谈到《塔索》时说："观念？我似乎不知道什么是观念！我有塔索的生平，有我自己的生平，我把这两个奇特人物和他们的特性融会在一起，我心中就浮起塔索的形象，我又想出安东尼阿的形象作为塔索形象的散文性的对立面，这方面我也不缺乏蓝本。此外，宫廷生活和恋爱纠纷在魏玛还是和在菲拉拉完全一样；关于我的描绘，可以说句真话：这部剧本是我的骨头中的一根骨头，我的肉中的一块肉。"

"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的说法出自《圣经·旧约·创世记》，《创世记》第二章记载：

>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和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歌德用“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来比喻《塔索》对他的价值，可见他对这个剧本的感情不同一般，但这种感情与其说是因为歌德在该剧本中反映了自己在魏玛宫廷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感情纠葛，不如说是因为另外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可以说，不读《塔索》，就不能真正理解进入魏玛后的歌德，也不能真正理解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对歌德作出的那段著名的评价：

> 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能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弄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塔索》从 1780 年开始构思、写作，最终完成于 1789 年，其间的意大利之行对《塔索》的最后形态和诞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意大利，歌德不仅参观了与塔索有关的历史遗址，还获得了包括塔索传记及传说在内的大量材料，从而在 1788 年 3 月最终确定了全剧的构思。

诗剧共分五幕，故事情节非常简单：16 世纪意大利的菲拉拉郊外的贝里瓜多别墅的花园，宫廷诗人塔索将自己刚刚完成的代表作品——长篇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献给了他的保护人和恩主——公爵阿尔封索二世和公爵的妹妹列奥诺拉公主，公爵让公主将她刚刚亲手编制的月桂冠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石像上取下，给塔索戴在了头上，使塔索深感受宠若惊。这时，大臣安东尼阿（或译为安东尼俄）出使罗马归来，恰巧看到了塔索头

戴桂冠的情景，心中妒愤不平，对塔索恶语相讥。在公主的示意下，塔索主动去找安东尼阿表示友好，但安东尼阿不仅没有被感动，反而变本加厉地贬低塔索，使塔索愤而拔剑要与他决斗。公爵适时赶到，他不细加体察塔索的心境和情感，虽然也训斥了安东尼阿，却把塔索关了禁闭，这使塔索陷入惶惑、怨艾之中。深谙塔索性情的公主非常为塔索的精神状态担心，她听从了暗存私心的伯爵夫人的计策，同意让塔索暂时离开菲拉拉外出旅行。塔索听了伯爵夫人的劝说后，并不认为公主是为他着想，他开始怀疑公主对自己的感情，陷入到了更深的绝望之中，安东尼阿来向他表示友好和挽留他也愤然拒绝。公主来向塔索辞行，言谈中，塔索了解了公主对他的一片真情，激动中忍不住拥抱了公主，公主匆匆逃开，公爵则下达了抓捕疯子塔索的命令。剧终，公爵和公主乘车离开了别墅，只有安东尼阿对塔索给以劝慰，诗人和廷臣终于达成了和解。

总的来看，《塔索》是一部歌德自我阐释的剧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歌德把它视为自己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剧中，安东尼阿和塔索分别代表歌德人格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愤世嫉俗的诗人，一个是脚踏在世俗社会里的大臣，前者感情纯真，思维单纯，容易在冲动中落入他人设下的罗网，后者老谋深算，处世老练，善于在不动声色之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当安东尼阿向塔索发动恶毒的攻击时，他便不再只代表尘俗原则，也代表魏玛敌视歌德的势力。歌德通过两个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对比向我们展示出了他对宫廷生活的深刻认识：塔索作为一个诗人看似在公爵心中的地位非常尊贵，实际上却毫无尊严保障，甚至连为自己辩白的机会都没有，他周围的人各个心怀深机，但他却既看不透其中的奥妙，更无力与众人相周旋，在剧中，他既是为安东尼阿所害，也是为想独得他青睐的伯爵夫人所害，甚至连自始至终都对

他怀有爱情的公主，也最终成为他灾难而非幸福的来源。

歌德深知塔索不幸命运的根源，他靠双重性格在生活中成功地避免了塔索的命运，但这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只有具备特殊感觉的人，才可能成为最冷静、最坚定的人。他不得不穿上坚硬的铠甲，为的是保护自己免受不文明行为的伤害，但这副铠甲也渐渐成为他的负担。"① 只有俗人能够抗拒俗人，这就是歌德在生活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他在生活中牢记这条教训行事，又在《塔索》中进一步对自我进行探索并进行自我辩护：为了保护他身上的塔索，他必须同时具有安东尼阿的素质，当环境不能给塔索提供保护的时候，他只能变成安东尼阿——诗人与大臣和解——来进行自我保护。当我们正视到这一点时，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地责备歌德具有庸人的特点，怎么能不在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中感到诗人人生的酸涩与悲剧性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谨慎的法兰克福市参议员的儿子，就没有活到83岁高龄、写出巨著《浮士德》的诗人歌德，庸人和天才在歌德身上既相互矛盾、损害，又相互依存、支持，没有天才，歌德只是个庸人，而没有庸人，天才可能根本就不会走完自己本能达到的目的地，塔索如此，屈原亦如此。

作为一个剧本来讲，《塔索》显然极为缺乏情节的外在冲突，内在张力也未达到一定强度，以至于黑格尔说它根本不是戏剧。然而，从对塔索的内心世界的刻画和对人物关系的把握而言，该剧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大概是像歌德所说，是因为剧中的事情没有一件是魏玛不曾有的缘故吧。此外，作为一部诗剧，剧中人物的道白都极为优美，显示出歌德炉火纯青的高度诗歌技

---

① 转引自艾米尔·路德维希著、甘木等译之《歌德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523页。

艺，使该剧成为德国古典时期戏剧中的花冠，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真理与谬误

“如果我没有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辛勤努力，我就不会学会认识人的本来面目。在自然科学以外的任何一个领域里，一个人都不能像在自然科学里那样仔细观察和思维，那样洞察感觉和知解力的错误以及人物性格的弱点和优点。一切都是多少具有弹性、摇摆不定的，一切都是可以这样或那样处理的，但是自然从来不开玩笑，她总是严肃的、认真的，她总是正确的；而缺点和错误总是属于人的。自然对无能的人是鄙视的；她对有能力的、真实的、纯粹的人才屈服，才泄露她的秘密。”

“我毫不追悔，尽管我在这门学问上已费了半生的工夫。要不然，我或许可以多写五六部悲剧，不过如此而已。在我之后会有足够多的人来干写剧本的工作。”

“他有一天对我说：‘我自己在许多不属于我本行的事物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一想到维迦写了多少剧本，就觉得自己写的诗作实在太少了。我本来应该更专心搞自己的本行才对。’另一回他又说，‘假如我没有在石头上浪费过那么多的功夫，把时间用得节省些，我就很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

以上三段话分别引自1829年2月13日、1827年2月1日以及1825年4月20日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从老年歌德对自己半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矛盾评价里，我们明显感觉到了作家歌德与科学研究者歌德的相互影响和冲突。

从回到魏玛到与席勒合作之前这五年的时间里，歌德将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他这段时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

面：植物学和光学。就像寻找“原石”一样，歌德一直想找到“原植物”。第一次去意大利旅行时，他从棕榈树的形状产生了这种想法，进而开始了植物形态发展变化的研究，并于1790年写成了《植物变形记》。在歌德看来，“叶”是植物世界的基础，植物的各种器官都是由“叶”逐步发展变化而成，是它的变异，而不同的土壤、气候、环境又使这种变异多姿多彩，纷繁复杂，从而形成千差万别的不同植物种类。在这方面，达尔文的祖父得出了与歌德类似的结论。

同样，歌德认为在动物界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即也有一种类似于“叶”的原形态存在。第二次去意大利时，有一天，他和仆人在威尼斯的一处公墓散步，仆人从地上捡起了一块颅骨，以为那是人的骨头，笑着把它递给了歌德。歌德立刻就看出这块骨头不是人的颅骨而是一个已经绝种了的绵羊的颅骨，它由九块骨头构成，通过对这块绵羊颅骨的研究，歌德得出了动物骨骼是由椎骨发展而来的结论，也就是说，在歌德看来，动物身上的任何一块骨头在本质上都是椎骨的一部分或一个片段。

通过自己的研究，歌德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统一的种类，借助于变异，逐渐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经历过全部有机性的创造。其中包括所有的低级和中级阶段；而我们则是站在人类这个最高阶段上来看它们，于是它们便温顺地退居次要地位。”

就这样，早在达尔文进化论问世70年前，歌德就已道出了达尔文思想的基本底蕴。

不过，在光学的研究上歌德却走入了迷误，而且整整40年没有从这种迷误中摆脱出来。17世纪英国科学家牛顿认为，白光由组成虹的七中颜色混合而成，通过三棱镜，牛顿将白光分解，验证了自己的结论。歌德用三棱镜检验牛顿的理论，但他没有得出与牛顿相同的实验结果。肉眼观察的失误和对“原始形

态”的迷恋欺骗了歌德，他反对牛顿的理论，认为光是不可分解的，各种颜色的产生是白和黑这两种“原始现象”相互交叠的结果。根据自己的实验和研究，歌德最终于1810年写出了《颜色学》，在此之前，他还于1791年发表了《光学论文集》。

歌德的错误理论和他那饱含真理性认识的“植物变态学”一样遭到了科学界的冷落，但他并不因此改变自己的看法。直到1827年2月1日，歌德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还指责那些坚持牛顿学说的人隐瞒了正确的实验结果，他说：“这并不足为奇，那批人坚持错误，因为他们依靠错误来维持生活，否则他们要重新从头学起，那就很不方便。”

对于歌德在科学上的探索，我们用德国传记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一段话来做总结比较合适，他说：“歌德的所有自然科学著作都是他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所得，接着又在直觉的基础上把这种观察加以深化和概括的结果。他的科学著作只是通向发现某个存在着的法则的道路上的一块纪念碑。而阻碍他本人确定这些法则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当时的时代精神，部分地则在于他自己那种强烈的感情和反哲学的天性。歌德在科学领域中的全部发现都打着他个性的烙印。甚至，他的逻辑上的错误看上去也是富有成效的，错误中包含着心理学方面的真理。”

当我们看到歌德在《颜色学》中赋予眼睛以强大的意志力，说它渴求变化，不愿只看某一种颜色，甚至活跃到看不到它所要求的颜色时就自己把它们创造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深受感动呀！作家的心灵，科学家的眼睛，也许这就是歌德成功和失败的秘密吧。

“席勒令我仇恨”

回到魏玛，歌德时常听人提到席勒。“弗里德里希·席勒”这个名字对歌德来说应当并不陌生。1781 年，22 岁的席勒完成他的第一部剧作《强盗》，1782 年 1 月，《强盗》在曼海姆首演成功，“席勒”作为一颗文坛新星的名字传遍德国，魏玛的歌德自然不会一无所知。1782 年 2 月，席勒发表《1782 年度诗集》，其中有 50 首为席勒的作品。1784 年，25 岁的席勒又完成了他的另一部戏剧力作《阴谋与爱情》，同年 12 月，由卡尔普夫人介绍，席勒与歌德的恩主、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在达姆施塔特相见，公爵赠席勒以魏玛顾问官的头衔，但席勒并没有马上来魏玛而是应克尔纳之邀去了莱比锡。1785 年，席勒写出名诗《欢乐颂》，并编辑于次年改名为《塔利亚》的戏剧评论杂志《莱茵塔利亚》。1787 年，28 岁的席勒完成《堂·卡洛斯》，并于 7 月 21 日抵达魏玛。

对于这个和自己一样在年轻时就名扬四海的后起之秀，对于这个在戏剧影响上远远超过自己并实际已代替了自己的位置的竞争者，歌德的态度是不闻不问，他以沉默对付席勒，不对席勒的剧作做任何评论，并避免见到他，更不愿意听人们谈论他。但同处于魏玛的社交圈子，他们不见面肯定是不可能的。在歌德回到魏玛两个多月后，即 1788 年 9 月 7 日，在鲁多尔施塔特的伦格费尔德家，歌德终于在上流社会的人群中遇见了席勒。

和歌德的心理不同，席勒对歌德充满了好奇心和相见的渴望，9 年前第一次见到歌德的情景还历历如在他的眼前。1779 年 11 月，歌德陪同卡尔·奥古斯特从瑞士归来，途经斯图加特，参观了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表兄弟——符腾堡的卡尔·欧根公爵主

办的卡尔军事学院，并参加了学院表彰优秀生的授奖仪式，当时，20岁的席勒正是被授奖的学生中的一员。虽然席勒熟知歌德的作品，但他却不能冲破森严的纪律跑到他所景仰的诗人面前让他认识自己，而歌德当然不会注意席勒，而且很难说他对参观这种仪式抱有多大兴致，这也许就是歌德给席勒留下一个“消瘦”、“可怜”印象的原因。作为名人来魏玛后，席勒听到了对歌德的种种赞誉与诋毁，这些截然相反的评论强化了他对歌德的好奇与渴望，但这种好奇与渴望显然与单纯的崇敬和五体投地的崇拜无缘。不，他热爱歌德，但他始终以批评的眼光去看待歌德，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能与歌德比肩而立的人——朋友和对手，而这，正是日后歌德与他建立友谊的基础。歌德回魏玛后，席勒长时间没能见到歌德。他关注着歌德的行踪，请人向他谈论歌德的近况，请朋友们向歌德转达他的祝愿，但他似乎始终没有前往拜访歌德，也始终没有受到歌德的邀请，歌德也没有辗转向他问候，更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去看望他，甚至在这次见面交谈过之后仍是这样。显然，这次会面毫无成效，席勒没有改变歌德对他的冷漠，而歌德也没给席勒留下太多好印象。见面几天后的9月12日，席勒在给克尔纳的信里这样讲述这次会面：

“我终于可以写信给你来谈谈歌德了。他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大大冲淡了人们灌输给我的有关这位迷人而又漂亮的人物的那些拔高了的看法。歌德中等身材，步态和动作都显得拘泥，面孔看上去也挺古板。只是那双眼睛却显得非常灵活、非常富于表情。看着它们，会让人感到非常和善……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没有任何一点拘束。周围的人实在太多，所有的人因为都想和他亲近而互相嫉妒，结果弄得我没能够长时间和他单独在一起，谈话所涉及的也只是一些最一般性的题目。”“总的说来，在这次私人结识之后，我对他的伟大想像事实上没有减弱，但是我怀疑，我

们彼此是否能很接近。许多我现在还感兴趣的，我还期待和希望的，他都经历过了，他在生活的经历和自我发展上（这远比年纪上的差异要大）早已远远地走在我的前面，我们在半路上再也不会相遇，他的本质从一开始便和我的截然不同，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们的思想方法全然两样。”

显然，尽管歌德觉得魏玛已冷落了他，在席勒眼里，歌德仍是社交场上的中心人物；尽管“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没有任何一点拘束”，他们实际上仍是话不投机。歌德对席勒的印象要更为简单和糟糕：“这是一种沮丧的情况，席勒令我仇恨。”①

席勒之于歌德，似乎正像过去的歌德之于维兰德，而代替年轻的歌德写给维兰德的充满敬意的信的，是席勒发表的一篇评论《哀格蒙特》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使歌德很不快，他反感的不是批评，而是这批评出自一个他不欣赏的作家之手并且他对文章的论点不以为然。在一些传记家看来，席勒的这篇文章导致歌德将席勒安排到耶拿大学，即让席勒离开魏玛宫廷。

1788年底，在一个朋友的请求下，歌德向内阁递了一封推荐信，推荐席勒任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因为席勒除文学外，在历史研究上也卓有成效，已经完成了《统一荷兰的解体》和《尼德兰的独立史》，当然，还写了诗歌《希腊群神》。不管这一推荐是出于排斥异己的目的还是为了耶拿大学的声誉，这个职务对席勒的才能来讲未必是最好的位置，而对于解决席勒的经济困难来讲相差就更远，执教初期，席勒甚至未有任何薪金。卡尔·奥古斯特虽然将席勒揽到魏玛，但每年只给他200塔勒的赠金，而歌德初到魏玛时，年薪是1200塔勒，相比之下，席勒的钱只是歌

① 转引自高中甫《歌德接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0页。

德的一个尾数，难怪席勒要重复那些许多人都在以不同方式唠叨的话："这个人真走运！他的好运道来得那么容易，而我们这些人却不得不永远和自己的命运做斗争？他果真比我们高？不，他不过是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因而接受到一种最好的教育。他不过是比我们幸运，并且比我们整整大上 10 岁！"

的确，席勒没有和他在同样年龄里出名的歌德幸运，当年歌德面对的是一个年轻重感情的君主和相对较弱的对手，而且适逢新君即位，百废待兴，而如今席勒面对的则是歌德这棵远比维兰德根深叶茂的大树，旅居国外虽然使歌德与魏玛产生了隔膜，但歌德对自己的君主和宫廷仍具有极大的震慑力。

虽然席勒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并到歌德家为了歌德的举荐而向歌德致谢，但他心里仍是愤愤不平的，他觉得歌德总是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挡住他的道，1789 年 2 月他给克尔纳的信表明了他对他的举荐者的真实感受："经常在歌德周围，这会使我感到不愉快的，他就是对他亲近的朋友也没有倾诉情怀的时候，他对什么都不在意，我相信，事实上他是一个极端的唯我主义者。他有着控制人的才能，引起人们对他的倾慕。而他自己却能永远地无拘无束。……人们不应当让自己在这样一个人周围转来转去。因此他令我憎恶，尽管我同时全心全意地热爱他的精神，想到他的伟大。他在我身上唤醒了一种十分奇异的感情——大胆的恨和大胆的爱。这种感情，也许，就是勃鲁托斯和恺歇斯对恺撒所曾体验过的。我准备毁掉他的灵魂，可同时又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他的智慧已经最终发展成熟，他对我的评价与其说是友好的，毋宁说是敌对的。但对我说来，所有评价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符合事实，这一来所有人中只有他一个人能把这种真实提供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让他的那帮暗探们包围起我来的缘故，因为我自己是永远也不会征询他对我有什么看法的。"

在席勒为无法得歌德青睐而苦恼的日子里，世界也开始走向一个巨大的旋涡。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在纽约就任美国第一届总统；5月5日，法国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开幕；5月11日，30岁的席勒去耶拿任教，首次上课他讲授的题目是“什么叫世界史，为什么要研究世界史”；7月14日，巴黎群众武装暴动并攻克巴士底狱；8月，席勒与贵族小姐夏绿蒂·封·伦格费尔德订婚；8月26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10月，巴黎武装群众进攻凡尔赛。

这一年，席勒完成了长诗《艺术家》，次年2月22日，与夏绿蒂·封·伦格费尔德小姐结婚，而这时，歌德的儿子已降生快两个月了。

革命与暴力

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包括歌德、赫尔德尔、席勒、维兰德、克洛卜施托克、荷尔德林、威廉·洪堡、康德、费希特及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革命都持热烈的欢迎、赞颂态度。1792年8月26日，巴黎国民议会还授予了席勒和克洛卜施托克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市民的称号。1790年3月3日，歌德在给雅各比的信中写道：“你可以这样想：法国大革命对于我也是一场革命。”并亲笔画了一棵自由松。但是，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法国革命日益呈现出恐怖、流血的复杂混乱局势。1793年1月21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冬尼达和杜巴瑞伯爵夫人被送上了断头台，5月，雅各宾党上台，法国国民公会开始实行恐怖统治。于是，德国的大部分法国革命的支持者开始转变立场，对革命持反对、憎恨态度，歌德也是其中之一。

早在1790年，歌德在《威尼斯警句》里就写下了这样的句

子：

> 让每个热狂者在30岁时被钉上十字架：/—认清世界，受愚者就变成坏蛋。/法国悲惨的命运，大人物可能会考虑；/可是小民们确实更应该考虑。/大人物灭亡：可是谁保护民众抵御/民众？民众成了民众的暴君。

显然，歌德看到了革命进程中所包含的矛盾因素和革命在实践上造成的社会现实的复杂状况，他对革命的反对中有他对小人物——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对他们的命运的真实关心。然而，历史的发展总要求处于变革时代的人们付出代价，到哪里去寻找没有牺牲的进步和发展呢？动荡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亦如此。无疑，混乱对于人民来说是一种伤害，但在混乱前人民所承受的并不是一种比混乱更能使人忍受的伤害。歌德同样也看到了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在1824年2月4日他与爱克曼的谈话中，他说：

"但是我也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归咎于人民，而只能归咎于政府。只要政府办事经常公正和保持警惕，及时采取改良措施来预防革命，不要苟且因循，拖延到非受制于下面来的压力不可。这样革命就决不会发生。"

在这段话的前面，歌德与爱克曼谈到他写于1794年的剧本《受鼓动的人》，他说：

"那是我在法国革命时期写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看成是当时我的政治信仰的自供。我把伯爵夫人作为贵族代表放在这部剧本里，通过她嘴里说出的话，我表达了贵族是应该怎样想的。那位伯爵夫人刚从巴黎回国，她是法国革命过程的一个亲眼见证。她从法国革命中吸收了不坏的教训。她深信人民尽管受压

迫，但是压不倒的；下层阶级的革命暴动都是上层阶级不公正行为造成的后果。她说：‘凡是我认为不公正的行为，我今后决心尽力避免，并且无论在宫廷还是在社会上，凡是遇到旁人有不公正的行为，我都要照实说出我的意见。遇到不公正的行为，我决不再缄口无言，尽管人家骂我是个民主派。’”

“我想这种心情是完全值得钦佩的。这当时是、现在还是我自己的心情。作为报酬，人们给我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我就不必提了。”

歌德看到了革命爆发的原因或说混乱形成的原因，他理想化地将希望寄托于政府自身的公正。他显然说出了真理，但他似乎忽略了实现公正统治的艰难性或可能性程度，仿佛他在初入魏玛的 10 年里试图进行的土地改革没有遭到失败，反倒取得了成功!

在这次谈话中，歌德接着说：“我既然厌恨革命，人家就把我叫做‘现存制度的朋友’这是一个意义含糊的头衔，请恕我不接受。现存制度如果贤明公正，我就没有什么可反对的。现存制度如果既有很多好处，又有很多的坏处，还是不公正、不完善的，一个‘现存制度的朋友’就简直无异于‘陈旧腐朽制度的朋友’了。”

“时代永远在前进，人世间事物每过 50 年就要换一个样子。在 1800 年还很完善的制度，到了 1850 年，也许就已变成有毛病的了。”

歌德反对人们不加区分地把他说成“现存制度的朋友”，他憎恨腐朽的制度，就如同憎恨革命中的暴力一样。他在 1825 年 4 月 27 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说：

“奇怪，真奇怪，一个人的地位在舆论中竟弄到这样是非颠倒！我想不起曾做过什么得罪人民的事，可是现在竟有人对我下了定论，说我不是人民的朋友，我当然不是革命暴徒的朋友。他

们干的是劫掠和杀人放火，在为公众谋福利的幌子下干着最卑鄙的自私勾当。我对这种人不是朋友，正和我不是路易十五的朋友一样。我憎恨一切暴力颠覆，因为得到的好处和毁掉的好处不过相等而已。我憎恨进行暴力颠覆的人，也憎恨招致暴力颠覆的人。但是我因此就不是人民的朋友吗？一切精神正常的人是否不这样看呢？你知道我多么高兴看到任何使我们看到未来远景的改良。但是我已经说过，任何使用暴力的跃进都在我心里引起反感，因为它不符合自然。”

那么歌德所说的这个自然究竟是什么呢？他接着说：

“我对植物是个朋友，我爱好玫瑰，把它看作我们德国自然界所能产生的最完美的花卉，可是我不那么傻，想在这4月底就在我自己的花园里看见玫瑰花。如果我现在能看到初发青的玫瑰嫩叶，看到它一片又一片地在枝上长起来，一周又一周地壮大起来，5月看到花蕾，6月看到繁花怒放、芳香扑鼻，我就心里满足了。谁要不耐烦等待，就请他到暖房里去吧。”

实际上，大自然中到处都充满了生命与死亡的搏斗，哪怕是在我们看来如此自然而平静的植物的生长，如果我们走进它们机体内部，我们就将发现那是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世界！南美洲的人们说：走进玉米地，夜里你会听到玉米生长的声音！

另一方面，革命就是要人为地打断自然的发展进程吗？即使拿自然硬性地与社会加以比较，植物的自然生长也不能导致对革命的否定。因为革命恰是植物要自然生长的表现，革命完全不是拔苗助长的问题，而是植物要挣脱压在它身上的石头瓦块挺起胸膛的问题，是生命力突破对它的束缚的问题。

深谙大自然本性和奥秘的歌德对上面这些问题不会不清楚的。实际上，只有结合歌德对德国问题的看法，我们才能真正弄清楚歌德关于玫瑰花自然生长一段话的真正所指，而不至于简单

地给他扣上一顶庸俗进化论的帽子。在1824年2月4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还说道：

> 说我不能做法国革命的朋友，这倒是真话，因为它的恐怖行动离我太近，每日每时都引起我的震惊，而它的有益后果当时还看不出来。此外，当时德国人企图人为地把那些在法国出于必要而发生的场面搬到德国来，对此我也不能无动于衷。
>
> 还有一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植根于本土，出自本国一般需要、而不是猴子式摹仿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对于某一国人民处在某一时代是有益的营养，对于另一国人民也许就是一种毒药。所以想把不植根于本土、不适应本国需要的外国革命引进来，这种企图总是愚蠢的；而一切有这种意图的革命总是不成功的，因为这种革命没有上帝支持，上帝对这种胡作非为是要制止的。但是一国人民如果确有大改革的实际需要，上帝就会站在他们一边，这种改革就会成功。上帝显然曾站在基督和他的第一批门徒一边，因为新的博爱教义当时是人民的需要；上帝也显然站在路德一边，因为清洗被僧侣篡改过的教义也还是一种需要。以上这两种伟大力量都不是现存制度的朋友，无宁说，都生动地渗透着一种信念：陈旧的酵母必须抛开，不能再让不真实、不公正的邪恶事物这样流行和存在下去。

在歌德看来，当时的德国并不存在像法国那样的爆发大革命的必然条件，——注意，他甚至不否定法国大革命将会产生有益的后果，——防止德国可能发生的对法国大革命的仿效，这才是歌德关心的主要问题，从这一点上讲，他既是站在一个唯物主义

者的立场上说话，也是站在一个贵族大臣的立场上说话。

歌德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但在实践上，他却被拖进了普奥联军攻击法国革命军的行列。1793 年春，英国组织了欧洲第一次反法联盟，魏玛追随普鲁士参加了对法战斗。8 月，歌德随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出征法国，9 月间，普奥联军攻陷了隆威，接着占领了凡尔登，直逼巴黎门下。9 月 20 日，瓦尔密战役，普奥联军被法国军队和人民武装击溃，法国转入反攻。9 月 22 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自由、平等、博爱”被宣布为共和国的政治口号。就是在 9 月 20 日的晚上，在被溃败的恐怖笼罩着的普鲁士军官中间，歌德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就在这里，就在今天，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开始了，你们可以说，你们是它的见证人。”

歌德一直以一种超然的评判者的态度对待他亲身经历的这一切，在炮轰凡尔登的夜里，他和一位亲王彻夜大谈颜色学，而在此之前，他则对那些弹坑积水中的小鱼看得入了迷，因为阳光随着鱼的运动所呈现出的不同色彩使他又想到了他努力钻研的颜色学！然而这一切并不表明歌德对眼前的战争持漠不关心的态度，那句准确地把握了世界历史转折的话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歌德只不过不持卡尔·奥古斯特那样的立场和热切的功利心罢了。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歌德这样写道：“我痛苦地发现，枢密会议已经在毫不迟延地把战争宣布为保卫帝制的战争。这就意味着我们正成帮结伙地奔向自己的毁灭。”

1793 年 5 月至 7 月，歌德又随卡尔·奥古斯特参加了围困法军占领区美因兹的战斗，在那里，德国的革命家格奥尔格·福斯特建立了德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作为占领军的法国的雅各宾党人。当美因兹被攻克的时候，一些市民企图擅自对一个即将撤离的共和主义者动私刑，歌德威严地阻止了他

们，并将那人放走。他回答人们的责难说："我宁愿犯下一桩不义之罪，也不愿忍受混乱，这是我的一种天性。"

"东好，西好，在家最好"

1789 年 12 月 25 日，在法国大革命的扰攘不安日子里，歌德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令歌德感激地做了新生儿的教父，孩子被命名为奥古斯特·歌德。克里斯蒂安娜·符尔皮乌斯以后又生了 4 个子女，但都夭折了，奥古斯特便成了歌德唯一的孩子。歌德久已希望做父亲，现在中年得子，心中的满足可想而知，小家伙的出世为内心孤独的他带来了新的欢乐和安慰，使他真切体会到了一种新的情感，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感到内心有一种撇舍不开的牵挂。

孩子降生刚 3 个月，歌德便不得不为迎接老公爵夫人阿玛利亚而离开魏玛，前往意大利。歌德给赫尔德尔写信说："我为那两个被我扔在家里的人感到非常不安，我坦白地向你承认，我非常爱这个姑娘，只有分别时我才感到我对她有多么依恋。""我告诉她，让她在最必要的时候径直前去找你。"

一路上马车的颠簸，与欺生的马车夫和搬运夫们的口角磨擦，繁多的税卡，使旅途劳累的歌德更加向往远方自己舒适的家庭："我的肉体在旅行，我的心却总是休憩在爱人的怀里。"和 1788 年的《罗马哀歌》一样，歌德再次写下了一些充满爱欲的诗篇。

3 月 31 日，歌德抵达威尼斯，由于老公爵夫人的原因，歌德在这里一直停留到 5 月 6 日。对于不到两年前刚返回魏玛的歌德来说，首次意大利之行的许多往事还历历在目，如今，物是人非，徒增感慨，正是在现实与回忆的撞击交汇之中，歌德创作了

他的《威尼斯警句诗》。

> 这就是我曾告别的意大利。大道依旧/尘土飞扬，/外乡人仍然受到诈骗，不管他如何抗拒。/德意志的忠诚，你在哪儿都将白白寻找；/这里只有忙忙碌碌，没有秩序和纪律。/谁都只关心自身，怀疑他人，爱好虚荣，/就连国家的首脑也同样只关心自己。/国土虽美，可是，唉，浮士蒂娜已无处/寻觅。/这已经不是我怀着悲痛告别的意大利。

由于思念克里斯蒂安娜和新生的小宝贝，也仿佛是为了安抚那些曾经被他对意大利的热情伤害了的同僚们，或者仅仅是出于不重复艺术感觉的需要，意大利就这样开始以另一番面目出现在歌德的诗里。

远行往往是一个绝好的思绪整理的机会和过程。在威尼斯的等候和漫游中，歌德有更多、更集中的清静时间来思索一年多来发生的一切，他想到施泰因夫人，想到自己的抉择，眼前的和过去的情景浑然成为一片。

> 我有过一个爱人，我爱她胜过一切！/如今失去了！闭起嘴，忍受这损失吧！

没有人能确切指出这个“爱人”究竟代表什么。也许眼前陌生的意大利女子使歌德想起了第一次来意大利时他曾爱过的某位被称为“浮士蒂娜”姑娘，更多的人则倾向于将这首诗与施泰因夫人联系在一起，然而以“她”来代指自上次离开意大利以来歌德所失去的一切，似乎也无不可。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歌德的生活、他生存的小环境以及世界局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歌德的

确失去了很多，但他没有失去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宠信，在几乎整个宫廷都起来反对他的时候，公爵支持了他，做了他儿子的教父。理解也好，同病相怜也好，假若没有公爵的支持，很难想象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娜母子的处境会有多糟糕。也许正因为此，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歌德没有忘记将及时的感激再次呈献给他的恩主，他将那首去年献给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诗再次镶嵌在他的《威尼斯警句诗》里：

> 在日尔曼的君主中，我的君主的确很小；/他的国土狭窄；他的能力也平平常常。/然而，要是每一位君主都能像他一样/致力内政外交，德国人就可将太平同享。/试问你为何称颂他，赞扬他的业绩？/看起来是他用贿赂，换取了你的感激。/不错，他给了我那些大君侯难得给的一切，/给了我宠信、闲暇、田庄、林园和住宅。/我不须感激其他任何人，只想感激他；/我这个诗人需要挺多，却不善于获取。/欧洲称赞我，可又给了我什么？没有！/为我的诗歌，我付出了多沉重的代价。/德国人模仿我，法国人对我入迷，/英国啊，你殷勤地接待这憔悴的客人。/可对我又有何益呢，就连中国人也用/颤抖的手，把维特和绿蒂绘上了镜屏？/从来没有皇帝垂询我，从来没有国王/对我关心，只有他是我的奥古斯都和麦卿[1]。

的确，如今卡尔·奥古斯特和歌德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君臣关系，不如说是一个封建君主和他的被保护的艺术家的关系。也许正因为如此，歌德对他的君主才不再有当初做实业大臣时的那

---

① 奥古斯都的大臣，保护文人，奖励文艺。

些不满和失望了吧。

在漫步街道的时候，歌德不时遇到一些带儿携女的乞丐，这些衣衫破烂的人未必丝毫不打动歌德的心，但却更使他想念自己的女人和孩子。的确，歌德损失的不仅是施泰因夫人的友谊，但他毕竟得到了一个家，一个快乐年轻的主妇，一个可爱的孩子，他们给他带来快乐和安慰，而他则给他们带来庇护，使他们免于眼前这种忍饥挨饿的耻辱命运，在家过着安逸无忧的生活。

> 你们带着美貌的儿女，戴着面纱/在乞化：想着力打动男子的心。/看到你们的穷孩子，人都想有个孩子，/看到你们的面纱，都想到爱人。

> 你抱着来乞化、乞怜的，不是你的亲生子；/把我的亲生子带来，才会感动我！

思念和表白的愿望使我们的诗人竟不惜以这种有冷酷之嫌的方式来表达对自己儿子的骨肉之亲！

的确，他需要表白，正如克里斯蒂安娜不断向歌德表白自己的感激与满足，歌德也在利用各种机会将自己的爱情写进诗歌。在歌德看来，这是他给克里斯蒂安娜的最大荣誉，也是在那些他的爱情的宫廷反对者面前捍卫自己爱的尊严的最好方式。和那些粗暴的占有者及纨绔的玩弄者不同，歌德献身于他的爱情，并全力保护它。

> 我要怎样的姑娘？/你们问我。我已经/如愿以偿，这句话言简而意长。/我去海滨寻贝壳。在一只贝壳里找到/一粒珍珠；现在保藏在心头。

这粒珍珠，是克里斯蒂安娜，也是给他生命带来新的惊喜的小婴儿奥古斯特。歌德在自己的诗歌里大声向世人宣讲这母子二人对他的珍贵，并给克里斯蒂安娜寄去两行短诗：

东好，西好，/在家最好。

第七章

高山流水

联盟

无论对歌德来说还是对席勒来说，1791年都是一个暗淡阴沉的年份。这一年默尔克自杀了，死于破产。此前歌德曾尽力帮助他，从卡尔·奥古斯特公爵那里弄到一张保证书，以使法兰克福的银行贷款给默尔克，但默尔克仍未能摆脱悲惨的结局。而席勒，从1月起就开始遭受肺病折磨，到5月病情加重时，几乎丢掉性命。治疗花费了1400塔勒，这使席勒陷入经济拮据状态。在丹麦诗人巴格森的提议下，丹麦王子奥古斯腾堡和丹麦首相希美尔曼在11月21日赠与了席勒三年年金，每年1000塔勒，这才使席勒从窘迫的状态里暂时解脱出来，并免除了近

期的后顾之忧。

歌德经常到耶拿去，偶尔也去席勒那里，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冷淡疏远，尤其一谈到康德哲学的时候就总是话不投机。歌德天生有一种关注具体物质世界的倾向，在斯特拉斯堡读书时，他读了霍尔巴哈男爵的《自然的体系》一书。这本号称“唯物论圣经”的著作令歌德十分反感和失望，歌德希望从书中得到关于自然的具体认识和知识，如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博物学、解剖学等等，但他看到的只是一些淹没了具体物质的抽象概念，脑中只觉一片空虚。从此，他对一切哲学总是打心里不喜欢，而热烈地致力于经验、行动、创作和获得知识。在 1824 年 4 月 14 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说：“总的说来，哲学思辨对德国人是有害的，这使他们的风格流于晦涩，不易了解，艰深惹人厌倦。他们愈醉心于某一哲学派别，也就愈写得坏。但是从事实际生活、只顾实践活动的德国人却写得最好。席勒每逢抛开哲学思辨时，他的风格是雄壮有力的。”这段话显示出，歌德之所以躲避哲学，既是出自关注自然的天性，也是出于一个要保持直觉性思维的作家的自觉意识。

而席勒却是一个康德哲学的热烈追随者，他的全部美学思想都来自康德哲学，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占去了他一生相当大一部分精力。席勒十分了解歌德对哲学的态度，但这并不妨碍他高度评价歌德，他说：“歌德完全不善于昧心地对任何看法随声附和。哲学在他看来带有过分的主观性。而他关于事物的概念又总是带着过分的感情，在我看来，简直成为可摸触的了。但他的精神却在影响着一切，展延向各个方面，处处都在努力创造出某种完整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歌德是个伟大的人。”

席勒充分认识到跨越横在他与歌德之间的障碍的可能性，千方百计寻找与歌德建立友谊的桥梁。而事实也很快证明，康德哲

学并不是阻碍他们建立友谊的关键所在。1794 年 6 月 13 日，席勒给歌德写了一封信，邀请歌德为他筹办的杂志《时序女神》撰稿，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把赫尔德尔、费希特、威廉·洪堡、雅各比、威廉·施莱格尔等声望卓著的人延揽到了他的旗帜下。歌德回信接受了席勒的邀请，而一个月后耶拿的自然科学研究报告会又使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一步。

那天会后散场时，歌德和席勒在门口碰巧相遇，他们边走边交谈报告会上的内容，不知不觉走进了席勒的家里。歌德兴致勃勃地对席勒谈起植物变态的本质，给他画出原始植物的图形，席勒怀着浓厚的兴趣听着、看着，表现出惊人的颖悟力。但当歌德谈完的时候，席勒却摇了摇头说："不，这不是经验——是思想。"

歌德沉默了下来，感到有些遗憾，因为席勒的话明确地显示出了他们之间存在着的分歧点。往日的不快又萦绕在歌德的心头，但他克制住了自己，讥讽地说道："真的，我很高兴，自己竟然不知道这一点，我所拥有的只是思想，甚至用肉眼可以看到它们！"

那天，歌德和席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当他们终于宣布和解时，两个人谁也不认为自己是胜利者或被战胜者。在歌德看来，席勒比他更老练，更有上流社会的教养，为了《时序女神》的利益，席勒不是想排挤歌德，而是努力想把歌德吸引到自己身边，因此，尽管这次交谈两人仍存在争执与分歧，第二天回到魏玛后，歌德还是将一包书稿寄给了席勒，并附了一封包含以下文字的信：

"请对我保持友好的回忆，并请相信，如有可能与您交换思想，我会感到非常高兴。"

显然，歌德心灵上的坚冰已被打破，席勒的修养、策略及真

诚的努力已经开始对他产生吸引力。正像歌德所说，席勒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他把靠近他的一切人都把握得紧紧的。而就歌德来说，也许正像艾米尔·路德维希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如果善于用一种温和的感化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末，即使这个人是歌德的敌人，也会讨得歌德的喜欢。

收到歌德的信后，1794 年 8 月 23 日，席勒给歌德写了一封著名的长信，对歌德的精神发展做了透彻而富有独创性的分析。这封信不仅征服了歌德，也成为歌德研究和德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献。

从来没有人站在精神发展的高度对歌德的创作和自然科学研究作出过评价，从来没有人将歌德的精神发展、创作以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看待，从三者共同的走向中发现它们是如何被对一个巨大、崇高的目标的追求统一起来的。歌德被席勒敏锐的洞察力所显示出的强有力的思维和深邃的思想震撼了，多少年来他始终没能找到这样一个知音和对话者，没能走出自言自语的孤独状态，现在，他突然在自身之外，在他敌视的思辩者中，找到了一面能反映出他精神的真实面孔的镜子，甚至这面镜子反映出的，比他心灵的眼睛所看到的还要真实，还要令他惊讶！这种也许他从未指望在有生之年能获得的巨大幸福使他陷入长时间的激动之中，而席勒对两人合作的充分可能性的雄辩论证也使他对未来的前景感到无比欢欣鼓舞。他给席勒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说：

在我过生日的这一天，——我已经活满 45 岁——我所收到的最愉快的礼物就是您的那封信；您在这封信中如此友好地对我过去的全部活动作了一个总结，又满怀同情地鼓舞我更加勤奋、更加有成效地发挥我的全部力量。……我一直

> 珍视您所写过和做过的一切，高度评价其中表现出的纯正而又罕见的严肃性，如今我又可以指望从您本人那里了解您特别是近些年来的精神发展……眼下，当我们各自间解释清楚，两个人已经走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就可以更加顺畅无阻地一道工作。您的同情对我来说是一种多么巨大的鼓舞，当您帮助我克服掉一种存在着的我能清楚地意识到而又驾驭不了的昏暗和动摇之后，您自已将会看到，我们会变得多么亲近、熟悉……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去您那儿住上几天，好让我们畅述一切。祝您健康，希望您周围的人都想着我。

在歌德的盛情邀请下，9 月 14 日，席勒从耶拿来到魏玛，在歌德家里住了约两周时间。通过坦诚、亲密的交谈，歌德发现他和席勒的看法、想法和活动范围一部分完全吻合，一部分则很接近，认为这将给他们双方都带来很多好处。他们交换了有关美学的信件，并商讨了今后的合作计划。从此，德国文坛上的古典派就诞生了。在以后 10 年的合作中，歌德和席勒写出了一批重要作品，共同开创了德国文学史的古典时期。

挑战

1795 年 5 月，《时序女神》初版，歌德在上面发表的第一批作品是《罗马哀歌》和《文学上的激进共和主义》，后者又译为《文学上的无短裤党》，是歌德为德国作家辩护的一篇论战性文章，它针对的是一位柏林作者的文章所持的德国缺少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论点。在文章中，歌德对德国作家所处的不利环境做了切中肯綮的分析，但他反对为创造经典作家所需要的条件而进行革命，他认为，18 世纪下半叶德国启蒙运动深入发展阶段所

涌现出的杰出作家们，已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为德国文化迎来了最初的曙光，也为年轻的后来者们造就了一所无形的学校，在这所学校的熏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们，不畏艰难地在晨曦的昏暗中摸索，又通过自己的努力扩大了已出现的曙光，他们的无数优秀作品已使德国民族文学的天空中出现了太阳——“天已经亮了，我们不会再把店铺关闭了。”

除歌德的作品外，《时序女神》上还发表了歌德与席勒的美学通信，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美育书简》等。但《时序女神》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而《罗马哀歌》则遭到了人们的非议。文学界的敌视和冷淡激起了歌德强烈的愤懑，自《伊菲格涅亚》和《哀格蒙特》受冷遇以来积郁在他心中的怒火，不由在此时又炽烈燃烧起来。1795 年 11 月 21 日，歌德在给席勒的信中写道：“把这些心胸狭隘的人的无聊勾当昭之于世，那太容易了，这同时就把明于事理的公众拉到自己的一边，这得有一个对愚昧昏庸的宣战声明，我们必须使这种愚昧昏庸到处不得安宁。”

一旦决定投入战斗，歌德很快便找到了作战的武器。1795 年 12 月 23 日，歌德写信向席勒建议用双行诗的形式向文坛发起进攻。事隔一天后，他便将写好的 100 多首双行讽刺诗寄给了席勒。席勒在同月 29 日的复信中写道：“写《克塞尼恩》的念头好极了，必须实现它。您今天寄给我的使我感到极为开心……”这里所说的“克塞尼恩”，就是前面所说的双行诗，该名称的希腊文原意是“友谊的礼物”，因此又称“馈赠诗”，歌德以此来做讽刺诗，是师承古罗马诗人 M·V·玛狄亚里斯的做法。

1796 年 10 月，席勒创办了第二份杂志《诗神年鉴》，它的第一期发表了歌德和席勒写的 414 首双行诗，这些诗在德国文坛上掀起了一场攻击与反攻击的风暴，其影响之大，竟使《诗神年

鉴》在很短时间里重印了三次，在当时的出版界创下了纪录。歌德和席勒在他们的双行诗里为自己树立了80位攻击目标，范围之广连克洛卜施托克、拉瓦特尔、施莱格尔兄弟也包括了进去，至于尼克莱、科策布等人更是他们不会放过的箭靶。对尼克莱的讽刺中有这样两行诗：

尼克莱还一直在旅行，他将旅行得更久，/但在理性的王国里，他老是找不到路。

歌德和席勒的挑战遭到了强烈反击，为数众多的被攻击者将主要矛头指向了歌德，说他是“高贵的席勒的诱惑者”，“有天才而不讲道义”，“是没有心肝的、虚荣的、只想被一群狗一样的献媚者环绕”的人。人身攻击所及，甚至克里斯蒂安娜也被扯了进去。

在歌德和席勒的眼里，所有这些叫嚣者都只是市侩而已，他们的反击全在料想之中。不过，有的反击者还是击中了挑战者的要害：

啊！这是一条多么遥远的路，/从《伊菲格涅亚》到讽刺短诗！

宣泄毕竟代替不了创造。1796年11月15日，歌德给席勒的信中写道：“经过了馈赠诗这场疯狂的挑战，我们必须勤奋地创作更伟大更高尚的艺术作品，和把我们的诗意的本性转化为高尚与善良的形象，以羞辱我们所有的对手。”

于是，两位巨人迈开了前进的脚步，将被称为“讽刺短诗年”的1796年扔在了脑后，共同创造了德国文学史上更富建设

性的一年——1797年，史称“叙事谣曲年”。

硕果

1797年年初，歌德和席勒商定在该年的《诗神年鉴》上推出叙事谣曲，于是，两人便怀着极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到了颇有成效的谣曲创作之中。

所谓谣曲，就是民间伴随着舞蹈而演唱的叙事诗。早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时期，歌德在赫尔德尔的指导下搜集了许多阿尔萨斯地区的民歌，其中就有一些叙事谣曲。后来，歌德仿照民间谣曲的形式，创作了《紫罗兰》、《渔夫》、《图勒的国王》、《魔王》等叙事谣曲，其中，《魔王》经稍后的音乐家舒伯特谱曲，成为传唱世界的著名歌曲。1797年歌德创作的叙事谣曲有：《新鲍侠斯和他的制花女》、《科林斯的未婚妻》、《神和舞女》、《魔术师的门徒》、《掘宝者》、《单身青年和磨房小溪》、《磨房姑娘的后悔》等，其中《科林斯的未婚妻》以其鲜明的反宗教禁欲主义色彩而成为重要篇章，被称为“叙事歌中的《浮士德》”。席勒在此期间写出的名篇有：《波吕克拉特指环》、《伊比库斯之鹤》、《手套》、《潜水者》、《托根堡的骑士》以及《人质》等。

对于歌德和席勒的相互合作，歌德在1828年12月16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曾说：“德国人摆脱不掉庸俗市民习气。他们现在就某些诗既印在席勒的诗集里又印在我的诗集里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在他们看来，把哪些作品归席勒、哪些作品归我分清楚仿佛是件大事，仿佛这种划分有什么益处，仿佛客观存在的事实还不够。”

歌德接着说：“像席勒和我这样的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晤谈，互相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

人，所以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有许多诗句是我俩在一起合作的，有时意思是我想出的，而诗是他写的，有时情况正相反；有时他作头一句，我作第二句，这里怎么能有你我之分呢？一个人如果把解决这种疑问当作大事，他准是在庸俗市民习气中还陷得很深。”

歌德和席勒这种彼此不分的共同创作情况，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上，也体现在戏剧写作方面。1797 年 7 月，歌德第三次去瑞士旅行。旅行中，瑞士民族英雄威廉·退尔的故事再次引起了歌德的兴趣，他给席勒写信说：“我确实认为退尔的故事可写成一部叙事诗”。但是，歌德的叙事诗并没有写成，倒是席勒写出了著名的剧本《威廉·退尔》。对于威廉·退尔这一素材从歌德向席勒的转移过程，歌德在 1827 年 5 月 6 日与爱克曼谈话时做了详细说明。

歌德不仅在剧本创作上给予了席勒有力的帮助，还在魏玛剧院全力推出席勒剧作的演出。席勒的剧本《华伦斯坦》、《威廉·退尔》、《玛丽·斯图加特》以及《迈西纳的姑娘》全都是在魏玛剧院首演，只有《奥尔良少女》的首演是在莱比锡举行的。在魏玛剧院，每三至五天就要上演一次席勒的新的或旧的剧作。歌德对席勒剧作的支持建立在他对席勒戏剧才能的充分肯定上，虽然他不喜欢《强盗》和《堂·卡洛斯》中那种使他重返激动狂热的青年时代的热烈气氛，但他对席勒的才能从来都是肯定的。

如果说歌德以自己的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立场影响了席勒并在创作的具体问题上也对席勒的诗歌和戏剧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话，席勒对歌德的贡献则是他把歌德从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沉迷中重新拉向了文学，用歌德的话来说，席勒给他带来了第二次青春，使他重新成为诗人。

在与席勒亲密合作的 10 年里，歌德除叙事谣曲和美学通信

外，还完成了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叙事长诗《赫尔曼和窦绿苔》，诗剧《浮士德》的第一部也在1806年春完稿。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是由歌德青年时代创作的《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发展来的。青年歌德原计划将《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写成12卷，从1777年2月到1785年11月，他完成了小说的前6卷，接着又起草了后6卷的写作计划。随之而来的意大利之行改变了歌德对这部小说的最初打算，他决定将威廉·迈斯特的活动天地由狭小的剧院引向广阔的现实社会生活，因而对旧作进行了彻底的改写。1796年10月，内容分8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全部完成，而在此之前的1795年，歌德就已分3册先期出版了它的前6卷。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歌德得到了席勒多方面的帮助和督促。早在1794年，席勒就在《时序女神》上刊载了小说的前几章，以后，他又写了许多长信，与歌德商讨小说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看法和意见。不管席勒的意见是否富有成效，有一点是大家都不否认的，那就是，如果没有席勒的热切关心和督促带给歌德的动力，《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也许还要长时间甚至永远地作为一个半成品终止在歌德与席勒结盟前的状态里。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作为德语文学中发展小说或教育小说的开山和典范之作，在德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它的主旨，歌德在1825年1月18日与爱克曼谈话时说：

"……此外，这是一部最不易估计的作品，连我自己也很难说有一个打开秘奥的钥匙。人们在寻找它的中心点，这是难事，而且往往导致错误。我倒是认为把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现在眼前，这本身就有些价值，用不着有什么明确说出的倾向，倾向毕竟是诉诸概念的。不过人们如果坚持要有这种东西，他们可以抓

住书的结尾处弗列德里克向书中主角说的那段话。他的话是这样：'我看你很像基士的儿子扫罗。基士派他出去寻找他父亲的一些驴子，却找到了一个王国。'只须抓住这段话，因为事实上全书所说的不过一句话。人尽管干了些蠢事，犯了些错误，由于有一只高高在上的手给他指引道路，终于达到幸福的目标。"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讲述的是商人的儿子、市民知识分子威廉·迈斯特由热爱戏剧到投身社会，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逐步成长、成熟的身心发展过程。威廉由木偶戏爱上了文艺，不愿子承父业，对女演员玛丽安妮的爱情更加强了他内心的这种倾向。虽然对玛丽安妮的爱情的失望使他在一个时期放弃了从事戏剧活动的初衷，转而从事了几年商业经营，但一次商务旅行时看到的业余戏剧演出又使他心中涌起了对戏剧生涯的热爱和向往。他将某个剧团残留下来的演员们团结在一起，资助他曾救过的梅林纳夫妇创建了一个流动剧团。威廉自己也留在了这个剧团里参与活动，后来，他又赎买了在马戏团里倍受虐待的意大利少女迷娘和一个实际上是迷娘生父的精神失常的老琴师，让这一老一少也在剧团里谋生。剧团在一个伯爵的府邸演出后，威廉被选为剧团的经理，不幸的是，剧团在奔往一个城市的路上遭到了强盗的袭击，伯爵赏赐的财物尽被洗劫一空，威廉也在奋勇抵抗时受了枪伤和刀伤。在一位适时赶到的女骑士和她的随从们的帮助下，威廉从昏迷中被救醒过来，但剧团已无法再维持下去，演员们只好去投奔了威廉从前结识的一个朋友——某城市一个固定剧团的经理塞洛先生。父亲去世后，威廉希望通过艺术来获取贵族们而非商人、市侩们所拥有的全面教养，因而决定过舞台生涯。他在塞洛的剧团里参加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演出，成功地扮演了主人公哈姆雷特，以后又成了剧院的导演。但威廉与塞洛的合作没能持久，出发点和目的的不同使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塞

洛与梅林纳计划兴建歌剧院，已不受欢迎的威廉离开了剧团，带着塞洛的妹妹奥蕾莉临终前交给他的信，去见奥蕾莉过去的男友罗大略。罗大略是位经历过美国独立战争的开明贵族，他主张废除农奴制，对德国农业进行改革。在罗大略家里，威廉加入了由罗大略等人组织的具有共济会性质的“塔楼会社”，并获得了毕业证书。最后，威廉不仅与罗大略的妹妹娜塔丽——昔日救过他的那个女骑士结为伉俪，还意外地得到了他与玛丽安妮的儿子费利克斯。

在小说中，威廉·迈斯特代表“美学的道德的梦”，他代表了歌德社会改良思想中为上层市民阶级指出的努力方向。在威廉身上，既体现了歌德以艺术进行自我教育的思想，也体现了他注重更广泛的社会实践的思想。

罗大略代表“英雄的积极的梦”，在他身上，歌德寄托了对贵族阶级的期望。作为一个理想化了的开明贵族，罗大略胸怀大志，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开阔了眼界。他自愿放弃某些特权，主张取消封建剥削，对土地实行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还向农民分送财物。在他身上，歌德展示了社会改良的充分可能性以及改良的必由之路。

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中，歌德试图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作史诗化的处理。他将上层市民、演员、贵族、教父、流浪者等各阶层的人物全部纳入到一个宽松的结构里，并在每个社会阶层下面，又区分出该阶层人物的不同类型。在这幅全景式的社会图画里，英雄、小丑、奸诈者、昏庸无能之辈、被软弱意志所毁灭的人、为世俗之利而不断钻营者以及代表真正宗教信仰的人形成了缤纷的不同色调，而古老的乱伦与惩罚的故事以及神秘女孩迷娘的引入，则为小说在总体的现代意识和现实主义风格之外又增添了古代命运悲剧的味道和浓郁的浪漫色彩。小说中迷

娘和其生父琴师吟唱的歌曲是歌德抒情诗歌中的杰作，极富音乐感，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其中，《迷娘》一首因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李斯特以及柴可夫斯基等人的百余种谱曲，更成为流传世界的千古绝唱。

尽管《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反响，批评界对它并未采取沉默不语的态度。在对小说的否定意见中，赫尔德尔等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批评歌德为了追求真实而牺牲了善和高贵，而尼克莱则从恶意和报复出发，把整个作品说成“胡说八道”。倒是诺瓦利斯站在浪漫主义美学立场上对小说作出的评价可以使我们从反面认识到歌德这部重要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和它有别于启蒙——狂飙突进文学的现代意义。诺瓦利斯在他的《片断与研究》中这样惋惜道：“《威廉·迈斯特》某种程度上完全是散文的和现代的。浪漫主义在此中完结了——自然诗和奇迹也都完了——，它处理的完全是日常的人世间事情。自然和神秘主义完全被遗忘了。这是一个诗化了的市民和家庭的故事。奇迹在这里被表现为诗和狂热。这部书的精神是艺术的‘无神论’。”

在1800年2月23日给另一重要浪漫派作家蒂克的信中，诺瓦利斯又写道：“代替去把喜剧女演员造就成缪斯，却把缪斯看成了喜剧女演员。……这有着一种伟大的技艺，在《威廉·迈斯特》中诗借此消灭了自己，而当它在背后破灭了时，经济与它的朋友一道坚固牢靠地站稳在地面上。……”

在包括席勒、克尔纳、威廉·洪堡和施莱格尔兄弟等人在内的赞扬者中，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在其《雅典娜神殿——断片》中的一句评价最精当地指明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的划时代意义。这句常常被引用的话是：“法国革命，费希特的《科学论》和歌德的《迈斯特》是世纪的最伟大的倾向。”

和《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相比，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的命运要好得多，它受到多层次多国别读者的欢迎，很快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首叙事诗的素材取自1732年出版的小册子《善待萨尔斯堡移民的盖拉市》和1734年出版的《由萨尔斯堡大主教领地被驱逐的路德教徒移民全史》。歌德试图在这部叙事诗中把一个德国小城市中的纯人性的存在从渣滓里分离出来，并同时力图从这样一面小镜子里反映世界舞台上的伟大运动和变化。

叙事诗讲述的是发生在大革命时期的莱茵河右岸一个德国小城中的故事：在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居民因战乱而纷纷逃往右岸的日子里，金狮楼饭店的老板和他的妻子让自己家的独生子赫尔曼用马车载上衣物和酒食去接济路过此地的左岸难民。赫尔曼因上路迟而错过了难民的人流，在追赶难民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位健壮、美丽的左岸姑娘窦绿苔，她正牵引一辆载着一个产妇和新生儿的牛车，去城效宿营的村子与众难民会合。窦绿苔请求赫尔曼给产妇一件衣服来包裹婴儿，并告诉赫尔曼她怎样救了这个产妇。赫尔曼对窦绿苔既爱慕又敬佩、信任，把自己所带的衣物、酒食全托交给她分配，自己动身回家了。

回家后，赫尔曼流露出欲娶妻之意，父亲建议他娶街坊一个富家女子，赫尔曼不肯，并与父亲发生争执。在母亲的说合下，父亲同意由神父和药材店老板陪赫尔曼前去对窦绿苔进行考察，以此来决定是否准许赫尔曼娶窦绿苔为妻。

在逃难者宿营的村子里，神父和药材店老板从窦绿苔原来的村长那里了解了窦绿苔济危扶困的善良和自卫杀敌的勇敢，对她的体貌也十分满意。但当他们到村口准备向等候在那里的赫尔曼道喜时，却发现赫尔曼心情沮丧、烦躁不安。原来，在焦急的等待中，赫尔曼想到窦绿苔可能已有了心上人，担心自己的爱情会

被拒绝。出于作者的有意安排，药材店老板没有让神父说出窦绿苔的未婚夫已死在法国的真相，听凭赫尔曼按照自己拿定的主意亲自去征询姑娘的意见，而他们则先回赫尔曼家去了。

窦绿苔来到村外的涌泉边打水，见到了正在这里踌躇的赫尔曼。赫尔曼对窦绿苔说希望她能到他家去侍奉他的双亲，窦绿苔以为是让她去做使女，一口答应了下来。赫尔曼本欲进一步说明实情，但看到窦绿苔手上的戒指，就把话又吞了回去。

两人辞别众难民回到赫尔曼家后，天上下起了大雨。赫尔曼的父亲不知儿子尚未向窦绿苔求婚，他的玩笑话刺痛了窦绿苔。原来窦绿苔也爱上了赫尔曼，赫尔曼父亲的话使她更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感情以及一个使女与主人间的差距，为了避免日后痛苦的结局，她决定冒雨返回难民营地。这时，赫尔曼的母亲使一切真相大白，两个年轻人戴上了从赫尔曼父母手上取下的戒指。

歌德于 1794 年时发现了这部叙事诗的题材，当时他想把它处理成戏剧。1795 年，歌德极为赞赏的格廷根诗人福斯发表了牧歌《路易斯》，歌德受其启发，于 1796 年 7 月转而决定写一部“现代的牧歌”。1796 年 9 月 11 日，歌德在耶拿开始动笔写作《赫尔曼与窦绿苔》，到 1797 年 9 月 7 日正式定稿，前后共花了一年时间。其间，席勒夫妇和威廉·洪堡给予了歌德督促和帮助。

在《赫尔曼与窦绿苔》中，歌德对本民族的当代生活内容做了古典化的处理，赋予了这种生活以明快、质朴、健康的古典色彩，人物性格刻画也力求简约，只展现其理性、道德和坚强的一面，而把欲望和各种杂念完全剔除或控制到了所能达到的最低限度，从而使现代的生活内容与古典的形式达到了完美的和谐统一。可以明显看出，在追求质朴、简洁、明快的叙述风格的同时，歌德也在寻求情节的起伏多变，只不过这种追求极其谨慎，完全被控制在不喧宾夺主、不破坏诗歌总体风格的限度以内。正

因如此，这些小起伏显得有些拘谨和不自然，有明显的人为痕迹和戏剧因素。如药材店老板隐瞒窦绿苔的未婚夫已死在法国一事，以及最后一歌里神父故弄高深地教训窦绿苔一段，都似与特定情境中的情理不符，甚至显出对某种喜剧手法与效果的追求。这些，大概与歌德最初构思此故事时打算采用戏剧形式有关吧。误会、偶然性因素和诗中人物故意造成的延宕，以有限的戏剧方式加入到了古典形式的叙事诗中来，而诗中所发生事件的时限之短，使这一现象更加引人注目。整个叙事诗所讲述的相遇、求婚到订婚的故事，发生时间不到 24 小时，这一处理方式也具有明显的戏剧化特征。

就对法国革命的态度而言，歌德在这首叙事诗中无疑显示出了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所应具有的那种全面把握运动中的纷繁现实的能力和严肃地追求历史真实面目的态度。叙事诗从一个侧面真实描绘出了大革命造成的复杂社会效应，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那一阶段的社会历史真实。我们可以指责一个思想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对一个作家来说，他完全有权利也有责任在思想家已道明了的大趋势之外，将那些细小的曲折、沟坎和陷阱补缀、描绘出来，以使历史得以真实地还原，使后来人真正认识到每一历史进步所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不过，叙事诗结束时赫尔曼那一大段慷慨激昂的类似于反法声明或动员令的话，似与人物性格不符，诗中窦绿苔“世界的纽带已经松开”一处分析世界局势的话也有明显的代作者言的味道。

《赫尔曼与窦绿苔》的最令人惊异之处，莫过于歌德对情景与场面的描绘与把握了，它显示出了歌德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和精当的捕捉现实世界特点的能力。在第一歌中，药材店老板向赫尔曼的父母讲述难民逃难情景的一段话，简直比一架摄像机所能给我们的印象还要直观、清晰。

《赫尔曼与窦绿苔》是歌德最欣赏的自己的作品之一。在1825年1月18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说过这样的话："《赫尔曼与窦绿苔》在我的长诗中是我至今还感到满意的唯一的一部，每次读它都不能不引起亲切的同情共鸣。我特别喜爱这部诗的拉丁文译本，我觉得它显得更高尚，仿佛回到了这种诗的原始形式。"

不过，歌德也曾说过这样的令人起疑的话："至于说到情节，在《赫尔曼与窦绿苔》中，我终于迎合了我们德国人的意愿，他们无比满意，现在我在考虑，我是不是再写一个同样类型的剧本。没问题，所有的德国剧院都会上演它，所有人都会毫无例外地称颂它，哪怕作者本人对他持完全相反的看法。"①

在当时批评家们的正面评论中，施莱格尔兄弟的评价仍然是引人注目的。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它是歌德诗作中最热烈的、最真挚的、最质朴的和最道德的。……这部诗作显然是以这样的意图写就的：既是古老的荷马叙事诗，又使存在于总体中的浪漫主义精神成为可能。"

虽然施莱格尔兄弟试图将《赫尔曼与窦绿苔》拉入浪漫主义作品阵营中的做法未必恰当，但以上评论却为我们理解这首叙事诗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死神

从1794年到1805年，歌德与席勒这两位德国文化的天才人物一直保持了十年亲密合作的关系，在此期间，两人尤其是席勒

① 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甘木等所译德国艾米尔·路德维希之《歌德传》第372页。

写出了许多重要作品，每个人都给予了对方全力、无私的帮助。然而正如人们所说，歌德与席勒的亲密关系并不像歌德与克内贝尔以及后来的策尔特的友谊那样建立在情同意合的基础上，联系着他俩的是毋宁说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精神呼应，而且是类似于南北两极的呼应。在歌德看来，他与席勒精神上的距离比地球的直径还要大，是永不会重合的两极，而在生活方式上，两人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 1827 年 10 月 7 日与爱克曼谈话时，歌德举例向爱克曼说明了这一点：

> 我也说过，而且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和席勒的性格很不同，尽管志向一致。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心理方面，也表现在生理方面。对席勒有益的空气对我却像毒气。有一天我去访问他，适逢他外出。他夫人告诉我，他很快就会回来，我就在他的书桌旁边坐下来写点杂记。坐了不久，我感到身体不适，愈来愈厉害，几乎发晕。我不知道怎么会得来这种怪病。最后发现身旁一个抽屉里发出一种怪难闻的气味。我把抽屉打开，发现里面装的全是些烂苹果，不免大吃一惊。我走到窗口，呼吸了一点新鲜空气，才恢复过来。这时席勒夫人进来了，告诉我那只抽屉里经常装着烂苹果，因为席勒觉得烂苹果的气味对他有益，离开它，席勒简直不能生活，也不能工作。

相比较而言，歌德一直保持着比席勒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歌德的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他只在早晨写作，而且经常住在郊外的花园别墅里，还喜欢骑马、滑冰等体育活动。他喜欢饮酒，但从不吸烟，他把烟草、臭虫、大蒜味以及教会的十字一起列为他最不能忍受的东西。但席勒平时却很少接触大自然，大部分时

间呆在屋子里，而且几乎不进行什么体育锻炼，晚上休息得也很晚，还大量吸烟。

从1799年起，席勒就放弃了耶拿大学的教授职务移居到了魏玛。生活细心的歌德对席勒非常关心，他帮席勒在魏玛租赁住宅，关心他冬天烧多少劈柴，还帮他挑选壁纸、布置房间。席勒结婚生子后，经济拮据，歌德便借钱给他，还替他的内兄在宫廷里安排了一个职位。尽管如此，常年辛苦的工作和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是很快摧毁了席勒的健康。和面色红润的歌德相比，比歌德年轻11岁的席勒的面孔常是惨白的，有一次画家迈耶尔竟拿席勒面孔与十字架上的基督相比。对席勒的身体状况，包括歌德在内的朋友们一直都非常担心，但席勒是一个以狂热方式投入工作的人，当他为家庭经济负担所迫时就更加不顾一切地拼命工作。1827年1月18日，歌德与爱克曼谈话时说：

> 身体的自由对少年时代的席勒起了那么大的影响，这固然有一部分由于他的精神性格，大部分却由于他在军事学校所受到的拘束。等到后来他有了足够的身体自由，他就转向理想的自由。我几乎可以说，这种理想断送了他的生命，因为理想迫使他对自己提出超过体力所能及的要求。
>
> 自从席勒到魏玛来安家，大公爵就规定每年给他1000元的年金，并且约定万一他因病不能工作，还可以加倍颁发。席勒拒绝接受加倍的条款，没有使用过加倍的那部分年金。他说，“我有才能，可以靠自己过活。”到了晚年，他的家累更重，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每年写出两部剧本。要完成这项工作，他往往在身体不好时也被迫一周接着一周、一天接着一天地写下去。他的才能每个小时都须听他指使。席勒本来不大喝酒，是个很有节制的人；但是在身体虚弱的

> 时刻，也不得不借喝酒来提精神。这就损害了他的健康，对他的作品也有害。有些自作聪明的人在席勒的作品中所挑出的毛病，我认为都来源于此。凡是他们认为不妥的段落，我可以称之为病态的段落，因为席勒在写出那些段落时适逢体力不济，没有找到恰当的动力。尽管我很尊敬绝对命令，知道它可以产生很多的好处，可是也不能走向极端，否则理想自由这种概念一定不能产生什么好处。

可以想像，来自歌德的经济援助并不比来自公爵的经济援助更能令席勒接受，他像所有的男人一样怀有养家糊口的义务感和荣誉感。同时，对于一个以写作为天职的人来说，如果他不能再进行创作，那也就意味着他的生命已经完结。

自1800年起，席勒就患了重病。1801年，拉瓦特尔去世，而歌德则染上了有生命危险的面部丹毒。1802年，歌德昔日爱慕的女演员科罗娜·施勒特尔去世，次年，赫尔德尔也离开了人世。赫尔德尔因对法国大革命持始终一贯的拥护态度而失去了公爵的宠遇，与歌德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隔膜，他心情抑郁，对歌德不无怨恨和不满，终于在孤独中郁郁而死。赫尔德尔去世的时候，歌德正在耶拿，他没有回来参加赫尔德尔的葬礼，——像从前一样，面对死亡，他宁可顾左右而言他，以此来压抑心中所有会毒化眼前和未来生活的思想和情绪。但席勒的死他却没能躲过去，他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1804年2月，席勒完成了《威廉·退尔》，7月，旧病复发，10月，病情稍稍好转后，他又投入了他的最后一个剧本《德米特留斯》的写作，但他终于没能将它完成。

1805年，灾难性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从1月起，歌德因着凉而发烧，接着是肾绞痛，高烧持续一个星期，接下去是双目失

明。歌德已经56岁了，他的生命开始受到死亡的威胁。紧随歌德之后，2月9日，席勒又再次发病，这一病，他就再也没能恢复过来。往常席勒生病时，他总能从歌德那儿找到精神支撑，现在两人都卧病在床，他们只好靠交换纸条来相互鼓舞。类似下面这样的简短文字足以使任何读到它们的人都深受感动：

“好像，我的身体终于恢复原样了。我渴望见到您。”

——歌德

“也许，如果明天风停了，我会鼓起勇气前来看您。”

——席勒

歌德的病情好转些后，他每周都去探望席勒。5月1日，席勒想去剧院看演出，歌德那天感觉身体很不好，还是陪席勒一起去了。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5月9日，席勒就与世长辞了，年龄才45岁。

当时，没有人敢把席勒的死讯告诉歌德，诗人福斯的儿子亨利希·福斯为后人记下了当时的悲惨情景：

> 当传来席勒死去的消息时，迈耶尔在歌德身旁。迈耶尔被唤了出去，但他没有勇气再回到歌德身边，而是不告而别。寂寞，歌德感到的寂寞；慌乱，他到处察觉到的慌乱；躲避，他看到人们在尽量对他躲避；这一切使他感到有些不安。终于他说道：“我知道，席勒一定病得很重，”整个晚上他都在不安地思索。好心的符尔庇乌丝却镇静得多，她没有使歌德觉察到什么，只是说席勒长期昏迷不醒，但会好起来的。歌德信以为真了……清晨他对符尔庇乌丝说：“昨天席勒病得很厉害，真的吗？”他说“很厉害”时语气很重，这使她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她没有回答，开始大声抽泣起来。“他死了？”歌德固执地问道。“你自己已经说出来了！”她回

答说。“他死了”，歌德又重复了一句，把脸转向一侧，用双手捂住眼睛，哭了起来，一个字也没有说。

5月11日深夜，人们为席勒举行了葬礼，歌德没有参加。但他并没有让席勒的死也像其他朋友的死一样默默无闻地过去，在尝试完成席勒的未竟遗作《德米特留斯》失败后，他写了《〈大钟歌〉跋》作为演出席勒的抒情长诗《大钟歌》的终场诗。1826年9月24日，歌德又把人们鉴定出来的席勒颅骨带回家保存了一个时期，并在保存颅骨的第二天写下《席勒的遗骨》一诗，再次对这个卓越的朋友表示悼念。

危机

用歌德自己的话来说，席勒的死使他失去了自己的一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歌德陷入了精神上的孤独处境和创作上的停滞状态。在给柏林音乐家卡尔·弗里德利希·策尔特的信中，歌德写道：“我真的应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在我此后的岁月里却没有路了。现在我每天只是径直地望着眼前发呆，随手做些事情，而不去想到有什么结果。”

实际上，歌德精神上的孤独感从他与席勒合作的晚期就开始了。两人思想上的巨大差异使他们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受到限制，只能在有限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在有关时代与文化的重大问题上，他们交谈得越来越少，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无法与对方达成一致。即使在其他方面的交流上，有时也不能顺利地进行，因为两人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当歌德晚上想和席勒一起聊天时，席勒却正准备投入将持续到深夜的工作，而早晨席勒什么也干不下去的时候，歌德却在进行口述或写作。

虽然歌德多年来只承担文化大臣的工作，但各种各样的烦琐事务仍令他头疼不已。他要签署有关公文，并把公文涉及到的内容巨细无遗地记入自己的记事本中，什么为外国建筑师确定食宿标准啦，给建造宫殿的工匠、帮工、石匠们定级啦，设计和确定图书馆书架的样式和表面光洁度啦，甚至小酒店老板要求增设弹子房这类事也包括再内。他还要领导魏玛剧院，管理大学，创立新的文化机关，而剧院的演员，大学里的教授和大学生，环绕在周围的伺机而动的反对者们，更是常使他心烦气恼，感到终日不得安宁。

歌德正式出任魏玛剧院总监是在他从意大利回魏玛两年后，即 1791 年。那年 4 月，新建成的魏玛剧院刚刚开幕，从 1 月起，歌德便接任了剧院的领导职务。但在此后的几年里，歌德并未实际参与到剧院的事务中去。只是到 1797 年 11 月，歌德从瑞士回魏玛后，才切实致力于魏玛剧院的领导工作。歌德首先着手的是对剧院进行改建，显然，与席勒的亲密合作是促使歌德关注剧院工作的重要动因。接着，剧院排演了席勒的剧作《华伦斯坦》三部曲之一——《华伦斯坦的军营》，并于 1798 年 10 月 12 日在改建后的剧院的揭幕仪式上上演。歌德为这次戏剧演出花费了很多心血，不仅选定音乐，分配角色，对演员的表演进行严格要求，对服装和道具也都亲自过问。1799 年席勒来魏玛后，协助歌德一起进行剧院的管理工作，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戏剧改革，努力致力于使魏玛剧院成为德国剧院的楷模和典范。歌德反对演员只演一种类型的角色，他建立了德国第一所戏剧学校，还让演员们研究古希腊雕塑的形体，直至每一根手指的姿势，并且制定了《演员守则》。歌德对剧院的管理是严格的，也是民主的，演员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如同吉普赛人，而歌德却善待并尊重他们，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还请他们到家里做客，以致于在家中招待演员

成为德国一时的风尚。尽管如此，歌德还是与一位叫雅格曼的女演员关系搞得很僵。雅格曼是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情人，也是魏玛一个档案管理员的女儿。雅格曼与卡尔·奥古斯特生下孩子后，歌德也像卡尔·奥古斯特曾经为他做的那样，做了雅格曼儿子的教父。但生活和工作毕竟是两码事，在角色分配上，在其它与剧院有关的事宜上，歌德不可避免地会与这个身份特殊的女演员发生冲突，而这势必影响到公爵与歌德的关系。不断产生的与雅格曼的矛盾使歌德不胜其烦，他请求辞去剧院的领导职务，但公爵不予准许，歌德只好继续在不利的环境里工作下去，而雅格曼则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反对歌德，经常在公爵面前说歌德的坏话。

出生于魏玛的戏剧家科策布也是歌德的一个对头。一次，为了羞辱歌德，科策布提议为席勒举行一个规模盛大的庆祝会，被歌德明令禁止了，于是，歌德就给科策布和他的同党们留下了嫉妒席勒的口实。结果，耶拿的大学生们不顾歌德的禁令，在剧院里为席勒举行了庆祝会。被违命者惹火了的歌德立刻写信给耶拿大学的各系，训斥那些参加集会的学生们的做教授的父母们没有管好自己的儿子。不仅如此，歌德还要求维兰德以后不在杂志上发表科策布的文章。歌德的专断和科策布的煽动激起了人们对歌德的强烈不满，一些教授辞职离开了耶拿大学，而一家著名的报纸也迁移到了别的城市，人们在剧场里对那些拥护歌德而又受歌德保护的年轻作家如弗·施莱格尔的戏剧演出发出哄笑，甚至逼得歌德不得不在包厢里站起来，厉声喝道："不许笑！"在一个正规剧院里，这是多么大煞风景的一幕呀！

在席勒的帮助下，歌德于1794年恢复了与施泰因夫人的友谊，这使歌德在林立的敌对者中又多了一个朋友。歌德依然喜欢施泰因夫人的小儿子弗里茨，并通过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为弗里

茨在普鲁士谋了一个职位。歌德也把自己的孩子奥古斯特送到施泰因夫人那里，并给她写了一个感人的便条："请允许我那可怜的孩子能享有守着您、在您身边受教育的幸福。您这样关怀着他，使我一想到这一点就非常感动。"

歌德重又像过去那样给施泰因夫人送水果，请她和其他贵妇到自己家里来做客。但尽管施泰因夫人已接受了克里斯蒂安娜存在的现实，她对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并不欣赏。"只要什么地方没有出现高尚的情感，他就立刻往这些地方多多少少抹上一把污泥，好让人类天性中那些神圣的东西荡然无存。"这就是施泰因夫人对《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的道德评价。

倒是忠实的克里斯蒂安娜·符尔庇乌丝给予了歌德更多无条件的关心和支持。随着歌德年龄不断增大，离开克里斯蒂安娜，他简直无法生活下去。虽然克里斯蒂安娜没与歌德正式结婚并被排斥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之外，但她实际上已经稳固地取得了在歌德家中的主妇地位，甚至早在他们相识一周年时，歌德就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结婚了，只是没有履行宗教手续。"不错，歌德没有把克里斯蒂安娜立为遗产继承人，但她却掌管歌德家里的财政大权。歌德的爱和尊重给了克里斯蒂安娜心理上的稳定感，她完全没有依附于人的那种女子的种种陋习，生活勤俭，家务都料理得井井有条。每天早晨6点歌德开始工作时，克里斯蒂安娜便在花园里种土豆，或修剪花草，而当歌德外出时，她总利用自己有限的文化给歌德寄去一封封朴素而又感人的信。

"您的那些房间以及整个住宅已经收拾得有条不紊，它们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自己主人的归来。也许，这一回你会比往常工作得更有成效些？这里你可以躺在床上口授，像在耶拿一样。而在你自己没有召唤我的时候，我不会在早晨走进你的房间……亲爱的人，没有你，我在家里实在很不好受……明天我要开始熨衬

衣，为的是打发时光。”

“我感到遗憾，小说都没动，哦，没什么，它总会动的。可别马上就陷入失望。我们会把线纺得更勤点。”

多么谦卑、温柔、体贴，多么善于安慰和鼓舞。然而，不仅如此，她还能敏锐地觉察出潜在的危机和将要临头的危险，及时收紧那套在天才脖子上的缰绳：

“如果你一定要去意大利，或者长时间地去别的什么地方而又不随身带着我，那我就带着古斯德利一道，干脆住在大路上，因为我宁可风餐露宿……也不愿再长久地和你分离！”

克里斯蒂安娜的这段文字写于她和歌德同居近 10 年后的 1797 年。那一年，歌德写完几首叙事谣曲之后就急切地想做瑞士之游。尽管从 1796 年就开始的拿破仑对意大利的远征使意大利周围战火纷飞，这并没有使他放弃远行的打算，相反，对于得到的处处交通堵塞的消息他几乎忍无可忍。在指定儿子为遗产继承人、烧毁了一些信件之后，歌德于 7 月底踏上了艰险的旅程。在苏黎世，他找到了在家养病的迈耶尔，两人一起在瑞士各地游览，收集资料，直到 11 月底才返回魏玛，而在返回魏玛之前，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本来是意大利。歌德已经写完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和《赫尔曼与窦绿苔》，只是后者还未最后定稿，他需要着手一部新的作品，找到新的创作点。计划中的意大利之行，就是为了写一部关于意大利艺术的专著，也不无躲开魏玛的上流社会和自己的家庭之意。

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娜同居 5 年后，克里斯蒂安娜的妹妹和姑妈也搬进了歌德的家，克里斯蒂安娜的哥哥也在歌德家住了很长时间。所有的人都极力想为歌德做点儿什么，但他们给歌德带来的烦恼总是大于他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好处。歌德不仅要关心克里斯蒂安娜的哥哥，还要为她妹妹的情人操心——那个年轻贵族跑

到歌德家里，而他的家人找上门来请歌德劝他回家。在歌德的家里，克里斯蒂安娜与她的几个亲人仿佛又自成一家，歌德就像把一个市民社会搬到了自己家里。但他不忍心赶他们走，于是自己便常常外出。冬天耶拿的房子里无法取暖时，他甚至宁肯临时在别人家赁一间屋也不回魏玛，当然，回到魏玛，他要面对的不仅是克里斯蒂安娜一家，还有无数的拜访和交际。

克里斯蒂安娜胜利了，歌德写了一首叫《阿明塔斯》的哀歌，并给克里斯蒂安娜写信道："别提什么危险，再危险我也敢到意大利去，但要我远远地离开你们，我感到受不了。我是多么希望和你在一起，在我们那绿色的凹室里，晨昏夕暝，每天向你问好，从你手里接过早餐……别离——这是件可怕的事，简直跟死差不多。"

尽管如此，歌德仍频繁地离开家到耶拿去，有时甚至一年中有半年是在耶拿度过。当然，有时克里斯蒂安娜也会带着孩子到耶拿去看他，有时，他也会突然悄悄地在夜晚返回家，而一大早又离开。歌德对克里斯蒂安娜日益明显的矛盾感情在上面提到的《阿明塔斯》那首诗里反映得再清楚不过了。据说，当时歌德看到了一株被常青藤缠绕的苹果树，由此联想到他与克里斯蒂安娜的恋情，于是写下了这首诗，表达了一种欲摆脱克里斯蒂安娜而又不忍、不能的善良和依恋心理。

歌德没有割断缠绕着他的常青藤，而且随着战争动乱岁月的到来，他又以婚姻这一法律形式将自己与克里斯蒂安娜的关系拉得更紧密了。

第八章

风云激荡

占领区的婚礼

当歌德和席勒在他们的作坊里打造古典时期的经典作品的时候，法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群雄争霸之中，在战场上崛起的青年将领拿破仑最终被大资产者们选定为他们利益的代言人，雾月政变之后，拿破仑凭一双铁腕迅速把各项重要权力收拢在自己手里，并最终在法国建立起帝国统治。1805年4月，当席勒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英国和俄国结成了第三次反法联盟，奥地利和普鲁士先后加盟。12月26日，联盟以失败而告解体，奥地利向法国割地赔款，损失惨重，而普鲁士因尚未参战并看风转舵使实力得以保存下来。拿破仑将被他控制的

16个德意志小邦组织在一起，形成“莱茵同盟”，在同盟内推行法国的政治制度，实行他亲自主持制订的《民法典》，加速了这些邦国的资本主义进程。

关于发生在拿破仑法国与欧洲封建诸国之间的这场战争，《拿破仑传》的前苏联作者叶·维·塔尔列在传记中写道：

“这里发生冲突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两种不同的国家制度，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军事策略和两种不同的军事组织。这是典型的农奴制的、封建专制的、工业落后的、只有十分原始的技术的国家，同经历了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封建主义和农奴制度的国家的冲突。……普鲁士军队则确实是反映自己国家的农奴制度的一面镜子。士兵就是过去挨地主皮鞭的农奴；他们被军官用马刀的刀背砍，用皮鞭抽打，听凭任何一个比他职位高的人（从司务长开始）拳打脚踢，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士兵们坚信，不管他们作战多么勇敢，多么努力，都根本不会改善自己的命运。军官之所以是军官，只因为他是贵族，有些军官常常夸耀自己对待士兵如何残忍，因为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纪律。一些人成为将军，或者是因为年纪大，或者是因为有显要的保护人，或者是出身高贵。”

在这种情况下，胜败似乎不言而喻。1806年8月，拿破仑迫使1792年即位的弗兰茨二世退位，存在千年之久的“日尔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覆灭。1806年9月，英国、普鲁士和瑞典结成第四次反法联盟，10月8日，拿破仑的军队三路进攻普鲁士的盟国萨克森。10月9日，普法双方在什列茨进行了第一次战斗，普军被法军击败，损失约700人。10月10日，扎尔费尔特城战斗，普军再败，损失近1500人，普鲁士的路易亲王被刺死，普军向魏玛地区撤退。10月13日晚，拿破仑进入耶拿城，10月14日，耶拿战役，普军节节败退，一部分残余部队被

法军骑兵追至魏玛，“在这里，普军伤亡特别大，士气高涨的法军骑兵大肆屠杀，不听求饶的呼喊，也不抓俘虏。普军全军覆没了。少数残余部队幸免于难，保存了士兵的外貌，其余的全部被打死或被俘，或者（大多数）下落不明。”普鲁士的布伦瑞克公爵在溃退中于距离耶拿约20公里处的奥尔施泰特附近遭遇法军达乌元帅的军队，受重伤身亡。耶拿战役的惨败使整个普鲁士陷入沮丧之中，拿破仑长驱直入，于10月27日进入柏林，“市长把首都的钥匙交给拿破仑，并且请求他赦免柏林。拿破仑下令要商店继续营业，生活照常进行。市民们怀着恐惧和尊敬的心情迎接皇帝，表现了绝对的服从”。与此同时，一系列强大的城堡未经任何抵抗便向法军投降，11月8日，最后一个要塞马德堡不战而降，普鲁士彻底垮台。

早在拿破仑大军逼近德国中部的时候，很多王公贵族就从魏玛逃走了，但歌德却没有走。也许他觉得没有人敢把他这个欧洲文化名人怎么样，也许他认为与其在这种年龄把自己那些费尽心血收集的标本、骨头、实验仪器以及各种艺术品弃置不顾，踏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终止的亡命旅程，还不如将生死交给命运。总之，歌德留了下来，他甚至在耶拿战役的前一天还到魏玛剧院去监督演出，而剧场里几乎空无一人。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夫人也没有离开宫廷，卡尔·奥古斯特则投入了他向往已久的普鲁士军队，成了一名将军。

歌德拿生命来下赌注是十分危险的，当时，魏玛城上空炮弹呼啸，歌德家的房子只是凭幸运才没有被炸毁。在耶拿战役中，无论是从耶拿溃退下来的普鲁士军人，还是随后追击而至的法国骑兵，都在魏玛城里进行了烧杀劫掠；魏玛剧院成了战地医院，而市民的家里则成了士兵们休息的场所。在普遍的恐怖中，歌德家里躲进了一些寻找庇护的市民，他们都想借助诗人的光环使自

己在混乱中幸免于难。

事实上，歌德的家也确实得到了城防司令保证安全的许诺。城防司令是个在耶拿大学学习过的魏玛本地人，他派人给歌德送去了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我请求歌德先生不要感到不安。根据拉恩元帅的命令，同时出于对伟大的歌德的尊敬，敝城防司令将采取在他权力范围内所允许的一切措施来保证歌德先生和他全家的安全。"但这种保证一开始并没有落到实处，歌德家本来被指定为法军的奥热罗元帅及其随从们的住所，但在奥热罗元帅未到之前，一些法国骑兵先行涌进了歌德家的大门。他们吵吵嚷嚷，要吃要喝要床铺，克里斯蒂安娜足足安排了40张床铺才把所有的人都安顿下。到了深夜，又有两个醉醺醺的步兵来砸歌德家的大门，并坚持一定要住在这里。房间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床铺了，当这两个士兵终于被放进门之后，他们先是要吃喝，接着便要见住宅的主人。歌德手里拿着蜡烛出现了，神态威严、庄重但并不流露出特别的敌意。两个士兵愣住了，他们要求与歌德碰杯，歌德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似乎无话可说了，于是歌德转回了自己的房间，但那两个士兵很快就追踪而至，用武器威胁歌德让出床铺。这可的确超出了歌德所能忍受的限度，他感到自己已经看到了坟墓，站在那里一动没动。正在这危急关头，闻声而至的克里斯蒂安娜带着一个仆人冲进了房间，她们不由分说，连哄带推地把两个士兵拽出了歌德的房间，并闩上了房门。两个士兵被带到了为元帅准备的房间，第二天一早就被到来的元帅的随从赶跑了。一切都似乎那么简单、平常，但对歌德来说，当那危险的一幕发生时，他的确摸到了死神的额头。

在一瞬之间，歌德经历了死与生，在一瞬之间，克里斯蒂安娜将歌德的生命又延长了25年！

对克里斯蒂安娜来讲，要保护歌德的愿望自然得已经成为本

能，而对歌德而言，克里斯蒂安娜的机智和奋不顾身却足以使他反观十几年来他为克里斯蒂安娜所做的一切。的确，他爱克里斯蒂安娜，他把自己对克里斯蒂安娜的爱在诗里大声讲给世人听，他不允许任何人对克里斯蒂安娜有不敬之辞，然而，他却一直在两种牺牲间徘徊，始终为上流社会的意见保留着一块合法的土地。由于没有正式的婚姻地位，克里斯蒂安娜一直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被人歧视的屈辱地位，她无法进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只能以同军官、士兵及大学生们跳舞、饮酒和骑马为乐。虽然歌德也陪克里斯蒂安娜一起去逛莱比锡市集，但在歌德50岁之前，他从未和克里斯蒂安娜一起在社交场合出现过，甚至在歌德50岁以后，没有正式妻子身份的克里斯蒂安娜也只是在魏玛以外的地方被上流社会接纳。开始时，年轻的克里斯蒂安娜无疑是不甘心自己的地位的，但时间久了，她便安于在有限的范围内自寻欢乐，有时也免不了以酒浇愁，当歌德长时间离家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多。歌德顾虑的是什么呢？除了私人方面的原因外，他也无法和上流社会彻底决裂，无法将上流社会的规则弃置不顾，因为那个社会太强大了，斗争的结果，被放逐的只能是歌德而不是那个社会。

然而当人们面对死亡的时候，还有什么浮世的名利追求能不显现出它脆弱虚幻的原形呢？死亡摘去人们的眼罩，让人抓住生命的真实。

“这些日子来，一个很久以来就萦绕在我脑际的想法终于最后成熟了：我要完全而公开地宣布我那年轻的女友为我的妻子，她为我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这严峻的时刻她和我在一起……请把您的答复立刻让我派去的人带回来，如果他能在您家中遇见您的话。劳驾了！歌德。”歌德派人给宫廷牧师送去这样一张便条，写在上面的话就仿佛57年来的智慧结晶。

10月19日，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娜在宫廷教堂法衣圣器室里举行了婚礼，证婚人是他们17岁的儿子奥古斯特和家庭教师里默尔，卡尔·奥古斯特和克内贝尔给歌德寄来了充满友谊的贺信。克内贝尔和歌德有相似的经历，歌德曾写信祝贺他的婚礼，并说出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必须在两种牺牲之间作出选择”那句话。

尽管魏玛的贵族们已经被大炮赶得七零八落，尽管战争已经使那条从一个贵族沙龙到另一个沙龙而连接起来的贵族的思想战线陷于松弛和破碎，但仍有一家报纸刊登了歌德和“他的女管家”结婚的消息，令歌德长时间气愤不已。其实，这又算得了什么呢？结婚对于歌德来说，既是对克里斯蒂安娜的报答和感激，更是他向自己17年前行为的回归。17年前，意大利之行使他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而今天，战争又使他重新认识到生命的本质！也许当时歌德并未意识到婚姻对他来说标志着他个人生活中一个时代的终结，但他肯定认识到了战争对德国来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 可是，在这悲惨的日子里，我并不过分/乐观，还有悲惨的日子在我们的后头：/因为世界的纽带已松开；除非等到/灾难已达到顶点，谁能再将它系紧？

窦绿苔的话语还在歌德的耳边回响，可是赫尔曼的声音到哪里去了？

> 在举世动荡之时，但愿我们的结合，/窦绿苔，更加牢固！我们要坚定持久，/一心一德，坚守住我们美好的产业。/因为，时代在动荡，如果人心也动荡，/只会使灾祸增

加，使灾祸更加蔓延；/而心志坚定的人，会创造自己的世界。/德国人不会助长这种恐怖的动乱，/也跟在后面摇摇摆，举棋不定。/这是我们的看法！让我们声明、主张！/因为，为了天主和法律，父母和妻儿，/进行战斗，团结在一起，抗敌捐躯，/这种果敢的国民，将永远受人赞誉。/你是我的；如今，我的更加是我的。/我不愿兢兢业业，而要以勇气和魄力/加以保卫和享受。现在或将来，如有/敌人来进犯，请给我武器，亲自装备我/只要想到有你照料家庭和父母，/我就能放心地挺起胸膛迎击敌人，/如果人同此心，那么，就能用武力/对付武力，我们就都能安享太平。

写这段道白的时候，歌德 48 岁，而现在，他已经快 58 岁了。代替刀枪，他让儿子和秘书带着各种酒类去大路上欢迎法国龙骑兵，而法军的奥热罗元帅也劝歌德赶紧利用贵族们四散奔逃的时机举行那势必被视为对贵族社会极大冒犯的贵族与平民的婚礼。“就伟人这个字眼的全部涵义来说，歌德是个真正的伟人。”这就是法军元帅在给歌德的保护令上对歌德的评价，而在魏玛，一个科策布就闹得歌德鸡犬不宁！对于拿破仑，歌德开始时只把他看成是一介武夫式的暴君，当拿破仑进军意大利时，他甚至担心迈耶尔带在身上的一幅绘画作品会落在那位波拿巴的手里，但拿破仑的作为越来越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助长混乱、此起彼伏、寿命短暂的波浪之一，而是一个力挽狂澜、在混乱中建立起牢固秩序的铁腕巨人。秩序，这是歌德生来就爱好的东西，早在 1793 年围攻美因茨时，他就说出了那句有名的不愿忍受混乱的话，现在，面对着代表拿破仑、要在德国的封建邦国中建立起资本主义秩序的将领和军队，除了哀怜那些无辜惨遭践踏的平民和他们的财产外，还有什么能让歌德感到对法国人的仇恨呢？

奥热罗元帅住进歌德家后，歌德家的门口加了岗哨，从而确保了歌德一家生命财产的安全，而随着耶拿战役的结束和拿破仑进入魏玛，魏玛城里也渐渐安宁下来，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短短的十几天里，歌德家里住进了三位法军元帅，其中之一是歌德在意大利旅行时结识的巴黎博物馆馆长德隆。德隆元帅为自己订购了歌德和席勒的画像，而歌德则带德隆去拜见公爵夫人，并力求他施加影响，对耶拿给予保护，因为那里不仅有歌德视若命根子的耶拿大学，还有歌德的许多朋友。歌德打听那些朋友的下落，给在炮火中遭受损失的朋友寄去钱、酒、衣服和食品，在一切都安排好以后，他便又开始了自己的写作。1806 年里，除 4 月份完成的《浮士德》第一部外，歌德还完成了《动物变形记》。

黑袍女郎和白衣少女

1807 年 4 月 23 日，优秀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塔诺的妹妹贝蒂娜来魏玛拜访歌德。这位后来因《歌德和一个孩子的通信》而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女作家，很多年里一直是人们推崇和蔑视的对象。鄙夷者把她说成是一个肉感而没有一点炽烈爱情的假惺惺的女人，不过是虚伪的浪漫主义者的最后一副麻醉剂，对于歌德的传记来说，就像对于他的生活一样没有任何一点意义，宽容和推崇者则将她视为一个富有浪漫气息的放荡不羁的才女，一个非凡的妇人，贝多芬和歌德之间的光荣无私的使者，一个百折不挠地为社会正义和政治自由而努力奋斗的显赫而高尚的战士。

“一个是……一个是贝蒂娜，疯狂而又明慧，梦似地度过一生，但她那梦游者的眼睛曾经在梦的深渊看见了许多当代那些最清醒的人也认不出的天才：贝多芬、荷尔德林，并且预告了大革

命。”这段话出自法国伟大作家、《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的光荣作者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一书，在该书中，罗曼·罗兰以大量真实材料和无可争议的雄辩，为我们活画出了一位传奇女子的肖像，不无辛辣地嘲讽了“那些不熟悉女性灵魂和缺乏同情心的人”。

这位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5至7岁的22岁的女作家于1785年生于歌德的故乡法兰克福，是歌德钟情过的那个莱茵省女子玛克西米丽安娜·拉洛塞——人们将她视为《少年维特之烦恼》中B小姐的原型——和她的丈夫、法兰克福商人布伦塔诺的女儿。贝蒂娜8岁时，母亲玛克西米丽安娜去世，12岁时，父亲去世。她先受教于女修道院，后在哥哥克莱门斯·布伦塔诺的培育下发展了艺术天赋。即使那些不承认贝蒂娜是诗人的人也不否认她有诗的才能。在贝蒂娜身上，有一种非宗教性质的神秘倾向，她常倾向于夸张的行为和将自己的境遇戏剧化，令人不由想起比她小3岁的英国诗人拜伦。罗曼·罗兰这样为我们描述贝蒂娜：

“身材短小，颜色黯淡、似乎无底的阴暗的眼，浓厚的黑色卷发，常穿着一件飘荡的黑袍，用一条粗的腰带系住，像进香客一样；不趋时髦，也不能遵守社会的狭窄的规矩；在椅子上坐不舒服，却常常盘膝在矮凳上，或栖息在窗台里；时而活泼狂笑，时而沉没在忧郁里：总之，一个活在梦里的大梦想家。”

17岁时，贝蒂娜开始接触歌德的作品。开始时她并不能理解它们，后来才逐渐感受到它们的吸引力。是一个意外的发现，促成了她对作者天真而炽烈持久的热情。21岁那年，贝蒂娜在外祖母家发现了歌德在1772年至1777年间写给她外祖母封·拉洛塞夫人的84封信，信中所表达的青年歌德对贝蒂娜的母亲——拉洛塞夫人的长女玛克西米丽安娜·拉洛塞的爱慕之情，一

下子拉近了贝蒂娜与这位素昧平生的作家的距离，将她引入了一个由狂飙突进时期的热血诗人的情感构成的虚幻境地。在对这些信件的反复抄写过程中，歌德对贝蒂娜母亲的热情渐渐灌注进了贝蒂娜这个充满幻想的女儿的血液，在那里引起了可怕的变化。冥冥中，贝蒂娜感到自己与曾经也是年轻美丽的母亲合为一体了："我真相信我从我母亲那里承受了这感情；她必定曾经和你深交，她必定曾经占有你，当我快要出世的时候。……"

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起，贝蒂娜身上的神秘、怪诞、戏剧化倾向才真正生长巩固起来，因为这一重大发现足以促使她确信自己命运的特殊性——上帝已借这些书信将她从众人中擢拔出来，将她拉向一条迥异于普通人的生活道路，而她自己，又是怎样怀着一种富于诗意的自我牺牲的意向而欣然前往的呀！

在发现那些信件的同一个月，贝蒂娜拜访了歌德仍留居于法兰克福的母亲。这个寡居的老夫人思念着自己唯一幸存下来的孩子，将儿子的崇拜者视同自己的亲生女儿。后来，贝蒂娜和歌德的母亲成了亲密的朋友，当贝蒂娜去拜访老夫人时，老夫人总将她记忆中的童年歌德的很多事情反复对贝蒂娜叙说，以此来安慰自己对儿子的惦念，也满足了贝蒂娜了解歌德的愿望。就这样，我们日后在《诗与真》中所见到的歌德的童年往事便首先从歌德的母亲那里流进了贝蒂娜的记忆，并在那里与她的情感和想像结合，成为她情感世界的一笔珍贵财富。

现在，贝蒂娜带着这笔财富和歌德青年时代的朋友韦兰的一封介绍信，女扮男装来到魏玛，她此时的身心状态，恰如一个梦游者，特别是当歌德热情地与她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并将自己的一枚戒指戴在她手指上的时候。那是一枚精致的古玩戒指，一位戴面具的妇人正冷冷地镶嵌在那儿，神秘莫测地面对着这个惊、喜、惧、悲交加的多情才女。这就是歌德的命运女神吗？如今歌

德将这命运女神交在她的手上，这意味着什么？对逝去人的未了心愿的补赎吗？对面前人的未来的许诺、暗示、抑或希望吗？无论如何，这是多么大的恩宠呵！这种恩宠足以慰劳贝蒂娜穿越战乱、长途跋涉的辛苦了。

当贝蒂娜把自己在魏玛的收获写信告知歌德的母亲的时候，那位可敬的老夫人回信道："你是我的女儿。愿我的儿子成为你的兄弟……我肯定他爱你。"

11月1日，贝蒂娜再次来魏玛拜访歌德。此前，她给歌德写过好几封信，但未收到歌德只言片语的回信。然而我们很难据此就认为歌德把贝蒂娜寄给他的书信、礼物看作是一种必须加以忍耐才能接受的打扰。显然，这位深谙人类心灵的谨慎的枢密顾问的沉默并不必然意味着贝蒂娜此行将遭到冷遇，相反，正像贝蒂娜所期待的那样，当她出现在歌德面前的时候，歌德便很难再坚守他那通过不回书信来维持的矜持和冷面，歌德不仅很乐意见到贝蒂娜，而且以一种非常亲密的态度对待这个他眼中的"小迷娘"。亲昵的谈话，挽着手臂的散步，最后的吻别，10天的时光已使歌德那由于意识到某种陷落的危险而刚刚筑起的防御工事岌岌可危了。

只不过是在去年，歌德才刚与克里斯蒂安娜正式结为夫妻，难道刚刚缔结的神圣婚姻就这样完了吗？不能找些什么缺陷把贝蒂娜从脑子里赶走吗？唔，也许她有点做作，也许还时常表现得过于兴奋，但这种做作和兴奋不正是青年歌德在弗里德莉克面前装扮小老板时的那种做作与兴奋吗？至于她对孩子的感情和习气的所谓模仿，有多少女子甚至男子不倾向于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扮演孩子的角色呢？歌德自己不是也曾表现出对施泰因夫人孩子般的依恋吗？卢梭不是也将华伦夫人称为"妈妈"吗？然而，贝蒂娜决不是个懂得隐藏、收敛的人，她整个儿交给她那率直的

天性的冲动，这虽然使她有一种天真和任性的美媚，但不受约束，过于狂热，这将会带来怎样的麻烦呢？真不知道像贝蒂娜所怀有的这种热情会满足于什么样的牺牲品，这个蹦来蹦去的山精，恐怕要将所有的人都拖向灾难。

然而，当 11 月 11 日歌德再次坐在自己的老朋友、耶拿书商弗洛曼家里时，所有的阴云烦乱好像都烟消云散了。米娜·赫尔茨丽卜，这个歌德从小看着长大的姑娘，她与贝蒂娜是多么不同呵！米娜总是穿着一身使人感到单纯、贞洁、轻盈的白色衣裙，——那黑色的衣袍相比之下是多么危险难测！——黑亮的眼睛有时也许会飘过一丝忧郁，却依然明澈、安宁，甚至连那目光的跳跃也给人一种静谧温馨的感觉，显示出她正常宁静的内心秩序。当她坐在钢琴前弹唱，恍惚如当年的丽莉，又使人想起那已经去世的迷人的女歌唱家科罗娜，然而这里却没有豪商巨贾的喧嚣，只有文人雅士的竞唱；在这个 18 岁少女的身上也没有那种出入于舞台的风情，只有天真未凿的青春散发出诱人的芳香。在聚集在这里的名流才子们的十四行诗的簇拥下，这个 18 岁的姑娘是多么使人愉快、令人神往呵！歌德的心被这个弗洛曼家的养女深深打动了。

歌德越来越陷入到一种客观的诱惑里，这种诱惑同时对他也是一种刺激。他从米娜纯净的眼神中知道自己已经老了，米娜只把他看作是一个可敬的、喜爱她的父辈，她的爱情却与他无缘。这种遭遇对刚被贝蒂娜穷追猛打的他来说，的确是难以被顺利接受。数天前在贝蒂娜面前，他还仿佛是个极有吸引力的青春少年，被一重重火热的情话所包裹，而今天他却成了年轻人们欢笑嬉戏的旁观者，虽然有时他也能通过努力将米娜吸引到自己身边来。歌德有点伤感，这伤感虽转瞬即逝，却像一方刀片一样在他的灵魂上划得很疼；它使他从一种迷误状态里惊醒，却丝毫不能

减低他汹涌增长的热情。

逃，惟有再逃，尤其在这条无望的路上。

12 月 18 日，感情仍在激荡的歌德再一次不辞而别返回魏玛，随身带着未完成的剧稿《潘多拉》、新创作的十四行诗，还有他的“旅行的干粮”——“必不可少者”——爱情。这时，他仿佛已不再是过去的歌德，在他的思想里，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风暴。

> 一切事情，不管是怎样要紧，/我就要开始丢弃得干干净净，/要紧的只是她的眼睛的光辉。/热烈的葡萄美酒，口腹的享受，/舒适、睡眠以及其他的礼品、/交际，我都要抛弃，一丝不剩。
>
> ——《旅行的干粮》

1808 年 1 月 9 日，迈向 59 岁的歌德给正忙于为《浮士德》作曲的贝蒂娜写了第一封回信，在信中，歌德带着由贝蒂娜和米娜激起的双重热情，将贝蒂娜写给他的热烈的情话剪裁进了他的十四行诗里。《爱人的来信》，《爱人的第二次来信》，《她不能终止》，——在彼特拉克打造的精美的爱的神龛里，贝蒂娜，也许他渴望那同时也是米娜，就像被装进笼中的金丝雀，缠绵缱绻地向着诗人歌唱。对此，罗曼·罗兰写道：“这简直像他走进贝蒂娜的身内，占有她，以至和她合体一样。对于我们这些认识艺术家的真相、和他们那欺人的塑造能力（他们的恶习惯）的人，这种文字上召唤的把戏自不能愚弄我们。”尖刻至极，却又让人难以反驳。的确，歌德已向那个痴情女子发出了自己意味深长的回应。

这不是一段个人罗曼史的简单进展，它是一个信号，预示着

一场浩大、持久的春潮涌动。这股生命潮流，与其说得之于爱情，不如说得之于对老年、对死的感悟，正是这种来自终极思考的能量，才使那自入魏玛以来逐渐在歌德情感上包裹起来而又经过屡次破坏的坚硬甲胄再一次碎裂、跌落，使人们重又看到了《维特》时代的歌德，甚至，比那时更激烈，更狂热，更决绝，也更彻底。

这一年的春天，歌德开始写作《亲合力》。这个从贝蒂娜初次拜访后的夏天就开始被歌德提起的小说，原来只打算作为其他作品中的一个片断。从 4 月到 7 月底，歌德在充满美女和上流社会达官显贵的温泉疗养地卡尔斯巴德口授写完了小说的第一部分。在卡尔斯巴德，歌德在各种奇遇和交谈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婚姻的约束，因魏玛的对抗而形成的对符尔庇乌丝的保护和捍卫，如今都已不复存在。现在的歌德，正如《亲合力》中的爱德华，是无条件地在爱，他已放弃对那些不断出现的山精们的抵抗，任由她们挡住自己的去路，化作自己胸中和诗文里的灿烂繁星：

> 一道山溪冲破云封的岩顶，/匆匆忙忙地要去奔向海洋；/一路上不管映出什么影像，/它只是向着谷中飞驰不停。/可是突然，具有魔力的山精，/指挥山林旋转，像旋风一样，/挡住了去路，拦成一片池塘，/她要寻欢作乐，跳进了波心。/波沫飞溅，惊惶地向后退缩，/回旋增涨，不断地自我沉醉，/朝宗父亲的意图受到阻遏。/它动摇而又安静，围成了大湖，/掩映的星辰，看水波熠熠生辉，/拍击着岩石，过一种新的生活。
>
> ——《巨大的惊异》

歌德就这样迎来了自己的59岁。在他刚过完生日不久，9月13日，他的78岁的母亲去世了。母亲的去世使歌德更加真切地意识到生命的短促和自己的衰老，他开始准备将自传的写作纳入工作日程，同时，也更加渴望能带给他生命活力的年轻人的爱情。到1809年2月，在60岁的歌德写给贝蒂娜的信中，人们已再也找不到那个表示尊敬和距离的“您”之类的称呼了。

激情和材料在不断扩张，已写出的《亲合力》不能令歌德感到满足，他又重新为全书起草了一个新的纲要，决定把它处理成独立的长篇小说。从4月起，全书有了清楚的眉目头绪，开始陆续走向完成。为了给自己提供一种客观压力，歌德让斯图加特的出版商科塔先发出了将于秋季博览会上出版该书的预告，整个夏天，歌德在耶拿闭门谢客，全力投入小说写作。按顺序交出的书稿由弗洛曼负责随即印出，这样随写随印，到10月底，一部被称为“爱情小说——伦理小说——命运悲剧”的长篇小说《亲合力》就已寄出完整的样本了。

《亲合力》讲述的是一个最初被阻挠、继而又自行破裂的爱情的故事。爱德华男爵和夏绿蒂年轻时彼此相爱，但最初他们并未能结合在一起，而是各自与自己并不爱的人结了婚。后来，两个人的伴侣先后死去，他们才终于成为夫妻，一起搬进了一个远离尘嚣的田庄。不久，爱德华的好朋友、从军队刚退职的上尉奥托和夏绿蒂的侄女奥蒂莉先后来到了田庄，于是，四个人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奥蒂莉并没有像夏绿蒂所担心的那样爱上奥托，相反，倒是夏绿蒂自己爱上了奥托，而奥蒂莉和爱德华之间也产生了爱情。夏绿蒂是一个深受世俗观念束缚的女人，她没有像爱德华所期望的那样主动退出与爱德华的婚姻去和奥托另结良缘，而是像奥托一样克制了自己，而且，为了斩断丈夫和奥蒂莉的恋情，她决定让奥蒂莉离开田庄。爱德华对夏绿蒂的决定既

气愤又无可奈何，为了能留住奥蒂莉，他继奥托之后主动离开了田庄，并给夏绿蒂写了一封要求善待奥蒂莉的措辞强硬的书信。夏绿蒂发现自己怀孕后，希望爱德华能返回田庄，但这个消息反而更增加了爱德华的绝望，他立下遗嘱，投入了炮火纷飞的战场。爱德华并没有战死沙场，当凯旋而归的他从奥托口里得知夏绿蒂当初并不打算同他结婚而是想将奥蒂莉嫁给他时，立刻动身与奥托返回庄园，使僵持的事态迅速走向悲剧。与爱德华的重逢使奥蒂莉无比激动，精神恍惚之中，她驾船不稳，抱在她臂弯里的夏绿蒂和爱德华的孩子不幸掉进水中淹死。孩子的死使奥蒂莉产生了强烈的罪孽感，而夏绿蒂则把这看做是要求她和爱德华分手的不可抗拒的命运。于是，两个女性都开始转向与过去相反的立场，夏绿蒂同意离婚，而奥蒂莉则发誓决不嫁给爱德华。最后，奥蒂莉感到无法逃避和忘却爱德华与自己的爱情，便开始进行秘密绝食。在爱德华生日的前一天夜里，奥蒂莉终于因虚弱过度和受到牧师无意中的刺激而倒了下去，而爱德华很快也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从某种意义上说，《亲合力》是对卢梭的《新爱洛伊丝》中尤丽的丈夫渥尔玛的论断的验证，也是歌德自己的那本《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改编和增容。

在《新爱洛伊丝》中，当女主人公尤丽的婚前恋人——她昔日的家庭教师圣普乐来到渥尔玛和尤丽的庄园时，渥尔玛坚持要离家几天，而且对圣普乐要留下来和尤丽在一起的选择也不表示愤怒和反对。渥尔玛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他对人类情感的这样一种认识：人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境遇的转变而发生变化，而以激情为主要内容的爱情，更是难以逃脱这种变化。渥尔玛认为昔日尤丽和圣普乐之间的爱情实际上已不存在，只是对于过去爱情的记忆还留存在两个恋人的头脑中，使他们产生出一种爱情

依然存在的幻觉，并由此生出某种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向往或恐惧。渥尔玛肯定地认为，一旦圣普乐和尤丽实际上在一起相处，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发现可能是痛苦的，同时也最终带来解脱，——自己已无法在眼前的人身上找到昔日恋情，两人心中的憧憬或恐惧于是也就不复存在了，而做丈夫的也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压在妻子心头的负罪感和可能存在的来自圣普乐方面的威胁。当然，渥尔玛在这里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每个年龄阶段都有自己的激情方式，存在于某些两性之间的吸引力可能不会长久，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之间的吸引力有可能会持续存在，只不过呈现方式会变换一下罢了。或者换一种说法，当圣普乐和尤丽发现他们之间的那种青年时代的爱情已不复存在的时候，在他们之间还有可能萌发出一种新的、中年人的恋情，因为正像卢梭在小说中所特别描绘的那样，虽然圣普乐和尤丽在对方眼中看起来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但他和她同时又是怎样感觉到对方依然是那样富有光彩呀！正是这一新层次上的心灵撞击带给尤丽新的苦恼，以致于当她为救落水的孩子而染病将死的时候，她的心中怀着一种无比的喜悦——终于解脱了！渥尔玛不得不痛苦地发现，尤丽渴望死，她并没有从他安排的巧计中解脱出来。

歌德在《亲合力》中不仅借用了《新爱洛伊丝》中孩子落水的情节，也把自己整个小说的情节建立在对渥尔玛论断的认同基础上。爱德华不顾时间的推移和时世的变迁，硬要实现昔日受阻的愿望，结果最后不得不烦恼地发出这样的牢骚：“我们干了一件蠢事，这一点我看得太清楚了。倘若上了一定年龄以后，还想实现以往青年时代的心愿和希望，那总是自欺欺人的。因为人生的每个 10 年都有特定的幸福、期待和希冀。一个人要是出于某种妄想或各种情况的缘故而想向前或向后攫取想要得到的东西，是多么不幸啊！……”

从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继承来看，爱德华承续了维特对激情的追求和维特反世俗伦理道德的强烈的个性解放色彩。在《亲合力》中，歌德进一步充实了个性解放要求的根据，毫不留情地将人拉回到了他一直试图摆脱和改造的自然之中，将人还原为自然界中的元素，与其他元素一样受强大的自然力——“亲合力”的支配。那么什么是“亲合力”呢？在小说中的第四个主要人物奥蒂莉出场之前，歌德用了几页的篇幅在爱德华、夏绿蒂和奥托之间讨论、阐释了这个问题：

> ……
>
> “要是您不觉得学究气的话，”奥托上尉应道：“我就可以用几个符号把话讲得很简单。您设想有一个A，它和一个B是亲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亲密得人们想方设法和采用强力都不能使它俩分开。您再设想有一个C，这个C与一个D的亲密情况也全然一样。现在您让这两对发生了接触，A突然奔向D，B突然奔向C，叫你简直说不清楚究竟哪个首先抛弃哪个，哪个首先和另一个重新结合了起来。”

在谈话中，夏绿蒂敏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中的人并不像化学家们试管中的元素那样都能找到与之发生亲合作用的伴侣，那个被“亲合力”从原来结合体中排挤出来的第二者或第一者常常独自一人在孤独中漂泊。爱德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歌德无法解决的伦理道德问题，它典型地体现了人的自然本能与社会伦理规范相冲突的一面。

但歌德无疑试图通过夏绿蒂与奥托的恋情提醒人们充分注意另一事实，那就是情感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介入常常使本来能够顺利解决的感情问题复杂化。具体到奥托和夏绿蒂来说，奥托的自

我克制力并不比爱德华强出多少，在他的自我克制中，既有来自传统伦理道德的理性因素，也有来自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的客观因素。生活的茫然无着阻止奥托对自己与夏绿蒂的爱情持明朗态度，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当奥托最后小心地问夏绿蒂他是否有得到她的希望时，夏绿蒂便对他说了那句听起来十分冷淡的话："请您不要让我现在回答您，我们既没有犯下过失，应该招致不幸，但是也没有做出什么事，使我们理应得到幸福。"

当然，在这句话中，也不无夏绿蒂自我谴责的因素。夏绿蒂最初并没有感到强烈的要和爱德华缔结婚姻的要求，比起爱德华对她的爱情来，她对爱德华感到的更多是友情，因此才在最初做出了把奥蒂莉引见给爱德华的决定。在上尉奥托来到田庄之前，歌德通过夏绿蒂在给奥托的信上附言时慌乱紧张以致将墨水滴在纸上这一细节，不仅暗示出将来可能发生的感情纠葛，也使人不免猜想到在此之前夏绿蒂就可能对奥托有所动情，而且正因如此，她才像那个因害怕犯罪而排斥继子的费德尔[①]一样，千方百计地想阻止丈夫让奥托到田庄里来。

显然，夏绿蒂对爱德华的感情是以一种温和的体贴、自然的顺从以及朋友似的相互砥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当她与奥托在一起时，我们才更多地看到了一个产生了爱情的女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作为一个可以说是再次被动地接受了婚姻的人，夏绿蒂之所以不做利人利己的选择，却固执地、甚至冷酷无情地阻挠爱德华与奥蒂莉的爱情，开始是出于对社会传统习俗的本能维护，而后来却与她得知奥托有一个很好的婚姻前途从而对奥托完全断念不无关联。可以说正是与奥托结合的希望的丧失使她最终做出了向丈夫摊牌并让奥蒂莉离开庄园的决定。

---

① 17世纪法国悲剧家拉辛同名悲剧中的女主人公，她爱上了丈夫的前妻之子。

直到被夏绿蒂视为维系她与爱德华的婚姻的纽带的孩子死去，夏绿蒂才幡然悔悟了自己的行为。在她看来，孩子的死，正是命运要实现自己意志的表现，她违背命运的安排和自己的初衷，最初顺从了爱德华的求婚，其后又阻挠自己本来要撮和的爱德华与奥蒂莉的恋情，因而受到了命运的惩罚。

对夏绿蒂来说，命运代表着对她维护传统习俗和利用传统习俗来维护个人利益的自私行为的否定，但对奥蒂莉来说，命运却具有完全相反的性质，它代表着对她跨越传统伦理道德界限行为的否定。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了歌德艺术处理上的高明之处：不加约束的激情和麻木的世俗伦理道德规范同时受到拷问，爱情悲剧转化为命运悲剧。

在爱德华与夏绿蒂的婚姻悲剧中实际上也存在这种情况。最初，他们两人之所以没能在美好的青春年华结合在一起，对钱财的追求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此之后，个人意志的介入又使两人的情感世界更加趋于复杂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德华是个典型的维特的翻版，而且由于有强大的财产和贵族地位做后盾，他的要求个人情感意志实现的愿望就表现得比维特更激烈，更有威力。当他一心要追求夏绿蒂、实现昔日遭受挫折的愿望的时候，他对含苞待放的奥蒂莉视而不见，一心把得到夏绿蒂视为自己唯一的幸福，而当他占有了夏绿蒂之后，尤其当奥蒂莉再次出现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做出的是愚蠢的选择，于是转而又把奥蒂莉视为自己的“亲合”目标。在这里，小说无情地指出了人的意志的盲目性和因此而造成的“亲合力”的复杂性：在爱德华和夏绿蒂各自结成的第一次无爱的婚姻中，对财产的追求扮演着催化剂角色，而在爱德华与夏绿蒂的婚姻中，爱德华的个人意志，确切来说是对未知经验的渴望，扮演了将他与对他显示出惰性的夏绿蒂结合在一起的催化剂的角色。那么在爱德华对奥蒂莉的渴望中

呢？我们不能不说，对夏绿蒂的占有实际上已成了爱德华放弃夏绿蒂去追求奥蒂莉的前提。

对于自然元素来说，任何需要催化剂才能结合在一起的元素，都被看做是彼此不是有“亲合力”的，那么我们怎么评价爱德华对奥蒂莉的爱情呢？他们显然被认为是彼此之间更有亲合力的，而在他们初次相见的时候，爱德华竟对奥蒂莉视而不见！

和其他自然元素不同，人的催化剂多半存在于他自身之中，这使我们难以把真正的“亲合力”与虚假的“亲合力”区别开来，而实际上，情况也许会更糟糕一些，那就是当我们一旦进入某种结合体之后，我们就已变成了非我，变成了另一种“元素”，丢失了一些东西，也增添了某些东西，从而使“亲合”倾向也随之发生改变。在自然界中，也许找不到比人更活跃的东西了，他具有无限的贪欲和无限的自我更新能力，只有死亡才能最终阻止他变化发展。这是人的幸运，也是人的不幸，从这种意义上说，《亲合力》为我们开辟的是一片广阔的哲理思考的田野，既富有论战性，又充满了思辨的智慧。

《亲合力》在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攻击上远远超过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所具有的深度和强度。在小说中，伯爵对婚姻说了这样一段足以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话：“……而遗憾的是，婚姻本身——请原谅我用一个比较生动的词儿——就带有某些愚蠢的性质；是它破坏了那些最温柔的关系，目的仅仅在于取得那个空虚的安全感，使夫妇双方中至少一方感到有所凭借。一切都不言而喻；人们之结为夫妇，好像就为了从此各走各的路似的。”

除了对婚姻的种种评议之外，在即将结尾处，歌德还借用米特勒之口，将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了“摩西十诫”，指向了犹太教、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纵使米特勒所抨击的只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在正统的宗教信仰者眼里，那也算得上是十恶不赦的异教行

为了。

不仅如此，在小说中，歌德还对孩子是爱情的结晶这一说法进行了天才的发挥，同床异梦的爱德华和夏绿蒂结合生下的孩子，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却像父母两人各自思念的恋人奥蒂莉和奥托。在这里，孩子已不再是父母爱情的证明，而成了他们彼此不相爱的证明，成了不诚实的婚姻、不真诚的夫妻行为的揭发者。

《亲合力》在德国读者和评论界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引起的广泛注意和激烈争论超过了歌德除《维特》以外的其他所有作品。大多数人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对它予以否定，一些自以为有道德的人甚至骂它是一部“不道德的书”，“有伤风化”，而歌德也被斥为“异教徒”。据说在一次社交聚会中，一位自以为是的夫人对歌德说，她认为《亲合力》这本小说是极不道德的。歌德听后沉默了一会儿，冷冷地回答那位夫人说：“很遗憾，它却是我最好的作品。”

的确，在追求个性解放和反对传统宗教、法律及伦理道德的道路上，《亲合力》比《少年维特之烦恼》更往前迈进了一步，但是每缔结一次婚姻只应生效五年，这种理想却显得过于极端，刚结婚3年的歌德也不准备仿效那些在他周围出现的众多离婚者。他曾在《诗与真》中写道：“常言说得好，初恋是唯一的恋爱：因为在第二次恋爱中和经过第二次恋爱，恋爱的最高意义已失掉了，本来提高和支持恋爱的永恒性和无限性的概念便化为乌有，它与一切可以重现的东西同样，只是暂时、无常的。”既然如此，弗里德莉克，夏绿蒂·布甫，玛克西米丽安娜，贝蒂娜，米娜，又有什么分别呢？爱就是亲合力，“爱就是命运”。对歌德来讲，他的最终憧憬和最完美的理想永远都只存在于艺术之中，存在于诗与美学的永恒之中：

这样，一对恋人从此并肩长眠。静穆的气氛笼罩着他们安息的地方，欢乐的、亲切的天使像从拱顶俯瞰着他们；有朝一日，假如他们一起苏醒过来，那将是多么动人的一瞬呵。

——《亲合力》

会见拿破仑

在歌德的头脑被《亲合力》、山精、自传和母亲的去世充满的日子里，拿破仑来到了埃尔福特。

埃尔福特与耶拿一西一东，地图上相距约45公里，魏玛大致在这两点连成的直线的中间位置。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战胜俄国和普鲁士后，于同年11月21日签署柏林法令，开始实施旨在摧毁英国经济的大陆封锁计划。为了切实实施这一计划，拿破仑加紧了他的帝国扩张，11月28日，由缪拉元帅率领的骑兵进入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兰。与此同时，在英国的推动下，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将自己的军队开进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准备进攻拿破仑。双方几番交战，最终，法军战胜了俄国军队。1807年7月8日，法、俄、普鲁士三国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俄、法达成秘密的攻守同盟。此后，拿破仑开始进军葡萄牙、西班牙。在西班牙，当地农民组成的游击队击碎了法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拿破仑的诸臣服国中引起人心浮动。战线的拉长，法军在西班牙的挫折，使拿破仑担心奥地利会趁机反抗，为了以俄法联盟威胁奥地利，1808年9月27日，拿破仑在埃尔福特会见沙皇亚历山大，于是在埃尔福特聚集起了众多臣服国的国

王、君主和拿破仑的大臣及其他随从人员，其中，便有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他是在沙皇途经魏玛时陪同亚历山大一起来到埃尔福特的。很快，卡尔·奥古斯特招请歌德赶赴埃尔福特，几天后，歌德便来到了这个弥漫着虚伪奸诈的政治空气的城市。

在埃尔福特，歌德见到了1806年耶拿战役时在他家住宿过的拉纳元帅，结识了拿破仑的亲密外交大臣马雷，还认识了一些法国将军；法国前外长、狡猾的外交家塔列朗给歌德留下了深刻印象，歌德几次看到他，在拿破仑召见歌德时，这个已开始向沙皇叛卖主人的靡非斯特似的人物也在场。

拿破仑召见歌德是在10月2日，当歌德走进拿破仑的房间时，这位39岁的皇帝正在用早餐，塔列朗在那儿，还有其他法国人。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拿破仑和歌德谈话，也和其他人谈话。拿破仑询问歌德的年龄和个人生活，告诉歌德《维特》曾随29岁的他远征埃及，他将这本小说读了7遍，还对歌德谈了一些对这本小说的看法。此外，他们谈到戏剧，谈到莱辛、席勒、维兰德、伏尔泰。拿破仑显然极力要使面前的这位德国诗人高居于伏尔泰之上，他说：

> 悲剧对于君主们和各民族，应当是一种教育。这才是作家才能所能达到的最伟大的目的。您应该写《恺撒之死》，把他塑造成一个最可尊敬的形象，比起伏尔泰创造的形象来，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这部作品应该成为您一生中的主要作品。您应该向全世界表明，恺撒是能够造福于人类的，如果给他时间来施展他的雄才大略的话。去巴黎吧！我请求您！

显而易见，拿破仑就是恺撒。“歌德先生，我们留在这里时，

您应该和我们在一起，记下这次规模巨大的演出给你留下的印象。”拿破仑说。

对于拿破仑提问的问题，歌德回答得总是谨慎、自然、富于外交艺术。当拿破仑问他是否喜欢埃尔福特时，歌德回答：

“很喜欢。并且希望这些日子能给我们的小国家带来益处。”

拿破仑又问：“你们的人民现在幸福吗？”

歌德回答：“我希望是这样。”

“您的公爵邀请我来魏玛。他过去有段时间很坏，但后来改正了。”拿破仑对歌德说。

“假如他真是很坏，陛下，惩罚似乎也太严厉了。不过，也许我不应该议论这些事情？我们大家无论如何应该尊敬他。”歌德回答。

“俄国沙皇您认识吗？您应当创作几首描写埃尔福特的诗献给他。”拿破仑又说，表情难以捉摸。

“为的是将来不后悔，我从来不做这类事的。”歌德回答，语气自然、平和。

“对待路易十四，我国伟大的作家就完全不这样。”拿破仑意在言外。

“那是不言而喻的，陛下，不过我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们会不会后悔这件事呢？”歌德以低姿态固守自己的立脚点，又带些巧妙的风趣。

……

时间已经很长了，也许看上去容光焕发（拿破仑曾夸他保养得好）的歌德使拿破仑忽视了他的年龄，也许这就是拿破仑的习惯，谈话期间，歌德一直站着，当拿破仑向其他人谈话时他便走到阳台上去。最后，他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告辞拿破仑出来，脑中还响着那位年轻的皇帝的话：

“命运如今意味着什么？政治就是命运。”

“您是真正的人！”

晚上，歌德应邀去剧院观看了拿破仑亲自选定的戏剧演出：拉辛的《米特里达特》、《伊菲格涅亚》，伏尔泰的《穆罕默德》。这些戏剧演出加深了歌德对在1804年12月2日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加冕典礼上从教皇手中抢过皇冠自己给自己加冕、年轻时用笔写剧本而现在用大炮写剧本的法国皇帝的了解和景仰。

“谁给他加冕？谁把他变成国王？唯有胜利！”——征服者的蔑视教权的自豪与信条。

“胜利者的道路没有吸引住他，谁缔造和平，他就打算归附谁。”——征战者聪明漂亮的口号和动人的志向、许诺。

在大炮之后，拿破仑用戏剧向他征服的君主们这样进行威慑、宣讲。

10月6日和8日，歌德在魏玛又两次与拿破仑交谈，并获拿破仑亲授的法国荣誉团勋章。有关这些谈话，如同对在埃尔福特的谈话一样，歌德谨慎地对外界保持缄默，甚至公爵奥古斯特也不能从他那里了解到详情。等他简略地对往事进行追述，已经是16年之后了，那时拿破仑已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对歌德来讲，拿破仑犹如一个神话，他为它所炫惑并迷恋于它，甚至当拿破仑溃败的日子，他仍似乎比拿破仑本人更不相信一切会这样结束。他和很多杰出的人物一样，对战争和拿破仑持某种矛盾的态度：歌颂拿破仑，反对侵略战争。1829年4月7日，80岁高龄的歌德与秘书爱克曼谈论《拿破仑征埃及记》，当爱克曼惊赞拿破仑年轻时即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时，歌德说：

亲爱的孩子，那是伟大能人的天生资禀。拿破仑摆布世

界，就像洪默尔摆布他的钢琴一样。这两人的成就都使我们惊奇，我们不懂其中奥妙，可是事实摆在眼前，确实如此。拿破仑尤其伟大，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无论在战役前还是在战役中，也无论是战胜还是战败，他都一样坚定地站着，对于他要做的事既能看得很清楚，又能当机立断。在任何时候他都胸有成竹，应付裕如，就像洪默尔那样，无论演奏的是慢板还是快板，是低调还是高调。凡是真正的才能都显出这种伶巧，无论在和平时期的艺术中还是在军事艺术中，无论是面对钢琴还是站在大炮后面。

尽管如此，歌德并没有前往巴黎，他留在魏玛，等待着命运带给他另一位世界伟人。

失望的贝多芬

从1809年起，60岁的歌德开始考虑撰写自传《诗与真》。由于很多童年、少年的往事，歌德已经遗忘或记不清楚了，因此他要靠从他母亲那里了解了他的童年的贝蒂娜帮他唤回那些记忆，在这个过程中，歌德和贝蒂娜的感情由于这种工作上的帮助而格外加深了一层。到《颜色学》第一卷出版的1810年，歌德已和贝蒂娜建立起很深的感情，他一刻也离不开贝蒂娜的信，甚至旅行时也把它们带走。而当贝蒂娜连续几星期不给他写信时，他便会感到若有所失，主动给贝蒂娜去信问候。由于后来贝蒂娜在歌德逝世后出版的《歌德和一个小女孩的通信》中有虚构的成分，有的学者便认为“这样一来，就连那些仿佛是得自歌德母亲之口的有关歌德幼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叙述也变得大可怀疑了。”其实，不管贝蒂娜怎么对歌德叙说他的童年，《诗与真》上写下

的东西只能是歌德认可的东西，是他想要写上去的东西，真实与不真实，都应由歌德负责，不关贝蒂娜什么事。上面那种鄙夷的说法，岂不是说大文豪歌德竟成了贝蒂娜口述的笔录者了吗？

对贝蒂娜不受约束的性格，歌德无疑是看得非常透彻的，他仿佛一直在试图与贝蒂娜保持某种适当的距离，他想摆脱她，却又难以割舍对她的迷恋以及她对他的极真挚的仰慕，这仰慕对于处在被大众冷落境况中的他来说显得尤其珍贵，他怎么肯轻易得罪他的崇拜者呢？他不是一直都在用心地培养自己的读者群吗？

罗曼·罗兰认为，1810 年是歌德经过长期审慎后终于接受了贝蒂娜的爱情的一年，也是贝蒂娜自己觉得最接近歌德并且完全爱上了歌德的一年。也就是在这同一年的 5 月，贝蒂娜与她一生中狂热崇拜的另一个伟人贝多芬结识并建立起了友谊，此后，贝蒂娜便以她特有的真诚、热烈的方式将这个音乐巨人一次又一次介绍给自己所热爱的歌德。贝蒂娜告诉歌德贝多芬曾以怎样真诚的态度说起他对歌德的景仰，怎样从童年起就崇拜歌德、每天都读歌德的作品，怎样说歌德的诗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节奏上都对他具有极大的魔力，怎样从 1808 年起便从事《浮士德》的谱曲，以及多么希望她能将他介绍给歌德，等等。在向歌德转达贝多芬的这些敬意的同时，贝蒂娜还将贝多芬为歌德的三首诗谱的曲子转交给了歌德。

如果我们了解到那时人们对贝多芬的评价并不像今天这样一致，而歌德当时对贝多芬又只限于一般性的了解的话，我们就能正确估价贝蒂娜这种高尚努力的价值了。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奥地利的音乐天空群星灿烂，一大批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杰出音乐家活跃在当时的乐坛上，亨德尔（1685—1759），巴赫（1685—1750），海顿（1732—1809），格鲁克（1714—1787），莫扎特（1756—1791），贝多芬（1770—1827），韦伯（1786—

1826)，舒伯特（1797—1828），门德尔松（1809—1847），舒曼（1810—1856），瓦格纳（1813—1883）等等。无疑，贝多芬被视为天才人物，8 岁时，他就被父亲作为神童向听众介绍，13 岁，写出《三首钢琴奏鸣曲》，22 岁，成为海顿的学生，到 1810 年，贝多芬已写出了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庄严弥撒曲》、《月光奏鸣曲》、第三交响曲《英雄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等一系列重要作品。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贝多芬的乐曲，正像很多人不能接受歌德的作品一样。就与自己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言，歌德与贝多芬都是孤独的，而贝多芬则更为不幸，因为自 1800 年起他的听力便开始不断减退，到 1819 年，49 岁的贝多芬已完丧失听力，这对一个音乐家来讲是怎样的灾难呵!

尽管歌德的好友策尔特那时还不能接受贝多芬并且不断以自己的评价影响歌德，贝蒂娜对贝多芬的旗帜鲜明的捍卫以及贝多芬在贝蒂娜的心中激起的强烈兴奋和深刻同情仍给歌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贝蒂娜说："转达我对贝多芬的衷心感激，我高兴同他结识，交流思想和感受肯定会带来益处。或许你能使他到卡尔斯巴德一游，我几乎每年都要到那里，会有闲暇时间来听他的音乐，向他请教。"贝蒂娜转达了歌德的话，贝多芬听了非常高兴。

1810 年 12 月 4 日，经过了长期的踌躇之后，贝蒂娜终于与哥哥的朋友、民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的主要编写者、海德堡浪漫派的领袖诗人路德维格·阿希姆·封·阿尔尼姆订婚，次年 3 月 11 日，两人举行了婚礼。在这期间，即 1811 年 2 月 10 日，贝多芬给贝蒂娜写信，再次请她向歌德介绍自己，并告诉她自己将亲自写信给歌德。4 月 12 日，贝多芬给歌德写了一封充满敬慕的信，由他的秘书带到魏玛，信中他告诉歌德不久他将把他为

《哀格蒙特》谱的曲子寄给歌德，请歌德给予批评。5 月 4 日，歌德款待了贝多芬的秘书，并在饭后听他弹奏了几首贝多芬的乐曲，但歌德似乎并不能喜欢它们：

“你看！真够令人生气的！又美又狂，……你真想像不到！对于我们上年纪的人，真要变疯的，眼光光望着这溶解的世界回到那原始的混沌状态，直到——天知道什么时候？——新的诞生显出来……”

62 岁的歌德似乎只能接受巴赫、亨德尔、海顿、格鲁克和莫扎特了。此后不久，歌德又收到了贝蒂娜写于 5 月 11 日的信，信上，贝蒂娜又一次盛赞贝多芬和他对歌德无私的热爱。接着，在卡尔斯巴德，歌德遇见了贝多芬的保护人李奇诺斯基王子和金斯基王子，他们又在一起谈论了贝多芬。6 月或 7 月 25 日，歌德终于在卡尔斯巴德给贝多芬写了一封措辞 殷勤有礼的回信，信里不仅谈到了贝蒂娜对贝多芬的赞美，还表示将很高兴收到并使用贝多芬为《哀格蒙特》谱的曲子，诚挚地向他致谢，欢迎他早日访问魏玛，等等。这样，两位伟人终于相互握手了，尽管现在还只是通过书信。

到此为止，贝蒂娜作为贝多芬和歌德之间的中介者的使命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如果一切就到此终止了，那她此生该是多么幸福！然而命运似乎执意要取回它赋予这幸运女子头上的光荣，让她失去她的果实，并在那两位伟人的关系史上进一步留下自己的印痕。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是贝蒂娜事先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

9 月，贝蒂娜和丈夫阿尔尼姆新婚旅行来到魏玛，在这里停留了约三周时间。尽管贝蒂娜的结婚使歌德感到了贝蒂娜对他的感情的限度，但他对颇为崇敬他的阿尔尼姆本人却并无恶感，而一直嫉恨贝蒂娜的克里斯蒂安娜也很高兴自己的情敌终于有了归

属，加上这对新人起初并未准备在魏玛停留那么长时间，所以，开始时新婚夫妇在歌德的府邸里很受欢迎和款待，几乎和歌德形影不离。但时间一长，歌德感到自己的工作受到了打扰，而克里斯蒂安娜也痛苦地发现贝蒂娜对阿尔尼姆的热情远不如对歌德的热情，于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心性高傲的贝蒂娜一向瞧不起有很多笑话流传在外面的克里斯蒂安娜，歌德的宠爱更使她有恃无恐，而克里斯蒂安娜虽然从根本上说来惧怕自己的丈夫，但她决不是一个天性懦弱、无条件忍气吞声的女人，而且随着婚礼的举行和光阴的流逝，她和歌德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当歌德外出的时候，在克里斯蒂安娜写给歌德的信上总有这样的话——“爱我并且想着我，我每分钟都在怀念你，我想的只是，怎样把家务操持的井井有条，让你高兴；因为是你把我变得这样幸福的”。而现在，越来越胖的克里斯蒂安娜很少主动关心家务，倒是歌德经常在创作之余从事家庭的料理，尤其对自己钟爱的花园。对于丈夫的不忠，克里斯蒂安娜显然不是一无所知，从她写给歌德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她对丈夫的了解、疑问、恳求和几分无可奈何的听天由命。对丈夫的频繁离家她毫无办法，但在家里接待无法无天的情敌却非她所能忍受，更何况她已渐渐感觉出歌德对那一对居留过久的客人的厌倦了呢。她等待着，终于为自己的怒火找到了一个适当的时机。

一天，克里斯蒂安娜和贝蒂娜一起去参观迈耶尔组织的画展，审美敏锐而苛刻的贝蒂娜对那些她认为属低劣之作的参展作品进行了无情抨击，毫不顾忌主办人迈耶尔是歌德的亲密朋友和美术顾问，就像毫不顾忌策尔特是歌德的音乐顾问一样。然而，贝蒂娜忘记了时空的变化了，也忘记了自己身份的变化，过去，歌德能以一句“但是对于别人，她却非常之无礼貌”这样的话将

她的非礼打发过去，现在却不一定会对她那样宽容了，更何况，她的尖刻话语深深刺痛了一直在寻机进攻的歌德夫人呢。贝蒂娜完全低估了克里斯蒂安娜，低估了这个被她骂作“肥红肠”的下层社会出身的女人的判断力和捍卫自己尊严的顽强决心，她过于骄傲，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魏玛的不利处境，更不知道改变歌德在家庭中的不幸处境这种事非她力所能及。开始时，克里斯蒂安娜和贝蒂娜不过唇枪舌剑，继而便激烈冲突起来。审时度势的克里斯蒂安娜仿佛深知胜券在手，吼叫着向那个与她体型形成鲜明对比的小妇人发起了进攻，一把将毫无防备的贝蒂娜的眼镜夺过去摔碎在地上，往日积聚的所有怒火从心里直至每一根血管和全部肌肉里冲决爆发出来。正像34年前贝蒂娜的父亲对青年歌德所做的那样，克里斯蒂安娜·符尔庇乌丝，这个被侵犯了的主妇，毫不客气地对她的情敌下了逐客令。

魏玛一时舆论大哗，歌德与克里斯蒂安娜的婚姻再度受到魏玛人的攻击。然而，这丝毫也救不了贝蒂娜，歌德本对她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作为一个歌德的崇拜者，她毫无城府或过于自信地表现出的对贝多芬的狂热或许也已有点超过了歌德所能接受的限度，此外，她还以自己的婚姻与歌德所厌恶的浪漫派结成起了更为紧密的关系，她又总是这样招惹是非，得罪和伤害歌德的重要朋友，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帮她在她的宙斯面前阻挡赫拉的怒火呢?

于是，就像罗曼·罗兰在《歌德与贝多芬》中所说的那样，“无论贝蒂娜怎样悲痛、怎样坚持她的爱、怎样努力去接近歌德和忘记耻辱，她终于被逐出魏玛的圈外了。”歌德的门向贝蒂娜关闭了，他与贝蒂娜中断联系6年，直到1817年克里斯蒂安娜去世后，才又与她恢复了通信，但歌德对过去那个贝蒂娜的情感却再也找不回来了。可怜的贝蒂娜，她一头钻进了自己编织的爱

情遗传的神话故事里，徒然在老年歌德身上寻找母亲当年的情人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作者，过分夸大和信任了歌德对她母亲的友谊与爱情，现在，她尝到苦头了，而几个月后，这苦头将化作贝多芬的无情斥责，转回去落到歌德的头上。

1812年7月，贝多芬、贝蒂娜夫妇、歌德先后来到波希米亚的游览胜地泰布利茨，1810年8月贝蒂娜曾在这里向歌德热烈赞美过她刚结识不久的贝多芬，并和歌德一起度过了三天幸福的时光，现在，命运使这三个人物戏剧性地遭遇到一起了。歌德是奉魏玛公爵之命到泰布利茨接受奥地利年轻皇后的召见的，他对贝蒂娜夫妇避而不见，得知贝多芬也在泰布利茨，便主动前去看望他。罗曼·罗兰把这两个伟人的会见比喻为两个太阳的刹那间会合，虽然两人对于彼此的相见都怀着渴望和期待，但几日的相处并未使他们达成巩固持久的友谊与合作，把他们隔开的有不同的审美趣味，不同的行为方式，也有情感上的伤害。

7月19日，歌德第一次拜访耳闻已久的贝多芬，并听他为自己弹奏钢琴。虽然歌德此前并不欣赏贝多芬的音乐，但他一见到这个孤独的雄狮就被他和他的弹奏震撼了。歌德惊叹："我没有看见过有哪一个艺术家比他更专注、更有毅力和更诚挚可亲的了。我十分理解，他为什么那样奇怪地和世界作对。"

的确，他理解，但理解不是一切，不是认同，不是接受。歌德的天才的敏锐一下子就抓住了贝多芬和他的艺术的精神实质，但要与这种精神发生共鸣，贝多芬的诞生似乎太迟了些。63岁的歌德徒然对着贝多芬惊叹，如同惊叹自己已经逝去了的青春，但要把这青春还给他，他却不要，他渴望的，永远是新的，未曾经历过的，当然还得与他的节制原则相符合的——现在他正牢牢把持着这一点，固执地对抗着浪漫派，如同大海里孤独的岩礁。因此，当贝多芬渴望听到歌德对他的切中肯綮的批评时，歌德便

只好以“弹得很好”“弹得很可爱”之类的话来令贝多芬大失所望了。有时，歌德表现出一种深受感动的样子，使贝多芬更加生气，因为在贝多芬看来，“感情是妇女们的事。但是男人——嗨，音乐必须在他的思想中击出火花来。”“艺术家爆发出的是火焰而不是眼泪。”

歌德当然是蔑视伤感的，但他既不能（或者说不敢更确切些）与贝多芬的音乐共鸣，在“思想中击出火花来”，又不能像一个音乐行家那样在技巧上做一番评论，还能有多少其它方式可供他选择来表示他的礼貌和赞赏呢？此外，他也许还有点矜持，这符合他的性格，也可能还与贝蒂娜有关，他驱逐了贝蒂娜，而贝蒂娜与贝多芬有很深的友谊，因此，歌德要谨慎；他努力去理解贝多芬，尽力表示自己的好感，这已经足够了，但贝多芬不能满足于此，他对歌德爱得太深，太真，因而也太苛刻，不能允许歌德有丝毫平庸的表现，激动与兴奋的心情使他不能控制自己，他毫不客气地对歌德加以讥刺，以戏谑的口吻和歌德开玩笑，不像是一个歌德的崇拜者，倒像一个专门等在泰布利茨与歌德作对的人，尤其是当贝蒂娜使他了解到她的遭遇的时候。下面的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是被人们重复了又重复的：

那时，泰布利茨聚集着许多显贵，歌德和贝多芬挽着手一起散步时常遇见这种人。歌德沿途不断向这些人行礼，贝多芬大不以为然。不仅如此，歌德向来谈论宫廷时便与清高耿介的父亲唱反调，这时，他更以一派恭敬的口气和言辞与贝多芬谈论他，令贝多芬十分生气。贝多芬告诉歌德他如何在教奥地利大公爵弹琴的时候用力敲那公爵的手指并对他说出那有名的话来——“你可以制造一个朝臣、一个枢密使，但你绝对造不出一个歌德，一个贝多芬”，——以便教训大公爵以后遵守时间，不再让他在前厅的等候中浪费光阴。可以想像歌德听了贝多芬这番话后的复杂心

情：被推崇和引为同道的欣喜，对那鲁莽而危险的做法的吃惊和暗自的不以为然，也许也有那么一点敬佩，但无论如何，这不是他所认可的行为方式。歌德马上便向贝多芬证明他并不接受他的指教了。奥地利的年轻皇后和一些公爵显贵们迎面向他们走来，歌德企图将胳膊从贝多芬的臂弯里拿开并站到路边鞠躬行礼，贝多芬阻止道："留在我的手臂里！他们该让路给我们，我们却不。"然而贝多芬的话没有奏效，歌德仍离开了他的手臂。那个孤独的狮子见此便将他先前的同行者一个人抛在那儿，自己则"大摇大摆直冲进那些王族们的队伍里，像流星一样。他从中间走过，只用手指轻扶着帽边。"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有趣场景：这边是站在路边的歌德向贵族们脱帽鞠躬，那边是贵人们给贝多芬让路，并向他友好地行礼。贝多芬并未一走了之，他等着歌德。等歌德走上来后，他对他真挚而烦恼地说："我等你，因为我尊敬景仰你；你却太使他们荣幸了。"歌德会怎样想呢？会怪罪贝多芬吗？贝多芬抛下他，他当然有点不快，但贝多芬这会儿的话，又让他心里有点热乎。那么他惭愧吗？觉得自己不如贝多芬有才子气吗？不，他甚至丝毫不觉得这是个问题，除非人们对此大加议论的时候。

历来人们都喜欢拿这件事中所显现的两位天才的差异来指责歌德平庸，实际上，身为高官和出身显赫本身并不应成为一个人被蔑视的理由，正像出身低微、贫寒不应成为一个人不受尊敬的理由一样；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的是他的精神质量、人格品质，而不是其他什么身外之物。这个大家实际上都非常赞同的原则往往由于某种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下层对上层的不无理由的反感和敌视而被人们遗忘，人们倾向于赞赏那些在君王面前也不修边幅的人和做法，对于对显贵必恭必敬的知识分子总是嗤之以鼻，仿佛他们必要有一种桀骜不驯的姿态方显自身高洁。严格来讲，

这种东西方皆有的文化心理实在是处于精华、糟粕两可之间，因为它与其他许多貌似真理的东西一样，是建立在偏见和不公正的基础上的。退一步，就算那些贵人们都不值得尊敬，礼节上的退让也未必就说明实质问题，正像高声呐喊的人不一定都是最勇敢的人，隐居山林的人也未必不是想做官的人一样。

在充分感受了歌德早期作品的天才精神的贝多芬的想像和期待中，歌德是一只俯视大地、搏击长空的雄鹰，而现在他亲眼目睹的，却只是一个尊重等级、拘泥礼节、谨小慎微、惯于隐藏真实情感的枢密顾问和外交家，这比歌德不接受他的音乐更令贝多芬失望。虽然贝多芬仍继续表示对歌德的敬仰，但这敬仰却要大打折扣了，他指责歌德对贝蒂娜的态度，并忍不住对这个年长者开戏谑的玩笑：在他与歌德散步的路上，也常常遇到人们向他们行礼，当歌德对此表示厌烦时，贝多芬便说："请大人别这样腻烦罢！说不定是对我（行礼）呢。"

这真是一个好俏皮话，如果歌德与贝多芬一见如故，如果歌德是个老顽童，或者，如果歌德并不是正处于其权威被动摇的时代。可是实际怎样呢？这个贝蒂娜昔日的保护者，几天里一直与贝多芬一本正经地相处，深知有人尊敬自己，更多的人诋毁自己，也深知自己的弱点。可以想像，这话在歌德耳朵里听起来会怎样，也许有点辣，有点苦，有点酸，另外，很少的智巧与幽默，还有纵使贝多芬的哈哈大笑也难以缓解的隐隐的尴尬。

"我已经渐渐认识贝多芬。他的才能很使我惊异。只不幸他是一个完全放荡不羁的性格。如果他觉得这世界可憎，他或者没有错；但是他这样做并不能，真的，令世界更富于享乐，无论为他自己或为别人。他确是怪可原谅、怪可怜的，因为他失掉了听觉：这损害他的灵魂本体的音乐部分或者还不及社交部分。他生性本来已够鲁莽了，他的耳聋更使他变得加倍这样。"这是歌德

9月2日给策尔特的信，他不赞成甚至很否定贝多芬，但多么客观，多么宽容，多么体贴，正像一个年长者，一个伟人！如果说这种有克制的评论是出于谨慎，这谨慎却不是留给所有人的。贝多芬是独一无二的，纵使在歌德心目中他是一个需要防范的美学上的敌人，这个敌人却强大得足以使歌德暗生敬畏。

常言道：话越捎越多。与内倾的歌德不同，贝多芬不是个能在心里积攒负担的人，他把自己的失望向贝蒂娜夫妇诉说，向其他人诉说，贝多芬与歌德的故事便从人们的口头上、通信里流传开了。那些敌视歌德的人，那些因歌德对拿破仑的崇拜而反对歌德的人，从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材料。歌德感到自己被伤害了。虽然他深信自己在贝多芬心中的位置，但他已经不是笔伐雅各比兄弟和维兰德时的年龄了。很长时间里，他不再提及贝多芬。而贝多芬呢？19日、20日、21日、23日，也许还有在卡尔斯巴德的几天，这几天的印象无法抹去他对想像中的歌德的记忆，更不能妨碍他以天才的识别力判断歌德创作的价值，而感情上，心中的失望不断地发泄出去，剩下的也只有烟雾过去后的灿烂阳光了。当他回忆起泰布利茨的时光时，他是以怎样热烈的口吻对人谈论那位他所挚爱的伟人呀：

“你认识那伟大的歌德吗？我也认识他呢。……我那时候并不像现在这么聋；但是我已经不大容易听见了，这伟人多么耐性待我呵！……这令我多么幸福呵！……就是为他牺牲10次性命我也情愿……”

1822年，一个法国的小提琴师拿着很多介绍信却无法敲开贝多芬的房门，当他得到歌德的一封介绍信时，贝多芬立刻接见了他。而歌德呢？当感情上的伤害和流言的热浪都渐渐平复下来，他也忍不住要赞赏贝多芬的那完全合他旨意的《哀格蒙特》的配曲，骄傲地告诉访客自己有很多贝多芬的笔迹，并且让人弹

奏贝多芬的乐曲，当然，多半还是那样不能认同，但被震动："真宏伟！……这真伟大，简直是疯狂的！……"这种弹奏当然不会是经常的，因为贝多芬使歌德感到害怕，他要防止那狄俄尼索斯的音乐洪流在他的客厅里泛滥，以免淹没他这阿波罗的美学国度。

"……克洛卜施托克常常想到死。这迟早总要来的！……至于歌德呢，他活着，而且我们大家都得和他一起活下去。所以他那么宜于谱成音乐。再没有比他更宜于谱成音乐的……"1822年7月贝多芬对人如是说。多么击中要害！如果歌德想在他那个时代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知音的话，还有谁比贝多芬更胜任呢？然而歌德宁可在爱情上啜饮狄俄尼索斯的酒杯，却要与这个音乐上的狄俄尼索斯谨慎地保持距离。

水不怕山，山却怕水。两个孤独的国王，就这样坚守在自己的领土上，遥遥地彼此致意，也许这就是太阳的命运。

神游东方

随着音乐的太阳与歌德擦肩而过，曾经照耀过歌德的另一位太阳也开始黯淡、陨落。1812年，远征俄国的拿破仑大军被严寒和库图佐夫将军击败，57万士兵几乎全军覆没，至多仅剩10万人。为了稳定传言四起的巴黎和组建新的军队，12月6日，拿破仑将溃退的残余军队交给缪拉元帅，自己在没有卫队的情况下，由4位军官陪同秘密离开了俄国。在赶往巴黎的12个昼夜的雪橇和轻便马车的疾驰中，拿破仑并没有忘记在经过魏玛时向人打听歌德的情况并派人向歌德问好，而当1813年拿破仑重新调集了军队并再次回到埃尔福特指挥对俄军和普鲁士军队的战斗时，这位帝国领袖又一次以自己的问候向世人表明了他对这位德

国老诗人的敬意，此时，距拿破仑与歌德初次的埃尔福特会面已近 5 年，歌德已经 64 岁。

正是从 1813 年起，德国进入了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1813 年 8 月 11 日，梅特涅宣布奥地利对法宣战，使反法联盟的力量大大超过了拿破仑的实力。此时的德国，仿佛除了歌德之外的所有人都卷入了爱国战争的热情。起初，像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一样，歌德对拿破仑的威势是毫不怀疑的，当他在德累斯顿见到参加反拿破仑战争的 22 岁的德国诗人特奥多尔·克尔纳尔及其 44 岁的父亲、《献给德国人的歌》的作者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时，他说："好吧，抖落你们的铁链吧。不过，这根铁链太结实了，你们拉不断的。" 8 月 27 日，德累斯顿战役，拿破仑大获全胜，年轻的克尔纳尔战死疆场。然而形势很快发生了大的转机。10 月 16 日至 19 日，在莱比锡附近的平原上，发生了拿破仑时代最大的一场会战——莱比锡会战，双方共损失 1.25 万人，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取得决定性胜利，1806 年在拿破仑威压下成立的德意志诸侯反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莱茵同盟"解体，法军开始从西班牙等地全线溃退，拿破仑由进攻异国开始转向本土防守。半年后，1814 年 4 月 6 日，拿破仑皇帝宣布退位，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成为法国国王。在自杀未遂之后，4 月 20 日，拿破仑在"皇帝万岁"的口号声里告别了他的近卫部队，前往流放地厄尔巴岛，"世界历史上最庄严的英勇的史诗结束了——他告别了自己的近卫部队。"——拿破仑的对头英国的报纸如是说。

歌德怀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欧洲发生的一切。拿破仑的失败对歌德的地位毫无影响，他的府邸超出一切战争之上，同时受到交战双方上层的保护和拜访。然而，歌德对拿破仑的敬重，却引起一般德国人的误解、愤怒和仇视，他们指责他不爱国，指责他

阻挠儿子参加进攻法国的军队。从这时起直到歌德去世后的 40 年代，歌德遇到了他一生中最猛烈、最恶毒的攻击。

1830 年 3 月 14 日，歌德和秘书爱克曼谈论政治诗歌时，爱克曼说："人们都责怪您，说您当时没有拿起武器，至少是没有以诗人的身份去参加战斗。"歌德回答说："我的好朋友，我们不谈这一点吧！这个世界很荒谬，它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不知道在哪些事上应让人自便，不必过问。我心里没有仇恨，怎么能拿起武器？我当时已不是青年，心里怎么能燃起仇恨？如果我 20 岁时碰上那次事件，我决不居人后，可是当时我已年过 60 啦。"

"我写诗向来不弄虚作假。凡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没有迫使我非写诗不可的东西，我从来就不用写诗来表达它。我也只在恋爱中才写情诗。本来没有仇恨，怎能写表达仇恨的诗歌呢?"

"仿佛我的任务就是坐在书房里写战歌！如果住在营房里终夜听到敌哨阵地的战马嘶鸣，写战歌倒还凑合。不过这并不是我的生活和任务，这是克尔纳尔的生活和任务。他有完全适合写战歌的条件。至于我，生性并不好战，也没有战斗的情感，战歌就会成为和我这副面孔不相称的假面具。"

显然，这种解释并不能令人们满意，因为歌德不仅自己对战争持消极态度，还阻止儿子去参加军队。在歌德当时谈的下面这些话里，我们会看到歌德更为真实和客观的思想：

"我们为祖国服务，也不能都采用同一种方式，每个人应该按照资禀，各尽所能。我辛苦了半个世纪，也够累了。我敢说，自然分配给我的那份工作，我都夜以继日地在干，从来不肯休息或懈息，总是努力做研究，尽可能多做而且做好。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这样说，一切事情也就会很好了。"

"还可以向你说句知心话，我并不仇恨法国人，尽管在德国摆脱法国人统治时，我向上帝表示过衷心的感谢。对我来说，只

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才重要，法国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教养的，我自己的文化教养大半要归功于法国人，对这样一个民族我怎么恨得起来呢?”“一般说来，民族仇恨有些奇怪。你会发现在文化水平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强烈。但是也有一种文化水平，其中民族仇恨会消失，人民在某种程度上站在超民族的地位，把邻国人民的哀乐看成自己的哀乐。这种文化水平正适合我的性格，我在60岁之前就早已坚定地站在这种文化水平上面了。”

显然，歌德并非不希望自己的国家从战争的灾难中解放出来，然而，他似乎站在某种超世纪的高度，这不仅给他的同胞造成了理解他的困难，也给我们今天对他的解说造成了困难，因为在世界大同到来之前，民族利益和民族意识注定是各个民族国家首先要关注的，所谓“超民族的地位”，有多少现实可行性呢?但尽管如此，谁又能否定歌德的理想不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呢?

高中甫先生在他的《歌德接受史》中写道：“歌德晚年所生活的时代，正如布赫瓦尔德所说：‘是伟大的政治崩溃和兴起的时代。民族感情和基督教的虔诚就藉此时机苏醒过来。特别是在1813年志愿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人心中，活跃着这种民族政治的理想和宗教的理想。’歌德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儿子，但也是这个时代最不合时宜的人，是一个精神上的反叛者。”在深沉的精神孤独中，歌德读到了德国东方学家汉默翻译的14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集，被压抑的情感突然找到了倾泻口，久已低沉的诗兴再一次被激发起来。

北方、西方、南方在分崩，/帝座破碎，邦国震动，/逃吧，遁入纯洁的东方，/领略族长国家的风光，/在爱情、美酒、歌唱之中，/吉塞泉使你返老还童。

——《歌人之书·希吉勒》

当德国诗人、东方语言学者弗里德里希·吕克特写作歌颂民族战争的《顶盔戴甲的十四行诗》的时候，当出版商忙着出版特奥多尔·克尔纳尔的反拿破仑遗著《琴与剑》的时候，歌德却化作了波斯歌者“哈台木”，携着命运带给他的又一个迷人女子“苏来卡”，走进了理想化了的“纯净的东方”，走进了阿拉伯的爱情、宗教和诗歌世界，“轻轻地扣着天堂的大门，给自己乞求永恒的生命。”这个在《西东合集》中被化装为波斯美女“苏来卡”的女子就是30岁的玛丽安涅·封·维勒玛，人们把她描述为一个“温柔、多情、性感很强的任性女子，是个聪明、可爱的奥地利人”。

玛丽安涅和母亲本是奥地利一家剧团的演员。玛丽安涅15岁时，歌德的同乡和老朋友、法兰克福银行家维勒玛先生将玛丽安涅从她母亲那里买来做了自己的养女，并让她和自己的女儿一起受教育。后来，玛丽安涅便成了维勒玛的情人。玛丽安涅能歌善舞，而且对诗歌独有灵犀，她后来与歌德恋爱时写的很多诗歌都被收进了《西东合集》中的“苏来卡之书”，歌德只对她的诗略作了改动。1814年8月4日，玛丽安涅在威斯巴登初次见到歌德，此时的歌德虽然已经65岁，但在年轻女性的眼里，他仍富有极大的魅力。当歌德在10月11日应邀来到维勒玛在法兰克福附近的领地赫尔贝缪尔时，维勒玛的亲生女儿这样描述歌德给她的第一印象：

“多么富于感情，多么使我激动啊！……我原以为他是一个愚蠢的、很难接近的暴君，结果却发现他心地可爱，待人既和蔼，又可亲；我情不自禁地像爱孩子似的爱上了这个人，愿意一直信赖他，……他的光临多么令人高兴，和他在一起又是多么愉快！他周身都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他容光焕发，但一点也不傲慢。他好像是装满美酒的容器。”

这些赞词已足以使人惊叹，但它还不能言尽歌德在玛丽安涅心中掀起的波澜。总之，玛丽安涅似乎一见面就爱上了这位老诗人，而歌德显然也情不自禁地对玛丽安涅产生了迷恋。维勒玛显然察觉到了某种危险，他以及时的婚礼结束了自己的鳏夫生活和与玛丽安涅一直保持的情人关系，使玛丽安涅正式成为自己的合法妻子。

婚姻如网，爱情似水。1815 年 8 月，歌德再次到莱茵和美因地区旅行，在法兰克福的维勒玛家住了 5 周，其后又在海德堡与维勒玛夫妇相聚，直到 10 月 11 日，歌德才在毅然斩断与玛丽安涅的关系后回到魏玛自己的家中。

如果没有《西东合集》，这只不过又是一个平庸乏味的三角恋爱故事，如果没有《西东合集》中那些被指认为是玛丽安涅所写的“苏来卡”的情诗，玛丽安涅也只不过是又一个卡尔斯巴德温泉的浪漫女子。然而在攻击者的喧嚣中，赫尔贝缪尔却如世外桃源，使歌德的思绪从现实中逃遁，而玛丽安涅则像一眼甘泉，使歌德的灵感不断生长。玛丽安涅用爱情做栅栏为歌德在现实和创作的沙漠上圈起了一块绿洲，并用自己富有才气的诗歌把这绿洲装点成一个争奇斗艳的花园，而作为报答，老诗人要让他心爱的女子做这园中的主人，和她一起走入冥想中的东方，走入艺术的永恒。

哈台木已经离开多时，/情人也曾学习作诗，/她曾受到他满口称赞，/因此经得住别离的考验。/别认为这些是他人所作；/是苏来卡的，也是你的歌！

——《苏来卡之书·每当我再次跟你相会》

可以说，对波斯诗人哈非兹的激赏和对玛丽安涅的爱情催化

了《西东合集》的诞生。爱情，是贯穿《西东合集》的常春藤，它结出了《爱情之书》和《苏来卡之书》两朵奇葩，在其他各“书”中也不时闪现出自己的翠影。在《西东合集·歌人之书》的《要素》一诗中，歌德将诗歌的“营养”列为四种：爱情，醇酒，英雄和憎恨。这四种元素也是《西东合集》中最重要的结构元素，“爱情之书”和“苏来卡之书”写爱情；“酒保之书”歌颂醇酒；“不满之书”写悲愤和憎恨；“帖木儿之书”借帖木儿影射拿破仑，可以看作英雄之书。除此之外，还有“歌人之书”、“观察之书”、“格言之书”、“寓言之书”、“拜火教之书”及“天堂之书”等。玛丽安涅的爱情点燃了歌德暮年的激情，导致了《西东合集》中不朽的爱情诗篇的产生：

> 书本之中最奇妙的书/乃是爱情之书；/我曾仔细加以阅读：/只有几页是欢娱，/全篇却都是痛苦，/其中有一节叙述别离。/叙述重逢只有一小章，/乃是断片。忧伤各卷，/附有冗长的解释说明，/真是无穷无尽。/……

这首命名为《读本》的诗堪称爱情诗的绝唱，它对爱情的洞察抵得上无数部长篇小说和爱情论著，其中欲言又止的况味直令人读后留下长长的叹息和无尽的感慨。晚年的歌德虽再次被爱情点燃青春的激情，但此时的诗人已对爱情的全部滋味品尝殆尽。诗人从自身的经历中提取出爱情的几大元素：欢娱，痛苦，别离，重逢和忧伤，对爱情这种既使生命迷醉又令人无限忧伤的人生际遇做出了经典阐释。

在另一首被命名为《重逢》的诗中，歌德又将爱情的发生比喻为创世时上帝说“要有光”的那伟大、神圣的一刻，这首诗被公认为《西东合集》的绝唱：

这竟然可能！星中的明星，/我又把你紧抱在怀中！/唉，分隔之夜，那是何等/无底的深渊，无限的苦痛！/是的，就是你！对我的欢情，/你是甜蜜可爱的佳偶！/我想起了过去的苦闷，我就要为眼前发抖。

当世界还在深渊底层，/偎着上帝的永恒的胸怀，/上帝就安排最初的时辰，/他开口说了一句："要有！"/就听到一声痛苦的呻吟，/投入现实之中的万有，/气势磅礴，雷霆万钧。

光明辟开，黑暗就此/战战兢兢地跟它离分，/各种元素也在同时/分道扬镳而各奔前程。/各自匆匆地奔向天涯，/就像进入混乱的梦境，/在莫测的空间里僵化，/没有憧憬，没有和鸣。

万籁俱寂，一片荒凉，/上帝第一次陷于孤独！/他于是就创造出曙光，/曙光很怜悯这种痛苦；/她从浑浊之中展开/一场和谐的色彩游戏，/万物又能相亲相爱，/不像先前互相分离。

急急追求自己的目标，/各求适合自己的本性，/感情和目光又转向到/那种无穷无尽的生命。/不管是抓紧还是掠取，/只要能够保持牢靠！/安拉更无创造的必需，/他的世界由我们创造。

就这样，驾着曙光的翅膀，/我被带到你的唇边，/繁星之夜用无数印章/巩固我们的美满良缘。/我们不论是喜是忧，/总是地球上的范例，/即使再说第二次："要有！"/也不会再次使我们分离。

读了这首诗不能不使人相信这样一种说法：和老年歌德写的

情诗相比，青年歌德写的那些爱情诗歌简直算不了什么。就像老诗人在诗集中自况的那样，将要熄灭的烛火的最后光明是最耀眼的，那短暂的光芒足以洞穿黑暗的世界里的昏暗的心灵。

约会，密码书信，孤独、焦虑、渴望和惊喜，歌德来了又去，玛丽安涅去了又来，玛丽安涅为歌德买了土耳其的日月勋章，歌德给玛丽安涅送去象征爱情的银杏叶，《西东合集》中的诗篇像春草一样迅速蔓延，不断增长着自己的绿色。

然而梦幻中的东方世界真的能将歌德活跃的精神触角全部收拢，“苏来卡”扑面而来的爱情真的使他忘却了现实世界，忘却了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对他的指责，忘却了他这个世界主义者所崇拜的拿破仑吗？

丘比特在左边溪旁/吹起笛声，/玛福斯在原野右方/吹起号声，/耳朵被悦耳之声/引向那边，/却又听喧嚣之声/将歌声遮掩。/笛声在战雷声中/越吹越有力，/我变得发狂发疯；/这是个奇迹？/两者越来越嘹亮，/笛声和号声，/我已经错乱，发狂；/这可是惊人？

——《歌人之书·分裂》

对于结实的新扫帚，/旧扫帚总觉得憎恨，/旧扫帚本也是扫帚，/新扫帚却不肯承认。/有些国民互相轻视，/彼此反目，分道扬镳，/他们谁也不肯承认/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不满之书》

怎么？骗人的僧侣，你们诅咒/霸主煽起的强烈的暴风！/如果安拉派定我做蛆，/他早把我造成蛆虫。

——《不满之书·帖木儿说》

真主乐意给穆罕默德赐以/保护和幸福，有谁感到不高兴，/让他去拿一根很粗的绳子，/在家中最坚固的屋梁上扎

紧，/自己去上吊！绳子吊得很坚牢，/他就会觉得他的怒气全消。

——《不满之书·先知说》

梅基农之义——我不想说，/它的意思就是狂人；/可是，请不要责怪于我，/如今我以梅基农自称。/

当我怀着一片真诚，/出声呼叫，要救救你们，/你们别嚷："这是狂人，/去拿锁链，去拿麻绳！"/

当你们看到贤智之士/终于憔悴在缧绁之中，/你们徒然在一旁注视，/会觉得如被荨麻刺痛。

——《不满之书·梅基农之义》

就像受到攻击的鸵鸟，头颈钻进了沙子，身体却露在外面，如果不是雄厚博大的天才，有谁能将这被描述为吸引的逃避转化为如此绚烂有力的与现实遭遇的诗篇呢？滑稽与悲壮，梦幻与现实，史诗与喜剧，醉言与真言，粗鲁与文雅，祝福与诅咒，诗人与酒保，帖木儿与先知，……五彩缤纷的色调就这样统一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东合集》的世界里。"狂人"，"错乱，发狂"，也许没有其他更好的词来形容1814至1815年的歌德和他的《西东合集》了，在《西东合集》里，歌德挥洒的不仅是他成熟精湛的诗艺，还有他一生的智慧锻造成的对社会人生的真知灼见，《西东合集》不是一个静态、死板的世界，它是一曲癫狂的舞蹈，它像它脱胎而出的现实世界一样在跳跃，在飞速旋转。

1815年3月1日凌晨，一只小船队载着拿破仑和他的将军、军官、士兵从流放地厄尔巴岛回到法国大陆。3月20日晚上9时，拿破仑进入巴黎，国王全家逃亡。6月，滑铁卢之战，拿破仑被彻底击败，威灵顿声名大振。8月，歌德去法兰克福，在维勒玛家住了5周，接着去了海德堡。10月11日，歌德再次从自

己心爱的女性的爱情中逃跑，回到魏玛自己的家中。10 月 15 日拿破仑被流放到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第二次巴黎和约签定。英国取得海上霸权。俄国占领波兰。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建立“神圣同盟”。

面对拿破仑的最终失败、欧洲大陆的封建复辟和德国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得意狂妄的叫嚣，歌德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法国化也好，英国化也好，/意大利化、德国化也好，/无论是谁，总不过是/出于利己心的需要。

因为，如果不是由于/要显示自己怎样了不起，/那就不会对许多人/或对某一人加以重视。

邪恶之事，只要在今天/能够让它畅行无阻，/那就不用考虑明天/正义怎样受人拥护。

对于三千年来的历史，/如果不知道正确解释，/就让他陷于愚昧无知，/度过一天一天的时日。

——《不满之书·法国化也好》

这是同胞的爱好和愿望，/不管他写德意志、条意志，/可是，歌儿却暗暗低唱：/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

——《不满之书·任何事物只默默发展》

就这样，歌德怀着高傲的冷漠和愤怒，将失败者和胜利者的一切都一笔抹平了，以此来表明他对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否定和对拿破仑的深深敬意。

4 年后的 1819 年，也就是歌德 70 岁时，《西东合集》出版。为了诗集的发行，歌德亲自撰写了广告，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尽管已著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并拥有众多追随者的黑格尔盛赞《西东合集》“编了一串抒情的明珠，其中幻

想的热烈和丰富是古今所没有的”；尽管《西东合集》的出版在德国文坛上引起了所谓“东方热”，这部如今被视为“歌德老年乃至一生最辉煌的诗集”的《西东合集》的第一版的较大部分在歌德死后数十年仍没有卖出去。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于当时的一般德国读者来说，《西东合集》这部叙述歌德精神游历的宏大史诗，如同痴人说梦，这部带着1814至1815年喧嚣的璀璨诗集，就像大西洋中载着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迅速消失在世俗人心的汪洋之中。

第九章

百川归海

丧妻

就在1815年歌德与玛丽安涅相恋的日子里，克里斯蒂安娜患了重病，她已接近了生命的最后尽头。

自从1806年正式成为歌德夫人后，克里斯蒂安娜就获得了进入上流社会社交场所的权利。就在那一年，哲学家叔本华的母亲约翰娜·叔本华第一个向克里斯蒂安娜敞开了自己沙龙的大门，两年后，公爵夫人也开始允许歌德在舞会上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她。表面上看，上流社会禁区的打破应该在家庭内部和外部都给克里斯蒂安娜带来很多好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克里斯蒂安娜偶尔也十分高兴能到宫廷里走走，但她并

不喜欢经常与那些挑剔、文雅的贵夫人们来往，为了促使克里斯蒂安娜到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去走动一下，歌德有时甚至不得不使用命令的口气。

克里斯蒂安娜最喜欢的是与大学生和军官们交往，后者活跃、随意、狂放不羁的风格很适合她那市民女子快乐、素朴的天性，而当她在贵族圈子中表现出这些本色风格时，却常常会使那些贵妇们感到颇受惊吓，并使在场的歌德十分尴尬、难堪，在一次有公爵夫人参加的假面舞会上，就不幸出现过这样的场面。对克里斯蒂安娜爽朗、素朴的平民习性，歌德从来也没试图加以改变过，过去，他喜欢的正是克里斯蒂安娜身上的这些不同于贵族女子的独特之处。克里斯蒂安娜喜欢饮酒和跳舞，而歌德在《西东合集》中就有整整一大篇《酒保之书》来赞美醇酒。在歌德看来，肉体是一座监狱，灵魂是被骗进监狱的囚徒，而美酒则是打开监狱、释放灵魂的解放者。歌德时常在家中和克里斯蒂安娜对酌对饮，饮酒，成了他们两人增进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克里斯蒂安娜发胖以前，歌德也一直很喜欢看克里斯蒂安娜跳舞，55 岁时的歌德写给克里斯蒂安娜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既感人又让人发笑的文字："最近如果有机会，一定把你在信上提到的那双最近跳舞时跳出个窟窿的新鞋给我寄来。我是多么希望能把你的一个什么东西紧紧地贴在我的心上。"

尽管克里斯蒂安娜越来越胖的身体阻止了歌德继续对她的舞姿表示兴趣，但这并不妨碍克里斯蒂安娜以此来自娱自乐，而且随着爱心的松弛和孤独感的增强，克里斯蒂安娜对酒也开始有一种自暴自弃式的沉溺。饮酒带给克里斯蒂安娜的更多不是灵魂的解放，而是疾病，是"借酒浇愁愁更愁"，是心灵的下跌与堕落。正像克里斯蒂安娜无法挽回歌德对她昔日的爱一样，歌德也无法使克里斯蒂安娜像过去那样照顾自己和家庭。过去，克里斯蒂安

娜虽然也经常出去跳舞、饮酒，但娱乐并没有妨碍她收拾家务，她甚至还要求歌德为她购置了一块地产，当上了非常精通买马卖马的女地主，甚至还出售自己菜园里出产的蔬菜。但婚后，随着歌德对婚姻的背叛，克里斯蒂安娜也越来越疏于家务，狂热地投入到了与大学生和军官们的交往中，对歌德交代的事情，也常采取一种马马虎虎的态度，令歌德十分恼火。孩子长大了，不再依赖母亲，这对克里斯蒂安娜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克里斯蒂安娜的姑妈和妹妹都已去世，大屋子里安静了，却也使克里斯蒂安娜陷入了更广大的孤独之中。歌德并没有因为家中安静了便经常呆在家里，在克里斯蒂安娜患病的这一年，他便有半年之久没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过去，在那首《阿明塔斯》中，歌德表达的是对克里斯蒂安娜欲罢不能的矛盾和割舍不下的眷恋，而现在，人们看到的则是《亲合力》中对于难以摆脱的婚姻的沮丧和痛苦。结婚对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娜来说并不是一种在结合初期自然发生的与青年人的爱情有关的事情，而是一种典型的对于天长日久辛勤服侍的报恩，是爱情的最终总结，它反映的是几乎全然与爱情无关的、一个老人对他的生活依靠者在未来生活中的要求。

不是吗，自从席勒去世后，甚至在席勒还未去世的时候，克里斯蒂安娜就由情人变成了歌德的护士和保姆，像绝大多数男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大，歌德越来越在生活上表现出对克里斯蒂安娜的依赖态度，靠着克里斯蒂安娜的照顾和精神支撑，歌德走出了疾病和席勒去世带给他的生命危机，接着，仿佛传奇一般，克里斯蒂安娜又在刺刀下救出了歌德的性命。可以想像，如果歌德不是一个渴望创造、渴望抓住生命的最后岁月来给自己头脑中的那些活跃、纷扰的思想和形象赋予完美艺术形式的天才的话，克里斯蒂安娜会和歌德一起度过幸福的晚年。但兵乱之险带给歌德的不只是对克里斯蒂安娜的感恩和婚姻的最终确定，战争提醒

了歌德死亡的到来，促使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准则进行反思和调整，而民族战争和对新的资本主义时代下产生的诸种时代精神和社会现象的不适应，也使他的内心难以平静、安定下来。一连串的情感波折接踵而至，仿佛第二个青春时代突然降临，这些迟暮之年的爱情带给歌德又一部成功的小说和大量诗歌，带给克里斯蒂安娜的则是更多的遗忘和冷落。“人们责备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说他竟然还在追求年轻的女子。‘这是’他说，‘这是返老还童的唯一手段，这是谁都梦寐以求的呵。’”这就是从《亲合力》奥蒂莉的日记中发出的爱德华——歌德的呼声。

1815年的疾病并未使克里斯蒂安娜完全垮下来，但1816年6月，克里斯蒂安娜的健康却被连续爆发的疾病彻底摧毁了。当歌德得到妻子病重的消息急忙从耶拿赶回魏玛时，歌德自己连同他的仆人也都一起病倒了。

6月6日，也就是在歌德返回魏玛的第二天，克里斯蒂安娜就永远离开了人世，去世这天，她刚好满51岁，而67岁的歌德当时也正病倒在自己的床上，没能陪她度过她生命中的最后时刻。

为了悼念与自己共同生活了28年的妻子，病中的歌德为克里斯蒂安娜写了四行悼念诗。但与其让那几行并不出色的诗句做为我们对克里斯蒂安娜这个将自己的生命与伟人连在了一起的女性的最后叙述，不如让另一首歌德写在《威尼斯警句》中的诗篇去安慰克里斯蒂安娜那孤独辞世的灵魂，让幸福的时光永远陪伴她，因为正像歌德不仅带给她耻辱、孤独和背叛，还带给她爱情、光荣和富足一样，克里斯蒂安娜也不只带给了歌德束缚与烦恼，还带给了他自己的青春、儿子、十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无微不至的照料，甚至还有歌德的第二次生命。

“啊，我的脖子有点肿!”我的好人说着，/很担心，——别嚷，爱人！别嚷！听我讲：/维纳斯的手摸过你；她对你轻声预示，/她就要使你的娇躯不停地改变。/她就要破坏你苗条的身段、可爱的乳房，/全部都在膨胀：新衣服也穿不上。/尽管安心吧！落花乃是给园丁预示，/可爱的果实就要在秋天结出。

克里斯蒂安娜去世这一年，歌德完成了《意大利游记》第一部。

狮子狗的风波

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魏玛公国成为大公国，领土扩大了两倍，卡尔·奥古斯特成为大公，魏玛枢密院改为内阁，歌德也升任魏玛大公国首相，年俸增至3000塔勒。尽管歌德更换了头弦，他仍主管文化教育工作，而且在克里斯蒂安娜去世后的一段时间，他将很大精力用在了魏玛剧院的管理上。

过去，在席勒的有力协助下，歌德将魏玛剧院办成了德国剧院的典范，他们不仅在魏玛演出，还去疗养胜地作巡回演出，不仅获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功，也赢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培养了自己的大批观众。席勒去世后，歌德在一段时间里很少过问剧院的事务，但妻子去世后，他又开始在剧院里频繁出现，并且让儿子奥古斯特到剧院里做了自己的助手。

本来，在歌德放松自己对剧院管理权的一段时间里，大公的第二夫人雅格曼已发展了她在剧院的势力，歌德重新回到剧院，并紧锣密鼓地实行各种改革措施，势必要和雅格曼的权欲发生冲突。不久，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使歌德和雅格曼之间久已存在的

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1817年3月，一个巡回演出的喜剧演员途经魏玛，请求歌德准允他和他的狮子狗在魏玛剧院表演独幕剧《狗奥勃里》。歌德本着维护魏玛剧院品位和尊严的原则，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但这个演员并不死心，他又直接找到了卡尔·奥古斯特大公，请求大公恩准他和他的狗的表演。卡尔·奥古斯特答应了喜剧演员的要求，并让人把自己的意见通知了歌德。

过去，歌德从不违拗卡尔·奥古斯特的决定，但这次他却不想对大公让步。歌德再一次拒绝喜剧演员和狗登台演出，这使奥古斯特大公极为恼火。奥古斯特已经60岁了，他和歌德保持了40多年的友谊，甚至对拿破仑战争态度上的分歧也没能使他和歌德之间产生深刻的敌意，但这一次，在雅格曼的怂恿下，他把这件应由剧院内部解决的一般性事务看成了与歌德在威严上的较量，因此，他决定不顾歌德的再次否决，坚持让喜剧演员和他的狗登台表演，并派了一个导演将自己的决定再次通知了歌德。

显然，大公的决定意味着他要在歌德面前显示自己的君主权力，而并不是出于他对狮子狗的个人喜好，因为如果他想看狗表演的话，他完全可以让演员把狗带到宫廷里而不必到剧院里去演出。歌德意识到了这一点，感觉出自己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就要与大公发生激烈冲突，但他仍不想亲自践踏自己为剧院制定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先拖延一下，然后采取回避的态度。歌德先让给他带来大公口谕的导演第二天再来商量有关演出事宜，接着，便动身到耶拿去了。像当年去意大利时一样，歌德给卡尔·奥古斯特大公写了一张先斩后奏的便函，请大公允许他不出席狮子狗表演的观看。

这显然是一种对大公旨意的不满和抵抗行为，甚至连封·施泰因夫人和席勒夫人都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歌德不想照两位

夫人所说的那样让克内贝尔居中调停，他似乎也决心要在卡尔·奥古斯特尤其是雅格曼面前捍卫自己不只是作为一个剧院领导者的尊严和威望。

卡尔奥古斯特被彻底激怒了，他一气之下解除了歌德魏玛剧院总监的职务，而且不仅把该决定通知了各部门，还把写有以下文字的布告贴在了剧院里：

"……据悉，枢密顾问封·歌德先生希望解除他作为剧院总监的职务，特此照准。"

这不仅仅是对歌德职务的解除，这种大动干戈的方式是对歌德在魏玛地位的极大贬低和羞辱。面对无可挽回的僵硬局面，歌德给卡尔·奥古斯特写了这样一封毫不退缩的谴责信：

"殿下，尽管这类事情过去已屡见不鲜，不过，最仁慈的殿下不仅能屈尊玉成我的愿望，而且能先于别人想到我的愿望，这就意味着我保留这种愿望是不无权力的了……因此，请接受我的谢意，我感谢您对我的恩典以及我在任期间受到的宽宥；所以，我认为，您也会俯允我将来在我希望我尚有某种经验和知识的事务中发挥我的影响。"

卡尔·奥古斯特因为一条狮子狗而解除歌德剧院领导职务的暴君式行为，激怒了一批因仰慕歌德声望而来剧院工作的演员，他们继歌德的儿子之后，纷纷离开了魏玛剧院，以此来表示对歌德的同情、支持和对卡尔·奥古斯特的抗议。显然，无论是喜欢狮子狗还是因为女人，卡尔·奥古斯特这样做的理由都不是冠冕堂皇而是会遗全世界以笑柄的，他意识到这一点，主动去耶拿和歌德缓和关系，但歌德已看出大势所趋，再也不愿在与雅格曼的较量中耗损自己的精力和尊严了。

这一年，歌德完成了《意大利游记》第二部。

不过，剧院风波并未彻底损伤卡尔·奥古斯特和歌德之间的

友好关系。在歌德的晚年，求知欲又促使卡尔·奥古斯特密切了自己与歌德的关系，他经常到歌德家去，甚至拥有歌德家围墙门的钥匙，随时都可以到歌德家里听歌德给他谈论文学之外的种种有趣话题。在歌德家，卡尔·奥古斯特从来不吸烟，当歌德家有客人在场时，他称呼歌德时也总称“您”，以此来表示自己对歌德的尊敬。卡尔·奥古斯特 70 岁生日那天，歌德专门在家里设宴向他表示庆贺，还激动地对他说了一句：“至死在一起。”

卡尔·奥古斯特于 1828 年 6 月 14 日死于中风。作为一个为歌德提供了巨大优遇的科学文艺保护者，作为第一个在自己的公国里制定并实行了宪法的德国封建君主，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应是誉多于毁吧。

新世纪

> 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大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是凡是现在才出生的人都不可能得到的。他们只能从书本上学习上述那些世界大事，而那些书又是他们无法懂得的。

这段被反复引用过的文字出自 1824 年 2 月 25 日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单从这段文字，我们无法看出歌德在走过这些历史大事时的坎坎坷坷，正像歌德所说的我们无法通过教科书来全面把握过去的人类历史一样。

对歌德来说，对新时代的适应早在上世纪末德国浪漫派兴起

时就开始了。那些浪漫主义者最初极力把歌德拉向自己的阵营，继而就开始显示出更加独立的立场，公然成了歌德的竞争者和敌对者，或者反过来说更合适一些，那就是具有浓厚复古倾向和天主教色彩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自始至终就没有博得歌德的真正好感，尽管歌德曾接受早期浪漫派对他的赞誉并在魏玛剧院里大力提携过施莱格尔兄弟的本。在 1829 年 4 月 2 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把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称做“病态的”文学，他说：

> 我把“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尼伯龙根之歌》就和荷马史诗一样是古典的，因为这两部诗都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最近一些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并不是因为新，而是因为病态、软弱；古代作品之所以是古典的，也并不是因为古老，而是因为强壮、新鲜、愉快、健康。如果我们按照这些品质区分古典的和浪漫的，就会知所适从了。

无论是对德国的浪漫派诗歌还是对德国的浪漫派绘画，歌德都持十分强烈的厌恶和否定态度，但对国外的浪漫主义作家、作品，歌德却极为赞赏和推崇，尤其英国的杰出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更是以其特异的个性和卓越的才华令歌德赞叹不止。拜伦也极为敬仰比他年长几乎一倍年龄的歌德，当他准备渡海到希腊去支持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时，他把歌德写给他的信和诗作为出航的吉兆，并希望从希腊返回时能去德国拜访歌德，而在此之前，他已在自己的历史剧《萨达纳帕卢斯》上写下了给歌德的献词：“一个陌生人冒昧地以一个藩臣所献于他的王侯的敬礼，献礼于伟大的歌德，这位创造了他自己国家的文学并光耀了欧洲文学的现代作家的泰斗。”

在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中，记载有大量歌德对拜伦的谈论，有赞誉，有批评，无论贬誉，都有其恰切独到之处，反映出歌德对拜伦这个年轻而又能与他比肩的异国天才诗人的深刻理解和洞察。不过，歌德并不把拜伦看作是一个浪漫派诗人，他在1827年7月5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说：

> 除掉拜伦以外，我找不到任何其他人可以代表现代诗。拜伦无疑是本世纪最大的有才能的诗人，他既不是古典时代的，也不是浪漫时代的，他体现的是现时代。我所要求的就是他这种人。他具有一种永远感不到满足的性格和爱好斗争的倾向，这就导致他在密梭龙基丧生，因此用在我的《海伦后》[1] 里很合适。就拜伦写一篇论文既非易事，也不合适，我想抓住一切恰当的时机，去向他表示尊敬和怀念。

由于拜伦和拜伦之死，歌德改变了原来设想的《海伦后》的结局，这既可以解释为拜伦给歌德带来了灵感，也可以解释为歌德要“抓住一切恰当的时机”向拜伦“表示尊敬和怀念”。

对于新建立的君主立宪体制，歌德也显得极难适应，他反对新宪法，对大公授予市民和农民以参政权力的做法不以为然。显然，歌德的政治立场与很多实际问题有直接关系，比如，在过去，他可以直接向大公申请文化建设方面的款项，而现在，如果他打算购置一批古希腊罗马雕塑的仿制品，他就得在枢密会议上小心谨慎地征得市民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同意，而他们也许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

对于学生运动，歌德也采取一贯的否定、压制立场，这倒不

---

① 即《浮士德》第二部第三幕。

是因为他敌视学生们的进步要求，而是因为他认为学生们的做法对改变现实毫无益处。1817年10月底，全德大学生在瓦德堡集会，纪念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反对教皇出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问世300周年，要求统一德国，并提出用黑—红—黄三种颜色做为德国统一的标志。对于大学生和教授们的高涨爱国热情，卡尔·奥古斯特大公极力表示赞同和支持，甚至亲自率领五百名德国青年去路德山庆祝德国的自由日。集会中，大学生们发表要求和捍卫自由的演说，并焚烧了投靠俄国的反动作家科策布的政治作品。大学生们的集会引起了奥地利、俄国和法国政府的恐慌，他们把魏玛视为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决定以高压手段对魏玛和大学生们进行惩罚。

歌德对大学生们的集会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当他看到学生们面临被抓捕的危险时，又忍不住要站出来保护这些可贵的年轻人，尽管他表面上仍板着一副让人感到难以接近的冷漠面孔。

歌德一直怀着欣喜的心情密切注视着新时代在自然改造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蓬勃发展。轮船和电报机，苏伊士运河的开凿，美洲新大陆的建设，所有这些都刺激了歌德的创作，被他及时吸收到了自己的作品中。对未来的世界，歌德并不持完全乐观的态度，他看到了随新时代一起到来的不加节制的贪欲和由此造成的盲目发展、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短期效应以及传统的断裂，但速度、传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无疑也使歌德看到了另一种较为有利的可能性，那就是“世界文学”的产生。在1827年1月31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明确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20年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这个名词将再次出现。

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

百上千的人创作出来。这个诗人比那个诗人写得好一点，在水面上浮游得久一点，不过如此罢了。马提森先生不能自视为唯一的诗人，我也不能自视为唯一的诗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只应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

显然，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内涵和我们今天提到“世界文学”时从其中领会到的诸种含义还有极大的不同，但无论如何，歌德敏锐的目光已自觉地、清楚地开始把整个世界的文学生产纳入到一个共时的不相隔离的视野中来了。

最后的玫瑰

当拜伦从意大利渡海到希腊，准备将生命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入到捍卫自由的壮烈事业中去的时候，歌德的生命中也掀起了最后一次激情的波澜。

早在1821年夏季，歌德就在马里恩巴德温泉疗养地认识了17岁的少女乌尔莉克·莱维佐夫小姐，并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乌尔莉克家一共有三个女孩，乌尔莉克是老大，她们的父亲早已去世，母亲和外祖母一起在马里恩巴德经营由一位奥地利伯爵——乌尔莉克母亲的情人建造的一栋房屋。歌德10多年前就在卡尔斯巴德疗养地结识了乌尔莉克的母亲，所以每当到马里恩巴德，他都租住乌尔莉克家经营的房子。

乌尔莉克说不上特别漂亮，但她年轻，充满了少女纯洁的魅力，歌德开始时把她看成一个可爱的女儿，后来就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她。在歌德眼里，乌尔莉克的褐色卷发像克里斯蒂安娜和玛丽安涅，淡蓝色的眼睛柔和而温馨，闪烁着青春的梦幻色彩。

到完成《随军征法记》的1822年夏季，歌德对乌尔莉克的爱情已经发展到了难以和她分离的地步，而随之而来的次年初春的一场大病，使歌德对乌尔莉克的渴望更加强烈起来。那是在二月份，歌德接连八昼夜持续发烧，医生们束手无策，歌德也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然而，他竟奇迹般地又活了下来，而且身体也很快又恢复了健康。

1823年7月，歌德再次来到马里恩巴德的乌尔莉克家，他显得精神抖擞，心境爽朗，但当他听音乐时，却常常止不住流泪，暴露出内心的孤独、情感的脆弱和精神的病态。在给儿媳妇奥蒂莉的信中，歌德写道：

> ……你本人将感到，正是在此时此刻和拜伦告别，对于我来说，这意义多么深远而巨大。我觉得，在假面舞会中，我突然了解到在我的生活中应当起关键作用的东西。但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的只能是带来欢乐和喜悦的具有魔力的青春，这个作用也许要大大超过它原来所希冀和理解的程度，

从而使它感到非常惊讶。……

拜伦的生平和他此时投入到又一次人生历险中去的行为，显然深深刺激了歌德。和歌德意境高远的作品相比，拜伦的诗歌具有真正的开阔视野和由独立不羁的性格造就的伟大，拜伦的存在，使歌德看到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人生可能性，而与这种人生相比，歌德自己的生活显得狭小、拘谨、灰暗，就像浮士德布满灰尘的书房和屋外田野中明媚的阳光的对比一样。歌德既不可能成为英国贵族，更不可能像浮士德一样重新恢复青春，但他可以极力延长生命，可以让爱情在他的生命中制造出第二个青春。

“人们责备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说他竟然还在追求年轻的女子。‘这是，’他说，‘这是返老还童的唯一手段，这是谁都梦寐以求的啊。’”十几年前，为刚缔结的婚姻所困的歌德只是在小说里发出这种渴望青春的呼声，现在，他已没有婚姻的束缚，可以自由地去追求他所渴望的爱情。当然，一个19岁，一个74岁，年龄过于悬殊，但地位和声望给了歌德跨越年龄障碍的勇气，他怀着极大希望祈盼他的求婚能够成功。

8月，乌尔莉克一家去了卡尔斯巴德，歌德也随后到了那里。在卡尔斯巴德，歌德度过了自己74岁生日，9月，在他即将离开卡尔斯巴德的时候，他请卡尔·奥古斯特大公为他向乌尔莉克家提亲。

乌尔莉克的母亲显然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她回答得很委婉，说要考虑考虑再说。这样，歌德不得不失意迷茫地与乌尔莉克告别。在归途上，他写出了那首著名的《马里安巴德哀歌》，将渴望、不安、自责、失意、憧憬、梦幻中的满足和清醒中的绝望，全部倾泄在了这首长达138行的诗里：

> ……
>
> 如今紧锁心扉，自怨自怜；/……/烦恼、悔恨、自责和忧愁的/重负，如今窒闷着我的胸膛。
>
> ……/她赐给我许许多多美好回忆，/如今已成重负，我必须摆脱。/难忍的渴慕逼得我坐立不安，/除了无休止的流泪，别无良策。
>
> 让我留下吧，忠实的旅伴，/留在山崖边和沼泽中，独自一人！/你们只管前进！世界对你们/辽阔广大，天空对你们崇高光明；/……

显然，歌德已明了了自己爱情的无望，让他难以接受的不是爱情被拒绝本身，而是他由此感到了自己已被打入另册，被彻底关到了青春的门外。这种感觉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是极其残酷可怕的，这使歌德此后的八年岁月，都变成了与死亡的愤怒搏斗。

父与子

爱情的挫折和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打击本来就够歌德承受的了，回到家里，他又经受了一场严重的吵闹。魏玛人纷纷传言歌德又要结婚了，这使歌德的儿子奥古斯特极为恼怒，他担心父亲的婚姻会使他失去一部分遗产，因此，不顾一切地和父亲大吵大闹，甚至威胁说要搬到柏林去。奥古斯特对父亲的凶蛮、冷酷的态度毫不足怪，要弄清他对歌德感情冷漠的原因，还得从他从小的教育成长说起。

歌德 40 岁时才得了儿子奥古斯特，因此对儿子极为看重和珍爱。开始时，他和儿子一直保持着比较紧密的联系，给儿子做玩具，带儿子去伊尔梅瑙参加节日游行，去矿泉疗养地时也把儿

子带在自己的身边，父子两人就像一对好朋友，奥古斯特有什么心里话都对自己的父亲诉说。

随着奥古斯特年龄一天天增大，他需要的父亲的关怀和影响也就越来越多，但恰在这时，奥古斯特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他不得不大部分时间都跟母亲在一起。歌德经常到耶拿去，有时一年中有半年不在家，这样他便难以和奥古斯保持经常、直接的接触，父子之间的感情变得越来越疏远了。

也许是长期生活在私生子阴影里的缘故，也许是因为更多地遗传了母亲的素质和接受了母亲的影响，奥古斯特虽然继承了祖、父辈爱好整齐的习惯，却未能继承父亲的诗歌才能。歌德最初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把儿子送进大学去学法律，不过不是去斯特拉斯堡，而是海德堡；后来又为儿子在卡尔·奥古斯特公爵那里谋到了法庭陪审员的职位。1817 年春，歌德又让儿子做了魏玛剧院的理事会成员，但随着狮子狗风波的掀起，奥古斯特马上又离开了剧院的职位，这件事对奥古斯特的一生所具有的意义，也许远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无足轻重。就在 1817 年，歌德为儿子办了婚事，被选中的女子拥有一个和《亲合力》的少女主人公同样的名字——奥蒂莉，娘家是普鲁士没落贵族。奥蒂莉与其说是看上了奥古斯特本人，还不如说是看中了歌德的地位和名望。

表面上看，歌德似乎为儿子的幸福做到了一切，但实际上，他恰恰是在尊重奥古斯特的个人意志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奥古斯特也想参军随公爵出征，但歌德阻止了他，并给公爵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爵解除奥古斯特的军职。虽然奥古斯特从军可能丢掉性命，但是当他看到他的伙伴们安然无恙地归来并听到他们对他的嘲讽的时候，他对父亲可能抱有的所有感激也就多半转化成了委屈和怨恨。歌德为儿子选定的婚姻同样没给奥古斯特带来幸福，奥蒂莉既对奥古斯特

没有深挚的感情，对家务管理也没有多少兴趣，夫妻俩常常吵吵闹闹，甚至当着歌德的面，两人也会吵个不停。

作为一个名人之后，奥古斯特不仅未能达到歌德的高度，甚至未能成为父亲的一个有力助手。他既参与不到父亲的创作中去，也参与不了父亲的科学研究，只能帮父亲保管个别稿件，承担一些杂务。出于男子汉的自尊心，也出于世俗的虚荣心，奥古斯特并不甘心在父亲的荫蔽下循规蹈矩地生活，他甚至从未表示过喜欢读父亲的作品，反而热烈称赞席勒和父亲的对头科策布，当然，他也崇拜拿破仑。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其《歌德传》中为我们提供了奥古斯特背着父亲写下的这样一首诗歌，在诗中，他表达了自己渴望获得独立、自由的心情：

> 我至死非常厌恶/没有独立行动的自由。/一旦获得自由，我就开始勇敢地/沿着死亡的/深渊滑走。/我破碎了的心粘合不在一起，/它再也不跳动，既然它已停息……/所以，倘若要计算出日期，/只有当我还没有停止呼吸。/我要摆脱一切羁绊，/为了把美好的未来顾盼。

但奥古斯特始终没能获得他所渴望的自由，在高明的父亲眼里，儿子的任何想法都显得极其愚蠢，这和歌德年轻时与自己父亲的关系大为不同。也许一切都应归罪于奥古斯特没有受到很好的早期教育，——歌德工作很忙，不能像自己的父亲那样亲自来教育儿子；也许只能怪奥古斯特自己的先天素质不好，——这使歌德的一切努力都显得徒劳；也许如果奥古斯特生在别的家庭里命运会好一些，——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父亲的非凡使他的平凡成为可耻，他既无力超过父亲，也不能使自己具有平常心。实际上，奥古斯特并不需要超越自己的父亲，关键是他找不到自己的

目标和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他所缺乏的是内心的踏实感和成就感。在奥古斯特所得到的东西中，几乎没有一件是经过他自己的努力奋斗而得来的，这对某些人来讲可能是好事，但对另一类人来说，却会使他感到自己毫无用处。

这样，奥古斯特就像一个可怜虫似的被紧紧钉在了父亲为他选定的位置和道路上，既没有上升的能力，也没有下坠的自由，只能整日在酒中找刺激，到外面去寻欢乐，脾气既暴躁，又孤僻、阴郁，并且内心里越来越自暴自弃。

可怜的歌德，面对儿子咄咄逼人的态度，只好收拾起内心的隐痛，竭力对儿子表示会慎重对待自己的婚姻问题，一场家庭的骚乱才慢慢平息下来。

一场疾病已必然地开始酝酿，但在它到来之前，歌德又幸运地得到了一次短暂的心灵抚慰。11 月，波兰女钢琴家玛丽亚·什马诺夫斯卡亚和她的妹妹来魏玛拜访歌德，歌德为她们在家里举办了音乐会，接着，又举办了晚宴。玛丽亚·什马诺夫斯卡亚与歌德在马里恩巴德相识，她 30 岁左右，具有漂亮的相貌和迷人的风姿，在马里恩巴德时，歌德就常听她弹琴，和她一起散步，还为她写了一首题为《抚慰》的诗，后来，这首诗与《马里恩巴德哀歌》一起收进了《爱欲三部曲》。玛丽亚的到来给歌德充满敌视的家庭带来了一缕阳光，当她几天后与歌德告别时，歌德感到自己仿佛被独自一人留在了黑暗里。在目送玛丽亚离去后，歌德控制不住内心惶恐不安的感受，又冲动地令人将已离开的玛丽亚追了回来，再次与她拥吻告别，泪水从老人的眼里夺眶而出。歌德拥抱的哪里是玛丽亚，他与之告别的分明是他再也得不到的青春的生命和与之相伴的爱情的幸福！

玛丽亚走后，歌德马上就病倒了。当他的老朋友策尔特碰巧来看他时，竟发现歌德家中没有人在关心歌德，奥蒂莉和她的妹

妹都不在，而奥古斯特则似乎仍在对父亲愤愤不平。

眼前的情景实在令策尔特心痛和难以忍受，他留了下来，决心承担起照顾老朋友的职责。策尔特陪歌德谈心，病中的歌德将自己的恋爱经历尽情地对老朋友倾吐，还让策尔特把《马里恩巴德哀歌》一遍又一遍朗读给自己听，甚至在身体恢复些后又亲自将哀歌重抄了一遍，珍爱地将它放在自己从马里恩巴德带回的银杯里，仿佛那样就能留住逝去的爱情。

歌德追求乌尔莉克的这一年，奥古斯特 34 岁，五年后，40 岁的奥古斯特终于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歌德同意儿子去意大利旅行。

在意大利，奥古斯特先气跑了陪同他的爱克曼，后来又摔断了肩胛骨，紧接着又得了重病。1830 年 10 月，作为歌德独子的奥古斯特终于因脑溢血而死于罗马，结束了自己忧郁、苦闷的一生。在奥古斯特病重期间，他仍一直在信中向父亲和家人隐瞒自己的实情，这似乎表明他渴望死，也许实际上，他很久以来就一直生活在有意无意的自我摧毁之中。奥古斯特的尸体被就地埋葬，而毫不知情的歌德在儿子死后 12 天还在给儿子写回信！当夏绿蒂·布甫的儿子最终把奥古斯特已死的消息转告给 81 岁的歌德时，老人说了一句让人痛彻肺腑的话——

> 我知道，我生了个死儿子！……

40 年前，正是在意大利，歌德在他的《威尼斯警句》中为儿子写下了充满深情祝愿的诗句，其中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动人的父爱亲情：

> 当爱人跳动的心向你初次表示爱，/你把她热烈地抱在

怀里，真开心。/在爱人腹中有个新生命不断地成长、/搏动，你觉得他时，那就开心。/他已想学顽童跳跃；他已很不耐烦地/跳动，渴望见到天日之光。/再等几天！时序女神就要来领你/进入人生的路程，按命运指使。/不管你遭际如何，日渐成长的爱儿——/你由爱而生，爱情也将归于你！

那时，这首诗使人倍增对那幸运的幼儿的羡慕，现在，它却只反衬出奥古斯特人生的可悲和命运对歌德的作弄。虽然歌德似乎早已对儿子失去了信心，但活着就是希望，而现在，盖棺定论，歌德感到自己后半生的一切努力和辛苦都付诸东流。81岁的歌德不得不看着儿子先自己而去，在废物的位置上结束了一生。

收割

从1824年起，歌德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生命的最后总结中去了，他要完成手中未完成的主要作品，要为自己的一生和过去的时代留下一幅文字的肖像，此外，他还要对自己去世后围绕自己的作品可能出现的一切情况作出安排，以确保自己的后代从中取得不受侵犯的利益。

为了实现最后一项目标，歌德在多方面进行了巨大努力。早在1816年，以奥地利为首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德国34个君主国和4个自由市就组成了“德意志联邦”，并在法兰克福设立了由各成员国（市）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议会主席由奥地利代表担任。歌德向联邦议会提出申请，要求保证自己的两代后裔拥有继承他的稿费的唯一特权，与此同时，他又向多方发出呼吁，甚至也向丹麦国王和荷兰国王请求支持。最后，歌德获得了成功，他

从维也纳得到了对他申请的特权予以保证的羊皮纸文件，这在德国历史上还史无前例，它显示了歌德在当时德国和欧洲的巨大威望和影响力。

的确，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老年歌德像王侯一样到处受人颂扬，他是那些能在生前就看到自己被作为伟人崇拜的幸运者之一，浪漫派在报刊和讲台上的赞扬与批评使他的创作在席勒之后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与研究，而来自国外的巨大声誉则使他在国内的地位更加稳固和提高。当歌德在马里恩巴德过 74 岁生日的时候，耶拿的大学生们为庆贺他的生日举行了游行，而在歌德 80 岁诞辰纪念日，魏玛剧院上演了他的《浮士德》第一部。慕名到魏玛来求见歌德的人来自世界各地，歌德的介绍信成了人们求职、应聘的有力证明书。对新时代的人们来说，歌德代表的是必须加以正视的人类历史，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人们就已为他建造半身胸像和纪念碑。

为了完成第二项目标，歌德除了继续写作《诗与真》、《意大利游记》等自传性作品外，还整理出版了《与席勒通信集》；更重要的，他选定了一个新的崇拜者作他的喉舌——爱克曼，他写了一部诗论《论诗，特别引歌德为证》，把它和一些诗歌一起寄给了歌德，希望歌德为他向出版商推荐，接着，又于 1823 年 6 月到魏玛拜访了歌德。歌德留下了爱克曼，让他做自己的私人秘书，并介绍他做了大公家的家庭教师和大公夫人的图书馆员。爱克曼几乎每天午后都和歌德在一起，听歌德对他谈论种种话题，也就有关问题向歌德请教，回去后，他就把当天所谈论的内容记载下来，于是后人就得到了一本对研究歌德非常重要的著作《歌德谈话录》，它记录了从 1823 年 6 月 10 日爱克曼第一次去拜访歌德到 1832 年 3 月歌德去世约九年间里歌德与爱克曼的重要谈话，内容涉及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神秘

感应等诸多方面。就文学而言，歌德不仅阐述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和对有关写作的诸多技术性问题的看法，还对过去和当时的文坛及作家进行了评论，其中包括对拜伦、司各特、贝朗瑞、雨果、司丹达尔等19世纪的非德语作家的评论。

就第一项目标而言，除了各种文稿的整理外，歌德于1827年5月至6月创作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在以后的时间里，又陆续写作了一些诗歌散篇，1829年，歌德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到1831年，最终完成了一生的纪念碑——《浮士德》。

《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从1807年开始动笔，全部完成于1829年，在这部小说中，歌德续写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的主人公威廉的故事。威廉和罗大略的妹妹娜塔丽结婚后，为了实现"塔楼会社"的社会计划，他再次外出游历。为了帮一位贵族找到女儿，威廉暂时将儿子寄放在了一个代表理想教育模式的"教育区"里，在找到贵族的女儿后，他又去意大利寻访了迷娘的故乡。最后，威廉找到了生活的答案：一个人应掌握一项专门技能，以此来造福社会。于是，威廉做了一名医生。小说结束时，成为医生的威廉带着妻子和儿子，与朋友们一起迁居到了一个遥远的世界，在那里建设起了自己的乐土。和《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相比，《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具有更少的情节性和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人们甚至说歌德简直把这本小说当成了存放他以前书信和文章的全部思想的巨大仓库。这样一来，这本小说很难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但对研究歌德思想的专家学者们来说，它却是一本非读不可的作品。小说中插入了很多歌德以前写的中篇小说，其中《新梅露西娜》一篇最为著名。

诗剧《浮士德》是歌德一生思想和创作的总结性作品。浮士德的故事最早见于16世纪德国的民间传说，在以后的漫长岁月

中，这个题材始终吸引着众多作家、艺术家对它进行自己的演绎，而在十八、十九世纪，作家们对它的热情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般认为，歌德的两部《浮士德》是浮士德题材作品中最好的作品，它是插有歌舞的诗体悲剧，具有史诗的宏大规模，同时又具有真正的悲剧性质和莎士比亚式的丰富。歌德从1773年开始构思《浮士德》，1775年完成了《浮士德初稿》，1790年发表了《浮士德片断》，1806年完成了全剧的第一部，1831年7月22日完成了第二部从而也就完成了全剧，前后历时60年，可谓倾注了一生的心血。

悲剧的第一部不分幕，只分场，讲述的是浮士德的知识悲剧和爱情悲剧，剧前有〈献词〉、〈舞台序剧〉和〈天上序幕〉三个附加成份。

〈献词〉约写于1797年，抒写的是创作中断多年后重新续写《浮士德》时的心情。〈舞台序剧〉写的是“经理”、“剧作家”和“丑角”的对白，三人的观点共同体现了歌德对舞台艺术的看法：既要追求艺术的卓越，又要满足观众的娱乐需要。“经理”的最后道白可以看作该剧的艺术宗旨——追求多样性：“……/指挥大小天光，/调遣普天星辰；/水、火、岩壁样样不缺，/还得有走兽飞禽。/要在这狭小的舞台上，/历遍宇宙乾坤，/以从容不迫的速度，/从天堂通过人间而入幽冥。”〈天上序幕〉写的是天帝和魔鬼靡非斯特的赌赛。出场的除天帝和靡非斯特外，还有众天使和三位天使长。三位天使长的唱词为悲剧勾画出从天界到海洋的宏大背景，而天帝和靡非斯特的对话则提示了该剧的情节线索——靡非斯特将去人间诱惑浮士德，——并阐明了该剧的精神纲领：“人在努力追求时总是难免迷误”，“一个善人即使在黑暗的冲动中/也一定会意识到坦坦正途。”〈天上序幕〉不仅确立了全剧的精神纲领，提示了剧情和人物性格，也为全剧确立了

争辩的基调，在以后的整个剧情发展中，靡非斯特的声音一直既作为否定的声音而存在，也作为争辩的声音而存在，使全剧富有哲理思辩色彩。

从第一场〈夜〉到第五场〈莱比锡的奥尔巴赫地下酒店〉之前的四场展示的是浮士德“知识的悲剧”。当大幕拉开时，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中世纪一间有穹窿屋顶的哥特式狭隘居室，里面有各种祖传的家具，书堆重重叠叠，直堆到屋顶，用烟熏了的旧纸遮盖着，还有一排排实验用的器械、瓶罐，年过半百的浮士德博士正不安地坐在书案边的靠椅上，手里拿着一本法国占星术家米舍尔·诺特尔大牟的魔术书，通过独白，他向我们倾吐了胸中的忧闷：

“唉！我到而今已把哲学，/医学和法律，/可惜还有神学，/都彻底地发奋攻读。/到头来还是个可怜的愚人！/不见得比从前聪明进步；/……/我虽然比一切纨绔子弟，/博士、硕士、文人和僧侣较为聪敏；/没有犹豫和疑惑使我苦闷，/我对地狱和魔鬼也不心惊——/然而因此我的一切欢娱都被剥夺干净，/别妄想有什么直知灼见，/别妄想有什么可以教人，/使人们幡然改邪归正。/我既无财产和金钱，/又无尘世盛名和威权；/就是狗也不愿意这样苟延残喘！/所以我才把魔术钻研，/……”

浮士德厌倦了建立在对自然和人生做有限甚至谬误解释基础上的中世纪知识体系，也厌倦了单调、灰暗的书斋生活，他开始钻研预言家们的巫术书籍，希望从中找到打开未知之门、改变当前匮乏处境的钥匙。结果，大宇宙的幻景令他觉得空洞缭乱、无所适从，而被他满怀希望唤出的地灵却令他觉得面目可憎。地灵

愤愤然消失了，但地灵的当头棒喝，却使浮士德清醒地认识了自己的卑微，而学生瓦格纳的愚蠢更让浮士德感到自己人生的无聊和难以忍受，于是，他想以自杀来摆脱一切，但复活节的钟声响了，天使们唱起了庆贺基督再生的颂歌。对基督教持憎恶、敌视态度的歌德在此再一次肯定了宗教对人的强大审美感召力，——浮士德被庆贺基督复活的钟声和歌声打动，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和耶稣一道由死亡走向了新生。在具有莎士比亚式群众场面的第二场〈城门前〉中，被复活节的钟声唤回生命欲望的浮士德带着他的学生瓦格纳，和熙熙攘攘的人流一起，到城外游春。学徒和学生们的喧闹，侍女和市民姑娘们的叽叽喳喳，乞丐的乞唱和市民们对市政、时世的评论，驼背的老太太和精神抖擞的士兵，这一切都使浮士德感受到一种盎然的生活意趣，而郊外田野的景象和村民们欢快的舞姿更使他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但即令如此，浮士德仍摆脱不了烦恼的纠缠，村民们的感激反而使他想到了父亲和自己的拙劣医术不知害死多少本该治愈的病人！苦恼的浮士德在黄昏中再次向空中呼唤精灵，希望有魔衣载上他“到奇都异国去远征”。随着他的呼唤，靡非斯特化成一只黑色卷毛狗来到了他们眼前，并跟他们一起回了城。在接下来的第三、四两场〈书斋〉戏里，浮士德和显形的靡非斯特订约：靡非斯特答应满足浮士德的一切愿望，而一旦浮士德心满意足，他的灵魂就归靡非斯特所有。其中，第四场是全剧的重头戏之一，它正式提出了全剧的主情节，将以后的剧情发展置于赌赛的胜负悬念之下；靡非斯特的个性特征和多重角色意义也得到了初步展示：他既是一个觊觎人的灵魂的恶魔，具有厚颜无耻、玩世不恭、诙谐机敏的性格特征，又是一个睿智的社会、人类的批判者，具有诗人代言人的角色承载。抱着“原始有为”的信念，浮士德准备和靡非斯特踏上旅程，后者用大衣作飞行器，他要带浮士德“先看

小世界，再看大世界”。

接下来的两场戏是从第一个重头戏向另一个情节高潮的过渡。第五场〈莱比锡城的奥尔巴赫地下酒店〉展现了大学生们喝酒胡闹的狂乱情景，这种低层次的感官刺激当然不是浮士德所要追求的东西，于是，在第六场〈巫厨〉里，靡非斯特将浮士德带到了巫女的厨房。喝了巫女魔汤的浮士德变成了一个比原来小30岁的英俊青年，他从魔镜中看到了一个代表完美女性概念的女子的身影，对她着了迷，但靡非斯特阻止他沉迷于镜中的虚幻，要带他去经历真实的爱情。

从第七场〈市街〉到第二十五场〈囚牢〉即第一部的结束，写的是浮士德经历的第二个人生悲剧“爱情的悲剧”，这是诗剧第一部的主要段落，也是《浮士德》中最精彩的戏剧段落，在这个包括十九场戏的段落中，剧情地点转移到了阿尔卑斯山畔的一个小城，在这里，歌德向我们展示了从市街到闺房，从花园到教堂，从井泉边到城廊，从森林洞窟到囚室的诸多场景，变化多端，异彩纷呈。通过兄长、邻家妇等人物的引进，歌德在这里组织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悲剧故事，起承转合，五脏俱全，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出独立的市民悲剧：浮士德爱上了美丽纯洁的市民姑娘玛嘉丽特，在靡非斯特的帮助下，他终于赢得了姑娘的爱情并实现了自己的爱欲。但浮士德的爱情给玛嘉丽特平静的生活带来了灾难：玛嘉丽特的母亲被过量的安眠药夺去了生命，玛嘉丽特的哥哥则在与浮士德和靡非斯特的打斗中被剑刺死，而玛嘉丽特本人因溺死了自己的私生子而被关进了死囚牢。倍受外在打击和内心自我谴责折磨的玛嘉丽特陷入了神智迷乱的绝望状态，当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潜入狱中要救她出去时，她断然予以拒绝：痛苦已使她心灰意冷，浮士德身边的魔鬼更使她胆战心惊，绝望中她只有向上天呼喊，只渴望在天父的慈爱中得到保护，浮士德只好忍

痛离去。“爱情悲剧”的内涵是多方面的。玛嘉丽特的悲剧既反映了自由爱情与世俗陈规的冲突，也展示了难以克制的情欲给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从这种意义上说，玛嘉丽特既是封建世俗道德和宗教法规的牺牲品，也是浮士德的情欲的牺牲品。在这里，浮士德主要表现为一个诱惑者，一个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的人。他为自身强烈的情欲所迷惑，虽然明知自己就像奔腾的“瀑布”、“亡命者”、“流浪汉”和“茫无目的和宁息的恶汉”一样不可能给玛嘉丽特带来能使她的爱情得到保护和许可的婚姻，而只能使她成为牺牲，却仍旧千方百计地让靡非斯特帮助自己达到占有玛嘉丽特的目的。在这里，靡非斯特对浮士德的怂恿和诱惑实际上代表的是浮士德的自身情欲对他的怂恿和诱惑，浮士德对靡非斯特的谴责实际上体现的是浮士德的内心斗争和自责，靡非斯特已成为浮士德心中的恶魔的外化，或者说靡非斯特和浮士德已成为一体。继第二十场怀孕的玛嘉丽特的教堂祈祷之后，诗人为我们安排了一场〈瓦卜吉司之夜〉的魔鬼狂欢，这场戏不仅与前面第二场〈城门前〉的风格似中求异，造成美学效果上的连续与反差，也使我们看到魔界与人世只有一墙之隔，而从人世到天堂却路途遥远。在这里，浮士德对魔女的道白与他和玛嘉丽特说话时风格迥异，正像他对靡非斯特所询问的，他已搞不清自己是否已成为恶魔中的一员：

> 我做一梦真有趣：/梦见苹果树一棵，/两个苹果耀枝头；/诱我攀上树梢去。

此时浮士德的智性已荡然无存，在我们面前的是魔鬼浮士德，直到从舞伴嘴里猛然跳出的红鼠把他的魔性吓跑，远处玛嘉丽特披枷带镣的凄惨身影才进入了他的视野。借助于这种分解和

象征手法，歌德将人类自身的尴尬处境生动形象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一方面，人的智慧和理性已高度发达，以至于妄想与神比肩，连“二级天使”地灵都不放在眼中；另一方面，他又难以使自己完全从动物界中摆脱出来，难以摆脱情欲对他的控制；人类面临的实际上是浮士德式的矛盾处境——“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情欲和理性的冲突，精神和肉体的对抗，这是人类自身难以解决的困惑，是处在自然与社会的夹缝中的人的命运悲剧。从这种意义上说，浮士德本人也只是人类命运绳索上的傀儡，他无力超越人类自身的局限，把“神的肖像”变成真正的神。紧接着〈瓦卜吉司之夜〉，歌德安排了一场剧中剧——〈瓦卜吉司之夜的梦——或奥伯龙与蒂妲妮娅的金婚式〉，借用莎士比亚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仙王、仙后角色，将现实中的诸多人物吸纳进来，形成了一个现实的万花筒，为诗剧增添了几分政论杂文色彩，那种戏谑、嘲讽的辣味，颇似当年歌德与席勒合作的讽刺短诗的风格。

从第二部开始，《浮士德》进入了一个更为开放、明朗的话语情境，歌德在 1831 年 2 月 17 日与爱克曼谈话时曾说：“……上卷几乎完全是主观的，全从一个焦躁的热情人生发出来的，这个人的半蒙昧状态也许会令人喜爱。至于下卷，却几乎完全没有主观的东西，所显现的是一种较高、较广阔、较明朗肃穆的世界。谁要是没有四面探索过，没有一些人生经验，他对下卷就无法理解。”

第二部共分五幕，第一幕写的是浮士德的“政治悲剧”。当浮士德继监狱一场戏后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正在暮色朦胧中躺卧在繁花似锦的草地上，往事俱已烟消云散，一大段对自然的颂歌昭示出他内在的奋发昂扬的精神。在靡非斯特装扮的小丑的引领下，浮士德在第二场走进了帝国皇城，开始了他的从

政生涯。作为德国封建诸邦朝廷的缩影，皇城里集中反映了德国社会政治的各种矛盾，只会诉苦的大臣们心急如焚，向皇帝提出了一大串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皇帝却左顾右瞻，不明白“为什么要上朝议事劳心焦思!”通过首相、兵部大臣、财政大臣和宫内大臣向皇帝的禀奏，以及他们同靡非斯特的对白，歌德将存在于封建国家社会上和宫廷内的千疮百孔悉数揭露在我们面前。接下来的第三场〈毗连众室的大殿〉和第一部中的〈瓦卜吉司之夜的梦〉构思相似，只是场面更为盛大，且弥漫洋溢的世俗气氛代替了森森鬼气，不论戏剧节奏，还是人物构造，都不似〈瓦卜吉司之夜的梦〉那样紧张、局促。在化装舞会上，靡非斯特和浮士德装扮的“瘦人”——吝啬和普鲁图斯——财神在虚幻中向垂涎欲滴的人们展示了大量金银财宝，同时他们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而向皇帝献策发行纸币、开掘矿藏。虽然稀里糊涂的皇帝在化装舞会上签署了发行纸币的命令而事后对此竟全无一点记忆，但纸币发行造成的繁荣和平却使他得到了颂扬和安宁。他像卡尔·奥古斯特委派歌德开发伊尔梅瑙矿山一样任命浮士德和靡非斯特管理国家的矿藏，接着又让他们去召唤希腊美人海伦。海伦在魔术的虚幻中出现了，和她在一起的还有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或译为巴黎斯等)。当帕里斯要将海伦劫走的时候，完全被虚幻情景感染了的浮士德禁不住要挺身相救，结果，魔法世界消失，浮士德本人被从魔力中释放出来的能量炸伤，从而结束了他的“政治悲剧”。在整个第一幕中，浮士德失去了以往清晰的轮廓，在虚化、象征等经济手法中变得模糊不清，直到最后一场海伦出现的戏，他才又恢复了在第一部中的明确性，从庞大纷攘的宫廷生活中突现出来。就人物塑造而言，没有哪一幕比这一幕中的浮士德形象更为单薄了，诗人将大部分笔墨都用在了反映国家状况和宫廷内部的人文环境上了。在第七场“骑士堂”中，歌德借海伦的出

现，为上流社会的宫廷妇女勾画了一幅群丑图，对她们狭隘昏昧的内心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揭露。

第二幕主要写浮士德等人的古典世界之游，也分七场。幕启时，场景由富丽堂皇的宫殿又转回到浮士德狭小敝陋的书斋，但星转斗移，昔日浮士德的学生瓦格纳已成为大学者，拥有了自己的助手，并造出了一个人造小人，而那个诚惶诚恐地向靡非斯特请教过的学生已成了学士，咄咄逼人，目空一切，反过来把靡非斯特训斥了一通。第二场〈中世纪风格的实验室〉展示的是与第一场共时的另一个场景：瓦格纳在实验室里制造人造人，这一景象令人想起歌德早年钻研炼金术的经历。当靡非斯特在学士离开后来到实验室时，人造人霍蒙苦鲁斯正在长颈瓶中诞生。霍蒙苦鲁斯具有卓越的智慧，他被仍处于昏迷中的浮士德的梦境所吸引，建议将浮士德送至“古典的瓦卜吉司之夜”，以避免浮士德醒来后发现海伦的幻影消失而遭受打击。靡非斯特接受了霍蒙苦鲁斯的建议，于是人造人霍蒙苦鲁斯在前面发光引路，靡非斯特以大衣携浮士德紧随其后，三人一起离开了中世纪的书斋，来到了希腊东北部彭纳涅斯河流域的帖撒利平原。从第三场到第七场，诗人引领我们穿越了从上古到希腊时期的诸神世界。渴望找到海伦的浮士德在司芬克斯[①] 的指点下由希隆[②] 带到了巫女曼陀的住所（诗人在第三场交代出是曼陀用巫术控制了古代鬼魂，帮助浮士德使海伦脱离了冥府），靡非斯特则在与妖女们的调情

① 希腊神话中狮身女人面的有翼怪物，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向过路人提问谜底为“人”的谜语，被英雄俄狄浦斯破谜而死。在埃及神话中，司芬克斯无翼。

② 又译为喀戎，是希腊神话中人首马身的马人，公正善良，富于智慧，是阿喀琉斯等诸多英雄的老师。

谄笑中变成了戈耳工女妖的姊妹福基亚斯[1] 们的面孔，而人造人霍蒙苦鲁斯“颇想真实地诞生”，最终将玻璃瓶碰碎在海中神女迦拉特[2] 的贝车上，在火与水中，加入生命的轮回，走上了真实生命的诞生之路。在第二幕中，神话世界和对自然奥秘的探究成为诗人关注的重点，神话世界带给作品的更多是审美和背景价值，而对生命起源的探究则宣讲着歌德一贯固守的唯物论立场。

第三幕分三场，展示的是浮士德追求美的悲剧。第一场开幕时，场景由帖撒利平原转移到了更南方的斯巴达，在海伦的丈夫梅纳劳斯的宫里，刚从特洛伊归来的海伦正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会被丈夫杀死祭神，已变作福基亚斯模样的靡非斯特乘机向海伦进言，将她诱进浮士德的城堡。在这里，与其说巫女曼陀帮助浮士德从冥府中领出了海伦的亡魂，不如说靡非斯特和浮士德穿越时间隧道改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艺术形式上，该场采用了希腊戏剧中的歌队形式，通过海伦与靡非斯特、合唱队的对白，诗人重新讲述了神话传说中的海伦的故事，并将自己的主人公编织进了古老的神话之中。第二场，海伦等人在靡非斯特的引领下，从古典样式的王宫来到了浮士德在斯巴达北部兴建的中世纪风格的城堡，身着骑士宫廷服装的浮士德尊海伦为女王，海伦由古典父权世界里的女人变成了中世纪女性崇拜文化氛围里被骑士迷恋和效忠的贵妇人。正当浮士德与海伦两情缱绻、难舍难分之时，梅纳劳斯大敌压境，演出了又一场“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和怯弱的帕里斯形成鲜明对照，浮士德慷慨陈辞：“只有出死力保护

---

[1] 戈耳工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面孔能使人变成石头的墨杜萨是其中之一。福基亚斯又称格赖埃姊妹，是戈耳工女妖的三位姊妹，把守通往戈耳工女妖住处的路途，三人合用一只眼睛和一颗牙齿。

[2] 迦拉特即伽拉忒亚，是希腊神话中的海中神女，平静而闪光的海洋的化身。

女人的男子，才配得到女人的恩典。”他将国家四方边境的领土分封给日尔曼、哥特、撒克逊、诺曼等各族将官，以促使他们拼死捍卫自己的领土。在这一场中，浮士德完成了他在第一幕中所没能做到的事情——将国家权力掌握在手掌之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俨然一派拿破仑、惠灵顿的气魄。第三场〈树木荫蔽的林苑〉是“美的悲剧”的核心。浮士德与海伦结合生下的儿子欧福良不安于和平快乐的生活，渴望投入危险的战争，结果飞得过高，从空中坠落而死，形体消失，只留下衣服、披风和利拉琴，而海伦也从浮士德的眼前消失，再次回到冥府，浮士德怀里只剩下海伦的衣服和面纱，它们化作云彩，带浮士德脱离幻境，重新回到了现实之中。整个第三幕带有浓厚的梦幻寓意特征，时空、人物交错，古希腊、中世纪、现代社会连为一体。在海伦身上，歌德寄托了自己的古典审美理想，而欧福良则代表了拜伦扬厉奋发的浪漫主义精神。歌德曾明确指出过欧福良与拜伦之间的联系，剧中对欧福良的挽歌，实际上也就是歌德对拜伦的挽歌。

从第四幕开始，浮士德进入了他生命最后阶段的追求——“事业的悲剧”。第四幕开幕时，浮士德从云端降落到一处峭拔嵯峨的岩顶，片片离去的浮云显示出他内心还保留着对魔幻经历的记忆，但他既无惋惜，也无哀叹，他的内心奇迹般地保持着健康的性格、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和充沛旺盛的精力。靡非斯特此时已对自己缺乏信心，禁不住询问浮士德：“难道地球上丝毫没有使你满意的东西?”浮士德的回答大出靡非斯特所料：“我要获得权力和产业！/名声等粪土，事业是一切。”“我要振作精神，大展雄图，/与海斗争，将水制服。”接下来，作为对第三幕中正面描写战争场面的缺失的补充，诗人进入了对战争的描写。浮士德曾经服务过的皇帝与叛军交锋，浮士德和靡非斯特纠集人马前去助战，结果，靡非斯特用魔术制造出洪水幻影击退了叛军，浮士德

护驾有功，皇帝将那片浮士德早已看好的海滨荒滩赏赐给他，浮士德准备在那里移山填海，创建自己的辉煌国度。该幕中，歌德以夸张的笔法塑造了一个贪婪的大主教形象，他借口上天来谋私利，饕餮之口几乎吞下了整个帝国，甚至连分到浮士德名下的海滨荒滩也不放过。在这个人物身上，诗人表达了对虚伪宗教的极端憎恨和厌恶。

第五幕是“事业悲剧”的延续，也是全剧的结束和总结，分七场，包括三个主要情节：一对老夫妇的悲剧，浮士德之死和浮士德灵魂的被救。在第一场〈旷野〉中，诗人通过住在海滨的一对老夫妇与一位他们曾搭救过的旅人的对话，交代出时世的巨大变化以及存在的矛盾冲突：浮士德的事业已取得了很大成功，昔日波涛汹涌、泡沫飞溅的海滩，现在已变成了牧场、园圃、村落和森林，沿海修筑了堤坝，开凿了运河，草原上也矗起了浮士德的王宫。但浮士德的意志并没有完全得以实现，老夫妇的房舍和林中的教堂还都没有按照他的规划拆迁或摧毁，这使他日夜不得安宁。在第二场〈宫殿〉中，浮士德命令航海归来的靡非斯特去迫使老夫妇迁移，第三场〈深夜〉写老夫妇受驱赶者惊吓而死，旅行的客人在受伤后葬身火海，教堂也在火焰中夷为平地。浮士德在感到遂心如愿的同时又对老夫妇和旅人的惨死而深感歉疚不安，这时，“忧愁”便乘机向他袭来。第四场〈子夜〉写浮士德与“忧愁”的对话，它和前三场一样具有明显的寓意象征色彩。在前三场中，教堂代表即将逝去的封建时代的正统权利和观念，老夫妇既代表久远的文化传统——他们的名字出自神话传说，又代表封建时代的世俗民众。资本主义势力的崛起，不仅冲击了封建官方政权，更给附着在旧时代肌体上的民众带来了灾难，使他们成了旧时代的无辜殉葬品。虽然从新时代的诞生来说这种牺牲并非没有价值，但从人道主义的观念来看，那种肆意践踏生命的

行为却是不可原谅的罪恶行径。正因如此，浮士德的心头才涌起了忧思。“忧愁”吹瞎了浮士德的眼睛，象征浮士德无法摆脱人类共同的命运——盲目，也象征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在这一场中，浮士德表面上仍慷慨激昂，但在台词对照中，我们却不难在彼此相互消解的言论中发现隐在的怀疑，这一点恰和歌德对现代社会所持的保留态度相一致：

> 我只是匆匆地周游世界一趟；/劈头抓牢了每种欲望，/不满我意的，我抛掷一旁，/滑脱我手的，我听其长往。/我不断追求，不断促其实现，/然后又重新希望，尽力在生活中掀起波澜。/……/在前进中他会遇到痛苦和幸福，/可是他呀！随时随刻都不满足。

这段浮士德的台词如果用下面“忧愁”的两句诗——“人的一生是盲目无睹，/浮士德，你如今到了末路！”——加以阐释，就完全变了味道，浮士德的自我表白恰好印证了“忧愁”所指出的人的行动的盲目性。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与魔鬼同行的一系列探索经历，浮士德如今已不再需要魔鬼来给他的生活添注生命活力，他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所在，魔术已成了他的累赘——

> 我迄今尚未在自由状态中斗争，/但愿魔术离开我的生命途程，/并把咒语忘得一干二净，/哪怕在大自然面前是只身孤影，/也值得作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第五场是全剧中具有总结性的一场，双目失明的浮士德沉浸在事业的成就和进一步的开拓计划带给他的兴奋之中，对人生做出了自己最后的总结：

这是智慧的最后结论：/人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浮士德满足了，在对理想世界的憧憬中，他喊出了“你真美呀，请你暂停！”但实际上，这仍是他在“劈头抓牢”自己的欲望，他是满足在对动态的肯定与向往上，因此，他的满足并不意味着停止。另一方面，与其说浮士德是死于满足，不如说是死于衰老，死于自然力，这种安排与浮士德对人生的认识相一致：人永远也不应满足，只有死亡才能终止他的追求。从以上意义上讲，靡非斯特当然不能得到浮士德的灵魂，因此，接下去的第六、七场，写的便是浮士德的灵魂升天堂的情景。这种安排，与其说是出于对宗教的信仰，不如说是出于艺术形式方面的考虑，歌德本人对此曾有明确的解释。

综观第五幕，“忧愁”与失明的构想是总格调中的不谐和音，也是诗人表达思想的重要符号，在激昂奋发的主旋律外，它们似隐若无地发出一种柔细的音调，轻轻诉说着自己的怀疑。可以说，此前浮士德所经历的，都是诗人所熟知的过去时代，而第五幕中描述的，则是诗人正在经历的时代。歌德敏锐地感觉到了资本的力量和它的全部肮脏之处，面对无法解决的矛盾，他选择的是对人生做非整体性或社会性的考察，而将人类拉回到生生不息的自然界中去。人每时每刻都要去追求，在地球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这说明了什么呢？指明了方向又没有指明方向，这就是这个智慧的最后断言的悲剧性所在。对浮士德的肯定实际上仍停留在肯定生命冲动的意义上，在浮士德的行为中，体现出的是一种个人的生命意志，而非他所说的“为千百万人开辟疆土”，后者只是前者的产品而非出发点，海盗行为、强征民夫、驱逐老夫妇，

都是这一点的有力证明。当靡非斯特行凶时，他只是浮士德野心的爪牙和化身，而浮士德的内疚，则是高于个人意志的社会观念的反映。故事的结局，一切都向强大的生命意志让路，这是无法解决的人生和社会矛盾中的权宜之计，是人面对有局限的人生所能采取的唯一积极的态度。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浮士德》的辩证思想才是彻底的，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浮士德才能最终进入天堂。

正像人们所公认的那样，浮士德是一个具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特征的不断进取者的形象，是个《神曲》中但丁似的人生探索者，是个具有矛盾性格的复杂艺术典型。在浮士德还未出场的〈天上序幕〉中，靡非斯特就为浮士德的矛盾性格初步勾画了一幅躁动不安的肖像——“……尘世的饮食他不爱沾尝。/他野心勃勃，老是驰骛远方，/也一半明白到自己的狂妄；/他要索取天上最美丽的星辰，/又要求地上极端的放浪，/不管是人间或天上，/总不能满足他深深激动的心肠。”第一幕第二场中，诗人让浮士德通过与瓦格纳的对白进一步进行了自我阐释——“哦，你只懂得一种冲动/永不会把另一种认清！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以固执的官能贴紧凡尘；/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歌德对浮士德“原始有为”的思想和奋发进取的人生态度无疑是肯定的，而且从多种意义上说，浮士德都具有歌德自画像的色彩，但我们必须看到，浮士德身上同样隐含着诗人的怀疑和迷惘，浮士德的选择也许是人在其自身和社会的局限条件下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但决不是完美的选择。

和浮士德形象相比，靡非斯特在诗剧中是一个灵活多变的角色，他既代表哲学意义上的虚无，又象征伦理意义上的恶，同时又具有智者的特征。在〈天上序幕〉中，诗人通过天帝之口对靡

非斯特的作用和性质进行了阐释："人的活动太容易弛缓，/动辄贪求绝对的晏安；/因此我才愿意给人添加这个伙伴，/他要作为魔鬼来刺激和推动人努力向前——/……"在第二部第二幕第四场中，诗人又借司芬克斯之口对靡非斯特评价说："善人和恶人都少不了你，/对善人你是甲胄，磨练刺击，/对恶人你是帮闲，胡作非为，/而两者都使宙斯大神感到有趣。"在诗剧中，靡非斯特在很多情况下扮演了一个睿智的社会批判者和真理揭示者的角色，是诗人观点的代言人，如在〈天上序幕〉中靡非斯特对人类的一段评价，既反映了他作为一个魔鬼而对人生价值所采取的虚无观和他自身的否定性质，又替诗人作出了对时常处在迷误中的人类自身行为的深刻反思和辛辣嘲讽——"关于太阳和宇宙，我无话可讲；/我只看见世人受苦难当。/这世界的小神还是老样，/和开辟那天一样荒唐。/本来他可以生活得较为称心，/如果你没有给以天光的虚影；/他把这据为己用而称作理性，/结果只落得比畜生还要畜生。/请恕我直言奉扰，/我看他很像个长脚知了，/不住地飞，又不住地跳，/一头钻进草堆里去唱老调；/如果一直藏在草堆里倒也还好！/他偏爱把鼻子向垃圾当中胡搅。"在第一幕第四场中，歌德还安插了靡非斯特化装成浮士德回答学生问题的情节，对当时的各学科教育和学科内容作了尖锐嘲讽："……法律和权利/像遗传病一样世代承袭；/从前代遗传到后代，/从此地渐次推广到彼地。/善行变成苦痛，有理变成无理；/倒楣的是你们后生小子！/至于我们的天赋权利，/可惜从来没有人问起。……"最后，靡非斯特给了学生一句完全是浮士德腔调的教训："灰色啊，亲爱的朋友，是一切的理论，/而生活的金树长青。"

靡非斯特与浮士德如影随形，既形成对照，又体现着善与恶、肯定与否定、弱与强的辩证关系，靡非斯特的最后失败从作

品自身来看呼应着〈天上序幕〉中天帝的断言，又是天使们得出“不断努力进取者，吾人均能拯救之”结论的前提，而从诗人的角度来说，这一安排则是为浮士德与魔鬼为伍的追求的一生所做的伦理意义上的辩护。

关于《浮士德》的主旨，歌德在 1827 年 5 月 6 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说：“人们还来问我在《浮士德》里要体现的是什么观念，仿佛以为我自己懂得这是什么而且说得出来！从天上下来，通过世界，下到地狱，这当然不是空的，但这不是观念，而是动作情节的过程。此外，恶魔赌输了，而一个一直在艰苦的迷途中挣扎、向较完善境界前进的人终于得到了解救，这当然是一个起作用的、可以解释许多问题的好思想，但这不是什么观念，不是全部戏剧乃至每一幕都以这种观念为依据。倘若我在《浮士德》里所描绘的那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生活能够用贯穿始终的观念这样一条细绳串在一起，那倒是一件绝妙的玩艺儿哩！”

总的来看，我们可以把浮士德的经历看作是一个精神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在这条线索上，诗人融入、串加了许多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真知灼见，从而形成了对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 300 年间欧洲文化的批判性反思，使该剧具有了史诗的规模和巨大的包容量。

当 1831 年 8 月歌德将《浮士德》第二部的手稿装订成册后，82 岁的老人快活地对爱克曼说：“我这一生的今后岁月可以看作一种无偿的赠品，我是否还工作或做什么工作，事实上都无关重要了。”完成了《浮士德》，歌德也就完成了自己生命的纪念碑。

歌德之 1823 年后的岁月是在没有爱情波澜的勤奋工作中度过的，他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工作时间表，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余生的宝贵光阴。除了工作之外，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崇拜者是

歌德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一般情况下，歌德只是礼节性地接待来访者或在家庭茶会上露一露面，但如果遇到特别感兴趣的来访者，他又会个别地与他们进行深入而愉快的详谈。除大公外，策尔特和迈耶尔是歌德家中的常客，有时几位老人并不进行什么交谈，仅是大家坐在一起，就足以感受到彼此的关心和生命的相互支持。施泰因夫人于 1827 年 1 月 6 日去世，78 岁的歌德没有参加她的葬礼，但当施泰因夫人的女友参加完葬礼后前来拜访歌德时，歌德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虽然垂暮之年的歌德在 81 岁时又遭到了独子去世的沉重打击，但儿媳奥蒂莉随着年龄的增长却变得能稳重持家，两个孙子也长大成人，过着令歌德满意的生活，这使歌德在丧子之后不致失去生活的支撑。晚年的歌德仍同玛丽安涅和贝蒂娜保持着书信联系，歌德在临终一个半月前，将玛丽安涅的信用火漆封好还给了她；贝蒂娜的儿子于 1832 年 3 月 10 日前来拜访歌德，他是歌德生前接待的最后一位来访者。3 月 15 日，歌德着了凉，第二天歌德就病倒了。

早在 1831 年 1 月时，歌德就写下了最后的遗嘱。同年 8 月 28 日，歌德度过了自己最后一个生日。那天，他又再次登临伊尔梅瑙，第三次站在自己在山顶木屋的题壁诗前，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群峰一片沉寂，树梢微风敛迹。林中栖鸟缄默。稍待你也安息!”读着旧作，歌德禁不住热泪滚滚，82 岁的老人已预感到了自己生命终结的时刻。这一年，哲学家黑格尔死于霍乱，浪漫主义诗人、贝蒂娜的丈夫阿尔尼姆也去世了。

在病倒的第二天，歌德还能口授信件，但到了 20 日，他便经受了剧烈的肉体痛苦和对死亡的巨大恐惧，后来医生帮他止住了疼痛，他才稍微安定了下来，还用颤抖的手在一份公文上签了字。21 日，歌德的状况似乎显得好了一点，但饮食仍相当困难。歌德极力要同死亡抗衡，甚至还翻阅了几页有关法国七月革命的

一份出版物，并要求仆人给他拿来一个夹子研究颜色学。22日，歌德迎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天早晨，歌德在他人的搀扶下试着走了两步，并在询问日期后说希望春天的到来能使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上午九时，歌德陷入了昏睡状态，他在梦中发出呓语，人们听到他断断续续地说："……您看，多么漂亮的女子的头，多么黑的卷发，在深暗的底色衬托下又显得多么雍容典雅！……打开百叶窗，让更多的光进来！……"十时，歌德请求人们给他一点酒，人们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来，我的小女儿，把小手递给我。"此后，周围的人只能从歌德的手势中感觉到他的思维的延续，他用手指在空中写着什么，人们说那仿佛是个"B"字，接着，他的手就垂落下来了。

公元1832年（即道光十二年）3月22日上午11时30分，歌德在魏玛家中去世。26日，歌德的遗体被安葬于卡尔·奥古斯特大公家的墓地，与卡尔·奥古斯特和席勒同葬在了一处。一年之内，歌德的两位好朋友——画家迈耶尔和音乐家策尔特也相继去世，同年去世的还有英国诗人、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以及法国的拿破仑二世。

正像斯蒂芬·茨威格在《同恶魔的搏斗》中所说的那样，歌德的一生是个圆满的圆，而他的死只是这圆上的一个不起眼的质点，没有给他的生活增添本质的东西；他的死不是英雄式的，他是像家长一样死在床上。但这并不能减少我们对歌德的崇敬之意，就像对克里斯蒂安娜和奥古斯特的叙述一样，我们仍将以歌德《威尼斯警句》中的诗来结束对我们的传记主人公的叙述，——在世界文学史上，他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比肩；他是一个天才，但却不是流星，而是一棵根须深植于世俗社会的参天大树——

众神啊，你们常自称是诗人的朋友。/满足他需要！他要的不过分，却很多：/第一是舒适的房子，其次是稍好的饮食；/德国人对神酒很知味，像你们一样。/此外是合适的衣着，谈得投机的朋友：/还有衷心于他的、消夜的爱侣。/他首先要求的就是这五种实际的东西。/再给我古代和现代语言的知识，/让我能了解各国人民的活动和历史；/给我以纯知，能理解他们的艺术。/给我在群众之中的威望，能影响统治者，/或是在世人之中其他的方便：/行一感谢你们，众神！你们早就成全了/我这幸运者：大部分已经给了我。

主要参考书目

《歌德诗集》，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
《迷娘曲——歌德抒情诗精粹》，杨武能译，漓江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歌德叙事诗集》，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歌德戏剧三种》，韩世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
《歌德戏剧集》，钱春绮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第 1 版
《亲合力》，杨武能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亲合力》，董问樵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第 1 版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董问樵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第 1 版
《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关惠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北京第 1 版
《浮士德》，董问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少年维特之烦恼》，杨武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1 版
《歌德谈话录》，〔德〕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第 1 版
《席勒诗选》，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第 1 版
《人类文明编年纪事》，〔德〕维尔纳·施泰因著，龚荷花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2 年第 1 版
《德国文化史》，杜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第 1 版
《德国文学史》，余匡复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诗与哲学》，〔美〕乔治·桑塔亚那著，华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拿破仑传》，〔苏联〕叶·维·塔尔列著，任田升等译，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第 1 版
《歌德与贝多芬》，〔法〕罗曼·罗兰著，梁宗岱译，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 年第 1 版
《作家与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歌德自传——诗与真》，刘思慕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歌德接受史》，高中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第 1 版
《歌德传》，〔德〕艾米尔·路德维希著，甘木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
《歌德传》，侯俊吉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5 年第 1 版
《歌德传》，〔德〕汉斯·尤尔根·格尔茨著，伊德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 1 版
《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高中甫著，北京出版社 1981 年第 1 版
《六大师》〔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著，黄明嘉译，漓江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歌德传　天·地·人
作者=李大可著
页数=333
SS号=10962342
DX号=
出版日期=1999年01月第1版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